

现代与传统丛书

法兰克福学派史

(1923 - 1950)

(美) 马丁·杰著 单世联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ISBN 7-218-02101-8/B·45

定价：23.80元

法兰克福学派史

(原名《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
和社会研究所的历史 1923—1950》)

(美) 马丁·杰伊 著
单世联 译
陈立胜 校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余小华

封面设计：迪 赛

法兰克福学派史

(美) 马丁·杰伊著

单世联译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佛陶印刷厂印刷

厂址：佛山市石湾忠信路9号

856×1168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385,000字

1996年4月第1版 199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218-02101-8/B·45

定价 23.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现代与传统丛书序

袁伟时

这套书收录的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术著作。

学术研究是探索未知世界的艰苦跋涉。真正的学术著作是联结已知与未知世界的形质各异的铺路石。从小小的单篇论文到长篇巨制，都应在人类文化积累的永无止境的征途中留下自己大小不等的印记。一个中国学者，如果经受不住心灵的孤寂和思考的痛苦，不能坦然对待飞来的横逆和尘世的喧嚣，而冀图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多半是一枕黄粱。而他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奖励不过是发现和创新的喜悦与傲骨的增长。这套丛书是为分享这些探索者的甘苦而存在的。

世界很大，我们的力量很小。当代牵动世界大事莫过于占人类五分之一强的中国人在付出过于巨大的代价后终于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这个过程的各种问题特别是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研究，是本丛书优先关注的课题。

这个小小的园地是开放的。期待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赐予各种优秀论著。既欢迎可以单独出版的优秀书稿，也欢迎几千乃至几万字而新见迭出的单篇论文。有些意义深远而无法找到必要经费的研究项目，我们也愿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

这套丛书是霍英东基金会慷慨支持的产物。当决定拨一笔资金支持这项学术活动时，有关人士只说了一句话：“你对历史负责，

· 2 · 法兰克福学派史

对社会负责。”我一再思考着这句话，企盼越来越多志同道合者乘这个宗旨携手共进。

1995年春于广州中山大学

“只因没有希望，希望才给予我们”

——中译本序言

单世联

当一大批民间学术书刊迅速颠覆主流学术，当传统的汉宋之争以思想与学术、80年代与90年代之争再度搅动中国学人，当话语不同、背景各异的学术集团悄然可见，当一些本与中国无缘的学术如现象学、神学等几成显学……世纪末的中国人文学术确实呈现出某种亢奋和骚动。尽管学人们仍在抱怨市场经济对学术文化的挤压和否定，尽管学术仍然受到相当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和控制，但我们毕竟可以怀着热切而乐观的期待瞩望蠕蠕而来的新世纪。

然而，即使现有的“学术范式”能日趋完善、不断扩张，以至花繁叶茂、硕果累累，我认为也依然不够：中国还需要批判理论。

假如可以把“知识分子”这一极为抽象的群体分为政策知识分子（为政治集团设计方略提供论证）、技术知识分子（以其专业技能参与各分工领域）、自由知识分子（以其社会关切和价值信仰成为一个时代文化精神的表达），那么，我个人不成熟的意见是人文学者应当是属于技术知识分子，即以其专业之学致力于一个知识部门的累进和增长。在其成熟意义上，学术领域也有严格的等级体制和利益分配原则，而人文学者本身也更易于与社会现状相遇而安，因为他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手段本与特定的社会条件没有根本关联。中国市场经济勃兴而学术文化前景看好是一个外在表征；通过学术与思想之争而体现出来的一些学人对激进的

公共介入和思想历险的厌倦和冷漠，则是一个内在证据。

可以认为，当代现实能够为比较纯粹的学者和比较超然的学术研究提供更广大的语境，倒是倡导思想、颇具激烈进姿态的学人在现代甚显因窘。交换原则对精神活动、思想求索的排斥，意识形态的规整和限制，多教学人转向学术而使之徬徨歧路等等，固然相当重要；就思想者自身而言，似乎也缺乏充分的内在动力和准确的谈论对象。究竟何谓“思想”。我看也和其对立面的何谓“规范”一样难以清晰表述，还是不谈为妙。但我愿站在思想者的一边，从“批判理论”的角度谈谈当代“思想”。

首先要说明两点，“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在上帝面前，卑微的人连伊甸园都不能走出，如果一切都看上帝的脸色，人类根本就不会存在。所以上帝自可发笑，人类仍应思考。再一个是，既然像 I·伯林、F·海耶克、R·阿隆等保守人士都是一流思想家，可见思想有多种型态，“批判理论”云云，只是其中之一。

所谓“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在其特定意义上，即是指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社会哲学理论。它以焕发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意识和批判潜能为起点，在整合了精神分析、存在哲学（后期还包括语言哲学、解释学等）等现代思想后，发展为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发达工业社会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和批判。批判理论植根于欧洲传统哲学的核心而又敏感于时代的重大问题（尤其是纳粹的兴起和大众文化的霸权），并吸收当代社会学的经验技术，思想译利，义蕴幽玄，加上人物众多，组织一贯、历时甚久，不但成为当代思想界强有力的竞争者，也是任何现代化国家不能不聆听的清醒之音。

批判理论之所以诞生在德国，有其充分的传统积淀和背景期

待。处在东西欧之间没有“罗马化”的德国，历史地形成了一套独特而深厚的文化传统，拥有可能对现代化运动做出别一种反应的精神资源；而德国现代化的迟缓，又使其思想家可以审慎地对待现代性的突破，揭发现代社会的矛盾和危机，反抗现代性的第一代人物就是德国浪漫派；悲剧性的巧合是，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和人类史上最残忍的奥兹维辛的制造者，德国充分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内在痼疾，提供了不尽的批判话题。最后，活跃于德国思想领域的精英人物，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斗士们，多为摩西的后裔，他们在德国的边缘地位有利于滋养其突兀峥嵘的批判意识。所以广义地讲，批判理论就是德国思想家反省文明历史、批判现代社会的思想学说。席勒对恐怖政治与机械分工的美学否定，青年黑格尔派对古典哲学的实践性转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经济学—哲学分析，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呼号，弗洛伊德对文明压抑人性的揭发，海德格尔早期对西方历史遗失“存在”的发现及晚期对“技术”的敌意等等，均属批判理论的家庭成员。其“家族类似”或可概括为“反抗现代性”。

“反抗”，不是知识精英对现代世界怀旧的、禁欲式的拒绝，而是汹涌澎湃的现代化运动本身激活的精神反应和思想姿态，它正视现代性整体结构中工具理性和功能主义的越位、恣恣的现实，确认现代性的未完成性、改写并扩充现代主义和先锋艺术的否定精神以推进现代性的自我校正。反抗现代性是真正的现代思想。“反抗”也不是暴力行动和革命实践，而是基于人性潜能的理论反思和文化批判。批判理论家认识到，在20世纪被管理的恶梦中，社会总体的力量是如此强大，真正的主体性和自由的力量已分崩离析，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设想的异化回归自身的动力——否定之否定也消蚀殆尽，一切合理的要求只能以缄默的否定

形式出现，理论是向诚实的人们敞开着的实践的唯一形式。因此，批判理论放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实行剧烈变革的主张，拒绝向他们寻求实现其观念的社会力量妥协，自觉选择（或退入）思想领域：“主体与客体、语言和事物不可能在当前条件下整合，我们被否定性原则驱使，企图从虚假结局的残骸中拯救相对真理”（阿多诺）。批判理论把思想和现实、理论与实践对立起来，坚持前者的优先性并反复比较，以超越作为暂时的历史现象的后者。

20 世纪的中国在动荡和恐怖中蹒跚走过。悠久的文明传统与现代世界的冲突所透露出来的，不只是时代的错位和文化的差异，也映衬出现代性的难堪和悖论。而中国知识分子的天下情怀和兼济意识迄今仍积重难消，急速转型的社会结构使知识分子在饱受政治摧残后又遭经济白眼，愈益边缘化、异己化，这些都可能使其本能地接近批判理论。重要的还有，拘谨贫困了数千年的国人在获得经济发展权后，像当年“政治挂帅”一样走向“经济挂帅”，利益标准、物化机制、交换原则渗透到一切非经济领域，精神萎缩、道德失范、艺术衰颓等等已绝非盛世危言。而大众文化却凭借其利润效果和现代传媒迅速播散，客观上操纵着文化主流，诱使文化平庸化、均质化、模式化，使大众丧失自由选择的空间和自我决断的资禀。更遑论从意识形态与技术控制的合流到政治全能和市场乌托邦的循环等一系列严峻的现代性问题了。所有这些，都逐步成为我们当下遭遇的情境，迫使我们向文明的内在演进逻辑和人类的自我管理能力质疑，批判理论也就呼之欲出、在所必需了。随便翻翻有关的文化评论，很少没有批判理论的潜在踪迹。如果思想不同于学术，总是植根于具体的社会状态

并表达人性的理想追求，那么，当代思想首先必须是批判的。只有从这里，思想才能找到自己的激情和想象、灵感和语言。

批判的不谐和音也曾打破古中国的沉寂静阒，如汉末的清议思潮、晚明的儒学异端、近代的入世佛学等，但现代中国却没有批判理论滋长的土壤和空气。实业和科技、革命和政治在民族危机面前被视为中国新生的必由之路，被抛离中心的知识分子急于向总体需要和权力集团认同，少数具有批判气质的人如鲁迅却不得不在大雾弥天、风沙扑面的境况中寂寞无助，“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鲁迅）。客观地说，严格意义的批判理论是现代社会的伴随物，在一个幅员辽阔、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批判理论不但是是一件奢侈品，而且根本没有自己的对象。于是，当现代化在世纪末真正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时，批判理论才终于成为中国社会的内在需要。

但，我们还缺少批判理论的另一个维度：根据和信念。我们何以能够批判现代社会和文化？奥兹维辛肯定是罪孽，因为它灭绝无辜平民。但大众文化比如广告和流行音乐呢？它们不是每天都在殷勤而周到地满足着现代人吗？西方历史上的人道主义、个体自由、幸福等等都是批判理论的基本准则，其中最主要的，首推古典哲学的“理性”。“哲学就是把理性带到世界上的不倦的方法论尝试”（霍克海默），理性不是构成现代性核心的、愈益“僭妄”的工具理性，不是抽象空洞的逻辑范畴和思维形式，也不是外在于历史的超越观念，而是思想与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唯一形式，在当代，它存在于对资本社会的内在批判之中。“如果理性的含义是依照人们在其认识的基础上所作出的自由决断去改造生活，那么，对理性的渴求就意味着创造一种社会组织的形式，

个人在其中可以依照他们的需要经由集体的努力去规划他们的生活。随着理性在这个社会中的实现，哲学就会消亡。展示出这种可能性，并为经济结构的变革奠定好基础，这一切恰好就是社会理论的任务”（马尔库塞）。鉴于人类在 20 世纪的特殊处境，批判理论还接受了精神分析对人性结构的解释，确认文化通过压抑而实现进步。在创造性地整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后，批判理论把真实的、自主的需要与虚假的、受控的需要区分开来，连带提出“必要压抑”与“额外压抑”，“施虐—受虐”的社会性格，“匿名的权威”，真假自由、真假幸福等观念，揭示已经消除了物质匮乏和政治压迫的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的各种“舒舒服服”的压抑和异化，进而展望一种非压抑性文明的乌托邦前景。

相信一个可以普遍认可的理性，相信人性有一种本然的真实，这些与解构哲学要清洗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观念，本身又有何“支援意识”呢？除古典资源和审美视角外，与批判理论并非充分自觉的犹太教观念相关。阿多诺终生不能忘情于“救赎”的悲愿；弗洛姆总是激动于“普遍和平”的弥赛亚幻象；本雅明迷恋于名物一致的原始语言；贯穿于《启蒙的辩证法》一书的犹太教思想使得一些学者认为批判理论是一种“隐蔽的神学”；直到晚年，霍克海默还一再表述“对完全是另一种东西的渴求”……先知般的勇气，救赎的热情，深深潜藏的乌托邦冲动，绝望了的希望，如果据此而认为批判理论的历险是 20 世纪的一种准宗教行动，也许并不为过。

作为中国哲学第一原则的“天理”，被宋儒解释为人性所本有，这不但以道德理性取消纯粹理性，也使人性本然湮没不彰；至于拯救情怀、宗教意识等，素为中国人所漠视。所以今天的思想虽面临着与批判理论相类似的处境，却没有批判理论据以建立

的原则、标准和理想。我觉得，这也是相当一批知识分子迅速认同解构哲学，“争后恐先”的原因之一。后现代思潮自有其批判含义，它和批判理论家，特别是阿多诺、本雅明的亲缘关系也早已得到确认，这中间谈不上谁是谁非，但社会哲学自应与语言哲学、文学批评有别。霍克海默曾批评无政府主义因为不耐烦地否定一切权威而与专制主义相反相成。解构哲学、后现代主义是否应对此保持警惕呢？法国大革命后期，无套裤党人的激进就是和恐怖政治联系在一起。

可见，中国批判理论的创立，需要从头做起。除睁眼看现实，开掘一切可资利用的传统宝藏外，准确而完整地学习西方批判理论是当务之急。这本《法兰克福学派史》（原名《辩证的想象》）就是一本精当的、任何有识之士都不能回避的批判理论的“引论”。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只有拒绝赞美现状，我们才可能憧憬一个较好的未来；只有严肃地培植现代社会中否定的、批判的力量，我们才能最终有所肯定。否定而不是不成熟地寻找各种解决方式是真理的真正避难所，正如本雅明说的：

It is only for the sake of those without hope is give to us (只因没有希望，希望才给予我们)

1995.12.18

关于本书作者及其著作

单世联

Martin Evan Jay (其著作均署名 Martin Jay), 1944 年生于纽约。1971 年以论文 “The Frankfurt School: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Institute für Sozialforschung, 1923 - 1950” (法兰克福学派: 社会研究所的思想史, 1923 - 1950) 在哈佛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1967 年开始在美国学校任教, 1982 年后为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利校区历史系教授。

20 多年来, Martin Jay 多次在美国和欧洲的大学及研究机构从事研究、举行讲座, 多次出席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 并担任一些学术刊物和出版社的顾问。Jay 学养渊深, 持论公允, 是当代欧美思想史领域活跃的知名学者, 尤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著称。

其著作有:

1.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 - 1950* (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的历史 1923 - 1950),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3 年第 1 版;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年第 2 版。

此书以客观的态度叙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从成立到 1950

年迁回德国的历史，概括了法兰克福学派在其“英雄时期”的主要思想成就。这是第一部全面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霍克海默亲自写序，马尔库塞、洛文塔尔等当事人及 F·杰姆逊等著名学者均给予高度评价。现已译成德、法、意、荷、西、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韩等 8 种文字，中译本改名为《法兰克福学派史》。

2. *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ács to Habermas* (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从卢卡契到哈贝马斯一个概念的历险),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年版。

此书引论描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演变，第 1 章追溯了“总体性”在西方思想史上的轨迹，从第 2 章到 15 章，分别论述了卢卡契、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多诺、列菲伏尔、戈德曼、萨特、梅洛·庞蒂、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关于总体性的思想，以“后结构主义的挑战”作为结束语。作者把“总体性”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范式”，描绘了它在卢卡契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那里引起的兴奋和自阿多诺以降引起的幻灭，及其由此幻灭预示的当前解构哲学。作者认为，当代思想的进一步展开，有赖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总体理论与以富科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有效对话。

此书已译成日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中译本亦在进行之中。

3. *Adorno* (阿多诺),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年版。为伦敦“fontana”“现代大师丛书”之一。

“总体性”到阿多诺这里已经崩溃，对总体的不信任，对非同一性的强调，使其哲学成为“无调哲学”，其表达方式也是非

体系性的。此书以阿多诺本人的方法，围绕阿多诺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美学现代主义、文化贵族的保守主义、犹太情感和解构主义等 5 种并列而不整合的要素来批评性地论述阿多诺哲学，是关于阿多诺的最权威的著作。

此书已译成意、葡、西、日、法、斯洛文尼亚、瑞典文。中译本有两种，一是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的胡湘译本，二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出版的“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中瞿铁鹏、张赛美译本。

4. *Permanent Exiles——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 (永恒的流放——关于德国流亡知识分子的论文),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年版。

此书收论文 15 篇，9 篇是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涉及到批判理论的宗教背景及其在 50 年代之后的发展。其中“乌托邦的元政治学”、“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批判”、“反犹太主义与魏玛左派”、“犹太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对反犹太主义的分析”、“肯定的与否定的总体性”等都是专题论文，可以看成是在《辩证的想象》、《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两部通论性著作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另外 6 篇是关于 G·利希特海默、S·克拉考尔、H·阿伦特、H·巴彻特等德国著名知识分子的论文。此书与《阿多诺》、《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一起被称为“Martin Jay 的法兰克福学派三部曲”。

此书已有日译本。

5. *Fin - De - Siecle socialism* (世纪末的社会主义), Routledge 1988 年版。

此书第一部分“从思想史到文化批判”收文 4 篇，探讨一些方法论问题，包括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的争论，保守主义的激进

含义等等。第二部分“解读社会主义遗产”收文12篇，大多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题研究，如“维科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与审美救赎：霍克海默与克拉考尔的争论”、“哈贝马斯与现代主义”、“哈贝马斯与后现代主义”等等，对批判理论的最近发展及其与其他哲学思潮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和上一本论文集一样，作者特别注意解构哲学、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此书已有西、日文译本。

6. *Force Field: Betwee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Critique* (力场：思想史与文化批判之间)，Berkeley 1993年版。

此书我未见过，估计是关于目前德国思想的论文集。“力场”这个概念是阿多诺提出来的，指由吸引和排斥的关联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复杂现象的动力学结构，可以有效地解释既构成又变动不居的现实结构。Martin Jay在《阿多诺》一书中已成功地使用了这一概念分析阿多诺哲学。

除上述6本著作外，Martin Jay还编辑了好几种文选和资料，在欧美学术刊物上发表上百篇文章。他的著作，是研究当代西方思想文化的必备参考书。

序

亲爱的马丁·杰伊：

您邀我为您论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历史的著作写序，确实，读后的喜悦之情使我不能拒绝这一请求，然而，健康状况迫使我只能以简代序。我首先感谢您细致的工作，如果没有您的描绘，这本书中的许多往事也许早被忘却了。

研究所从德国流亡前的工作——人们会想起波洛克 (Pollock) 的《苏联 1917—1927 计划经济实验》或随后出版的集体著作《权威与家庭》——与当时的官方教育体制相比，是一个新东西，它意味着能够进行大学没有提供机会的研究。这个事业的成功仅仅因为——由于 H·韦尔 (Hermann Weil) 的支持和他的儿子 F·韦尔 (Felix Weil) 的参预——一群具有不同学术背景、但都对社会理论有兴趣的人，他们怀着在一个转折的时代，陈述否定比学术事业更有意义的信念聚集到一起，把他们联系起来的，是对现存社会的批判性考察。

差不多在 20 年代末，确切地说是在 30 年代初，我们相信国家社会主义可能掌权，也相信只有通过革命行动才能对付它这一事实。但我们没有想到它需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本以为在我们的国家会出现造反，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我们的思想中有决定性意义。当然，在我们经过日内瓦到达美国后，对社会事件的马克思

主义解释仍然保持着优势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条式的唯物主义在任何方面都成为我们立场的决定性主题。对政治体制的反思告诉我们一个必要的事情，正如阿多诺（Adorno）所表达的： “不要把要求绝对看成是可靠的，也不要因强调真理的概念而削减任何东西”。 XII

对不同于此一世界的另一个完整世界（ein ganz Anderes）的渴求，曾经是社会—哲学的主要动力，这最后导致对一些形而上学倾向作出更为肯定的估价，因为在经验上“总体是不真的”（阿多诺）。确实，希望尘世的恐怖没有最后决定权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愿望。

那些一度和研究所有过联系的人们，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感谢您，在您的书中他们会体认到自己观念的历史。我也以那些死去的人的名义，如 F·波洛克（Fred Pollock）、T·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W·本雅明（Walter Benjamin）、F·纽曼（Franz Neumann）和 O·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向您，亲爱的杰伊先生表示感激之情，非常感激您的著作。

您诚挚的

M·霍克海默

1971年12月于瑞士蒙塔戈诺拉

第二版序

1968年8月，我受洛文塔尔（Lowenthal）之邀第一次来到贝克利，作为一个24岁的研究生，此行的目的是要考察洛文塔尔收藏的有关社会研究所的丰富档案。就在我颇费时日地仔细阅读若干年来的信件和未出版的手稿，并集聚了许多由洛文塔尔耐心回答的有关人物、事件和思想的问题时，外部世界却因一系列突发事件而剧裂震动。8月21日，苏联及其盟国的坦克隆隆驶进布拉格，武力终止了“人道主义面孔的马克思主义”的实验，而这曾吸引了此前非教条的左翼人士的想象力。仅仅数日之后，“举世瞩目”的民主党芝加哥大会为抗议者打断，他们被约翰逊（Johnson）总统的越南政策及共和党候选人H·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继续其前任的令人遗憾的政策的可能性所激怒。

从寓所到洛文塔尔办公室，我每天都经过废弃了的，此时已空空如也的R·肯尼迪（Robert Kennedy）的贝克利竞选总部。2个月前肯尼迪被暗杀，意味着一种希望的幻灭，用当时流行的话说，这是对可能出现的“在体制之内进行”的基本改革的希望。贝克利校园成了学生和当局日益对抗的场所，这场对抗是得到R·里根（Ronald Reagan）为首的州管理机构的纵恿的。在周围社区，黑人“山豹党”（Panther party）的始终存在，成为变化无常的种族紧张的证明，这种紧张在同年春天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被暗杀后已扩展为少数民族居住区的造反。

当我沉浸在洛文塔尔提供的尚未公开的宝贵材料中时，这些环境的压力是无法回避的。虽然对它的理解还很模糊，但法兰克福学派已开始被公众视为美国和国外新左派的理论灵感，其影响已超出学术领域^①。在我到达贝克利的时候，我要讲述的故事的主角之一 H·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正隐藏在洛文塔尔位于卡迈尔山谷的夏季寓所，由于受到几次匿名的死亡威胁，他正谨慎地避开公众的注意。数月之前，在巴黎的 5 月“事件”中，愤怒的学生公开颂扬“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 (Marx Mao Marcuse) 的名字；加州的反共右翼企图终止他与圣地亚哥校区的合约；他也是正统左派不断增长的恶毒攻击的目标，他们不顾他对好争论的前学生 A·戴维斯 (Angela Davis) 的原则性支持，也无视戴维斯毫不动摇的共产党员身分，不久又突然因枪击事件而在马里县被监禁的事实。很快我就明显感到，马尔库塞是研究所同事不安的一个主要根源，他们因其政治上的好战而惊慌不已。

几个月后，也就是我回到哈佛一学期后，我准备到欧洲的法兰克福和瑞士的蒙塔戈诺拉继续这项研究。1969 年 2 月动身的前夕，在纽约的一个晚会上，我碰巧被介绍给 M·罗德 (Mark Rudd)，他是哥伦比亚学生反叛的激烈领导人，后来不久他就从事被称为“地下风暴”的孤注一掷的自我毁灭的冒险。当我告诉他我的论文计划时，他轻蔑地表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 (Horkheimer) 都急于自我出卖，已背叛了革命事业。罗德咆哮说，阿多诺从其犹太音的 Wiesengrund 中改名，就是他胆怯的证据。

2 月初到达法兰克福后，我发现这种情绪在法兰克福也很流行。许多大学建筑被正在进行的“造反行动”占领，用以开设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临时课程。继魏玛早期军事化之后，

社会学系再度受洗为“斯巴达克系”；2月31日，社会研究所本身也为激进学生接管，至少其焦虑不安的领导人阿多诺和L·V·弗里德堡（Ludwig von Friedeburg）是这样认为的，后者曾呼请警察来清理大楼。尽管事后看来这不过是一个误解（学生其实是找一个地方进行讨论），但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任领导与其不受欢迎的后裔之间的深广鸿沟依然加大了。由于不谨慎地谴责“左派法西斯主义”而引来学生猛烈攻击的J·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给我看了他办公室电话上的锁，以此防止可能闯进来的学生使用长途电话；阿多诺则过于敏感地拒绝对我们的会谈进行录音，他担心可能留下“口头指纹”，这两件事都说明了这一鸿沟的影响。

我离开法兰克福到瑞士的时间，恰好是4月中不幸事件的前几周，其时几个属于德国SDS（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民主学生协会）的妇女赤裸上胸冲上讲台，打断了阿多诺的讲演，这一象征性的弑父行动似乎是1969年8月阿多诺因心脏病而死亡的预兆。而此时，在蒙塔戈诺拉靠近洛迦诺的美丽小镇提克诺，霍克海默和波洛克正过着舒适的退休生活。远离喧嚣中的贝克利和法兰克福，我能够在较少火药味的气氛中和他们进行广泛的交谈，并有效地使用他们的材料。但是，即使是这样相对孤立的环境，看来也渗透着激进承诺和严重威胁奇异混合的全球气氛。1年以后，也就是我回到美国最后完成博士论文（并恢复因汽车事故而摔伤的骨盆，这是我去布达佩斯访问G·卢卡契〔Georg Lukacs〕时发生的，这是一次无意义的旅行）时，波洛克还这样写信给我：“从远处看，美国发生的一切确是令人悲哀的。所有这些表明“伟大的社会”（这意味着参照其他国家来相当严肃地考虑美国生活中的肯定要素）分裂的症候，不过是现

存自由的丧失和一个无情“领袖”之下的狭隘的物质主义的中产阶级的统治。^②

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天启般的构思其实是虚伪的，然而它确实唤起了波洛克的警觉，上述其他事件也提醒《辩证的想象》第二版的读者注意这本书的写作及其最初被接受的压力性背景，虽然这不能和1806年（我要立即补充这并非就书而论）黑格尔完成《精神现象学》时围绕着他的著名的耶拿争论相比，但也不是典型的远离时代压力而转向静观的学术立场。

当修改过的论文于1973年出版时，60年代的希望和恐惧仍然存在，越南战争还有2年才能结束，新左派的精力尚未耗尽。事实上，以“西方马克思主义”著称的精神传统在1972年的一本美国文集中仍然被描绘为“未知的方面”，^③在当代文化斗争中依然可能提供有用的思想，其经典著作的翻译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比如1971年卢卡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次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从中可以强烈地感到这一思想宝藏仍有待挖掘，像《新左派评论》、《泰洛斯》和《新德国评论》之类的刊物，在其急于提供一些详细的、可运用的、意在帮助颠覆现状的观念时，都对之作了相互矛盾的理解。

所以，《辩证的想象》的某些带有政治色彩的评论者在发现本书的“挽歌”音调时不耐烦就毫不奇怪了，这一音调表现在本书序言中宣称学派的历史契机“现在已最后过去了”。撇开罗德这样的少数极端主义者不论，他们相信批判理论包含着当代和未实际斗争的资源。其实我从未完全同情批判理论所坚持的一些很有疑问的现点，在1969年提交给“社会主义学术会议”的论文中，^④我就批评过马尔库塞把总体化的“大拒绝”观念当作一种审美的元政治学。由于本性上我与战斗行动主义不同，我总是

和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保持一个怀疑的距离，从未参加“运动”的任何一个特殊派系。

不过，写作《辩证的想象》确实希望传达一种强烈的激动和承诺，这是我在发掘并试图整理完全不熟悉的且具有挑战性的著作全集时感到的。虽然就其主要著作已明显地留在他们身后，且许多已不再具有活力而言，学派中心人物的确定的历史时刻已经过去，但在我看来，对这些著作的接受和欣赏仍然存在于未来。本书的写作，至少是部分地希望能有助于这一过程，只是我没有采取非批判的教条主义态度，而这恰恰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征。

其实，随着法兰克福学派不久成为剧烈的当代论争的历史兴趣的焦点，这一期望已远远超过了我最喜爱的幻想。《辩证的想象》最后被译成8种语言，在把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介绍给国际公众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特别是1976年德译本问世，当时的争论已激烈到不允许超然的、学术的解释（在极端时期，保守派把学派当作应予鞭笞的孩子，指控它所教导的左派恐怖主义），而这本书有助于促成一种严肃的历史兴趣。我是作为一个对其观念没有先入之见，与其成员没有个人争论的局外人身份写作的^⑤。这本书因此具有某种素朴的品格，它允许学派的友人和敌人从不同的立场予以运用，与后来一些反映了更加幻灭的、或揭发的心情的著述不同，本书幸运地避免了德国人所谓“仆从视角”，即希望清洗肮脏的亚麻衫的女仆的视角。

本书后来的命运很有意思，对批判理论的接受比70年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发现和吸收持续的时间更长，后者的结束也标志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其他人物如K·科尔施（Karl

Korsch)、L·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或 L·戈德曼 (lucien Goldmann) 兴趣的急剧衰落, 而对批判理论的接受却成为 20 世纪后期理论风景中持续的景点。虽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 其统一性现在看来已不像我第一次写作其历史时那样明显, 但批判理论的基本意图在四分之一世纪后仍然是统一的, 即使在其工作已与其他理论思潮混合、合并之后也是如此。

法兰克福学派持续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它所发起的工作异常丰富多样。如果说它的一些成员如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和弗洛姆 (Fromm) 现在看来已不像我开始研究他们时那样重要。^⑥ 那么另外一些人物如阿多诺、本雅明在重要性方面却增加了, 他们著作的每一个译本问世, 都有广泛的读者; 一些边缘性成员如纽曼、基希海默等人, 在对魏玛时代的法理学和法律问题热烈兴趣结束时也获得了一些新的听众, 这一兴趣部分是由于对好争论的法理学家 C·施密特 (Carl Schmit) 的热情接受——左右两方面都是如此——而引发的。^⑦

学派后继者们所从事的具有显著特质的工作, 是学派保持其活力的另一个根源, 这些后继者并不局限于欧洲和美国,^⑧ 他们在德国被习惯地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 其中最著名的成员包括哈贝马斯和 A·施密特 (Alfred Schmidt), 以及包括 A·韦尔默 (Albrecht wellmer)、A·贺奈特 (Axel Honneth)、P·柏格 (Peter Burger)、O·内格特 (Oskar Negt)、H·杜必尔 (Helmut Duhiel)、C·奥菲 (Claus·Offe)、A·索勒尔 (Alfons sollner) 和 H·布龙浩斯 (Hauke Brunkhorst) 在内的第三代。虽然卢卡契也在一生的最后岁月培养了一个“布达佩斯学派”, G·d·沃尔佩 (Galvano della volpe)、阿尔都塞一度也曾有过大批追随者, 但这些思想传统在自我更新的活力以及较少虔诚地重复方面, 都不能和本书试

图追溯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历史相比。

不过，对批判理论兴趣的顽强存在，也还有另一种解释。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范式已失去其活力之后，批判理论也仍然保持着重要性：它意外地适应了在其初创时期只是朦胧觉察到的一个时代的关切和焦虑。如果果真如此，这也是在《辩证的想象》第一次面世时开始的，1973年对它的回顾要超过美国新左派在向资产阶级社会挑战时重新发现欧洲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高潮期。确实可以说，最初的另一叙述中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其结局尚未可见。

这一年发生了二战以来第一次全球性经济萧条，由于欧佩克(Opec)突然提高石油价格而造成的加油站突然出现的长长的车队，可能是其最戏剧性的象征。简化复杂过程的结果是世界经济体制的根本调整，它最终导向，或至少可作为其标志的是东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破产和西方逐步放弃凯恩斯—福特主义的政策。D·哈维(David Harvey)宣称的“弹性积累”的新体制的生长，意味着国际金融资本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大于民族国家增长的重要性；劳工市场的全球化使廉价的外国劳工加速流动；工会运动的削弱；技术革新带来的时空缩小；资本主义通过时空移置而追求的过度积累的受挫等等。^⑨但这一在1973年开始明朗的新体制绝非稳定和顺利运行的，它看来也产生了新的危机，它既不像一架有意识驾驶的机器那样可以控制，像库岁收入和金融政策那样；也未能产生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继承者那样，可以从内部挑战的集体性社会角色。

初看起来，对社会研究所持续兴趣的保持，是很难从这种新发展中得到支持的。符合这种新范式的，既非H·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拥护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亦非

纽曼的垄断资本主义和命令经济混合的观念，也不是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政治至上”的观点，甚至奥菲后来的“无组织资本主义”的论点也可能是不充足的，如果哈维的下述论断是正确的话：“关于当代处境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方式，在其中由于劳工市场、劳动过程和消费市场的分布，地理的流动及弹性反应——伴随这一切而来的是组织的、生产的和技术的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因此更为严密地组织起来了。”^⑩

事实上，不能不承认，在研究所有关经济问题的论述上，几乎没有预见到1973年以后资本主义的调整。^⑪但公正地说，后福特时代的弹性积累的新体制出现后，其相关的文化方面恰好可以帮助解释法兰克福学派持续的生命力。如果哈维是正确的，以后现代主义著称的是这样一种文化条件，它设法表达和反映——偶尔也抵制——可以追溯到1973年左右的经济变化。与其他类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批判理论相对敏感地发现了这一新气候，后现代主义与第二代批判理论家之间的论争界限已相当明显，这在美国要超过德国。随着政治经济和政治实践的边缘化，文化、审美问题成为中心，学派在这些领域丰富而深入的探讨已激发了新的兴趣和争论。^⑫

当然，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后现代主义这个争论很多的词，把批判理论径直简化为它的导论是错误的。哈贝马斯坚定地为现代性计划的未完成而辩护，^⑬洛文塔尔最后警告像“后历史”这样的“非理性和新神话学”概念，^⑭阿多诺坚持高低艺术的分野，热衷于以贝克特（Beckett）、卡夫卡（Kafka）和勋伯格（Schoenberg）这样的现代主义者反对文化工业平整化影响，这些都表明法兰克福学派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是抵制把自己完全批发为后现代主义先驱的。其实，正如F·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指出的，

是阿多诺蔑视的斯特拉文斯基 (Stravinsky) 折衷的混成曲，而不是阿多诺敬佩的勋伯格进步的革新，才是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关键特征的先声^⑬。而且，被批判理论置于中心的“意识形态批判”，被大多数后现代主义理论贬黜到边缘，后现代理论缺乏——或者是故意蔑视——这类批判的任何转折的可能性，而愿意代之以一种反讽的理性，如果它确实还算是理性的话；它将所有的超越立场辱骂为失去信誉的基础主义，将乌托邦主义嘲弄为天生的谬误。^⑭

然而在某些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中至少有几个人，其总的理论轨迹可以说是为后现代转折准备了基础，因而使其著作获得了新的读者。最明显的是，他们逐步放弃了人类即将解放的乐观信念，此一信念的基础，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整个族类进步的单一故事，这与放弃任何元叙述，特别是以救赎为高峰的元叙述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是一致的。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的财富，他们喜欢的上升、衰落和重现的复杂叙事，都常常为后现代理论家以不同方式甚至相互矛盾地吸收。只有，对西方传统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激进批判，《启蒙的辩证法》以其对神话和理性交织的灰暗沉思对此作了广泛的详细论证，这和后现代主义对各种理性的怀疑是潜在地一致的。^⑮确实，学派第二代有时并不采取这一立场，比如哈贝马斯就完全拒绝这一结论。^⑯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与小·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的解构也有许多可比性，他们都反对总体化的同一哲学，不信任第一原则和起源，怀疑唯心主义升华的意识形态，支持寓言优于象征的再现模式。虽然坚定的乌托邦主义者阿多诺拒绝接受与解构的气质相投的优柔寡断的重复^⑰，但阿多诺“忧郁的科学”与德里达根本拒绝悲伤看来只相差一小步。对批判理论与小·拉科一

拉伯特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著作中的某种有益模仿论的多方面辩护也引起关注，它们与拉康 (Lacan) 对自我心理学的批判有一些密切关联。^⑨

同样，M·富科 (Michel Foucault) 关于身体的谱系史，对规范化及学科分类的敌意，对细节的微观，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迷恋等等，看来也接近批判理论的关切。虽然富科在《性史》中对马尔库塞的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著名批判，认为他假定一个超历史的利比多现实化的规范是错误的，但在对规范性欲的主宰理论的质疑并批判压抑的反升华方面，还是可以发现他们显著的一致。^⑩富科自己承认：“如果我在年轻时就遇到法兰克福学派，除了评论他们的工作就不会再有其他事情来吸引我一生了，而现在他们对我的影响却是回溯性的。迟至不再处于知识的‘发现’期，我才接触到他们的成果。”^⑪

热烈的争论也发生在本雅明有争议的遗产上。解构主义者如 P·德曼 (Paul de Man)、S·韦伯 (Samuel Weber)、R·内格尔 (Rainer Nägele) 和 W·哈马彻 (Werner Hamacher) 等都根据自己的观点阅读本雅明；^⑫德里达也对本雅明的早期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暴力的批判》甚感兴趣，这本书神秘地唤起了一种神圣的正义观念并迷恋于起源的暴力，作为其人道的（和人道主义的）对手平整化的平等主义的解毒药。^⑬当后结构主义普遍认识到一些超现实主义如 G·巴特利 (Georges Bataille) 的重要性时，^⑭本雅明和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复杂关系也被记起。虽然本雅明思想中有顽强的救赎成分，也相信名物一致的亚当式原始语言，这与对充足起源和终点解构的怀疑难以调和，但在他留下来文本的复杂网络中，有充分的理由将他置于这些后来思想家的星座中。

这里不可能详细提供批判理论的诸种形式和后现代主义诸种形式之间的平行与对照，但完全可以说，后新左派的接受语境是愿意接受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遗产的，这些遗产在 R·伯恩斯坦 (Richard Bernstein) 命名的当代思想的“新星座”中已成为强有力的“星丛”。^②正如 J—F·利奥塔德 (Jean—Francois Lyotard) 自己承认的：人们现在带着这些名字（德里达、塞尔斯 [Serres]、富科、列维纳 [Levinas] 和德鲁兹 [Deleuze]）来阅读阿多诺——像《美学理论》、《否定的辩证法》、《最低限度的道德》等——时，会感到这些著作预示了后现代的一些要素，尽管它大部分仍处在缄默或被拒绝之中。”^③

当然，也应当承认，批判理论在新的背景下充当了反对后现代理论中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反启蒙等极端含义的堡垒。阿多诺预示了对后现代主义的拒绝，这在上文引过的利奥塔德的评论中已经提到，其根源来自他顽强地拒绝放弃社会正义和真理（最终被理解为“真实的社会”）问题，依然希望可以发现一种可以实现它们的政治手段，我们可以说，这是他对一种有意义的、甚至是乌托邦的历史变革可能性所下的赌注。批判理论的许多当代追随者，像新杂志《星座》的编辑 S·本哈比 (Seyla Benhabib) 和 A·阿拉托 (Andrew Arato)，都追随哈贝马斯，顽强地坚持现代性计划的有效性，并把批判地理解视为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

然而，人们如果接受抵抗的后现代主义与肯定的后现代主义的区分，那么，可以出乎意料地说，前者能被合理地当作受欢迎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支之一，至少在学派抛弃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即使是杰姆逊那样的拒绝完全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者，也一度发现阿多诺“在过去存在着强大的对抗的潮流时，他无疑曾是一位盟友；而在现在，他则成了 90 年代的辩证

楷模。他自省的、反思的辩证法适宜于这一境况，在其中——由于新的世界秩序的诸方面及其不平衡——个体与体制的关系看来是不明确的，假如不是流动的或消亡的”。^②哈贝马斯有一次说，阿多诺“冬眠的战略”现在看来已不再像一代人之前的罗德认为的那样，是可以轻蔑地抛弃的卑怯，而是一种激进思想在漫长的政治冬天的生存方式。

现在，人们已逐步熟悉了这种沉思：学术实际上是法兰克福学派这种类型的批判思维的最后逃亡地，实现其思想的机会则已经消失。与此同时，60年代充满希望的“穿越制度的长征”也在随后的10年停滞了，进入了漫长的徘徊期，另一个世界的前景也没有了，它看来对此也根本不感兴趣了。也许只有大惊小怪的右派才认真对待“长征”计划的似是而非的“成功”，它给右派们经常性的反对“政治正确性”的幽灵的歇斯底里运动增加了刺激。在另一端，新左派的学术化恰恰是其政治热情耗尽后的标志，无论他们解释的真理是什么，^③作为当代学术生活一个中心的理论冲动，批判理论都无可置疑地达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安全的——也许已反讽地成为正典——位置。

其实，当我受奥萨卡同事的邀请，为日本读者编辑两卷本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国追随者的文选时，它实际上的中心位置就很清楚了。大量的供稿者都是哈佛、康奈尔、斯坦福、哥伦比亚、莱斯、西北、德克萨斯、芝加哥大学和社会研究新学校的哲学、政治科学、历史、德国文学、社会学系及其他一些领先的学术机构的学者，只有独立的文化批评家和学术界的牛虻R·雅科比(Russell Jacoby)是仅有的例外。本书中论述的法兰克福学派最初在美国的孤立已明显过去；其独特的成就也难以再现，纵令这种成果常常是痛苦的、疏离于传统学院背景的，这对批判理论的

发展是颇为重要的，对此我在《辩证的想象》出版后的一篇论文中曾做过回溯。^①阿多诺的“漂流瓶”——他指向“野蛮主义湖水横溢的欧洲”的信息瓶，在值得欣慰的、较少野蛮主义的今天已经到达许多海岸。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以及它在当代可能性的继续探索——可以在公共领域得到全面判断，如果像哈贝马斯使我们知道的那样，“公共领域”的生存经常是不稳定的，那么，它至少可以在亚领域、即我们通常称之为学术界的领域中得到判断。不能否认，这种“成功”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文化机制的驯化能力，但只有那些认定边缘性是自足的美德的人才会不承认其裨益。

学派的历史已由不同国家的众多的学者从各方面再度研究并重新写过，新的档案材料的公开和最后活着的成员从场景中消失，使本书试图讲述的故事更为丰富和谨细。对织粹德国流亡知识分子的其他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相互竞争的潮流及其与20世纪其他理论传统的比较研究，已使之更鲜明化了。一些学者如S·巴克—摩尔斯(Susan Puck - Morss)、G·罗斯(Gillian Rose)、D·海尔得(David Held)、H·杜必尔、U·米格德(Ulrike Migdal)、A·索尔纳(Alfons Sollner)、B·凯茨(Barry Katz)、W·博茨(Wolfgang Iuz)、D·凯尔纳(Douglas Kellner)、R·沃尔林(Richard Wolin)、M·汉生(Miriam Hansen)、W·V·里京(Willem van Reijin)、G·恩·塔尔(Günzelm Schmid Noerr)和S·E·布龙纳(Stephen Eric Bronner)——这里只能提一些最优秀的——已对这个故事补充了许多细节、增加了新的视角，甚至出现了学派的光面“照片传记”本，它根据其生活历史提供所有相关人物的肖像。^②

然而，他们仍未涉足概括性叙述，所以，除少数事实的订正

之外，我自己也抵制了修改最初文本、整合新材料的诱惑，也不与有关学派遗产的潮水般的新解释做论争。尽管1986年出版了一本详尽的历史综合论述，即R·维格斯豪斯（Rolf Wiggershaus）的著作，它论述了学派直到阿多诺之死的经历，此书现已用英文出版。^②然而，即使这部长达800页的巨著，对已经出版的全部著述和它所论述的人物及观念来说，也不见得是公允的。对《辩证的想象》的疏漏，^③我在其他地方已做了补充，我知道这一任务现在是多么令人气馁。希望本书的再版能在今后激起象它在四分之一世纪前初版时那样多的兴趣。如果法兰克福学派已经如此地超越其初始背景，并能和60年代、80年代许多不同的关切一致，顽强地生存直到成为不确定的、受到围攻的软性混合物，也即我们称之为世纪末的社会主义的主要支持者之一，那么，它仍然可能有些出人意料的东西，教给我们更好地进入21世纪。

马丁·杰伊

1995年6月 贝克利

注 释：

①It turns out that even royalty was curious. When he was a student at Cambridge, prince Charles was told to read Marcuse's One - Dimensional Man by his tutor peter Lazlett. According to one account, "Charles told him he read it 'with father' while on a royal tour of Australia. They inspected troops during the day and read about bourgeois mystification in the evening... Charles did not comment on what he had learned." Bryan Appleyard, "King of Fragile New Europe?," The Sunday Times, London, July 22, 1990, P. 6.

②Friedrich pollock to Martin Jay, Montagnola, May 13, 1970.

③Dick Howard and Karl E. Klare, eds., The Unknown Dimension: European Marxism Since Lenin (New york, 1972).

④ At the fifth annual Socialist Scholar's Conference in September, 1969, I gave a talk entitled "The Metapolitics of Utopianism," which was published, under a variety of titles chosen by their editors, in Radical America, 4, 3 (April, 1970); Dissent, 17, 4 (July - August, 1970); George Fischer, ed., The Revival of American Socialism: Selected Papers of the Socialist Scholars Conference (New York, 1971). It was republished in my collection permanent 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 (New York, 1986).

⑤ It was written before I joined Lowenthal on the Berkeley faculty and was privileged to develop a warm and close friendship with him. For my reflections on his legacy, see my introduction to the Festschrift for his 80th birthday in Telos, 45 (Fall, 1980) and "Leo Lowenthal: In Memoriam," Telos, 93 (Fall, 1992).

⑥ They are, however, by no means entirely neglected. See, for example, the recent collections Erich Fromm und die Frankfurter Schule, eds., Michael Kessler and Rainer Funk (Tübingen, 1992); On Max Horkheimer: New Perspectives, eds. Seyla Benhabib, Wolfgang Imitz, and John McCole (Cambridge, Mass., 1993); Marcuse: From the New Left to the Next Left, eds., John Bokina and Timothy J. Lukes (Kansas, 1994).

⑦ See, in particular, William E. Scheuerman, Between the Norm and the Exception: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Rule of Law (Cambridge, Mass., 1994). A debate about Schmitt's relations to Critical Theory was launched by Ellen Kennedy. See her "Carl Schmitt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responses by Martin Jay, "Reconciling the Irreconcilable? A Rejoinder to Kennedy," Alfons Söllner, "Beyond Carl Schmitt: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Ulrich K. Preuss, "The Critique of German Liberalism: A Reply to Kennedy," all in Telos, 71 (Spring, 1987). For her reply, see Ellen Kennedy, "Carl Schmitt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Telos, 73 (Fall, 1987).

⑧ See, for example, the discussion of its importance in Latin America in Martin Traine, “Die Sehnsucht nach dem ganz Anderen” Die Frankfurter Schule und Lateinamerika (Cologne, 1994). In Australia, although inspired by the Budapest School members who emigrated there in the 1970's, the journal Thesis Eleven also shows a strong interest in the legacy of Critical Theory. In Japan, the recently launched journal Ba - Topos plays a similar role.

⑨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1989).

⑩ Ibid., P.159. Offe's argument can be found in his Disorganized Capitalism: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s of Work and Politics, ed. John Keane (Cambridge, Mass., 1985).

⑪ For a global critique, see Moishe Postone,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1993), chapter 3.

⑫ For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recent reception of Critical Theory and its complex relations to other schools of thought, see Peter Uwe Hohendahl, Reappraisals: Shifting Alignments in Postwar Critical Theory (Ithaca, 1991). For an analysis that situates the work of Benjamin and Adorno in the now highly contested history of aesthetics, see 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Cambridge, Mass., 1990).

⑬ For my own attempt to discuss his position, see the essays “Habermas and Modernism” and “Habermas and Postmodernism,” in Fin - de - Siècle Socialism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1988).

⑭ Leo Lowenthal, “Against Postmodernism,” Interview with Emili Galh Zugaro, in An Unmastered Past: 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owenthal, ed., Martin Jay (Berkeley, 1987), p. 262. For more on Lowenthal's resistance to Postmodernism, see my “Erfahrungen und/oder Experimentieren: Lowenthal und die Herausforderung der Postmoderne,” in

Geschichte Denken: Ein Notizbuch für Leo Lowenthal ed. Frithjof Hager (Leipzig, 1992).

⑮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1991), P. 17.

⑯ For a lively debate over these issues, see David Couzens Hoy and Thomas McCarthy,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1994).

⑰ For discussions of these issues, see the essays in Andrew Benjamin, ed., The Problems of Modernity: Adorno and Benjamin (London, 1989), and Harry Kunneman and Hent de Vries, eds., Enlightenments: Encounters between Critical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French Thought (Kampen, The Netherlands, 1993).

⑱ Habermas's most sustained critique of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came i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trans.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Mass., 1987). In America, it is perhaps in the work of Richard Wolin that Habermas's critique of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and the "Nietzschean," protopoststructuralist moment in Critical Theory has been most elaborated. See his The Terms of Cultural Criticism: The Frankfurt school, Existentialism, poststructuralism (New York, 1992). A vigorous defense of Adorno against Habermas has been waged by the English philosopher J. M. Bernstein. See his The Fate of Art: Aesthetic Alienation from Kant to Derrida and Adorno (University park, Pa., 1992) and Recovering Ethical Life: Jurgen Habermas and the Future of Critical Theory (London, 1995).

⑲ For a probing comparison, see J. M. Bernstein, The Fate of Art: Aesthetic Alienation from Kant to Derrida and Adorno (University Park, pa., 1992).

⑳ On the question of mimesis, see my essay, "Mimesis und Mimetology: Adorno und Lacoue - Labarthe," in Gertrud Koch, ed., Auge und Affekt: Wahrnehmung und Interaktion (Frankfurt, 1995); For the comparison with

Lacan, see peter Dews, The Logics of Disintegration: Post - Structuralist Thought and the Claims of Critical Theory (London, 1987); for a recent reappraisal, see Joel Whitebook, Perversion and Utopia: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ss. 1995).

① See, for example, paul Breines, "Revisiting Marcuse with Foucault: An Essay on Liberation meets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Marcuse, eds., Bokina and Lukes. Several of the other essays in this collection attempt to resituate Marcuse in the debate over postmodernism.

② Foucault, "Adorno, Horkheimer, and Marcuse: Who is a 'Negator of History?'" Remarks on Marx: Conversations with Duccio Trombadori, trans. R. James Goldstein and James Cascaito (New York, 1991), P. 119 - 120. Foucault once told the author that the 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in 1977 first alerted him to the similarities. Comparing Foucault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has become a frequent pastime; see, for example, Axel Honneth, Critique of Power: Reflective Stages in a Critical Social Theory, trans. Kenneth Baynes (Cambridge, Mass., 1991) and Michael Kelley, ed., Critique and Power: Recasting the Foucault/Habermas Debate (Cambridge, Mass., 1994).

③ See, for example, the essays in Benjamin's Ground: New Readings of Walter Benjamin, ed., Rainer Naägele (Detroit, 1988).

④ Derrida, "Force of Law: The 'Mystical Foundation of Authority'," in Deconstruc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Justice, ed. Drucilla Cornell et al., (New York, 1992).

⑤ See, for example, Margaret Cohen, Profane Illumination: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Paris of the Surrealist Revolution (Berkeley, 1993).

⑥ Richard J. Bernstein, The New Constellation: The Ethical/Political Horizons of Modernity/Postmodernity (Cambridge, 1991).

⑦ Jean - Francois Lyotard, "A Svelte Appendix to the Postmodern

Question," in Political Writings, trans. Bill Readings and Kevin Paul (Minneapolis, 1993), P. 28.

② Fredric Jameson, Late Marxism: Adorno, Or, The Persistence of the Dialectic (New York, 1990), PP. 249 -- 252.

③ For my own thoughts on this issue, see my "Class Struggle in the Classroom? The Myth of American 'Seminar Marxism'." Salmagundi, 85 - 86 (Winter, Spring, 1990). It has also been argued by Stephen T. Leonard that despite everything, Critical Theory has managed to produce significant practical effects in areas such as critical pedagogy, feminism and liberation theology. See his Critical Theory in Political Practice (Princeton, 1990). See also the earlier collection, Critical Theory and Public Life, ed., John Forester (Cambridge, Mass., 1985).

④ "Urban Flights: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between Frankfurt and New York," in Force Fields: Between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Cultural Critique (Berkeley, 1993).

⑤ Willem van Reijen and Gunzelin Schmid Noerr, eds., Grand Hotel Abgrund: Ein Photobiographie der kritischen Theorie (Hamburg, 1988).

⑥ Rolf Wiggershaus, The Frankfurt School: Its History, Theories,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rans. Michael Robertson (Cambridge, Mass., 1994).

⑦ Adorno (Cambridge, Mass., 1984) sought to provide an overview of his career. 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acs to Habermas (Berkeley, 1984) attempted to situate Critical Theory's ruminations on the concept of totality in the longer history of Western Marxism as a whole. Permanent Exiles: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Germany to America (New York, 1985) collected my scattered essays on aspects of the Institut's history, as well as on other emigres such as Siegfried Kracauer. An Unmastered Past: The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Leo Lowenthal (Berkeley, 1987) was an edition of texts and interviews by Lowenthal.

鸣 谢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最令我激动的事情之一是结识了许多在法兰克福学派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他们对一直引起争论的研究所历史和思想的经历或批评或捍卫，我从双方都学到不少东西。很高兴能在此向他们表示我的谢忱，同样也感谢那些以各种方式支持过本书写作的朋友们、老师们和同事们。

研究所原来的成员中，M·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马尔库塞、阿多诺（1968年夏季他去世前夕）、E·弗洛姆（Erich Fromm）、K·A·维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P·马辛（Paul Massing）、E·沙赫特尔（Ernst Schachtel）、O·兰格（Olga Lang）、G·迈耶尔（Gerhard Meyer）、M·I·芬莱（M·I·Finley）、J·迈尔（Joseph Maier）和A·迈尔（Alice Maier）等都热情接受了我的访问；当本书作为我在哈佛历史系的博士论文完成之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弗洛姆、维特夫又花了不少时间对原稿作了校正；法兰克福学派最新一代的核心人物哈贝马斯、施密特、韦尔默回答了我的提问；虽然我没有见到在研究所创立时起过重要作用的F·J·韦尔（Felix J. Weil），但我们进行了广泛而富有启示的通信，涉及到研究所的许多方面，他对一些事件的解释与我并不一致，但对本书许多部分的贡献是非常宝贵的；G·阿多诺（Gerelel Adorno）和G·迈耶尔（Gladys Meyer）也是对我很有帮

助的通信者。

研究所历史的参与者中，有3个人的配合超过了我的预期。1969年3月，波洛克在瑞士的蒙塔戈诺拉多次接待过我，向我追溯了他和研究所近50年的关系；回到坎布里奇后，我仍然不断和他通信讨论本书的进展；1970年9月，即在去世前夕，他还XX勉力审阅了本书第一章。波洛克教授曾表现出对研究所成就的巨大骄傲，我很遗憾未能把全书送呈给他。

L·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是我研究之初见到的第一个法兰克福学派成员。1968年夏天在贝克利，他不惜时日，提供了许多资料，并就他和霍克海默的重要通信作了耐心解释。此后，他一直对本书保持强烈的兴趣。和波洛克一样，他也以极大的关心和敏感评阅了本书第1章；我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他从不把他的观点加诸于我；我到贝克利工作以后，他对本书的完成继续提供支持和建议。在这项研究所得到的所有关怀中，他的友谊是我最看重的。

最后一位是P·拉扎菲尔德（Paul Lazarsfeld），他不断给我鼓励和明智的建议。虽然从未成为研究所的核心成员，但他热心于研究所的工作，30年代中期以后就从外围介入其事务，他保存的许多文件和信件都慷慨地交由我使用，而他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距离也帮助我获得一个用以评论研究所工作的视角。

总之，研究所活着的成员对我帮助极大，作为这种友谊的突出象征，是重病中的霍克海默为本书写了序言性评论。

同样应当感谢对本书有过帮助的其他人。应特别提到H·S·休斯（H. Stuart Hughes）教授，他是指导这篇论文的导师；我也感谢F·K·林格（Fritz K. Ringer），是他第一次激发我对德

国思想史的兴趣，并以友好而严格的态度评阅了本书初稿；对于坎布里奇的朋友，我只能用文字重复一次，希望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深深谢意：P·勃兰斯（Paul Breines）、M·T·吉尔摩（Michael Timo Gilmore）、P·魏斯曼（Paul Weissman）和L·伍格夫特（Lewis Wurgaft），他们不但在研究生期间支持我，还带着批评的眼光阅读了本书；我也感谢那些由于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共同兴趣而结识的新朋友们，M·贝克尔（Matthias Becker）、E·勃来斯林（Edward Breslin）、S·布克（Susan Buck）、S·利普希思（Sidney Lipshires）、J·J·夏皮罗（Jeremy J. Shapiro）、T·希路耶（Trent shroyer）、G·乌尔门（Gary Ulmen）和S·韦伯（Shierry Weber）；在向那些关心法兰克福学派的老一代学者的请教中，我也获益甚多，他们是：E·C·休斯（Everett C. Hughes）、G·利希海默（George Lichtheim）、A·洛威（Adolph Lowe）和K·H·沃尔夫（Kurt H. Wolf）。

XXi

我和贝克利的新同事相处时间不长，但他们已经向我显示出，在一个学术团体的老观念中，依然有着远大的生命力，本书的完善有赖于他们的评论：F·考思（Fryar Calhoun）、G·菲尔德曼（Gerald Feldman）、S·哈珀（Samuel Haber）、M·玛里（Martin Malia）、N·利森诺夫斯基（Nicholas Riasanovsky）、W·索尔（Wolfgang Sauer）和I·希尔纳（Irwin Scheiner）；我也向下列人士表示感谢：小布朗出版社的W·菲力浦（William Phillips），他自始至终以罕见的热情和敏捷的编辑眼光给予帮助；我的打字员，麻萨诸塞州莱格辛顿的A·斯洛康勃（Annette Slocombe）和贝克利国际研究所B·利斯特希（Bojano Ristich）以及她的职员，使我的手稿获得可以出版的形式；B·弗兰克尔（Boris Frankel）帮我编了索引。最后，我以特别的愉快向丹福斯基金会（Dan-

forth Foundatiow) 表示感谢，他们在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使我得以完成研究生学业。

这份鸣谢的名单或许过长，因为我急于表达我的谢忱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辩证的想象》差不多是一个集体性作品，它的长处即源自这一事实；至于它的不足，则应由我负责。

马丁·杰伊

目 录

- 《现代与传统丛书》序…………… 袁伟时 (1)
- “只因没有希望，希望才给予我们”
——中译本序言…………… 单世联 (1)
- 关于本书作者及其著作…………… 单世联 (1)
- 序…………… 霍克海默 (1)
- 第二版序…………… M·杰伊 (3)
- 鸣谢…………… (22)
- 引言…………… (1)
- 第一章 研究所的创立及其在法兰克福的最初岁月…………… (7)
- 第二章 批判理论的起源…………… (51)
- 第三章 整合心理分析…………… (102)
- 第四章 对权威的首次研究…………… (133)
- 第五章 研究所对纳粹的分析…………… (165)
- 第六章 审美理论与大众文化批判…………… (199)
- 第七章 40年代的经验性工作…………… (251)
- 第八章 走向历史哲学：启蒙的批判…………… (288)
- 结束语…………… (319)

· 2 · 目 录

注释.....	(339)
文献.....	(437)
索引.....	(465)
译后记	单世联 (494)

引 言

在现代世界上，知识分子已被普遍视为疏远的、不适应的、不满意的人。然而，远在这个形象出现之前，我们已越来越习惯于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局外人（outsiders）、徘徊者（gadflies）、边际人（marginal）等等。“异化”（alienation）这个词被不加区分地用来指称那最平凡的消化不良患者和最深刻的形而上学的恐惧，它已成为现时代的习惯用语，即使是最明细的观察者，也难辨真伪。就那些真实地宣称受其影响之苦的人的恐惧来说，异化已被证明是文化市场上高利润的商品。比如说，现代主义艺术以其不和谐与痛苦，已经成为食欲不断加大的文化消费大军的常餐，他们一见就知能赚个好价钱。先锋派，如果这个词确实还在使用的话，已成为我们文化生活中体面的装饰，赞扬已压过了担忧。另一例子是存在主义哲学，还不到一代人以前，它还被当作一种新鲜的空气，现在却已堕落为一套易于操纵的陈词烂调和不光彩的空洞姿态。应当提及的是，出现这一颓势，并非因为分析哲学家揭露了其范畴的无意义，而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文化本身具有一种怪异能力，它能吸收和消除那些甚至是最不妥协的对手。最后还有第三个例子，它在1972年是最明显了，那时一个据说是反文化的宣言大张旗鼓地登台没几年，这个新生儿如果说没有被扼杀在摇篮中的话，此时也已在成长的道路上轻易地被驯化

作的一开始，他们就处在外部世界的流放之中。但根本无需遗憾，这一位置是被作为精神创造的必要条件而被他们接受甚至被培育的。

由于他们在理论的完整性上毫不退让地拒绝向他们寻求实现其观念的社会力量妥协，法兰克福学派的拥护者昭示了许多使下一代参予型知识分子感到痛苦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早期著作激活了战后欧洲新左派的想象，晚近在美国也是如此。很久就绝版的著作的盗版在德国急躁的学生运动中流行，这些学生的欲望由于和 1950 年回到法兰克福的研究所的接触而大大增强，要求再版研究所机关杂志《社会研究杂志》的呼声，最终导致了这样一些论文集在 60 年代的问世，如马尔库塞的《否定》^③和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④还有其他成员已经再版的选集如阿多诺、洛文塔尔、本雅明和纽曼^⑤等等。尽管专门评论研究所回到德国后的这段历史非我此处的兴趣所在，但也应提一下它在第一个 25 年中比较晦涩的著作的再版所激发的现代兴趣。

XV

何以这一段历史以前从未探讨过？这是不难理解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包括如此多的分支学科，以至对每一个问题的决定性的分析都需要一组从音乐学到汉学的各方面专家，简单地说，这需要拥有法兰克福学派本身具备的一切知识，所以，专门史学家面临的危险是非常明显的。就我来说，在开始这个计划之前确有些犹豫，但当我作出这个决定，开始沉浸到研究所的著作中去的时候，我发现我在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由于我逐渐获得的高度理解力而得到补偿，我开始理解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中有一个本质的统一，它影响到几乎所有领域的全部著作。我逐步认识到弗洛姆对施虐—受虐狂性格的讨论和洛文塔尔对挪威小说家 K·亨姆生 (Knut Hamsun) 的论述可以相互阐释；阿多诺对斯特拉

文斯基的批评和霍克海默对舍勒 (scheler) 哲学人类学的拒斥有非常亲近的关系；我也知道马尔库塞单向度社会 (one-dimensional society) 的概念是波洛克国家资本主义模型的必然结果等等。我并且发现，即使在他们真的因问题而发生争执的时候，像弗洛姆和霍克海默或波洛克和纽曼之间发生的，他们也非常清楚地使用共同的词汇并面对他们或多或少共同假定的背景。本书对研究所的发展的概观，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可能是肤浅的，但基本上是理由充分的尝试。

而且，这个研究的时机对我是重要的。尽管研究所的一些成员已经谢世——纽曼、本雅明、基希海默和格罗斯曼，只提这些更重要的名字吧——其他的许多人还富有生机地活着，在生涯的这个阶段，他们很关心他们的历史记录，当我最初表示对研究所历史的兴趣时，他们在许多场合都作了肯定的反应，我得到了许多帮助。 XVii

虽然他们主要是帮助我重建研究所的过去，但结果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历史法庭”。事实上，在许多问题上我不断听到相互矛盾的陈述，研究所成员对各自著作也有不同估计，使我感到似乎是在看日本电影《罗生门》，无法认定哪一种叙述是准确的。最终的选择不能使每个提供情况的人都感到满意，不过我希望他们对我尽可能地综合核查许多矛盾说法的努力表示满意。再说，我对研究所成就的评估也不应当和其成员的意见一致，我对他们大部分著作的钦佩之情是明显的；但同样明显的是，一旦有充分的理由我也并不犹豫对他们进行批评。忠实地保持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精神比不加怀疑地接受他们的言行，看来是更好一些的褒扬。

我谨慎地限制自己，对霍克海默和洛文塔尔之间极富价值的通信的利用，出于这些信件可能使还活着的人感到困窘这一可以

理解的顾虑而受到限制。当然，这类并不常见的克制，只有在写到那些还活着的人时才显得不利。很少有历史学家能够如此直接向其研究主体提出他的问题，通过这种做法，我不仅可以了解文件所没有披露的东西，还可以进入研究所成员的生活之中，并更加直接地体验到他们作为流亡知识分子的个人经历的影响。虽然我这本书的大半内容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概念，但我希望这些人生经历及其与这些观念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许多方面，无论是好还是坏，它们毕竟是非凡的一代人在一个无可挽回的消逝的历史时刻中的独特的经历。

第一章 研究所的创立及其在 法兰克福的最初岁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之一，至少就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而言，是社会主义中心向东方转移。布尔什维克革命出人意料的成功——与之相对照的是它的中欧模仿者的戏剧性失败——使那些先前处在欧洲马克思主义中心的德国左翼知识分子面临一系列进退两难的问题。概略地说，他们面临以下的选择：第一，他们可能支持温和社会主义者及其新创立的魏玛共和国因而远离革命并蔑视俄国的试验；或者第二，他们能够接受莫斯科的领导，参加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从事瓦解魏玛资产阶级妥协的工作。虽然由于战争促成的迅速投降以及温和社会主义者登上权力舞台，但两者之间的交替选择却一直是社会主义者数十年争论的中心所在。然而，行动的第三阶段，差不多都是马克思主义前提的彻底破裂的产物，这一破产是由战争及其后果引起的。这最后一种选择是带着解释过去的错误和准备未来的行动的双重希望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新考察，开始此一过程必然要返回马克思哲学过去那模糊的地带。

在这一紧跟而来的分析中，重要问题之一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或准确地说，实践成为马克思主义辞典中一个熟悉的词汇。粗略地说，实践指一种自我创造行为，它不同于那些由外在于人的力

量产生的外部刺激行为。尽管实践第一次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时是与沉思性的“理论”对立的，但在马克思的用法中却与理论有一种辩证关系。事实上，与单纯的行为不同，实践的特性之一就在于它是理论性沉思的结果，革命活动的目标应理解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它将直接对抗资本主义的普遍境况。

其实，战后年代当社会主义政府第一次掌握权力时，这一目标就越来越成为问题了。苏维埃领导知道它的任务与其说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不如说是争取生存，这在当时条件下并非一种不现实的估计，但也绝不是设计来安慰像 R·卢森堡（Rosa Luxemburg）那样与其背叛革命还不如不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们的。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来看，魏玛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领导者也认为新政府最紧迫的目标是生存而非实现社会主义。工会意识，诚如卡尔·舒斯克（Karl Schorske）已经指出的，^①在第二帝国结束前就得到了广泛传播，浪费了有可能变革德国社会的机会。魏玛的工人运动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党（KPD）和非革命的社会党（SPD），对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纯粹性的人来说，这是非常遗憾的景观。一些人企图和这个或那个党派恢复联系，但正像卢卡契的经历所显示的那样，1923年《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不久，他就被迫否认这本他最富想象力的著作，这个教训常常意味着在党的统一的祭坛上知识分子完整性的丧失。

然而，当个人的倾向是对理论而非对党作出更大的承诺时，甚至当这一承诺意味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搁置起来时，理论革新可能是极有成果的。这将成为由一些相对独立的人组成的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社会研究所”（The Institut Fur Sozialforschung）的工作的中心主张，也是由于他们的合作而完成的主要理论成就之一。虽然这也必然有不利的方面，

即他们在魏玛时期以及随后的流亡期间没有太大影响，但法兰克福学派却成为战后恢复西欧马克思主义活力的主要力量。而且，5通过马尔库塞 1960 年以后在美国的突然流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对这个国家的新左派具有意义深远的影响。

从一开始，独立就被当作从事理论革新和无限制的社会研究的必要先决条件。幸运的是，独立所需的条件是具备的，F·韦尔 1922 年设想了一个可以追求上述目标的研究所框架。^②他是德国谷物商海尔曼·韦尔的独生子，海尔曼于 1890 年前后离开德国到阿根廷，把那里的谷物运回欧洲贩卖，财运很好。弗立克斯 1898 年出生于阿根廷首都布艾诺赛利斯，9 岁时被送回法兰克福进歌德大学预科学校，后来进了这个城市新建的大学。除 1918 - 1919 年他在杜宾根大学第一次参加左翼运动、度过了重要的一年外，他一直留在法兰克福直到以优异成绩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他探讨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些实际问题的学位论文，^③由柯尔施编辑的一套专题丛书出版，柯尔施此刻已经是第一个引起韦尔兴趣的马克思主义者。利用他从母亲那儿继承来的可观遗产和父亲的财富，韦尔开始支持许多德国的激进冒险。

第一件事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作周”（the Erste Marxistische Arbeitswoche），于 1923 年夏季在杜宾根的伊尔梅瑙举行。按韦尔的说法，“它的目的是聚集讨论各种不同倾向的马克思主义，以期达到‘真实’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④参加这个为期一周的会议的，有卢卡契、柯尔施、R·佐尔格（Richard Sorge）、波洛克、维特夫、B·福杰拉谢（Bela Fogarasi）、卡尔·苏穆克尔（Karl Schmuckle）、K·蔡特金（Konstantin Zetkin，著名的社会主义领导人 K·蔡特金 [Klara Zetkin] 的小儿子）、H·古姆佩茨（Hede Gumperz，先后与共产主义者的《红旗》编辑 J·古

姆佩茨 [Julian Gumperz]、G·艾斯勒 [Gerhart Eisler]、P·马辛 [Paul massing] 结婚),^⑤还有几位夫人,包括 H·柯尔施 (Hedda Korsch)、R·维特夫 (Rosa Wittfogel)、C·佐尔格 (Christiane Sorge) 和 K·韦尔 (Kate Weil)。会议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讨论柯尔施尚未出版的手稿《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韦尔写道:“工作周完全是非正式的,仅仅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并且“没有一点派系主张或结果”。^⑥当更具雄心的选择产生时,举办“第二个马克思主义工作者”的期望被放弃了。

在法兰克福大学几个朋友的帮助下,韦尔考虑建立一个更永 6
久的机构,这一计划他在工作周时已经想过,现在日益明朗了。他的朋友,曾参加过伊尔梅瑙讨论的波洛克 1894 年生于弗莱堡,是同化了的犹太商人之子,在战争服役之前,他有过商业生涯的训练。战后,他不想重返商界,却成为慕尼黑、弗莱堡、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学生,1923 年,他以一篇关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论文被法兰克福大学经济系授予博士学位。战前的 1911 年,波洛克和霍克海默成为朋友,霍克海默后来是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一个人物,现在他和波洛克一起支持韦尔建立社会研究所。

霍克海默比波洛克小 9 个月,1895 年生于斯图加特。其父莫里茨 (Moritz) 是一个杰出的犹太制造商,由于他的主张,霍克海默在入伍服役前也受到了商业训练,并在其父的劝告下为扩展业务而旅行到布鲁塞尔和伦敦。1913 年到 1914 年他在伦敦和波洛克一起学习英语和法语,不过他的兴趣从未集中在成为一个商人上,这从他这一时期写的一系列小说 (从未出版过) 中可以找到明证。1918 年以后,他在波洛克呆过的三所大学寻求更严格的知识训练,最初的心理学研究是在格式塔心理学家 A·格尔布 (Adhemar Gelb) 指导下进行的,但是,当与他所从事的研究

相似的课题在别处已被完成的消息传到法兰克福之后，他就转向了另一个领域。这个新领域就是哲学，导师是 H·柯奈留斯 (Hans Cornelius)。

尽管柯奈留斯从未和研究所直接接触过，但他对霍克海默及其朋友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这在下章讨论批判理论的原则时会更加清楚。1922年，霍克海默在柯奈留斯的指导下以其论述康德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①3年以后他以另一篇对康德著作的批评讨论取得大学授课资格，* 并于1925年5月作为编外讲师开讲

* 感谢韦尔博士对此以及20年代德国学术等级体制中的有关词汇所作的详细解释：“编外讲师 (Privatdozent) 是学术生涯的第一步，类似于美国的助教。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候选人要成为编外讲师，通常要作为教授、系主任或研究小组的助手服务一段时间，并须由两个教授推荐、提交一篇授课资格论文 (Habilitationsschrift)，在全系教授面前答辩 (法兰克福大学有5个系：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科学、医学和自然科学)。如果他通过了，系里就会请他授课，但只限制在某一学科之中，编外讲师不算公职人员，不拿薪水，只能从听课学生中收费。

“这个等级的第二步是副教授 (Ausserordentliche Professor)，这是有薪水的公职人员，同时可以向学生收费，在系里的会议上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

“正教授 (Ordentliche Professor) 拥有副教授的全部权力，在系里的会议上有表决权；他可以讲授任何他要讲的课程，甚至是其专业之外的课程 (比如美术史教授可以讲授空气动力学，只要他想这么做)；当然他是职务稳定的公职人员 (通常薪水很高)，也可以向学生收费 (通常是最底的保证)；还可以得到学校配备的助手。如果是外国人，教授在正式宣誓后可以被授予德国公民权，除非他事先拒绝 (如格吕堡选择奥地利籍，而后来的霍克海默选择美国籍)”。1971年6月8日韦尔给我的信。

有关康德和黑格尔的课程。^⑧

霍克海默和波洛克的关系是研究所的基石之一，值得予以评论。从 L·马尔库塞（Ludwig Marcuse，与 H·马尔库塞无关）的一段传记可以清楚的看出这一点，此人是 20 年代中期为法兰克福报纸撰稿的戏剧批评家。那时柯奈留斯把他的两个门生带到他的办公室，这是两个“有吸引力的人，霍克海默热情洋溢，波洛克则含蓄而外表严厉，矜持的背后看上去还有点儿戒备”。^⑨波洛克的特性，也许马尔库塞已经提示到了，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盲目忠于霍克海默的品质，这是他们之间 60 年直到波洛克于 1970 年去世之前的友谊的特征，除一次短暂的中断外，差不多保持了整个成年时代。波洛克发挥其实际的、谨慎的现实主义者的作用，常常周到地安排他们的日常生活，保证霍克海默有最大的时间从事学术工作；霍克海默则像孩子似地被仔细保护着，即使在成年以后也由波洛克充当他和严峻的世界之间的缓冲区。一个观察者曾回忆说，¹⁰霍克海默常常心情忧郁且有神经质，波洛克则相反，他最稳定的、专心致志的。他们个性的相互补充是研究所成功的一个根源，波洛克学术事业受到的损害在一定程度上是他愿意付出的代价。当然，在 20 年代，这还是一个难以预见的结果。

事实上，他们两个人，或许还有韦尔，都有可能在各自的领域中有所作为。但要想进入非常僵化的德国大学体制就必须把他们广泛的兴趣集中到一个专业上，而且他们所冀求的激进的学术立场在已确定的学术等级制度中也很难得到赞助，甚至并非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不守惯例的柯奈留斯，在其同事中也是一个无家可归者。因此，韦尔独立捐资建立社会研究所的设想，便是一条在正规大学生活之外从事学术的最好办法，像工人运动史和反

犹主义起源这样的题目，在德国高等教育的标准课程中是被忽视的，此前也从未被透彻研究过^①。韦尔的父亲海尔曼接受这个计划并同意开始每年赞助 120000 马克（通货膨胀结束后相当于 30000 美元），这个资金按波洛克的估计会相当于 1970 年的 4 倍。每月差不多以 200 马克（或 50 美元）资助研究所一个未婚助教，最初的年金及时由韦尔和其他人追加的资金予以补充。不过据我所知，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这里有政府的一份，尽管后来贬低研究所的人常常有这种言论。无论如何，海尔曼·韦尔的捐赠虽不巨大，但确实使研究所创立并得以维持，它的财政独立贯穿其历史并被证明是极为有益的。

虽然财政和思想的独立是创建者的目标，但他们认为寻求与法兰克福大学的一些联合是较为审慎的。这所大学是 1914 年刚刚成立的，他们最初想起名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所”（Insitut für Marxismus），后来考虑到这个名字太刺激而放弃。需要寻找一个更加伊索寓言式的名字（这种选择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上并非最后一次），教育部建议称为“F·韦尔研究所”（The Felix Weil Insitute），但韦尔拒绝了，他“愿意这个研究所为人所知，或许还是著名的，但这是靠它作为一个科学组织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而非靠创建者的金钱。”^②后来决定简单地叫它“社会研究所”（The Ins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韦尔还拒绝自己的“授课资格”或成为编外讲师，也拒绝考虑学术进展后成为研究所董事的可能性，因为有“无数人以为我为自己‘买’了授课权或后来的‘主席’”。^③事实上，一个拿着政府薪水的大学教授来掌权是研究所和教育部协议的一项规定，韦尔从亚琛工业大学选择了一个经济学家 K·盖拉赫（Kurt Albert Gerlach）为候选人，自己则控制着研究所的财政和管理机构“社会研究协会”（Gesellschaft für

Sozialforschung)。

盖拉赫和研究所的创始人一样对资产阶级社会充满美学和政治上的厌倦,美学的厌倦来自于他和 S·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小组的交往;政治上的厌倦则是他在英国学习的几年中,作为费边社交圈子中的一员培养起来的,其政治倾向无疑属于左派。若干年后,波洛克还记得他是一个非党派的社会主义者,^⑨英国史家 F·迪铿(F·W·Deakin)和 G·斯多列(G·R·Storry)在关于 R·佐尔格的研究中写道:“像佐尔格一样,他在那时很可能是一个共产党员”。^⑩无论盖拉赫的政治本质如何,韦尔选择他时,他是以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社会科学系的教授的身份被教育部接受为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的。早在 1922 年,盖拉赫就写了一份“社会研究所成立的备忘录”,^⑪其中明确了社会研究所的大概目标。此后不久,他宣布要做一次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就职演说。不过这个演说终于没有作,1922 年 10 月,盖拉赫因糖尿病发作而去世,时年 36 岁。他留下 8000 卷图书给韦尔,后者把它交给了研究所。

对继任者的挑选集中到较老一些的人身上,他将在任期内工作到年青的创立者之一成长到能获得大学职位为止。这样,G·迈耶尔(Gustav Mayer)是第一个人选,他是著名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和恩格斯传记的作者。不过据迈耶尔的回忆,谈判在涉及到一个由韦尔提出的要求——作为一个贵族共产主义者(Edelkommunist),韦尔后来放弃了这一要求——全面控制研究所的精神生活时失败了。^⑫如果这是真的,韦尔的坚持当然是短命的,后来逐步得到这个位置的候选人很快就维持了自己的支配权。韦尔对思想问题的影响,从来都不是太大的。

最后选来代替盖拉赫的,是 C·格吕堡(Carl Grünberg),他

被说服放弃了在维也纳大学法律与政治学教授的位置而来到法兰克福。¹⁸格吕堡 1861 年生于罗马尼亚福克夏尼的一个犹太家庭(后来改信天主教以获得大学职位), 1881—1885 年在奥地利学习法律, 接着便在此开始其法律和学术生涯, 1909 年成为维也纳大学教授, 次年开始编辑出版《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这个文库以“格吕堡文库”(Grünbergs Archiv)著称。

在政治上, 格吕堡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 有人称之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之父”。¹⁹不过这一称呼在研究这一运动的史学家中间是有争论的, 有人认为真实的情况只是“就他的维也纳大学的学生们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这一点而言, 而并不是说格吕堡本人是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 因为他的著作主要是历史方面的, 而从未想去进行什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²⁰格吕堡对理论不感兴趣的特点在他到法兰克福后仍然保持着, 虽然他的杂志上偶尔会出现一些理论文章, 像柯尔施的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 年) 和卢卡契 3 年后对 M·赫思 (Moses Hess) 的批评文章,²¹但其主要篇幅, 都提供给以马克思主义中非辩证的、机械的恩格斯—考茨基传统为基础的历史性、经验性研究。韦尔本人的兴趣也从未与此有很大差别, 所以格吕堡自然赞成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来彻底解剖资产阶级社会的目标。这样, 盖拉赫的接班人问题就在研究所准备开张之际完满地解决了。格吕堡被通过是十分注目的, 他是德国大学中担任教职的第一个自认的马克思主义者。

研究所于 1923 年 2 月 3 日正式成立, 这是由教育部根据它和研究所的一分协议而下令成立的。森肯伯格自然科学博物馆的教授德莱福曼 (Drevertmann) 邀请研究所把它的房子作为临时办

(Cologne) 社会科学研究所”采用学院式的领导，法兰克福研究所却有一个领导者进行“独裁式”的控制，尽管其成员的独立是得到保证的，但真正的领导者将在分配资源、集中力量方面有主导作用。在后来的岁月中，霍克海默在研究所事务上的统治是无可置疑的，固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力量，但其权力实际上源自研究所刚刚成立时就确立的结构。

在演讲结束时，格吕堡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对作为一个科学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正如自由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历史学派等已经建立了它们的中心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将在研究所中成为统治原则。格吕堡关于唯物主义分析的构想是很简单的，他认为那是“卓越的归纳”，“它最后宣称在时空中没有什么有效的”，“只有相对的、历史条件下的意义”。^②他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教条主义，它并不寻找永恒法则。这后一方面主张，是与批判理论后来的发展一致的。不过，格吕堡的归纳认识论并未得到霍克海默及其他年轻成员的赞同，只是在研究所的最初岁月中，格吕堡的方法是占优势的，“格吕堡文库”在以工人运动史为主的同时偶尔会出一些理论著作，像波洛克关于 W·桑巴特 (Werner Sombart) 和霍克海默论 K·曼海姆 (Karl Mannheim) 的文章。^③

12

格吕堡时代的音调——这与霍克海默接替他以后截然不同——在研究所的学生 O·斯威德 (Oscar H. Swede) 写给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M·爱思特曼 (Max Eastman) 的信中表露出来。研究所比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阻碍着年轻的斯威德，他抱怨花费

许多时间进行一些令人恼怒的争论，以便在研究所青年一代中建立教条主义的宗教和圣像文字崇拜，更不用说诸如

的最令人感兴趣的人物之一是佐尔格，他在二战前和战争期间充当苏联远东间谍那段著名经历早已众所周知而无须在此大书特书了。佐尔格起初是一位独立的社会主义者，1918年后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当然他也是亚琛的盖拉赫的博士研究生。他把学术活动和党的工作结合起来，其时党还是鲁尔地区的一非法的矿工组织。1921年，他与盖拉赫已经离异的妻子克利斯蒂娜（Christiane）结婚，令人奇怪的是，这并未影响他和教授的友谊。次年盖拉赫去法兰克福，佐尔格也随同前往，在研究所原来计划的第一任所长突然去世后，佐尔格依然和研究所保持了一个时期的联系，他负责筹建图书馆。这是他并不喜好的工作，所以当1924年党要求他到莫斯科时，他的服从就不难理解了。根据迪铿和斯多列的说法，在任何情况下，佐尔格和研究所的关系都只是“名义上的和表面的”，^⑧因为他是在为党工作。直到1940年他的间谍活动公开之前，人们都不知道他那极有特色的秘密生涯。^⑨

不过研究所的其他助教都公开参与了左翼政治，尽管研究所创立者们的公开倾向是独立于任何党派联盟的。维特夫、F·博克瑙（Franz Borkenau）和J·古姆佩茨都是共产党员，就此而言，政治行动主义本身并不是被这个团体拒绝的一个理由。然而正如柯尔施的情况一样，这确实是一个阻碍，柯尔施在1923年杜宾根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中担任过司法部长，直到1926年都是党内的一个卓越的左派反对者。维特夫认为在研究所初期柯尔施是一个中心角色，不过其他活着的成员都不同意这一点。柯尔施确实有时参加研究所的讨论并偶尔为其出版物写评论，但无论在迁移之前和之后，他都不是研究所的正式成员。^⑩其原因无疑是复杂的，但柯尔施强调实践，使他在后来越来越远离哲学沉思，这确实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别人在他的性格中看

到的不稳定性。^⑧

霍克海默是否为共产党员，常常为人议论，有充分材料证明这是无稽之谈，他的著作和行动都否认这一点。1919年在慕尼黑学习期间，他和波洛克都是巴伐里亚短命的文人革命活动的旁观目击者，虽然在随后而来的白色恐怖中他们帮助掩护过左派受害者，但他们从未参加革命，考虑到缺乏真正有助于社会变革的客观条件，他们确认革命尚未成熟，其结局必然是令人失望的。^⑨霍克海默早期在政治上同情卢森堡，尤其是她对布尔什维克中心主义的批评。^⑩在卢森堡于1919年被害后，他从未发现一个像她那样社会主义领导人。

在流亡之前，霍克海默极少写具体的政治分析。有一篇叫《德国工人阶级的软弱》，收在1934年出版的格言和短篇随笔集《黄昏》（Dämmerung，德文中有黄昏和黎明两种意义）中。在书中他解释了怀疑各种工人党的原因，完整的雇佣工人阶级精英和因当前形态的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受压迫受挫折的失业群众之间的分裂，在他看来，最终导致了相应的缺乏动力的社会民主党和理论跋足的共产党之间的分野，社会党有太多的“理由”，常常依靠强迫的共产党又太没有理由。他悲观地推断，调和这一对峙的前景看来要靠“经济的最终发展过程……两个党中都存在一些人类未来可以依靠的力量”。^⑪所以，无论是格吕堡时代还是霍克海默时代，研究所从未把自己和某个左翼党派联在一起。1931年，研究所的一个成员富有特征地描述了研究所和工人阶级运动的关系：

它是一个大学的中立机构，对任何个人都是可以接近的。其意义在于：它是第一次收集世界重要国家的工人运动情况，尤其是资料来源（会议记录、党纲、法规、报纸、期

刊)……在西欧, 无论谁希望写作有关当代工人运动的论文, 都必须来找我们, 我们是唯一全面收集这些材料的场所。^④

当研究所接受那些有政治承诺的成员时, 它所看中的仅仅是其非政治性工作。这一类人中最重要的是活动家维特夫,^⑤ 一个路德会教师的儿子, 1896 年生于汉诺威的沃尔斯特多夫镇, 战前参加德国青年运动, 战争结束时已日益卷入激进政治。1918 年 9 月, 他参加独立的社会主义党, 两年后, 这个党成为共产党。在整个魏玛时期, 他以相当大的精力直接参予党的工作, 尽管其异端立场使他不久在莫斯科陷入困境。 15

在深深参予共产主义政治的同时, 维特夫也想努力追求一种充满活力的学术生活。他在莱比锡学习时受到 K·兰姆勃莱希特 (Karl Lamprecht) 的影响; 在柏林和法兰克福, 格吕堡同意指导他的论文。在转向后来的主要兴趣领域 (亚洲社会) 之前,^⑥ 他出版了关于资产阶级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早在 1922 年, 盖拉赫和韦尔就邀请他参加计划设立的研究所, 但 3 年后他才接受这个建议, 他的夫人 R·斯莱辛格 (Rose Schlesinger) 成为研究所的图书员。

尽管他的同事尊敬维特夫对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贡献, 但他们并未真正地将其著作整合进他们自己的著述之中。反对对马克思理论做传统解释的霍克海默和其他成员认为在理论问题上维特夫太素朴了, 是非辩证的实证主义。轻视是双方都有的, 一个象征是: 1932 年他不得不以 C·皮特生 (Carl Peterson) 为笔名评论自己的一本著作, 因为此外没有人对其著作有兴趣。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格罗斯曼，虽然他从1926年到1940年都在研究所，但也很少被认为是研究所思想发展的主要力量。他无论在年龄还是在思想上都更接近格吕堡而不是年轻的一代。格罗斯曼1881年生于克拉科夫（那时还属于奥地利的加利西亚）一个非常富裕的犹太矿主的家中，战前他在克拉科夫和维也纳学习经济，在维也纳他和B·巴威克（Bohm Bawerk）合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关于18世纪奥地利贸易政策的历史论文。^④战争初期他是一名炮兵军官，他几次担任奥地利在卢布令的管理者，直到哈布斯堡帝国垮台为止。战后他选择了重建的波兰，受邀监督第一次国家财政的统计调查，并被任命为1921年第一次波兰人口普查的官员；次年他成为华沙的经济学教授，直到1925年毕苏斯基政府不满他的社会主义而请他离开。格吕堡战前就与他认识，此时就请他去法兰克福，在那里，一个大学助教和格吕堡在研究所助手的位置在等着他。 17

丰富的学养和在经济史方面惊人的知识，令每一个认识格罗斯曼的人都不会忘记他，^⑤人们把他当作中欧学术的具体象征：恰当、精确、典雅。然而，在恩格斯和考茨基的经济唯物主义盛行的时候，他也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并保持了对这种解释的坚定信仰，而对研究所青年成员们的那种辩证的、新黑格尔式的唯物主义不表同情。

但是，不应过分夸大格罗斯曼对霍克海默著作的冷淡。1937年6月18日，他写信给P·马贴克（Paul Mattick）说：

在最新一期的《杂志》上，有一篇特别成功文章，是霍克海默对新（逻辑）经验主义尖锐的、根本性的批评，非常值得一读。因为在各种社会主义团体中，马克思主义和经

验主义混在一起，有些人还用对经验主义的同情来表明其反形而上学的立场。⁴⁹

与维特夫、博克瑙一样，格罗斯曼在政治上对苏联基本持非思考的热情态度。尽管他曾是波兰共产党员，但到法兰克福后，看来并未成为德国共产党员，所以与他们不同，他并未体验到对共产主义的失望，即使在后来数十年包括流亡美国时。其时许多有过相同背景的人都在否定其过去。

格罗斯曼对博克瑙的书提出异议时，主要是针对从封建社会转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时间问题——他把时间提前 150 年——以及技术影响变革的重要性，列奥纳多比笛卡尔更是他的范式人物。虽然如此，格罗斯曼从未对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基本的因果关系表示怀疑。在 1935 年发表于《杂志》的文章中，他再次表达了他所理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赞同，自然这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比如他强调技术对变革的推动就和博克瑙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调对立。他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信条的坚持在 1926—1927 年的系列讲座中得到更充分的表述，1929 年，这些讲稿收集为《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积累和崩溃的规律》一书，⁵⁰成为研究所丛书的第一卷。

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者们争论的中心。自爱德华·伯恩斯坦 1890 年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从经验上反对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的预言以来，卢森堡、H·库诺（Heinrich Cunow）、O·鲍威尔（Otto Bauer）、M·J·杜冈—巴拉诺夫斯基（M·J·Tugan—Baranovski）、R·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等人都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对此作了艰难探索，其中 F·斯泰尔伯格（Fritz Sternberg）的《论帝国主义》在更为悲观的方向上修正了

卢森堡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死亡的唯一残余的观点，是格罗斯曼之前对这个问题的最后一个贡献。《资本主义体系中积累和崩溃的规律》首先对此问题的文献进了一番精辟的分析，接着，在对马克思的言论选辑作了一些说明之后，格罗斯曼试图在鲍威尔的数学模式上建立一个演绎系统来证明马克思预言的正确性。他指出贫困化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本家的贫困化，资本家过度积累的趋势将在利润率超出一定时期的限度时不可避免地衰落。虽然他也承认有相反的趋势，例如对资本更充分的利用，但格罗斯曼自信地声称它可能缓和却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体系的最终危机。这一预言在现实中遭到失败是明显的，无需为此论据的全部细节耽搁时间。^⑤然而，姑且这么说吧，他立论主旨的家静主义意蕴（quietistic implications）和所有那些把客观力量放在主体和革命实践之上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者一样，并未失去其时代伙伴。^⑥

研究所的另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波洛克，在另一立场上向格罗斯曼发难。他强调马克思产业工人概念的不足，因为它否定了非手工劳动，波洛克指出服务行业在 20 世纪日益重要，^⑦剩余价值也许既可以从商品生产的工人也同样可以从服务行业的工人中提取，他认为正是这一点将延长这一体系的生命。格罗斯曼并不让步，他和波洛克就经济问题展开的争论直到他离开研究所才结束。仔细领会波洛克的《苏联计划经济的实验 1917 - 1927》一书的言外之意，^⑧可对此一论争获得清楚认识，该书载于研究所的《杂志》的第二卷中。

在苏联国庆 10 周年时，波洛克应梁赞诺夫的邀请访苏。梁赞诺夫 1920 年曾在法兰克福呆过，并为“格吕堡文库”写过文章，^⑨在苏联，尽管由于他担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受到尊

重，但在政治上却被视为离心的、倒退到布尔什维克之前的社会民主党时代的人物。他经常批评党的政策，^⑤但还是活了下来，直到斯大林把他和伏尔加的德国人一起送去流放，这发生在波洛克访苏后几年。这次访问，被诙谐地称为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唯一真正“贡献”。因为梁赞诺夫的友谊，波洛克得以和布尔什维克党内正在缩小的反对派进行对话，这是他研究计划之外的收获。几个月以后，他带着并非完美的印象回到了法兰克福。他在书中小心翼翼地避开对革命和 20 年代强制性集体化运动的政治后果进行评论，对他的中心问题——从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化——波洛克很少热情支持，基本上是一种超然的、谨慎的分析，他不愿过早地下结论。这也是他和格罗斯曼的分歧之处。

但如果因此就以为研究所在 1927 年时对苏联实验的态度更接近波洛克的怀疑主义而非格罗斯曼的热情的话，那就错了。维特夫继续保留他的热情支持，博克瑙还未做出和党断绝关系的决定，就是霍克海默也保持着在列宁以后的苏联实现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乐观希望。几年以后出版的《黄昏》中有一段话颇能表现出他彼时的心情：

谁看到了帝国主义世界毫无意义的、决不能用技术无能来解释的不公正，谁就会把苏联发生的事件视为进步，视为企图克服这些非正义的痛苦尝试，或至少怀着砰然而跳的心情询问这一尝试该不该继续下去。如果一些表面现象并不有利于它，那么他也应怀抱着希望，就像癌症患者之于癌症疗方可能已被发现这类来路不明的消息那样。^⑥

对波洛克发现的热烈而秘密的讨论确实有过，不过从未见诸

文字。事实上，1929年他的书出版后，研究所对苏联发生的事几乎全都保持外表的沉默，仅仅被格吕堡20年代的学生R·施莱辛格（Rudolf Schlesinger）的一篇应时的文献调查报告^⑧所打破。这一沉默持续到10年后苏联大清洗，除顽固的格罗斯曼外，霍克海默和其他人完全放弃了对苏联的希望。但甚至在那时，由于全神贯注于我们后来将会讨论到的那些问题，他们从未把批判理论的中心集中在斯大林的左翼极权主义上面，缺乏可以利用的资料是原因之一，但另一个不应忽视的原因是，对共产主义的失败进行尽管是异端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这其中要牵涉到多少困难。

然而，说完这些以后，也应强调指出在研究所成员表述的批判理论中，包含着对苏维埃为其行为辩护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的、含蓄的批评。至此我们已经提到研究所早期历史上的大部分人物——格吕堡、韦尔、佐尔格、博克瑙、维特夫和格罗斯曼等等，尽管他们对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不太关心，但霍克海默对此的兴趣却越来越大，他并非没有同盟。波洛克的兴趣虽然最初是在经济学，但最后还是跟柯奈留斯学过哲学并和他的朋友一样反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1927年格吕堡中风以后，他越来越多地参与研究所管理事务，并依然在霍克海默主持的研究班上发表见解。20年代后期，两个青年知识分子洛文塔尔和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 Adorno 流亡后他只以其母亲的名字Adorno知名）参加研究所，他们在后来的发展中日益发挥重要影响。

格文塔尔1900年生于法兰克福一个犹太医生家庭，与其他人一样，战前从事学术活动，战时在军队服役。他曾在法兰克福、海德堡、吉森学习文学、历史、哲学和社会学，1923年以

一篇论述 F·巴德尔 (Franz Von Baader) 的论文在法兰克福获博士学位。大学期间, 他参加过激进学生的组织, 这方面他和霍克海默、波洛克、韦尔一样, 他和韦尔还是中学时代的朋友。另外他也和以颇富魅力的 R·诺拜尔 (Rabbi Nehemiah A Nobel)^⑨ 为中心的犹太知识分子小组有过关系, 这个团体包括 M·布伯尔 (Martin Buber)、F·罗森茨威格 (Franz Rosenzweig)、S·克拉考尔 (Siefried Kracauer) 和 E·西蒙 (Ernst Simon)。正是作为这一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在 20 年代发展成为著名的“自由犹太人读书之家”——洛文塔尔才再次和他学生时代的朋友弗洛姆取得联系, 弗洛姆后来也参加了研究所。尽管有些外部事务限制他的介入, 洛文塔尔还是在 1926 年参加了研究所, 此时他继续在普鲁士中学教学, 同时担任一个左翼自由派组织“人民舞台”的艺术顾问。20 年代晚期, 他一直为一些杂志写美学和文化方面的批评文章, 其中绝大部分刊登在“人民舞台”的刊物中的显著位置上, 另外他还继续为各种各样的定期杂志撰写一些犹太教哲学方面的历史性文章。此外, 他具有的编辑经验后来在《社会研究杂志》取代《格吕堡文库》而成为研究所喉舌时起了重要作用。

21

洛文塔尔于 1930 年成为研究所正式成员 (他的正式称呼是第一助手——只有格罗斯曼曾经得到过它), 之后他主要从事文学社会学和大众文化的研究。如果说研究所早期主要关心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 那么 1930 年后它就转向对文化等上层结构的分析, 我们会看到, 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两者关系上的一些框框, 批判理论是有疑问的。虽然洛文塔尔对这一重心的转换有所贡献, 但他对此承担的工作要少于 20 年代末参加研究所的另一个重要成员阿多诺。

阿多诺是仅次于霍克海默面和研究所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为一个成功的歌唱家。她那没有结婚的妹妹是一个曾给著名的歌唱家 A·帕蒂 (Adelina Patti) 伴奏过的钢琴演奏家, 她们一道督促这个“小太保”在 B·塞克勒斯 (Bernhard Sekles) 指导下演奏钢琴和练习作曲。

法兰克福所提供的音乐训练基本上传统的, 而阿多诺却渴望从维也纳开始的音乐革命。1924 年春 (或夏), 他在法兰克福全德音乐协会的集会上遇到 A·贝格 (Alban Berg), 被他那还未完成的歌剧《沃伊采克》的三个选段所吸引,^⑧他立刻决定随贝格去维也纳做他的学生, 只是由于法兰克福大学学业的关系, 此行拖延到 1925 年。此时的维也纳已不是鲍威尔、K·莱纳 (Karl Renner)、希法亭、M·阿德勒 (Max Adler) 等人的城市, 而是 K·克劳斯 (Karl Kraus) 和勋伯格等文化激进分子的城市。一到这里, 阿多诺就说服贝格每周开两次作曲课, 并请 E·斯托尔曼 (Eduard Steuermann) 在钢琴技术上予以指导。他所受到的影响, 看来是勋伯格无调音乐的探索而非其后的十二音制。^⑨此外, 阿多诺还不断为一些先锋派杂志如《破晓》等写稿, 1928 年他担任该杂志的编辑, 也就在这一年他回到了法兰克福, 但直到 1931 年他一直负责杂志的工作, 尽管他已改变了他的学术使命。

23

阿多诺在维也纳的 3 年并不是他学术生涯的中断。有机会在阿多诺 1925 年到达维也纳后和他同住一个公寓的 A·科斯特勒 (Arthur Koestler) 回忆说, 阿多诺是“一个怕羞的、狂怒的、诡秘的年轻人, 有看微妙的魅力, 我因为太年轻而无法分辨”。^⑩在具有相同的热情却教养不高的科斯特勒面前, 阿多诺是一个威严而又有优越感的人, 甚至他的老师贝格也发现阿多诺毫不妥协的思想有点令人不快。阿多诺后来也承认: “我的哲学基石常常在贝格所称的狂热念头下向之倾倒……那时我真有点蛮认真的甚至

要发展为成熟艺术家的神经症了”。^⑤维也纳的3年看来差不多根除了他的羞涩，但是，新的自信也并不意味着他放松了原先的高度严肃和对文化形式的苛求。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也只能说，由于他常常参加文化标准最严格的坚持者克劳斯的读书会和维也纳先锋派的秘密音乐讨论会，而更强化了他的固有倾向。在此后的岁月中，他从不肯放弃其文化精英主义。

在另一个方面，维也纳时期在阿多诺的发展中也是有意义的。许多年之后，他认为勋伯格小组吸引他的原因之一是其孤僻的、排他的小团体式性质，这使他想起德国的S·格奥尔格小组。^⑥3年中令他失望的是这个小组破裂了，原因是勋伯格的新妻子使他和其学生分开了，如果没有发生此事，那么至少可以推测，阿多诺也许不会回到法兰克福。当然一到那里，同样的派系因素使他进入了霍克海默和研究所青年成员的小圈子中。

阿多诺认识霍克海默是在1922年柯奈留斯指导的胡塞尔研究班上，两人都曾在完形心理学家格尔布指导下学习。1924年，阿多诺完成了向柯奈留斯提交的论胡塞尔（Husserl）现象学的博士论文。^⑦但当他从维也纳回来时，柯奈留斯已经退休，其教职在由舍勒短期占据后由P·蒂利希（Paul Tillich）取代。^⑧蒂利希是霍克海默、洛文塔尔、波洛克的密友，属于一个包括曼海姆、K·里察勒（Kurt Riezler）、A·格威（Adolph Lowe）和K·曼涅克（Karl Mennicke）等人定期结合的小组织。这个“小聚会”（The Kränzchen）——一个有一丛花环和一群亲密知己双重含义的旧式词汇——在大部分成员被迫流亡后继续在美国存在了几年。在蒂利希的帮助下，阿多诺写了一篇研究基尔凯郭尔美学的论文，于1931年得到授课资格成为编外讲师。^⑨

此刻研究所正经历一场重要的变化。格吕堡自1927年中风

学的起源》一书，^⑦研究马基雅维里、霍布斯、维科及其他早期的历史哲学家。1930年6月，年方35岁的霍克海默正式荣任此职，社会研究所从此开始了多产时期，而更有意义的流亡时期及文化迷失也随之而来。

1931年1月，霍克海默正式就任研究所所长。他在就职仪式上作了“社会哲学的目前形势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演说，^⑧他和前任的不同立刻就明朗了。霍克海默不是简单地给自己贴上一个好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而是转向社会哲学的历史并从此来观察当前形势。他把个体作为社会理论的基础，个体一开始曾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特征，黑格尔为了国家而牺牲个体，随后叔本华则表达了对客观总体信念的瓦解。在追溯了这一过程后，霍克海默转向最近的社会理论家，如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和社会总体主义的鼓吹者O·斯派恩（Othmar Spann），他们都试图克服由于古典综合崩溃而出现的失落感，舍勒、哈特曼（Hartmann）和海德格尔（Heidegger）等人都渴望重新回到意义统一体的慰藉中来。霍克海默认为，社会哲学不仅仅是一门寻找无可移易的真理的科学，还应理解为一种由经验工作补充和丰富的唯物主义理论；同样自然哲学也与个别科学领域辩证相关，因此研究所将继续在不同领域努力，不放弃其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目标。为此目的，霍克海默支持保留格吕堡非学院性的“所长独裁”。

在总结时，霍克海默提出了他领导下的研究所的第一个任务：研究工人和受雇者对德国和发达欧洲其他地方各种事件的态度，方法包括公共统计学和可由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作解释的数据所形成的问卷表等。为帮助收集资料，他宣布研究所将接受国际工人组织的领导A·托马斯（Albert Thomas）的提议，在

日内瓦建立一个研究所分支，这是研究所后来不断在德国境外建立的分支中的第一个。其实接受托马斯的建议而做出这一决定不仅是为了积累数据，而更多地是考虑到当时德国的政治形势已出现了将来或许流亡的迹象。波洛克受命在日内瓦建立一个永久性办事处，其助手 K·曼德鲍姆（Kurt Mandelbaum）随同前往。1931年，办事处刚建立，研究所的大部分资金也悄悄地转移到中立国荷兰的一家公司。

新的指导精神已不再适宜“格吕堡文库”的出版，于是霍克海默就任所长后的另一件事是停止创刊 20 年共出了 15 卷的“格吕堡文库”的出版，“文库”曾是为研究所内外各种现点的人服务的工具，部分地反映了洛吕堡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背景。现在大家迫切感到需要一个杂志来表达研究所自己的声音。霍克海默本人喜欢简洁，这已在这一时期他写下的大量格言中表现出来，他讨厌德国学者爱用的大部头著作。尽管研究所出版的丛书中第三卷即维特夫的《中国经济和社会》是 1931 年问世的，^④但重点已转向论文，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上的文章多为专题研究，它们是研究所在此后 10 年中贡献给世界的主要工作。许多论文在发表之前已由其他成员作了彻底批评，因此几乎既可算作集体成果也可视为个人著作。用洛文塔尔的话说，这个杂志“很少是不同观点的集合，而更多是研究所宣判的讲台”。^⑤即使另外一些人偶尔提供的一些文章也是如此。最后编辑由霍克海默拍板，洛文塔尔则根据过去的经验帮助编辑并全盘负责内容广泛的评论部分，他的第一件任务是去会见德国社会学家的高级代表韦兹，使他相信《杂志》无意于与他的《科隆社会学季刊》竞争。

霍克海默在《杂志》第一期的前言中说，^⑥“社会研究”并不像韦兹及其德国更传统的学院派所从事的那样。追随盖拉赫和

格吕堡，霍克海默强调了研究所综合的、跨学科的特性，特别指出社会心理学在沟通个体和社会现实之间的桥梁作用。在紧接着前言的第一篇文章《科学及其危机的考察》中，^⑧他开始把当代片面的知识和产生这一现象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认为一个垄断和无政府两兼的全球性经济结构已加深了知识的混乱状态，只有通过纯粹意识中克服科学知识中的拜物教根基，通过认识那些决定所有思维的具体历史环境，目前的危机才能克服。科学不能无视自己的社会功能，只有逐步意识到它在当前批判境遇中的作用，科学才能对将带来必然变革的力量有所贡献。

《杂志》第一期反映了“社会研究”的多样性。格罗斯曼再一次著文论述马克思与资本主义的危机问题；^⑨波洛克讨论萧条和资本主义框架中计划经济的可能性问题；^⑩洛文塔尔勾勒出文学社会学的任务；阿多诺在两篇文章的前一篇中讨论了音乐社会学；^⑪其余两篇文章讨论了社会研究的心理学方面，一篇是霍克海默的《历史与心理学》，^⑫另一篇的作者是研究所的新成员弗洛姆。^⑬（研究所对心理分析与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整合将在第三章得到详细研究。）格文塔尔 1918 年以来便是弗洛姆的朋友，30 年代初把他作为三个心理分析学家之一介绍给研究所，另两位是和研究所有联系的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的所长，K·兰道尔（Karl Landauer）及 H·门（Heinrich Meng）。兰道尔为杂志写的文章局限于评论部分（在第一期中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者，其他的评论者有 A·科利 [Alexandre Koyre]、K·莱文 [Kurt Lewin]、柯尔施和 W·赖希 [Wilhelm Reich]）。门的兴趣尽管是精神卫生学而非社会心理学，但他也帮助组织研讨班，并写了一些与研究所的兴趣相关的评论。

随着精神分析学家进入研究所，格吕堡时代是明显地过去 28

了。1932年为庆祝格吕堡70诞辰而出版的《格吕堡纪念文集》进一步标志着这一转折。^⑧虽然波格克、霍克海默、维特夫和格罗斯曼均写了文章，但大多数文章来自格吕堡在维也纳时代的老朋友，如M·贝尔(Max Beer)、阿德勒等。1932年，马尔库塞成为这个研究所的新成员，使这一转折获得新的动力，在后来的岁月中，马尔库塞成为批判理论的主要设计师之一。

马尔库塞1898年生于柏林，像其他人一样这是一个富裕的同化了的犹太之家。完成了战争中的军事服务之后，他参加了柏林士兵委员会的政治活动，1919年他离开了两年前加入的社会民主党，以抗议它对无产阶级的背叛。德国革命失败后的次年，他放弃政治到柏林和弗赖堡研究哲学，1923年以一篇论述“艺术小说”(以艺术家为主角的小说)的论文在弗赖堡大学获博士学位。此后6年，他在柏林从事书刊发行和出版，1929年他重回弗赖堡师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受到两位老师的重大影响。在此期间，他不时在M·贝克(Maximilian Beck)的《哲学手册》和希法亭的《精神》上发表文章。他的第一本书是1932年出版的《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理论的基础》，^⑨有其良师海德格尔的印记，这是他在大学取得授课资格的论文。但在海德格尔接受马尔库塞做助教之前，师生关系已比较紧张，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和日益右倾的老师之间政治立场的不同，无疑是根本原因。由于在弗赖堡无望获得工作，马尔库塞于1932年离开这个城市，法兰克福大学的董事里察勒应胡塞尔之请，把他推荐给霍克海默。

阿多诺在《杂志》第二期上评论了《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理论的基础》一书，指出此书背离海德格的地方是从“‘存在的意义’走向一个‘在世中的存在’的开放性，从基本本体论走向历史哲学”。^⑩尽管阿多诺感到还有一些观点仍然在海德格尔笼罩

多时间是在英国牛津大学默顿学院进行研究；格罗斯曼在巴黎找到避护，3年后又到英国去了1年，1937年才不情愿地来到美国；洛文塔尔在法兰克福呆到3月2日，接着他和马尔库塞、霍克海默一起到日内瓦，他是研究所关门之前最后一个离开的；在纳粹窃据权力的时候，波洛克实际上已在流放之中，尽管他料不到这一流放会持续近20年，横跨两大洲。

30

1933年2月，日内瓦办事处和21个人的董事会合并成为研究所的管理中心，^⑧为体现其欧洲特性而定名为“社会研究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Social Research），以霍克海默与波洛克为主席，格文塔尔、弗洛姆和斯特海默（Sternheimer）后来被任命为次年的继任者。^⑨现在，不仅瑞士有“法兰克福学派”，而且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法国和英国也建立了办事处。杜克海姆（Durkheim）的学生C·伯格（Celestin Bouglé）自1920年以来便是巴黎高师统计中心的主任，他主动把他的办公室提供给研究所，作为一个普鲁东主义者（他是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拥护者），他在政治上对研究所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同情，但还是愿意忘却政治上的分歧而关心研究所的困境。杜克海姆在斯特拉斯堡的另一个杰出学生M·哈布瓦彻（Maurice Halbwachs）以及那个时在海牙国际法庭作法方律师、时在巴黎教法律的G·瑟勒（George Sceller），也和伯格一道成了这一赞助活动的发起者。更进一步的支持来自H·柏格森（Henri Bergson），他曾对研究所的著作留有印象。在伦敦，相同的提议由《社会学评论》的主编A·法夸哈森（Alexander Farquharson）提出，他提供了利·勃莱大厦的一些房子，S·韦布（Sidney Webb）、托尼、M·金斯伯格（Morris Ginsberg）和H·拉斯基（Harold Laski）等都支持法夸哈森的建议，于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处建立起来了，只是由于资金缺

乏才不得不在 1936 年关门。

同时,《杂志》在莱比锡的出版人 C·L·赫尔辛菲尔德 (C·L·Hirschfeld) 告诉霍克海默, 出版社已不能冒险继续出版业务了。伯格便提议改寻巴黎的 F·阿尔肯出版社作为替代, 这个建议被采纳了, 此一联系一直持续到 1940 年纳粹再次以暴力威胁《杂志》的出版者为止。

以《杂志》1933 年 9 月在巴黎出版第 1 期为标志, 研究所的替国阶段结束了。在它创立后将 10 年的岁月中, 它集合了一批各具才能的青年知识分子, 协调他们致力于研究所构想的社会研究工作。法兰克福的最初年代是由格吕堡的思想统治的, 在他的领导下, 研究所获得了结构上的独立性和在魏玛精神生活中的立足点。虽然以研究为中心, 但也培养了一些人才, 像 1930 年参予波洛克苏联经济研究第二卷的 P·巴兰 (Paul Baran)^⑧、以及 H·格尔斯 (Hans Gerth)、G·迈耶尔 (Gladys Meyer) 和 J·都纳 (Josel Dunner) 等都是研究所流亡前培养的学生, 他们后来对美国的社会科学发生了很大影响 (顺便提一下, 都纳 1937 年写过一篇“假如我忘记你”的小说, 其中研究所的主要人物都以假名出现)^⑨而且研究所的主要人员都参加了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讨论, 它吸引了法兰克福的学术明星 H·德·曼 (Hendrik de Man) 和蒂利希。由 H·韦尔慷慨提供的经费, 使研究所从政治和学术的压力下解放出来, 获得独立, 即使在他 1927 年死后, 当其他的德国流亡学者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重新建立了他们的联系而没有财政来源时, 研究所也继续得到同样的资金保证。F·韦尔 1935 在纽约再度参加研究所后, 又提供了 100000 美元的资助, 帮助研究所度过了 30 年代。

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目标, 被视为研究所的基本特征之一,

尤其是在霍克海默成为它的领导人之后。这一特征被研究所带到新的环境之中，建立一个可作为未来大同社会样板的紧密无间的学者团体，这本来也是奠基者们的宿愿。前面提到的《杂志》强化了这种整体感；而且被迫流亡的体验和在海外的重新结合又大大加深了这种感情。在研究所范围内，还有一个更小的集体团结在霍克海默周围，包括波洛克、洛文塔尔、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他们的工作植根于欧洲哲学传统的中心又针对目前的社会问题，并吸收当代的经验性技术，由此形成研究所成就的核心。

如果人们通过学派成员的传记来寻找其共同点，那么就会发现他们都出身在中等或中上等的犹太家庭（阿多诺的双亲只有一个犹太人）。此处不能详细讨论魏玛共和国的犹太激进分子，但有几个问题不应当忽视。如上所述，在韦尔和波洛克劝说老韦尔支持研究所时都坚持一个观点，即必须研究德国的反犹主义，³²但这项研究直到40年代才开始，如果要概括研究所对“犹太人问题”的一般态度，也许可以说差不多就是一个世纪前激进的犹太人马克思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们都认为宗教和伦理事务明显地依附于社会。在《黄昏》中，霍克海默攻击那些仅仅因为经济威胁而反对“反犹主义”的犹太资产者，他写道：“准备为信仰而牺牲生命和财富”的观念已被遗落在犹太居民物质基础的后面了，对于资产阶级的犹太人而言，财产等级制既非犹太的也非基督教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像‘亚利安’一样，犹太革命是能为人类的自由而承担生命危险的”。^⑩他们对解救犹太人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冷淡，进一步说明了他们并不强调严格的犹太出身以反抗社会。^⑪

事实上，研究所成员都很急于否认他们的种族出身有什么意

阕，他们在这样的气氛中成长必然会留下其痕迹。那些急于忘却自己种族出身的犹太人所必然体验到的角色扮演感只会留下痛苦，而这种痛苦很容易培养起对社会整体的激进批判。这并不是说研究所的计划仅仅是，成主要地归因为他们的种族起源，而只是说完全否认这一点，就会忽视一个实际起作用的因素。

在这里附带说一下，一旦到了美国，研究所对犹太人问题更加敏感，比如阿多诺就应波洛克之请放弃了名字中的“Wiesengrund”，因为研究所的名单上犹太音的名字太多了。^⑧他们中间少有的非犹太人之一马辛说他的非犹身分是细微的但唯一使他和其同事保持区别的有意义的东西。^⑨奇怪的是，至少研究所的成员们感到，较之在纳粹之前的德国，同化在美国更加艰难了。

除了就其起源作社会学的解释外，还有文化上的因素。哈贝马斯最近认为，犹太文化传统的某些倾向与其根源常被认为是清教的虔敬主义的德国唯心主义之间有明显的相似。^⑩对理解批判理论特别重要的一个相似是，言说而非图像才是接近上帝的唯一途径这一古老的“犹太教神秘哲学的观念”（cabalistic idea）。神圣的希伯来语言和被流放后居住在非犹太人之间的世俗语言之间存在一个距离，这一观念对那些不信任流行的普通语言的犹太人发生了影响。所以哈贝马斯认为这与在黑格尔式辩证法那里达到顶点的对经验现实的唯心主义批判是平行的，尽管很难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犹太祖先与其辩证理论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线索，但一些倾向确实是存在的。而这一点也可以同样来解释法兰克福学派为何乐于接受心理分析，心理分析已被证明是特别符合被同化的犹太知识分子口味的。（当然，这并非如纳粹所讲的弗洛伊德主义是“犹太人的心理学”，而仅仅是暗示出一种可能的血缘关系）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也得提一下。德国犹太社会内部，关于

犹太教的内容和犹太人的未来等问题，父子之间常常会出现狂怒冲突，有时这种冲突是以一种独特方式解决的，本雅明和他的父亲冲突特别尖锐。H·阿伦特（Hannah Arendt）写道：“解决这种冲突的惯例，总是儿子声称成为一个天才，或者是致力于人类幸福，像那些为数甚多的来自富裕家庭的共产主义那样——总之立志做高于挣钱的事业——父亲才允许它作为没有成功的人生的有效借口”。^⑧正如许多方面一样，本雅明在此也是一个例外，其父拒绝支持他。不过其他人就不同，H·韦尔作为阿根廷一个或功的谷物商其兴趣在利益而非革命，但他愿意以其可观的慷慨支持其子的激进主义。在霍克海默决定不追随父亲的制造业而发生最初的冲突后，他的父亲看起来是给了他永久的支持。^⑨实际的疏远发生在霍克海默与他父亲的非犹太秘书发生恋爱之后，他大她8岁，1926年3月，他们结婚了。与此同时他开始在大学任教，如波洛克回忆，“霍克海默与其父的冲突非常短暂……疏远几年后，他们完全和解了，霍克海默被真诚地、热情地接受了”。^⑩显然，较之他成为一个革命者，他和非犹女子结婚，双亲在观念上更难接受。

其实，批判理论的强烈的伦理色彩也许是与关系亲密的犹太家庭可能信奉的价值观相结合的产物，总之很难说研究所成员们把他们对父母商业精神的拒绝转化为彻底的个性造反。尽管他们移到美国之前的著作中到处出现与无产阶级团结的热情表达，然而任何时候研究所成员都没有影响工人阶级的生活风格。

他们的革命感情表达得最清楚的是在H·莱格斯（Heinrich Regius）的著作中，这个名字是霍克海默从17世纪自然哲学家那里借来放在一本哲学格言集的首页上的，这本书是他流亡的第一年在苏黎世出版的。这种感情也出现在《黄昏》一书中《一致

勒 (Kurt Hiller) 和 C·奥兹查基 (Carl von Ossietzky) 或超越两党之差别, 或提供一个可行的选择这些热情的尝试, 也很快被他们视为梦幻而被拒绝。这样, 法兰克福学派作出了把理论的纯洁性置于实现理论的具体实践所需要的党派之上的选择, 由此产生的优势和局限将在下章讨论。 37

1931年研究所的财产被谨慎地转移到荷兰, 而使工作没有大的中断。在日内瓦的第一年是调整阶段, 但并非不景气。研究工人和受雇者态度的计划没有明显减缩。曾和工人运动有过联系的社会学家斯特海默被 A·托马斯办公室的一些人推荐给霍克海默作为未来的成员, 在日内瓦他是助理, 当波洛克赴美后, 他成为办事处主任。在为这个计划收集材料方面, 他有很大贡献, 不过在理论方面建树较少。当然他在研究当代社会的闲暇问题上很有成绩。^⑧

因调整出版人而短暂耽搁后, 《杂志》继续正常出版, 作者名单上出现了一些新手, G·卢夏 (George Rusche) 著文论述劳工市场与犯罪惩罚的关系问题,^⑨ 预示了后来他和基希海默一起在研究所赞助下完成的著作; 曼德鲍姆常常以库尔特 (Kurt) 或 E·鲍曼 (Erich Baumann) 为名和 G·迈耶尔 (Gerhard Meyer) 写作过去由波洛克、格曼斯曼写的经济学文章;^⑩ 派瑞狄克 (Periodic) 此时正努力成为 R·阿隆 (Raymond Aron) 或 G·弗里德曼 (George Friedmann) 的助手, 也从巴黎写来文章; P·兰兹伯格 (Paul Ludwig Landsberg) 是哲学家, 研究所对他寄予厚望, 后来被纳粹杀害, 他也著文论述种族观念和伪科学;^⑪ 美国的情况也由古姆佩茨的系列论文涉及到。^⑫ 《杂志》上的文章充分显示了它的国际性。

寻找新基地的问题现在日益紧迫了，在肯定日内瓦办事处的重要性的同时，霍克海默等人从未把它当做研究所的永久性中心。1933年5月，格罗斯曼在给马贴克的信中表达了他们的共同焦虑：“法西斯主义在瑞士发展很快，研究所在这里也受到了新的威胁”。^④波洛克1934年2月专赴伦敦，估摸在英国重建研究所的可能性，在和伦敦经济学院的主任W·贝弗利奇（William Beveridge）爵士、法夸哈森及其他社会学研究所的同事们紧张商议后，他确信这是不可能的。英国限制自1933年开始大量逃亡的德国学者，^⑤和研究所有关的人中，只有一个博克瑙选择伦敦作为其流亡的永久性居地，在伦敦大学成人教育部得到了国际政治的教席，几年后他有机会出访内战中的西班牙，更增加了他已很明显的对共产主义的厌恶，并写了一本对这场战争的经典性研究《西班牙的战场》。^⑥除了1936年他在《权威和家庭研究》上发表一篇文章外，^⑦此时他与研究所的联系已经中断。

38

在巴黎，重建研究所的希望也很渺茫，这里建立学术机构比英国更加困难。P·霍因夏姆（Paul Honigsheim）从科伦飞往巴黎执掌研究所的巴黎办事处，他这样描述流亡者在法国通常受到的冷淡：

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希望自身和家庭不但安全而且未未有望，德国知识分子却不把时间花在和友人喝开胃酒上，却以双倍于法国人的干劲工作，他们为上帝而工作，如没有宗教信仰就为工作而工作，在这方面真正的德国学者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法国知识分子自然发现了这些该死的德国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但他们和美国人的同情态度相反，并不欢迎他们中间出现德国学者。这样以德国避难者的身份

率直地工作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⑧

霍因夏姆强调，伯格、哈布瓦彻和他们的同事是有这个勇气的，不过他们毕竟只是少数，因此就排除了在法国安家的念头。

虽然研究所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向东移向斯大林的苏联的想法却从未得到认真对待，即使是格罗斯曼和维特夫 30 年代中期短暂而不成功的莫斯科之行也是如此，因而唯一的去处是美国。古姆佩茨 1933 年被派往美国考察形势，他是波洛克 1929 年的学生，一度为共产党员，后来弃党而成为证券经纪人，并在 40 年代写了一本反共产主义的书。^⑨他生于美国长于英国，美国之行带回了一个有利的报告，使霍克海默和其他人确信研究所每年能得到 30000 美元的基金，即使在经济危机时也能保证生存。 39

一年后，研究所和美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联系了几次，包括 C·比尔德 (Charles Beard)、R·麦克夫 (Robert MacIver)、W·米奇尔 (Wesley Mitchell)、R·尼布尔 (Reinhold Niebuhr) 和 R·莱昂德 (Robert Lynd)，他们都在哥伦比亚大学。1934 年 5 月霍克海默第一次赴美，和哥大年高德邵的校长 N·M·巴特勒 (Nicholas Murray Butler) 的接触给了他很大鼓舞，巴特勒建议研究所和大学联合，还提供 117 号西大街 429 的房屋。霍克海默担心由于英语水平的限制而误解，写了一张 4 页纸的信要求他确认，巴特勒的反应异常简洁：“你的理解很正确”。^⑩这样就像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出现在 20 年代的法兰克福一样，一个社会研究的国际性研究所开始在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纽约落脚，马尔库塞于 6 月、洛文塔尔于 8 月、波洛克于 9 月、紧接着是维特夫纷纷来到纽约。弗洛姆 1932 年已在美国，此刻正应邀在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讲课。他们是第一批到美国的欧洲流亡知识分子，这

些知识分子在此后数十年中极大地丰富了美国文化生活。^④

这一转移决非没有困难，和很少甚至没有财政来源重新安置的 A·约翰逊 (Alvin Johnson) 的“流亡大学”相比，研究所确实是幸运的。这两个流亡团体之间的紧张，固然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⑤也与完全不同的经济处境明显相关。然而，应予补充的是，研究所后来对处境较差的流亡者怀有强烈的责任感。研究所也有自己的问题，这是那些困扰着移民的语言和文化的调整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最困难的知识调整是其社会实践的哲学基础和美国社会科学中严格的反思辨倾向的冲突，美国的经验技术是他们在流亡中学到的重要一课，战后被带回德国。不过这些技术是在充满犹豫的情况下获得的。

总之，研究所没有急于放弃过去而完全美国化，从其离开欧洲后继续以 F·阿尔肯为出版人可以看出他们的勉强。研究所拒绝了新伙伴要求在美国出版的请求，以为这样更能保持《杂志》语言的德国味。虽然偶尔有英语、法语的文章出现，而且每篇德语文章后面都有英文或法文提要，但直到战争开始它都保持了德国性。事实上，它是唯一使用因希特勒而严重污染了的德语的刊物。这一点，被霍克海默及其同事认为对保存已受到根本威胁的德国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传统做出了重要贡献。确实，成为一种衰退文化的最后领地是研究所自我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深知语言负载思想的关系，坚持使用母语以抗拒纳粹主义对每一个德国人的同化。尽管德语世界的大部分人不能得到他们的书刊，研究所也愿意牺牲直接读者而为了只有希特勒失败才能实现的目标，这一抉择的可悲结果是他们成为美国学术界的孤立部分。1936年，研究所因为一些分歧而放弃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课，只开设一系列不同课题的研究班，^⑥但其中心仍然保持原来的理

论和研究。一旦他们在晨边峰 (Morningside Heights) 获得一个安全的所在——核心成员中只有阿多诺在国外多呆了几年——研究所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恢复他们在欧洲开始的工作。

虽然意识到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霍克海默等人还是对未来持乐观态度。1934年，他以 H·莱格斯为名写道：“资本主义的黄昏并不是人性暗夜的开始，诚然它在威胁着今天”。^⑨他们集中探索资本主义的危机、传统自由主义的崩溃、集权主义威胁的出现等相关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对纳粹失败所能做的最大贡献。他们的著作以一种社会哲学为基础，这一基础的表述是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在较少程度上还有阿多诺在 30 年代的主要事业。其中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发现有重大意义，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回到的批判理论的起源和发展的问題。

第二章 批判理论的起源

从最高的理性来看，所有的人都有几分邪恶的疾病，而世界则似一座疯人院。

歌德

我不相信任何体系并躲避它们，追求体系的意志是不诚实的。

尼采

批判理论的核心是对封闭的哲学体系的厌恶，如果以为它是封闭的体系，就那会扭曲它本质的开放性、探索性及未完成性。霍克海默选择格言和随笔而不是成为德国哲学特征的大部头著作来表达其思想，不是偶然的；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在写作完整著作时并不犹豫，但他们也抵制使其著作成为实证的、体系性陈述的诱惑。这样，批判理论正如其名字所提示的，是通过对其他思想家和传统哲学的一系列批判来表述的，其发展是对话式的，其起源是辩证的，这也是它运用到社会现象上去的方法。作为其他各种体系的牛虻，只有以其本身的方式对待它才能全面理解批判理论。因此，本章的目的，是在与其他思想学派及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的相互对应和作用中，介绍 30 年代产生的第一代批判理论。

追溯批判理论的起源，必须对 19 世纪 40 年代的思想兴奋作一广泛分析，或许这是 19 世纪德国思想史上最非凡的十年，^①此时黑格尔的后继者第一次把他的哲学运用到正处于急剧现代化过程中的德国社会和政治现象。所谓黑格尔左派由于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马克思而逐步暗淡，包括青年马克思在内，他们思想都经历了由哲学向一种更“科学”的，有时甚至是对社会现实的实证的态度转变，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都是一样的。^②19 世纪下半叶，社会理论在下面会得到解释的意义上一般已停止了“批判”和“否定”。

42

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根源被马克思主义自己遗漏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由科尔施于 1923 年在“格吕堡文库”上予以恢复。^③至此才开始了一系列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质疑，尽管（或许也正是因为）其科学主张已逐步退化到马克思本人曾摒弃的形而上学中去了。但有讽刺性的是，对马克思和最大的形而上学家黑格尔关系的新的理解，却有助于瓦解另一种形而上学，即从科学主义的后门而进入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黑格尔强调意识对世界的构成作用向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消极唯物主义提出了挑战，对此，战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克罗齐和狄尔泰因恢复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兴趣而为此奠定了基础；索列尔（Sorel）对自发性和主体性的强调也对瓦解第二国际内在固有的唯物主义教条发挥了作用。^④20 年代初，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卢卡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最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最有影响的刺激，^⑤在此后的 10 年中，他们的许多观点由于长期淹没的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出现而得到加强。当他们的努力由于种种原因而开始动摇的时候，重新焕发马克思主义生命的

任务主要落到研究所的年轻思想家身上。

法兰克福学派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回到 19 世纪 40 年代的黑格尔左派的主题上，这是可以讨论的。和批评理论的第一代思想家一样，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都对哲学和社会分析的统一感兴趣；他们同样热衷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对之进行唯物主义的颠倒。最后像许多黑格尔左派一样，他们特别关心探索通过人的实践改变社会秩序的可能性。

然而，世纪之交的巨大变化使他们的理论环境也极为不同，左派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唯心论的直接继承者，而另一方面，除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系统化外，法兰克福学派至少还因为叔本华、尼采 (Nietzsche)、狄尔泰 (Dilthey)、柏格森、韦伯 (Weber)、胡塞尔以及其他的人而与康德、黑格尔分开了。结果是批判理论不得不再声明自己反对把黑格尔逐出思想领域的对手们。当然，它并不能避免受到他们的观念的某些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巨大变化对复活了的批判理论产生了无可置疑的影响。确实，按它自己的立论来看，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左派黑格尔是在一个刚刚开始感到资本主义现代化影响的德国中从事著述的，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时代，以德国为其先导之一的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经济上为不断增长的垄断和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所统治。对左派黑格尔而言，可利用的社会主义的真实榜样只是几个孤立的乌托邦社会，而在法兰克福学派面前，已有惊人成功的苏联可供考虑。最后，也许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在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生活的时代中，一种新的“否定”（即革命）力量——无产阶级正处在激动之中，这种可以看到的力量被视为完成他们哲学的实践者。但到了 30 年代，无产阶级被整合进社会的迹象日益明显，

义者并反对德国的战争企图，虽然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还是被法兰克福更保守的教授们视为直率的激进分子。其文化悲观主义对霍克海默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又是和他的进步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的，波洛克回忆说“柯奈留斯从不犹豫公开承认他的信念和对当代文化的绝望。”¹⁰像魏玛早期的许多人一样，他有一段启示录式的话，见之于1923年写的自传纲要：

人类尚未学会在自身和事物中认识神圣的能力；自然与艺术、家庭和国家仅仅作为刺激物他们才有兴趣，他们过着漂浮的无意义的生活，他们享有的文化也是内部空虚的并行将崩溃，因为它应当崩溃，而人类需要的新的宗教将从这种文化的毁灭中诞生。¹¹

年轻的霍克海默对这种斯宾格勒式（Spenglerian）的预言较少热情，但他逐渐认同了柯奈留斯对形势的评论。不过，在20年代，他们仍然不忘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从他对《判断力批判》的分析来看，基本上没有放弃或绝望的意思，相反，倒显示出对实践 46
可以克服社会秩序中的矛盾并导致文化更新的确信，他从康德那里得到了一些他从未放弃过的信仰。

阅读康德，增加了霍克海默对个体重要性的敏感，作为一种价值，个体性从未被总体性的要求完全淹没，这同时也增强了他对认识过程中活动要素的欣赏，避免接受由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鼓吹的认识的摹写论。然而，他从未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现象和本体、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康德曾作为无法超越的而假定下来，在书的结尾时，霍克海默表明这些对立虽未曾克服，但却没有必然理由认为不能克服；康德关于意志和知识、实践理性和

纯粹理性、能够与应该之间的基本二元论应该调和。^⑧通过这样的讨论，霍克海默接受了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同意认识知识和规范命令、存在与应当之间最终是不可能分开的。

由于这一点，以及在理性的本质、辩证法的重要性、实体性逻辑的存在诸方面，批判理论与黑格尔相似，从而要概括批判理论的特征就没有比“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更好了。^⑨但在几个基础问题上，霍克海默总是与黑格尔保持距离，最主要的是反对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倾向和他宣称的绝对真理。《黄昏》中说：“我不知道形而上学家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也许是在某个地方有一种特殊的引人注目的形而上学体系或片断存在，但我知道形而上学家通常对人类的痛苦熟视无睹。”^⑩而且，容忍各种对立观点作为整体真理的一部分的体系无疑带上了寂静主义的味道^⑪，一个像黑格尔哲学那样的包融万贯的体系很可能成为社会现状的一种理论辩护。其实，马克思主义一旦僵化成为一种声称拥有唯一真理的体系，它也就和黑格尔一样成为同种疾病的牺牲品了，霍克海默认为^⑫，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对象，不是显现那不可改变的真理，而是催化社会变革。

此外，霍克海默对黑格尔形而上学还有其他一些意见，^⑬最强烈的批评可能是针对黑格尔的基本信条：所有知识都是无限实体的自我认识，换言之，即主体和客体，心灵和物质的同一，这种同一建立在终极性的绝对主体之上。霍克海默认为：“精神既不能在自己也不能在历史中认识自己，因为精神即使不是一个可疑的抽象，也不能和现实同一”。^⑭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思想”，只有植根于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具体人的思想；也没有这样的“存在”，“只有世界中的多种存在。”^⑮ 47

在拒绝同一论时，霍克海默也含蓄地批评了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它的重复。卢卡契以为，无产阶级既是历史的

主体又是历史的客体，它实现了作为德国古典唯心论目标的客观现实和人类自身创造物的自由统一。若干年后，卢卡契觉察到他的历史的主体—客体同一的假说是以形而上学的前提作为基础的，“被视为人类实际历史的统一的主客体无产阶级，决不是克服唯心主义建构的唯物主义的成果。毋宁说，它乃是一次想超越黑格尔的黑格尔式（Out—Hegel Hegel）的尝试，是大胆地凌驾于各种现实可能性之上，在客观上试图超越大师本身的尝试。”^④这是卢卡契 1967 年为该书新版写的序言，看来他很早就拒绝书中的观点，这种自我批评的原因一直不乏各种各样的猜测也不乏各种各样的批评。在指出其观点的形而上学核心的时候，他所做的也不过是在重复霍克海默差不多 40 年前就做出的对同一理论的批评而已。

对霍克海默而言，所有的绝对和同一理论都是可疑的，他后来指出，^⑤甚至包含在宗教之中的绝对正义的理想，也具有一种幻想性质，完全正义的想象“从未在历史上实现过，因为即使一个较好的社会代替眼下的混乱并发展起来，过去的苦难也不能成为善，而周围自然的苦难也不能克服。”^⑥结果，他所理解的哲学总是表现出一种无可避免的悲伤语调，但他没有屈服，更未顺从。

霍克海默固然攻击黑格尔的同一性理论，但也觉得 19 世纪相同性质的批评走得太远了，在抛弃黑格尔为其绝对精神的哲学而建立的本体论时，实证主义者剥夺了理智在判断现实的真假时的任何权力，^⑦过分的经验论偏见导致事实的神圣化，而这同样 48

* 在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上，对“实证主义”的定义是很广泛的，包括唯名论、现象主义（反本质主义）、经验论以及各种专注所谓科学方法的当代哲学，被划归在这一名称下的许多对手如 K·波普尔（Karl Popper）是抗议这一术语的适用性的。

是片面的。霍克海默一贯反对霍布森（Hobson）的形而上学体系化或反唯名论的经验主义，他确认辩证的社会科学的可能性，它既可避免同一论，又能保持观察者超越经验所予的权力。也正是在拒绝向这两种诱惑屈服中，批判理论表现出其锐利的锋芒。

霍克海默对形而上学的敌意，部分是出于对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即转化为一种现成真理大全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动，除此以外，也反映了他读过的既非黑格尔也非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的影响，叔本华对理性和意志调和的可能性的极端怀疑论确实产生了效果，重要的还有 19 世纪晚期 3 位重要哲学家尼采、狄尔泰、柏格森，他们都很强调思想与人类生命的关系。

对霍克海默而言，²⁷ 他们推进创立的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乃是对抽象理性主义日趋强化的僵硬性以及相随而来的发达资本主义下个体存在的标准化的一种合法抗议；乃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承诺和资产阶级社会日常生活之间的鸿沟一次控告。生命哲学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自身的根本变化相应，某些古典唯心主义者对理性与现实统一的乐观信仰与个体企业家相信他们的活动与作为整体的经济功能之间的和谐相应，而这种自信心的消失，又与 19 世纪晚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应，在此体制中个体的作用更多是被整体压倒而较少和谐一致²⁸，生命哲学基本上是对这一转变所作的令人震惊的绝叫。由于这一批判成份，霍克海默小心地将生命哲学家的“非理性主义”和他们在 20 世纪的庸俗变种区分开来。²⁹

霍克海默认为，30 年代攻出理性的目的是为了把人与普遍秩序的非理性调和起来³⁰。所谓悲剧人生观其实是为接受不必要的苦难面作的暗中辩护，“生活”与“奴役”最终成为同义词，

一度是批判的东西现在最终成了意识形态的东西。同样的情形也见之于对科学的攻击中，在第一代生命哲学家那里，对科学的攻击是针对科学主义信念的一种正确纠偏，但到了30年代便已退化为不加选择地攻击科学思想本身的有效性。霍克海默1937年写道：“哲学上取消科学，在个人生命中是一种慰藉，在社会中则是一个谎言。”^⑧

在将30年代的非理性主义视为一种被动的意识形态时^⑨，霍克海默忽略了它的动力的和破坏性方面，而这正是纳粹可以去利用的。这是霍克海默分析中的盲点，但在另一方面，他丰富了关于非理性主义历史发展的讨论。在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非理性主义时，霍克海默冲破了包括晚期卢卡契在内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敌视生命哲学的传统。^⑩除了赞成其反体系冲动，霍克海默还对狄尔泰和尼采著作中强调个体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好感。和他们一样，霍克海默相信个体心理在理解历史方面的重要性^⑪，不过，他们的著作不如霍克海默试图整合进批判理论的心理分析那样精致，他认为后者远比曾赋予自由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以活力的崩溃了的功利主义更为重要。

然而，在讨论狄尔泰的方法论时^⑫，霍克海默对历史解释的纯心理学方法的拒绝，则显得很清楚了。狄尔泰关于“理解的精神科学”的见解（社会科学以理解和再度体验而非以自然科学的方法为自己的基础）确实包含了对历史结构的意义认识，霍克海默能接受这一点，但他不同意这种意义能够由历史学家在其心灵中重新体验其内容而被直觉地把握到。他认为在这一观点的底下仍然是一种黑格尔式的主客体同一的信仰，内在生命的体验并不足以成为过去的意义结构的镜子，因为过去并不总是人的自觉创造，正如马克思早已指出的，它一般是“在个人的背后并违背其

意志”而完成的，至于历史并不总是这样，那是另一回事。事实上，维科是霍克海默早期思想的另一个主角^④，正是维科第一次提出人能更好地理解历史而非自然，因为与自然上帝创造的不同，历史则是人创造的。不过，这是一个目标而非一个现实，霍克海默悲观地暗示，现代生活的趋向只不过是越来越离开而非走向历史事件的意识决定罢了。所以历史不能像狄尔泰希望的那样被简单地“理解”，而必得用“解释”来代替。当然霍克海默确实希望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条件，使狄尔泰的方法论能行得通。 50

霍克海默对尼采的赞赏也是相当复杂的。1935年他认为尼采是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这主要是由于他过分强调个人主义而无视社会问题^⑤但很快，他又保护尼采而反对把尼采和30年代非理性主义混为一谈。在对雅斯贝斯的尼采研究所作的长篇评论中^⑥，他严厉批评作者把尼采视为种族主义者和宗教取消主义者的“法人代表”的企图。他至为欣赏尼采著作中的毫不妥协的批判性质，比如在知识论上，尼采就说过“伟大的真理需要被批判而非偶像化。”^⑦

尼采对传统西方道德受虐狂性质的批判也给霍克海默留下印象^⑧。他认为，尼采是第一个注意到痛苦像在禁欲主义的情形下那样，如何转化为社会规范以及这种规范如何通过基督教伦理的奴隶道德渗透到西方文化中的人。^⑨在论及尼采思想中几个有疑问的方面时，霍克海默倾向于宽容，对“超人”的天真赞美被视为孤独的代价而得到合理的解释。至于尼采对无阶级社会目标的敌意，考虑到尼采时代这一目标的唯一拥护者社会民主党，其心灵恰如尼采所声称的那样呆板而无灵感，那么这也是可以予以谅解的。事实上，霍克海默认为，尼采一直颇有远见地拒绝把工人阶级浪漫化，当时的工人阶级由于大众文化的发展已甚至开始偏

离其革命者的角色了。尼采失败之处在于他的民主化必然带来真正文化弱化这一漠视历史的信念，在于他误解劳动的历史本性，把它绝对化为永恒不变的东西以便为其精英主义辩护。总之，霍克海默认为在揭示资产阶级道德的历史根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尼采本身最终反受了非历史思维之害。

对生命哲学的第三个典型亦即研究所在巴黎的实际赞同者之一的柏格森，霍克海默批评略多一些⁴²。尽管承认柏格森在批判抽象理性主义时的犀利主张，但他怀疑在其哲学的根源处仍有形而上学的渴望。柏格森对作为发现普遍生命力手段的直觉的信任，被霍克海默视为意识形态而抛弃。他写道：“柏格森试图从中找到历史和认识救星直觉有一个统一的对象：生命，能量，绵延，创化。然而，现实中的人是分裂的，直觉企图穿越各种矛盾也就从其视野中失去了历史的决定性的东西⁴³” 他不满把直觉当作突破至现实基础的手段来无中介地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针对现象学家如舍勒尔、胡塞尔的类似努力

51

柏格森自认其时间哲学为“我工作中严肃深刻的部分”，“富有哲学的透视力”⁴⁴。在一篇主要探讨柏格森的时间形而上学文章里，霍克海默支持柏格森对经验时间和自然科学的抽象时间的区分，但又马上对此加以限制，认为柏格森试图创立一个时间形而上学是错误的，由此得到的作为绵延的时间观念，几乎与自然科学的时间一样是抽象而空洞的。把现实视为不可中断的流程就忽视了受苦、衰老、死亡的现实；把当前绝对化，无意中重复了实证主义者的错误。霍克海默认为，真正的经验抵抗这样的同质化，史家的任务是保护痛苦的记忆并培养历史质变的要求。

在霍克海默有关生命哲学的全部著述中，有三大批判主张是

反复提到的。仔细考察霍克海默这些批判，可以更好地理解批判理论的基础。首先，虽然生命哲学正确地从现代社会的威胁中拯救个人，但在强调主观性和内在性方面走得太远了，这就缩小了历史世界中行动的重要性；其次，如果偶尔把尼采对苦行主义的批判除外，生命哲学倾向于否定现实中的物质方面；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在批判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退化为抽象的和形式的这一方面，他们有时夸大了自己的理由以至于看起来否定了理性本身，这使得他们在20世纪的庸俗变种成为完全没有什么智慧的非理性主义者。

霍克海默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兴趣使他重新考虑康德和内在性的起源^⑤。他注意到，在康德哲学的二元论中有义务和利益的鸿沟，由实践理性发现的个体道德是公共伦理的内化和分离。^⑥就此而言，黑格尔的“伦理”由于强调公共一个人对立的沟通而优于康德的“道德”。尽管这样，康德的观点更正确地反映了19世纪初期的历史条件，因为如果假定那时在个人道德和公共伦理或个人利益和普遍道德规范之间存在一种和谐，那就忽略了外部秩序的非理性。康德的错误在于他把这种矛盾看作是不可改变的，由于把个人和社会的区别绝对化，也就把历史的有效性理解为自然条件，从而无意地支持了社会现状，这也正是生命哲学的问题所在。不过，霍克海默后来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同事们都逐渐相信真正的危险不在于那些过分强调主观性和个体性的人，而在那些企图在虚假的总体性旗号下完全消除它们的人。这种担心是如此严重，以至于阿多诺写道：“总体是不真的”。但在30年代，霍克海默和他的同事们仍很关心，从康德到生命哲学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中一直存在的对个体性的过分强调。

霍克海默也向康德假设的道德律令质疑。尽管他同意在自我

主义的自利之外的确存在着道德冲动，但康德之后道德冲动的表现已经改变了。它与19世纪早期表现为义务不同，现在或表现为同情或表现为政治关心。霍克海默认为，同情产生于对人不再作为自由主体或被贬为他不能控制的客观力量的认识^⑧，这是康德本人没有经验过的，因为他的时代仍有较多的个体自由，至少是就企业家而言是这样。政治行动作为道德的表现也为康德所摒弃，他过分强调个体良心的重要并倾向于为社会现状辩护。但在20世纪，政治已经成为道德行动的适当领域，因为历史上第一次“人类的工具增强到足以使（正义的）实现成为历史的直接任务，为它的实现而斗争是我们转折时代的标志”^⑨。无论是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如康德还是后来的生命哲学家，都不能欣赏政治实践在实现他们道德理想时的必要性。

53

霍克海默反对尼采、狄尔泰、柏格森的第二个主要方面是上面已经指出过的，他们其实是掩蔽着的唯心主义者。与此相反，他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的唯物主义理论，和正统马克思主义公认的唯物主义有一个鲜明不同，他在其最重要的文章之一《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中^⑩，提出要把唯物主义从仅仅是唯心主义的反义词和非物质存在的否定的简单理解中拯救出来。真正的唯物主义并不是建立在物质本体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形而上学，19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福格特（Vogt）和海克尔（Haeckel）以及崇拜一种假定的“客观”物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对的，设想社会的经济基础是永远第一位的也是不对的。基础和上层建筑永远在相互作用，必须指出，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是这一过程的决定性因素，但这种条件是历史的并随时而变。事实上，20世纪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政治开始要求超过马克思曾预言过的自主性，列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实际上都显示了这一变化。

霍克海默也讨厌庸俗马克思主义把唯物主义提高为知识论的倾向，它断言唯心主义所拥有的绝对确定性已经过时。其实，以为唯物主义认识论能穷尽对现实的解释是鼓励统治世界的欲望，这是费希特的唯心主义生动展示过的。这也由另一个事实，即可溯回至霍布斯（Hobbes）的一元论的唯物主义最终导向对自然的操纵性、统治性态度而得到证实^④。附带说一下，人类统治自然的主题，是法兰克福学派后来的关注的中心之一。

除了不可能获得绝对知识，霍克海默还坚持唯物主义不应当屈服于相对主义。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认识论无疑也太消极了，作为差不多一个世纪前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评回应^⑤，霍克海默强调认识中的积极因素，这恰恰是唯心主义所正确坚持的。他认为，感知的对象是人类自己的行动创造的，虽然这一关系有被物化掩盖起来的倾向。人类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自然观，同时人类也以积极的活动来改变自然，在此双重意义上，自然本身也是一种历史要素。霍克海默主张真正的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应涉及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永恒过程，这里他又一次回到了在世纪之交模糊了的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起源。与许多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像马克思一样拒绝把辩证法物化为不为人所控制的客观过程，也拒绝把辩证法当作是无序的多样性实在之上的韦伯“理想型”那样的方法论结构或社会学模型。根据阿多诺的表述，辩证法是探索意识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力场”，它没有也不能假装为发现了本体论第一原则，它拒绝极端的唯名论和实在论，而情愿在一永恒的未决状态中生存。

所以，对一种正确的社会理论而言，中介（Vermittlung）是极其重要的，社会现实的任何一面都不能被观察者理解为最终的或自身完全的，也不存在如实证论者所相信的作为社会理论基础

的真正存在的，只是普遍与特殊、“要素”（moment）* 与整体的永恒冲突。正如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说的：

抛弃经验实在性只能意味着经验世界的客体应被理解为总体的客体，即理解为总体社会形势的方面，这些方面只能在历史变革的过程中被捕捉。这样，中介范畴是一种工具，依靠它可以克服经验世界的单纯直接性，它本身并不是从外面偷偷插进客体之中的（主体的）什么东西，并不是什么价值判断或与“实然”相对的“应然”。毋宁说，它是一种真实客体结构的表现^④。

而且，整体与其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交互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从底层，从社会经济基础来寻找上层建筑、文化现象的简约论根源是错误的。霍克海默与其同事的认为，文化从来不是副现象，尽管它也从来不是完全独立的。文化与社会物质基础的关系是多维的，所有的文化现象都必须看作是经过社会总体的中介，而不是单纯的阶级利益的反映，这意味着它也表达了整体的矛盾，包含着否定现状的力量。没有，至少几乎没有纯粹的意识形态的东西。^⑤

55

在这些方面，可以说霍克海默更接近马克思本人而不是那些自我标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在讨论资产阶级国家时，马克思并未把它仅仅解释为“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而是暗示它虽是扭曲的、但仍旧是因无产阶级胜利而造成社会矛盾的调

* “Das Moment”在德语中意指辩证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一个方面，不能和“Der Moment”混淆，后者在英语中只意味着一段时间。

认为只有人类不断创造自己的能力才是唯一永恒的。用后来批评家的术语⁶⁵，“人的生成”是马克思所允许的唯一的人类本性。对此，霍克海默表示赞同，他认为一个好的社会就是人在其中能够作为主体自由行动而不是作为依赖性的客体接受影响。

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看来是对人的自我创造这一范畴作了更进一步的规定。霍克海默对此作了回溯，但对劳动在马克思著作中的中心位置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问题的强调，他却不那么看重。《黄昏》中说：“使劳动成为人类活动的超越性范畴是苦行者的意识……由于社会主义者坚持这个一般概念，就使自己成为资本主义的宣传员”⁶⁶。

本雅明和阿多诺也是这样看的。本雅明认为，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劳动“只看到了控制自然的进步，而没有看到社会的退化；这已经展示了后来在法西斯那里见到的技术专家政治的特征……新的劳动概念即是对自然的剥削，而本来自然的天真完满恰恰是与无产阶级的剥削相对照的。与实证主义的概念相比，傅立叶的幻想虽常遭嘲笑，不失为惊醒之声”⁶⁷。1969年3月，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对我说，马克思想把世界变成一个大工场。

霍克海默与劳动拜物教的对立表达了其唯物主义的另一方面：人对感性幸福的要求。在《自我主义与解放运动》这篇犀利的文章中⁶⁸，他讨论了资产阶级文化与个人固有的满足之间的敌对。虽然有边沁（Bentham）和曼德维尔（Mandeville）的功利主义，但早期资产阶级时代的典型意识形态却是康德式的⁶⁹。由于看不到个体利益与公共道德的统一，康德在幸福和义务之间设定了不可弥合的鸿沟。尽管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代他给予两者以一定的重视，但义务在总体中的优先是远在个体满足之上，

这一倾向日益发展到后者被完全忽视的程度。为了补偿个体幸福的压抑，大量娱乐被设计出来以减少不满^①，研究所后来许多论述“文化工业”的著作就是分析它如何发挥缓和作用的。

而且，甚至在所谓的革命运动中，霍克海默认为也保存了资产阶级对幸福的敌视^②。14世纪C·黎恩济（Cola di Rienzi）统治下的罗马和萨沃那罗吉（Savonarola）时代的佛罗伦萨就是两个清楚的例子，它们都是以崇高的目标开始而以反个体幸福结束的革命运动。更突出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和黎恩济、萨沃那罗吉一样拒绝热爱人民而代之以无情镇压。霍克海默提示说，革命带来的平等是断头台造成的否定性的平等，是堕落的平等而非尊严的平等。20世纪的法西斯是这一现象的重演，元首或领袖是资产阶级的浪漫感情和极端残忍两个极端的结合。在法西斯主义的华丽辞藻中，最彻底地表现了义务和为总体服务的意识是以个体幸福为代价的，法西斯的革命托词是使统治地位长久下去的骗局。

不同于资产阶级伦理学的自我牺牲，霍克海默坚持自我尊严，启蒙运动期间，爱尔维修（Helvetius）和萨德（de Sade）都抗议以崇高的道德之名而实行的苦行主义，尼采则更有力地揭露了西方文化主流中隐藏着自我否定与怨恨之间的联系。与他们不同的是，霍克海默强调个人幸福中的社会成分，既不像功利主义也不像尼采，他的自我主义的个人总是意识到他的最大满足是通过共同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霍克海默一直反对把个人和社会当作对立两极的异化，正如他在哲学中否认主客体的相互排斥一样。

研究所强调个人幸福作为其唯物主义的整体要素这一点，在马尔库塞1938年写的《论快乐主义》一文中得到进一步发展^③。与黑格尔“为了历史进步而反对幸福主义”相反，^④马尔库塞捍

这里，马尔库塞似乎危险地接近了更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客观社会的发展，而这恰恰是研究所通过强调实践中的主体因素所要反对的。其实，这只是短暂的偏离，关键的问题是在一个控制其成员意识的社会中变革如何才能发生，这在马尔库塞的后期著作，尤其是《单向度的人》中一直是一个麻烦问题⁶⁹。

无论真正实现幸福的手段是什么，都只有在自由已普遍达到时才可能实现。马尔库塞写道：“幸福的现实是自由的现实，这一自由的现实表现为在与自然的共同斗争中业已解放了的人性的自我确定”。由于自由和合理性的实现是同义词，“在其完成的形式上，幸福和理性是一致的”⁷⁰。马尔库塞在此鼓吹的是通常以“积极的自由”著称的个别利益与普遍利益的一致⁷¹，个人幸福是积极的自由的总体的一方面，理性是另一方面。

60

强调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著作的一个显著特征⁷²，其来源于黑格尔是明显的。在此可以回顾一下霍克海默反对生命哲学的第三方面，即过分反对合理性退化为反对理性本身。霍克海默在其一生中不断重复指出，从根本上说，理性是任何一种进步的社会理论的基础。对那些没有在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中受过训练的读者来说，他的理性是很难把握的。他经常明确地提及唯心主义者在知性和理性之间所作的区分，康德和黑格尔用知性来指称心灵中较低的能力，一般认为它赋予世界以结构。对知性而言，世界是由只与自身同一的，与其他事物全然对立的有限实体构成，所以它不能透过直接性去把握深层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理性意指一种超越单纯的现象把握深层现实的能力，尽管康德不同于黑格尔，拒绝现象世界与超验的、本体的“物自身”之间调和的可能性，但在理性高于知性这一点上，他和黑格尔是一致的。研究所

成员中，马尔库塞可能是最接近古典理性观念的人，1937年，他试图为之下一个定义并通过下述方式使之转向唯物主义：

理性是哲学思想的基本范畴，是藉此而允诺给人类命运的唯一范畴。哲学要发现存在的最终和最一般的基础，它以理性的名义，构想出关于本真存在的观念，在其中所有有意义的对立论题（如主体和客体、本质和现象、思维和存在）都得到谐调，与此相联的是它确信存在并未直接或已经是合理的，相反，现存的一切必须带到理性面前。……既然给定的世界是和合理性思维联系在一起的，即是说在本体论上依赖于理性思维，那么所有相悖于理性的东西或不合理的东西皆被设定为某种必须铲除的东西，理性被确立为一个批判的法庭^③。

马尔库塞似乎是在坚持法兰克福学派所反对的同一性。确实，马尔库塞著作中对同一性的厌恶远远比不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④。当然，在他们的著作中，理性的尊严及它所意味的和解也总是作为乌托邦的理想而出现。毕竟，犹太人虽然制止命名和描绘上帝，但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在研究所的全部著作中，其标准总是一个理性社会，“理性”是根据德国传统哲学理解的意义来使用的，它是批判理论赖以建立的主要基础，当代社会的非理性总是受到真正合理选择的“否定”的可能性的挑战。

如果说霍克海默在主客体的完全同一问题上还有些勉强，那么他对笛卡尔留给现代思想的严格的二元对立则是给予坚决的拒绝^⑤。他认为笛卡儿遗产的意义是把理性收缩到主体方面，这是驱使理性离开世界转入玄思的内向性的第一步。它导致了本质和

现象的永恒分离，而这滋生了对社会现状非批判的接受^⑥。结果，理性逐渐和普通意义上的知性合一，而不是成为更具雄心的综合性理性。19世纪后期非理性主义者对理性攻击，实际上就是针对这种已退化为分析性的、形式化的知性的理性。对此，霍克海默是同意的，尽管他立刻表示并不反对分析理性，“没有知性，就没有界限和秩序的概念，也就没有思想，没有辩证法”^⑦。即使是批判理论接受的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也并不简单地否定形式逻辑，黑格尔的“扬弃”既包含着超越、取消也意味着保留，霍克海默真正拒绝的是把理性、逻辑完全等同于有限的知性。

在研究所的全部历史中，它都坚持在两条前线上勇敢地保卫理性。除了在20世纪已堕落为全然反启蒙的、愚昧的非理性主义的攻击外，还有一个来自不同阵营的或许更严重的威胁。随着黑格尔式的综合在19世纪下半叶的崩溃，对社会科学经验方面的新的强调，促使它沿着自然科学对人类生活日益增长的控制的方向发展，实证主义否认传统的理性观念的有效性，这个观念被当作空洞的形而上学而被打发掉。与法兰克福研究所同时，在这个问题上最有意义的提倡者是维也纳小组的逻辑实证主义，他们差不多同时流亡到美国^⑧，由于维也纳小组与美国哲学传统比较接近，所以其影响远远超过研究所。此后，霍克海默痛苦地承认，当地学派如实用主义等与逻辑实证主义有很大的相似性^⑨。

他对逻辑实证主义第一次猛烈批评出现在1937年的《杂志》上^⑩。这再次表明他对一个思想流派在不同历史环境中功能变化的敏感。他认为，经验主义在洛克和休谟的实践中，由于坚持个体感知是知识的源泉因而包含着生机，甚至是批判性因素；启蒙运动的经验主义也以其观察来瓦解统治的社会秩序。相反，当代逻辑实证主义者失去了这种颠覆性质，他们相信知识虽然最初来

源于感知，但其真正关心的却是对包含在所谓的“约定句子”中的感知的判断^⑧。由于把现实限制在这种句子所能表达的问题内，不可言说的便被排除在哲学王国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一般经验主义者强调知觉而忽略整个认识过程中的积极因素，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者都最终放弃了反思^⑨，其结果是把事实绝对化并把现存秩序实体化^⑩。

除了对这种事实拜物教的厌恶以外，霍克海默还进一步反对逻辑实证主义者依赖形式逻辑而排斥实质逻辑。他认为把逻辑看作数学的类似物就是把它简化为一连串的在历史世界中没有真正意义的同义反复，以为所有真实的知识都要追求科学的、数学的概念化，其前提就是向形而上学投降，而这正是早期的实证主义曾经反对的^⑪。

也许，在霍克海默看来实证主义最严重的问题是把事实和价值分离的要求。在此，他注意到在原来的启蒙运动那里，经验主义被用作反对迷信和传统的迷惑的武器的，而现在它早已开始堕落了。一个社会可能“着了魔”而产生一个“愚蠢”的“事实”^⑫，现代经验主义由于无法评估这一可能性只有向既存秩序的权威投降，而不论其主观意图如何。维也纳小组政治上可能是进步的，但这与其哲学无关，他们向当前现实的神秘性投降，此绝非凭空臆断，毋宁说，它是个人被组织、被操纵的这一偶然社会状况的表现。人类必须重建掌握他自己命运的能力，为此理性就应重新置于作为目标的裁判者的恰当地位，而不仅仅是工具。理性应再次回到曾被得胜的知性驱逐出去的场所。

使霍克海默对理性的强调显得如此复杂的原因是他同样具有强烈的反形而上学倾向。现实不能不接受“理性法庭”的审判，但理性却不能理解为历史之外的超越观念。真现，霍克海默及其

义”，即试图通过强调所有部分真理都是同一整体的透视来挽救客观真理。由于假定这一整体真理存在于不同观点的综合之中，曼海姆实际在追随一种简化了的格式塔知识论^④。作为这一切基础的，是能协调各种视角的准黑格尔的和谐信念，这一信念对于社会变革只会采取寂静主义的立场。不像马克思关心社会变革甚于真理，曼海姆于此悄悄回到了追求纯粹知识的形而上学上去了^⑤。

霍克海默还批评曼海姆，指出其决定意识的“存在”概念是非常不辩证的。在霍克海默看来，基础和上层结构总是存在着反馈和中介^⑥，而曼海姆则复归到一种实体化了的主客体二元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个体意识单方面反映的“客观”实在，肯定它的存在即是忽视实践在创造世界中的作用。

实践和理性是批判理论的两个极，正如一个世纪前的左派黑格尔所面临的一样。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张力非常有助于激发批判理论的辩证联想，尽管理性的首要地位从未被怀疑过。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的一句话代表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即使革命实践偏离其正常轨道，理论也将保持真理，实践追求真理，而不是相反”^⑦。而且，人类生成的自主活动的重要性一直为研究所早期著作所强调，这方面，生命哲学对霍克海默及其同事的影响是很关键的，尽管他们一直将实践理解为一种集体性努力。强调实践与法兰克福学派对黑格尔同一理论的拒斥是一致的。在由作为主体与客体、特殊和普遍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所创造的空间中，人类的自由才得以维持下来。确实，使后期法兰克福学派颇为不安的正是西方社会中人类自发性空间的不断消失。

批判理论的另一个极点是，主体和客体、本质和现象、特殊和普遍之间乌托邦的调和具有非常不同的涵义。理性所意味的客

观理性并非仅仅由个体的主体行为构成，尽管它已从哲学理想转化成社会理想，但它仍带有其形而上学起源的痕迹。庸俗马克思主义却允许这种迹象再次出现在唯物主义一元论之中，研究所对此未停止过攻击。但是，甚至在批判理论中也存在着明确的否定的形上学和否定的人类学——否定的意思乃是指拒绝以任何固定的方式来界定自身，这样他们也就坚持了尼采的格言：“伟大的真理要求被批判，而不是被偶像化”。

作为“肯定性自由”的传统中的思想家，柏拉图、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等都陷于这个传统一开始就固有的基本困境之中。正像阿伦特指出的^⑩，肯定性自由的观念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矛盾，它可以由古希腊的政治经验和紧接其后的哲学家试图作出的解释之间的紧张来象征，由前者而来的是将自由和人的行动、人的言论，简言之是和人的实践相等同；由后者而来的则是将之和真实存在即理性相等。此后，有过多次整合它们的尝试。研究所在这方面巧妙而丰富的努力，是最有成果的尝试之一，尽管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在探讨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含义之前，应说明一下研究所的其他成员对此表述的贡献。洛文塔尔和波洛克虽然从一开始就关心其他方面，既有思想的也有机构的，但他们也积极参加有关《杂志》发表的文章的讨论。不过更有影响的是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他们写了许多论述理论问题的文章，分别考察他们的论著，我们或许能进一步明了研究所的哲学立场。然而，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评论他们在分析其他思想家时的有效性，我们的目的是阐明批评理论，而非勾勒一个选择性解释。

仅就其为研究所写的文章而言，阿多诺在 30 年代几乎完全

从事音乐社会学。在《杂志》之外，他还出版了一本大部头哲学研究和许多其他方面的著述。¹⁸在这两方面，他和霍克海默的接近都很明显，虽然40年代之前两人并未合作写作，不过从一开始，他们的观点就有显著的相似性。阿多诺1934年从伦敦写给洛文塔尔的信是一个证据，在此他讨论了刚刚出版的《黄昏》：66

我非常仔细地读了几遍，留有特别印象。其中大部分我过去已了解过；但在此形式中每一件事情的出现都完全不同了。首先，行文的某种粗野，它早先一度曾因格言的形式而使我不快，现在才明显看出它是一种表达手段——恰好与资本主义总体形势的痛苦发展相应，其恐怖如此本质地存在于中介机制的准确性中，……就我的立场而言，我相信我几乎完全认同它——完全到我很难说出其中差别。对我来说新颖的也特别重要的，我想应当是书中以对个体偶然性问题的解释来反对激进正义的正题，以及散布在全书中的对静止的人类学的总体批判。需要讨论的一些事情或许是和启蒙的一般关系¹⁹。

在此，阿多诺首次暗示了若干年后他和霍克海默合作进行的对启蒙的清理性批判。

阿多诺早期的哲学著作主要是写于1929—1930年的《基尔凯郭尔美学的建构》，1931年作为授课资格的论文提交给蒂利希，其出版日期颇有些讽刺，恰好是1933年希特勒掌权之日。该书是献给和他一起研读康德的克拉考尔的，他的另一位密友本雅明，对此书也有明显影响，本雅明和蒂利希都属于对此书有好评的人²⁰。然而，此书在批判的和流行的两方面都不能说是成功

的，部分原因是其非辩护性的（unapologetically）深奥文风和过分苛求的复杂分析。阿多诺后来说，它的很小影响也是在“政治罪恶开始的阴影”下产生的^⑧。

无论如何难读——即使是对专门读者，阿多诺的所有著作都是不妥协的严格——这本书包含了许多后来成为批判理论特征的主题。根据阿多诺的艺术倾向来看，以美学问题作为自己探索的对象是正常的，但从一开始，他就清楚地表明这是美学而不是简单的艺术理论。和黑格尔一样，这个词（Aesthetics）之于他是一种主客体关系，基尔凯郭尔也是以一种特殊的哲学方式来理解美学的，他在《或此或彼》中界定的美学范围是：“通过它，人类直接地是其所是，而伦理的则是通过它，人才成为他所成为的”^⑨。但正如阿多诺在其批评中首先指出的：“伦理随即撤回回到他的悖论宗教（Paradox - religion）教训后面，从信仰的‘跳跃’来看，审美是辩证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即从非决定阶段祈免地转入简单的受造物的直接性”^⑩。对阿多诺来说，直接性也即对原初真理的寻求是令人讨厌的东西，和霍克海默一样，他的思想总是植根于一种无垠的反讽之中，拒绝停止在任何一处，拒绝说出最后结论，这才是真理的栖居之地。他们两人都拒斥黑格尔主客同一的根本预设。

表面上，基尔凯郭尔也反对这一点。不过在阿多诺看来，基尔凯郭尔著名的对主体性的推崇无意中包含着同一论，“其哲学目的不是主体性的决定而是本体论的决定，主体性的出现不是作为内容而是作为阶段”^⑪。在基尔凯郭尔对具体实存的个体的全部谈论的背后，潜伏着对超越真理的隐秘渴望，“黑格尔被向内转了：对黑格尔来说是世界史的东西，对基尔凯郭尔来说则是具体的人”^⑫。

而且，基尔凯郭尔设定的本体不在天堂而在地狱，不是希望，而是绝望才是他视界的中心，基尔凯郭尔所倡导的退向内在性，实际上是向否认历史变化的神秘的、魔鬼的、循回的退却，“内在性是史前人性的历史囚房”⁶⁸。因为拒斥历史世界，基尔凯郭尔成为他经常指责的异化的同谋；他的辩证法没有物质对象因而实际上回到了他自称已超过了的唯心论；因为否定真实的历史，他已退回到一种以“历史性即存在于时间中的抽象可能性为基础的纯粹人类学”⁶⁹。与此相关的是其没有变化的“同时性”概念⁷⁰，它是绝对自我的相关者。阿多诺的这些批评，与崔克海默几年后对柏格森绵延概念的批评是相似的。

相应于对内在性哲学含义的分析，阿多诺也对基尔凯郭尔时代的资产阶级的“内在性”作了社会学的探讨。他认为主体的内在性与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食利者位置有关，这也是基尔凯郭尔所处的位置。基尔凯郭尔具有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无能感，通过对自然自我所做的禁欲式的全部拒绝，他把这一无能感发展到了极端，“他的道德力量来自孤立个人的绝对要求，他把所有的幸福主义批评为与无目的的自我相对照的偶然”⁷¹。因此，牺牲成为他神学的中心绝不是偶然的，绝对的精神的自我通过自然自我的毁灭而完成：“基尔凯郭尔的唯一论的最重要之处是对自然充满敌意”⁷²。阿多诺在许多著作中都表达了克服人对自然的敌意的愿望，此一主题在研究所后来的工作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尽管阿多诺后来又写了一篇论述基尔凯郭尔的文章⁷³，但《基尔凯郭尔美学的建构》实际上是他向这位丹麦哲学家告别的文字⁷⁴。1934年他离开大陆前往英国，在牛津大学的默顿学院从事研究，除了偶尔回德国旅行外，他在英国呆了3年半。在此期间，他仍然对音乐保持兴趣，并为《杂志》写了一些相关的文

阿多诺在另一篇文章中说的：“无论何人，想把世界还原为事实或本质，他就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处在孟桥生(Münchhausen)^{[译注]*}的位置上，他想通过抓住自己的头发走出泥沼”^④。

由于企求这种不变者，胡塞尔明显接受了当代“被管理的世界”的现实性^⑤。阿多诺写道：胡塞尔是“他那个时代最静止的思想家”^⑥。在片刻中看到永恒，仅仅在当下看到过去是不够的，阿多诺认为真正的辩证法“力图旧中求新而不是一味新中求旧”^⑦。胡塞尔虽然也想以直觉基础上的还原法来否定物化世界，但他失败了。阿多诺承认直觉是经验的合法部分，不过不能抬高为认识的绝对方法，正是因为这一点，胡塞尔才表现出对他而言“外在于自我的真正世界”的无意识拒绝^⑧。存在既不能和感知的事实分开也不能完全等同。

阿多诺进而从认识论转向对胡塞尔的数学实在论和逻辑“绝对主义”的批评。他认为，西方世界中数学式思维的胜利包含了一种神秘因素，对数字的崇拜导向了拒绝非同一性和一种密封的唯心主义；相似的，依赖形式逻辑作为精神上的绝对也包含神秘的趋向。这些思想方法并非没有社会意义，关于逻辑的物化，阿多诺评论说：它“指溯到商品形式，其同一性存在于商品的等价交换之中”^⑨。形式逻辑使形式和内容的虚假区分永恒化了，因此阿多诺建议代之以可回溯到黑格尔那里的更加动态的逻辑。“逻辑不是存在，而是一种既不能还原为主体性一极也不能还原为客体性一极的过程，逻辑的自我批判产生了辩证法……没有

* [译注]：Münchhause，原名 Karl Friedrich Hieronymus (1720-1797)，德国军人及冒险家。因 R·E·Raspe 搜集其本人之夸大了的冒险故事而闻名。

样强烈抵制那种默认将偶然个体融入无论是种族的还是阶级的总体的诱惑，甚至他取资甚多的友人本雅明，也不免受到他的这种批评。在写于本雅明 1940 年悲剧性自杀后的文章中，阿多诺抱怨： 71

他的目标并不是一种公开的过度膨胀的主体主义，而是主体自身方面的观念。在他哲学的两极即神话和调和之间，主体消失了，在他美杜莎式的一瞥面前，人被纳入了一个客观过程展现的舞台。因此，本雅明的哲学作为恐怖之源并不亚于其作为幸福的承诺。¹⁴¹

由于强调非同一性和偶然性，阿多诺形成了一种“无调”哲学，正如他从勋伯格那里吸收来的无调音乐一样。¹⁴²

要以同样的方式评论研究所的第 3 个主要理论家马尔库塞是困难的，尽管他的著作经常强调否定方面和悲观主义，却总是包含着理性在社会世界中可能实现的明确信念。¹⁴³较之霍克海默，19 世纪末的生命哲学对他影响较小，正如哈贝马斯说的，¹⁴⁴马尔库塞比研究所的其他思想家更多地接受了 20 世纪的哲学。尽管在研究所期间，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影响有所减弱，但跟随他们的经验总是保持着，而且与霍克海默、阿多诺比较，马尔库塞的哲学风格更为铺张，这可能是由于他没有他们那种活跃的审美兴趣。然而，这种风格也反映了他相信系统的、非格言的、长篇的写作是分析和再现现实的有效方式，他从不像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主要理论家那样强调乌托邦的“他者”（Other）的无形象的含混性。

虽然不能说马尔库塞在 1932 年之前保持不变，但考察他进入研究所之前的作品仍将有助于理解他对批判理论的贡献，他的晚期作品就常被认为是回到其海德格尔时期。¹⁸ 在弗莱堡时期，马尔库塞的思想充满现象学范畴，同时又坚信马克思主义，虽然从未加入任何党派，他企图调和两种看来不可调和的体系的努力预示了战后梅洛·庞蒂和萨特的尝试。在其第一本著作《历史唯物主义对现象学的贡献》中，¹⁹ 几乎全部海德格尔的特有词汇：72 烦、历史性、决断、在世等等都出场了。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的新著《存在与时间》是“一个重要时期，其中资产阶级哲学从内部消解了自己，并打开了一条通向‘具体’科学的新途径”。²⁰ 之所以如此，马尔库塞认为是有原因的。首先，海德格尔显示了历史及作为共在的历史世界即人的相互作用的世界在本体论上的重要性。第二，通过显示人对其在世界上真实处境的深刻关心，海德格尔正确地提出了构建“本真存在”的问题；最后，他提出了可以通过在世界中的决断行为来达到本真存在，这就使资产阶级哲学达到了可能有的程度——实践的必要性。²¹

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是摇摆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中肯的。《存在与时间》的社会环境太抽象了，海德格尔的历史性概念也太一般了，不能解释人类活动的真实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则以激进行动来回答海德格尔关于本真存在的可能性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处境”，²² 是其自我显示、自我创造的关键。而且，为马克思所认识而为海德格尔所忽视的是社会可划分成阶级，在当前的历史情况下，只有一个阶级能真正从事激进行为并成为历史主体，“历史行动在当代只有作为无产阶级的行动才是可能的，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拥有与其实存一道必然给出这一行为的在世之中的存在”。²³ 仅仅由于它在生产过程中的

关键作用，无产阶级才有采取激进行动的潜力，只有通过革命，历史世界才能改变，超越工人阶级的本真存在的普通可能性才能实现。

但是，如果海德格尔必须被马克思补充，那么马克思主义也应成为现象学。马尔库塞认为，辩证法“必须进一步研究被给予的是否已穷尽其自身，或包含一种超历史的、又内在于全部历史性的意义”。^④马克思主义必须放弃上层建筑是经济结构反映的传统信仰，“一些陈旧的问题如客观优先性、物质与精神、意识与存在谁是第一性的等等，是不能由辩证现象学来决定的，提出它就已是无意义的了”。^⑤辩证现象学不应像研究历史那样来研究自然，在这方面恩格斯是错误的。自然存在不同于历史存在，数学、非辩证的物理学在其自身范围内是有效的，“自然有一个历史，但不是历史，此在才是历史”。^⑥在另一篇论辩证法的文章中，他又说：“历史性和非历史性的界限……是一个本体论的界限”。^⑦这也是卢卡契《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观点，马尔库塞承认这一点，表明他与恩格斯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及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距离。

73

这一对照也显示了马尔库塞与狄尔泰的关系，后者也曾做过类似划分。应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上面说的马尔库塞比霍克海默较少受19世纪末的生命哲学影响的说法，即他较少响应生命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攻击。准确地说，迎合马尔库塞的是狄尔泰把历史和本体合一的做法，^⑧在1931年《历史现实的问题》中，他赞扬狄尔泰把文化科学从自然科学的方法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它的哲学基础。狄尔泰视为历史现实基础的“生命”概念是富有洞察力的，它强调了意义面不是因果，因为人能创造自己的历史，它由人们注入其中的价值统一起来。这篇文章没有霍克海

默后来对狄尔泰隐蔽的唯心主义和同一论的批评，在马尔库塞生涯的这一阶段，他赞成狄尔泰历史概念的本体论前提。

这一点更清晰地表现在马尔库塞作为其授课资格的论文《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理论的基础》中，^⑭他一开始就承认海德格尔的广泛影响。和马尔库塞论述黑格尔的另一本书《理性与革命》不同，^⑮在此他认为主客体同一是黑格尔思想的中心，存在是否定的统一体，是通过运动和分裂而实现的整体，所以历史是存在自我揭示的舞台，黑格尔的历史观预示了海德格尔的“历史性”和狄尔泰的“生命”。事实上，马尔库塞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就试图把“生命”理解为黑格尔的早期著作，包括《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的基本本体论范畴。

74

在讨论的结尾，马尔库塞分析了狄尔泰的“精神科学”与黑格尔的“精神”之间的关系，“恰恰是作为历史并在其历史性中，内在统一体和生命整体就是知识的统一体和总体”，马尔库塞写道：“历史生命的行动本质上是通过这一知识决定的，恰恰是作为历史并在其历史性中，生命成为精神。所以狄尔泰的这句话最深刻地表明了他和黑格尔意图的相通：精神是历史的本质”。^⑯一种令人满意的历史方法论的可能性植根于知识和生命的统一，认识的基础在于主客体的最终统一。

《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理论的基础》与马尔库塞进入研究所后写的《理性与革命》不同的原因，在于这本书不关心黑格尔哲学中的批判成分。马尔库塞对统一和同一的强调导致了一种神正论（Theodicy），他无意把它与他别的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协调起来。在关于黑格尔的第二本书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否定概念在第一本书中仅仅作为存在的历史变异的一个要素，而且由于强调存在的统一应理解为通过时间的持续，否定几乎是被当作幻觉而

出现的。第一本书没有把黑格尔当作攻击现存秩序中非理性的马克思的先驱；没有像在第二本书中那样重视实际的非同一性、重视理性；也没有像阿多诺在批判胡塞尔时那样强调认识过程中中介的重要性。

早期的马尔库塞像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卢卡契一样，坚持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的同一论，他也同样接受为他们弃绝的哲学人类学的可能性。在他赞同海德格尔颇富人类学寓意的“本真存在”的观念的同时，他对新发现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示了相当的兴奋。在1933年为希法亭写的文章中，^⑭他认为不能说早年马克思的哲学关切已在其成熟期被克服，共产主义革命的承诺远不止是经济关系的变革，更重要的是通过使人实现其本质而实现人类基本存在的转换。通过革命，人实现了他在历史中的潜在本性，而历史，则可以被理解为“人的真正的自然史”。^⑮ 75

在这篇文章中，马尔库塞表达了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宏伟见解。^⑯他认为马克思曾追求人与自然统一——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后来曾强调这一根本目标以反对马克思主义，但在同时，他们又厌恶马克思的自然观。在文章的另一处马尔库塞自己表明说：“所有的自然（就其人类以外的广义而言）是人类生命的中介，是生命的手段（也意味着食物），人不能简单地屈服于客观世界或对之让步，人应当适应它，使它属于自己”。^⑰很明显，人要统治自然而非和它协调。

这一表面矛盾可以用马尔库塞同意马克思说的劳动是人实现其本质的手段来解释。他主张，劳动是人的本性，是一个本体论范畴，正如马克思和黑格尔理解的那样，虽然前者更敏于把劳动扩展到脑力劳动之外。^⑱马尔库塞认为，人必须把自身对象化；

应当既是自为又是自在、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资本主义的恐惧是由于它培养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客观化而造成的，在此他同意《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分析，这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他们的著作中较少提及的。马尔库塞认为非异化劳动是为着人而非反对人，只有通过社会活动，人的“类存在”才能实现，资本主义由于妨碍了这一点，所以成为“人类本质的灾难”而需要一种“总体革命”。^⑧

重要的是，1933年以后马尔库塞也依然保持着对劳动作为本体论中心的信仰。在《理性与革命》中，他认为应回到黑格尔来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劳动概念并不是表而的、而是一个中心概念：黑格尔通过它才能构思社会发展”。^⑨因为把劳动理解为人类自我实现的基本范畴，马尔库塞就不再强调那些可以在黑格尔著作尤其是早期著作中发现的自我创造的第二种方式。哈贝马斯最近指出了这第二种自我创造的模式即“符号中介了的互动”的同等重要性，这一模式也就是语言和表现姿态。^⑩然而对马尔库塞来说，黑格尔相信：“语言使个体采取反对其伙伴的立场成为可能，并使他宣称的反对其他个体的需要和愿望也成为可能。劳动过程使所导致的对立得到统一，它也是文化发展的决定力量”。^⑪由于把社会矛盾溯源到一种特殊类型的劳动，马尔库塞能够谈论一种“本质”的变革，它将通过克服异化劳动而实现（或者像他在后期著作中说的那样在游戏中全部废除劳动）。^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太相信劳动的本体论意义，他们就无意于预言一种“以克服异化劳动为基础的冲突的整合”，因为这其中暗含着同一论。在同样的方式上，他们也总是不愿意对人的本质采取实证思考态度。

自狄尔泰以来，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的各种潮流都一直关注着理论的具体“历史性”……这些努力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他们（开始是无意识地、后来是有意识地）与他们反对的利益和目的恰恰是联结在一起的。他们没有攻击资产阶级哲学抽象性的前提：即在一个无政府的生产过程中，个体实际上的不自由和无力。^⑧

在《哲学和批判理论》中，马尔库塞揭示了资产阶级哲学如此封闭、孤立的原因，“哲学家只有当他不是一位职业哲学家的時候，才可能参与社会斗争。这种‘劳动分工’同样产生于精神生产方式和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分离，哲学不可能克服这一点。哲学工作从过去到现在的抽象性质植根于社会的生存条件之中”。^⑨所以他认为批判理论比传统哲学更小野心，并不认为自己能够对人类条件这一古老问题给予一个永久性回答，相反，“批判理论仅仅意味着揭示哲学无能全面提出该问题的特定的社会条件的根源，并指出任何其他的解决都处在哲学疆域之外。因而，内在于所有对这个问题的超验处置之中的虚伪的东西，是‘从外边’进入哲学里的，因而只有在哲学之外才能克服它”。^⑩

如果说批判理论虽不乏其洞见但总不象哲学，那么它也不是如庸俗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科学。马尔库塞认为：“科学的客观性本身并非是真埋的充分保证，尤其是在那种真理与事实截然对立的境遇中，在那些真理象今天这样被事实掩盖的境遇中。科学的可预见性并不与真理借以存在的那种未来模式相一致。”^⑪批判理论必须保持强烈的想象力、甚至是乌托邦的气质，它超越现实的当下限制，“没有幻想，所有的哲学知识都只能抓住现在或过去，

而脱离了与未来的联系，但未来才是哲学和人类的真正历史之间的唯一纽带”。^⑨对幻想特别是体现在伟大作品中的幻想的强调和对实践的关切，是批判理论拒绝把现在永恒化、而取消转向未来的可能性的两个主要表现。对此，马尔库塞、霍克海默、阿多诺及其它成员都是完全一致的。后来当然也有变化，但在30年代，这也许是研究所最富有成果的10年中，整合理性理论、审美想象和人类行为，看来至少是一个希望，虽然这是不确定的、脆弱的。

这一希望的残存依然可在《理性与革命》一书的字里行间见到，^⑩这本书是马尔库塞在研究所最后颇为活跃的几年里写成的。在美国思想中，黑格尔是和纳粹有关系的，马尔库塞这本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拯救黑格尔，他认为黑格尔的政治理论，包括对一国家颇有争议的强调，内在固有的是理性主义，而纳粹则是柏拉图的浪漫主义传统中的非理性主义。这本书也是第一次向英语世界广泛介绍批判理论。^⑪前面已经说过，《理性与革命》显示了与海德格尔分裂10年以来马尔库塞和他的距离，这个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许多重要方面，这本书都同意霍克海默在《杂志》的系列文章中所表述的原则性观点。

象霍克海默一样，马尔库塞热衷于建立黑格尔理性主义批判的、否定的冲动，正象他后来对待弗洛伊德一样，他急于改变黑格尔的保守形象，也关心黑格尔的激进成分被其实证主义的后继者清除的方式。在对孔德、斯托尔（Stahl）、V·斯泰恩（Von-Stein）的深刻批判中，马尔库塞揭示了他们保守主义的政治含义，如同霍克海默对实证主义在20世纪的后人所做的那样。他还集中论述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继续了他此前所做的把马克思的早期和晚期统一起来的分析。对马尔库塞来说，黑格尔始

终是一个进步思想家，不能象“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那样，以为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成分是令人为难的根源，“黑格尔全部体系的基本观念”，就是“建基于抽象和定量的劳动体系，建基于通过商品交换而实现的需要的统一——这一现存的社会秩序，根本不能确定和建立一个合理的共同体”。^⑨更为重要的是，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对劳动的强调已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先行出现。对此，研究所其他成员是有不同意见的。

79

另一方面，本体论曾是马尔库塞在其海德格尔时期十分关心的，但现在，他完全同意霍克海默关于黑格尔思想中的本体论冲动已经被马克思更为历史的方法超越了的观点：

马克思的理论所产生的整体不同于黑格尔的整体，两者的差别包含着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的决定性差别，对黑格尔来说，整体就是理性整体，一个封闭的本体论体系，最终与历史的理性体系相一致……另一方面，马克思从观念的基础中获得了辩证法，在他的著作中，现实的否定成了一个历史条件，一个不能被实体化为形而上学关系状态的历史条件。^⑩

和霍克海默、阿多诺一致，马尔库塞反对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一假设，对人类解放与技术、工具理性的进步的关联表示明确怀疑。^⑪

抱着这种态度，马尔库塞继续坚持意志主义和实践的必要性。然而，像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一样，他还感到理论和实践之中前者是更高级的一方。“理论将保护真理，即使革命实践偏离正常轨道。实践追随真理，而非相反”。^⑫甚至在晚年与霍克

海默及阿道诺不同而去积极支持抗议行为时，他也从未放弃正确理论首要性的信仰。

在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理论与革命》明显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产品，但在某些方面，马尔库塞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霍克海默影响的独立性。他们对劳动中心的不同态度，意味着马尔库塞在批判工具理性时避免提到马克思，而霍克海默、阿多诺及最近的其他成员则是这样做的。¹⁹对马克思的后继者们，马尔库塞也比他们更有善意，修正主义中只有伯恩斯坦一派被批判；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因其“保护了”马克思学说中的批判涵义面受到他的称赞；²⁰考茨基及第二国际实际上被忽略了。而且，在批判理论的基础上，他没有区分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最后，马尔库塞也不关心黑格尔同一论中的顺从主义、拟神正论因素，而这是霍克海默在其早期几次提出的。缺少关心可能与他对黑格尔思想中神学前提的相对冷漠有关，他的几位批评家很快就注意到了。²¹

80

但在总体上，《理性与革命》是马尔库塞向研究所作的适当的告别辞。随着他日益参与政府工作，和研究所的联系在40年代开始减少了——为美国战略服务中心（DSS）及国务院工作，并不是后来一些左派贬抑人士所指斥的那样是法兰克福学派提倡的革命实践，如同研究所其他在战时为政府工作的成员一样，马尔库塞依然相信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仅仅是乌托邦的希望，而从现有的选择来看，在保持个人理论使命的纯洁的同时帮助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不能算是不诚实的妥协（当然后来继续为美国政府工作问题就复杂了，但马尔库塞只工作到朝鲜战争）。研究所越来越确信知识分子在现代世界上的作用是继续思考现代世界中越来越成为不可思考的东西。

如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不能被哲学论断所克服，那么至少有益的理论工作可以有助于它们可能发生的统一（或者至少可以解释它们为什么不能）。虽然不可否认，它最终与政治行动有关，但批判理论近来不得不主要来考察社会与文化现状。不过，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方法，它肯定与其传统的伙伴极为不同，这一点，霍克海默 1937 年在其《杂志》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之一《传统与批判理论》中作了阐明。^⑩他认为传统理论的对象总是要形成一般的、内在一致的原则来描述世界，无论这个原则是像笛卡尔理论那样由演绎产生，还是像穆勒那样由归纳产生，亦或象胡塞尔那样从现象学产生，这个原则总是坚持的。甚至重视经验和证实的盎格鲁—撒克逊科学也追求一般命题，传统理论的目标历来是纯粹知识而非行动。如果说培根式的科学指明了活动的方向，那么其目标也是做世界技术上的主人，这与实践是完全不同的。无论何时，传统理论总是在思想和行动之间保持严格的分离。

81

批判理论的几个不同点在于，首先是它拒绝把知识作为与行动不同并优越于行动的东西来崇拜，而且它认识到非功利的科学研究在一个连人自身都不自律的社会中是不可能的。霍克海默认为，研究者总是他要研究的社会对象的一部分，因为他要研究的社会尚未创造出一个自由的合理的人的选择，科学家不可避免地处于他律之中，他的感知必然被社会范畴中介，而这个范畴是他不能超越的。霍克海默在回答 30 年前尚未成名的 M·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时说：“也可以把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伸这个命题反过来，人的器官也是人的工具的延伸”。^⑪这一训谕甚至也是对“客观的”社会科学家、无论是实证的还是直觉的社会科

学家提出的。与此相关的是上面提到的霍克海默对狄尔泰文化科学方法论的批判，历史学家不能在其心灵中重现那从未被完全自律自觉的行动所完成的行为。

在讨论预言的可能性时，霍克海默持同样的观点，只有在社会更为合理时社会科学家才有可能预测未来，维科关于人类能够理解历史是因为历史是人类创造的洞见尚未实现，目前的人类还不能创造自己，科学预测的可能既被方法论也为社会所决定。^⑧

因此，在当代社会，视知识分子为“自由漂浮”（free-floating）是错误的，该词是曼海姆从A·韦伯（Alfred Weber）那里取来并使之广为流行。知识分子超越论争、“自由漂浮”的理想是形式主义的幻像，必须抛弃；同时，像种族理论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把知识分子视为完全扎根其文化与阶级之中也是错误的^⑨，总之两种极端都错误地视主体为完全自律的或完全依他的。尽管研究者肯定是其社会的一部分，但他并不是不可能有时超越其上的。其实，揭示社会中那些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现实的否定力量和趋势性恰恰是他的责任。简言之，坚持事实和价值形式上的二元论，它一直被韦伯式的传统理论所强调，其实是维护社会现状的行为，^⑩研究者的价值必然影响到他的著作，他们也应当自觉地这样做，知识和利益最终是不可分割的。

82

除了反对传统理论中的纯知识目标外，霍克海默还拒绝一般原理的理想和证实或证伪的范例，批判理论涉及的一般真理并不能通过参照当代秩序而被证实或证伪，很简单，这是因为它意味着可能有另一种不同的秩序。^⑪证实总要有一个动力要素，即隐藏在社会现实中的否定要素，社会研究总要包含历史内容，这不是指在客观历史力量的情境中判断事件的严格意义而言的，而是指从历史可能性的角度观察它们。辩证的社会研究敏于接受那些

产生于前科学经验的洞见，如上所说，它承认审美想象、幻想的有效性，把它们当作人的灵感的真正贮存所，它坚持所有对社会理论家有效的经验都不应当还原为实验室的受控观察。

在始终坚持当代矛盾和未来可能性的总体性的同时，批判理论拒绝过分的一般和抽象。它常常试图在其具体特殊的体现中抓住总体，这有点像莱布尼茨，在特殊的历史现象中寻找普遍，它像单子一样，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在方法上，它强调的是类推而非传统的因果。本雅明说过：“永恒更像衣服的装饰花边而非一个观念”。^①剥去其神学基础，只要其实践者同样不强烈坚持概念解释的必要性，那么这句话可以成为批判理论的模式。研究所的大部分著作，尤其是阿多诺的著作，有时令人眩目，有时又是高度抽象的陈述和似乎无足轻重的观察的令人迷惑的混合。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他们不同意传统理论在“具体”和“特殊”、“抽象”和“普遍”之间划等号。批判理论遍随黑格尔，正如 G·克林 (Gorge Kline) 说的：“‘具体’意味着多方面的、充足的关系、复杂的中介……而‘抽象’意味着单方面的、缺乏联系，相对而言缺少中介”。^②考察由研究所成员掌握的不同领域的不同具体现象，有希望获得有助于阐明整体的丰富多采的洞见。

然而，基本的东西是社会变革这一目标。在研究“实践”时，研究所谨慎地与实用主义区分开来，霍克海默、阿多诺对他们在美国遭遇到的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做了多次批评，他们 83 对实用主义的反感在其留美的生涯中一直是很强烈的。^③迟至 1945 年 9 月 21 日，霍克海默在给洛文塔尔的信中还说：

你从引文中可以看出我读了不少他们本土的书，我觉得我成了这方面专家了。主要的东西明显属于第一次大战以前

阶段，基本方法属于经验主义传统，但却远没有我们的老柯奈留斯那么优雅。

在随后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都是“哲学和科学主义的同一”。^⑧尽管实用主义将真理与人类活动联系起来是正确的，但他们的联系太简单、太不辩证了：

这种认识论声称真理是生命的增进，或全部“有益”的思想都是真理，但如果它不属于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包含了真正能导向更好的、生命提高趋势，那么这种认识论就是肯定包含着某种和谐幻像。与一个整个社会的确切理论相分离的任何一种认识论，都是形式的和抽象的。^⑨

实用主义无视此一事实：即与现实相矛盾的某些理论及反对现实的努力往往并不是“假的”。无论其主张如何，实用主义的意义是更为顺从的而非批判的，像实证主义一样，它缺少超越现存“事实”的手段。在进行这一批判时，鉴于 S·胡克（Sidney Hook）和 30 年代的其他人不正确地把马克思主义贬低成变相的实用主义，霍克海默无疑是在做一件颇有价值的工作。然而，洛文塔尔和哈贝马斯后来指出，他们没有注意到实用主义传统中的一些辩证潜力。^⑩

霍克海默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也有一个以实践和历史检验为基础的证实理论，“真理是正确实践的一个方面。将之和成功等同的人乃是越过历史而成为现行实在的辩护者”。^⑪“正确实践”是一个关键术语，既再次表明研究所的理论思维作为行动指导的重要性，也表明其论证的某种循环。但是，霍克海默警告说：在统一理论和实践的愿望中，它们之间仍必然存在间距，不应被草率地忘却。这一鸿沟在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上清楚显示出，马克

恩、恩格斯曾认为工人阶级是新秩序的唯一催化剂，“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如是说。但霍克海默认为，在20世纪，由于物质条件的不同，生活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无产阶级已不能自动地适应这一角色，而一味去随声附合无产阶级的所有愿望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也放弃了自己的真正功能，即不断强调超越现存秩序的可能性的功能。事实上，为了同工人阶级顺从倾向作斗争，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紧张在目前还是必要的。^⑧于是，批判理论并不自视为某种阶级意识的简单表达，这表明它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比如卢卡契，他总是强调阶级意识，甚至在他因“罪”而流亡远方的时候。相反，批判理论愿意和所有愿意“说出真理”的“进步”力量结盟。^⑨

如果批判理论的证实只能通过它和“正确实践”的关系来达到，那么，由马克思断言唯一能适合革命行动的阶级却无力实现其历史作用，这又意味着什么呢？30年代研究所虽已开始有所怀疑却并未正视这一点，“今天”，马尔库塞1934年写道：“工人运动的命运，其中保存着哲学（批判的唯心主义）的遗产，被不确定性遮盖着”。^⑩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不确定性继续增长，除非在战时戏剧性的瞬间，那时霍克海默短暂地回到了《黄昏》中的乐观主义。^⑪

同时，研究所开始把主要注意力指向如何理解世界中的否定的、批判的力量消失的问题上，结果，这也意味着从经济意义上的物质关心转移。虽然在波格克、格罗斯曼和其他人的著作中，它并未完全被忽视。研究所把精力集中到被传统马克思主义贬黜到第二位的现代社会中的文化上层建筑方面，这意味着主要关注

两个问题：权威的结构与形成、大众文化的出现和扩散。在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分析之前，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鸿沟必须填平，这两方面未能联结是因为缺少心理学，研究所选来补充这一点的，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究竟如何整合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是下一章主题。

第三章 整合心理分析

除了夸张，心理分析无真实可言。

阿多诺

如果恐惧和破坏是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情感根源，那么爱欲则是民主的主要情感根源。

《权威人格》的作者

到 70 年代再来欣赏那些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不自然地结合在一起的第一批理论家的胆识，是困难的。随着近来对赖希兴趣的复活以及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的广泛影响，不少左派人士认为这两人虽然立场不同，但却说着相同的问题。然而，仅仅在一代人之前，这种观念的荒唐在大西洋两岸都是无人怀疑的。尽管托洛茨基曾对精神分析表示同情，但 1923 年后他的声音在正统共产主义世界中已不再听到，此时弗洛伊德和其追随者已成为禁忌而巴甫洛夫的行为主义则成了新的教条。在精神分析运动自身内，S·拜因菲尔格（Siegfried Bernfeld）、O·芬西尔（Otto Fenichel）和 P·芬顿（Paul Federn）也有兴趣整合两种体系，但没有成功。^①赖希在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是这一尝试的最为鲜明的提议者，也遭到全面嘲讽，^②30 年代他被共产党和精神分析运

动非正式地开除出去。保守的和激进的都认为弗洛伊德对社会变革可能性的悲观主义是与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希望不相容的，直到1959年，P·利夫（Philip Rieff）仍然写道：“对马克思来说，过去蕴育于未来，而无产阶级则是历史的助产婆。弗洛伊德则认为，未来蕴育于过去，其要旨只能靠医生幸运地传给我们……革命不过是重复反抗父亲的原型，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注定是失败的。”^③

87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研究所试图把心理分析引入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是勇敢而有挑战性的一步，也是它力图挣脱传统马克思主义紧身衣的标志。事实上，研究所成员中，格吕堡—格罗斯曼一代和其后来霍克海默为首的一代的区别，主要之一就是对其心理学的不同态度。正像我们将看到的，纽曼对精神分析的冷淡，是他不为研究所核心圈子完全承认的原因，纽曼是终对弗洛伊德发生兴趣，是在耄耋之年，已很难在整合这两种传统方面取得成绩了。^④

相反，霍克海默对心理分析的兴趣可追溯到20年代，这部分是由洛文塔尔诱发的，后者20年代中期在F·F·利希曼（Frieda Fromm-Reichmann）指导下实际分析过。另外，心理分析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那些年月法兰克福常常讨论的话题，1929年以后，大学左派重要人士之一是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者H·德曼，他在《论社会主义的心理分析》（1926年）中，^⑤尝试以一种基础更为主观的行动主义来取代经济决定论，德曼反对他归之于马克思的功利主义利益取向的心理学，强调激进行动的非理性主义根源。据说德曼进入法兰克福做社会心理学教授乃是为了削弱研究所较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⑥无论什么原因，他的到来并未说服霍克海默或其他人转到非理性主义立场上，这是和批判理论明显

不相容的。德曼后来和法西斯主义的调情，也加强了这种不信任。然而，他们和德曼一样，急于超越庸俗马克思主义工具性的功利主义。

早在1927年，阿多诺就在霍克海默的鼓励下，写了一篇长文，论及心理分析和科奈留斯的超验现象学的关系^⑦。在两者的相互关联中，他主要指出两种理论都强调象征性连环交织的无意识结构以及从当前经验出发而直达过去经验的共同尝试。^⑧霍克海默也曾一度对心理分析感到兴趣，后来遂决定自己亲历一下，他选择弗洛伊德的学生兰道尔为他的精神医师。一年后，曾严重干扰霍克海默的问题，即没有准备讲稿就不能授课的问题解决了，^⑨这种主要是教育而非治疗的精神分析也就结束了。兰道尔被说服成立一个法兰克福心理分析研究所，作为最近在海德堡成立的西南德国心理分析团体的分支。^⑩它于1929年2月16日开张，是第一个虽然是间接然而与德国大学有联系的弗洛伊德组织，它也和霍克海默及同事保持不太紧密的联系。霍克海默在寻求大学赞同这样一个“客座研究所”方面有过帮助，为此弗洛伊德本人两次写信给他表示感谢。^⑪

88

以永久成员身份加入兰道尔组织的有门、弗洛姆和弗洛姆夫入利希曼。^⑫在心理分析研究所的最初9个月中，公开授课是由像H·萨赫（Hanns Sachs）、拜因菲尔德、A·弗洛伊德（Anna Freud）和芬顿等心理分析运动的领导人完成的，G·格罗代克（George Gtroddeck）也是一位常客。4个永久性成员中，弗洛姆与洛文塔尔有10多年之交，也是由洛文塔尔介绍给研究所的，不久便成为研究所最重要人物之一。只是在研究所流亡美国后，他才逐步成为一个所谓新弗洛伊德修正主义的最重要人物，其妻也来到美国，但与研究所没有什么关联。兰道尔后来去了阿姆斯

特丹，在那里他不明智地参予抵抗，等到原来研究所的同事恳求他离开欧洲时已太晚了，战时他死于贝尔森。门稍为幸运一些，离开法兰克福去了巴塞尔并成为精神卫生方面的专家。这样研究所第一次试图调和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尝试是由弗洛姆来进行的。

弗洛姆生于 1900 年，是在强烈的宗教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时受到犹太思想中弥赛亚的强烈吸引。他后来写到，“弥赛亚、阿摩斯、何西亚的预言书比其他任何东西都令我感动，不是它们的戒律和灾难的宣告，而是他们对‘末日’承诺……普遍和平与各民族之间和谐的幻相深深激动了我”。^⑩20 年代初期，弗洛姆和洛文塔尔一起参加了诺拜尔小组，他也和 G·萨尔兹伯格 (George Salzberger)、罗森茨威格一起建立了著名的“自由犹太读书之家”。虽然 1926 年他在慕尼黑第一次成为心理分析家，摆脱了正统教义的外在束缚，但对宗教的热情却一直保留在他后来的著作中。

89

然而，同样受犹太先驱的吸引，弗洛姆与霍克海默、阿多诺不同，他不是强调真理的非形象性和规定人的本质的不可能性，而是坚持一种哲学人类学的思想。与布伯尔以及其他“自由犹太读书之家”成员一样，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这在他离开研究所的后期著作中得到了生动表现，不过在任何时期，他都坚信人的本质的现实性。只是这种本质并不是像罗马人的“自然” (natura) 那样固定的概念，而毋宁说是相似于古希腊的“自然” (physis) 这种人的潜在本质的观念。据此，弗洛姆总是十分强调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类学含义。^⑪在这方而，他和马尔库塞相近，至少是和进入研究所之前的马尔库塞而不是和霍克海默、阿多诺相近。与法兰

克福学派相联系的是，弗洛姆常常利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特别是在后研究所时期^⑮，为了给他的完整的人提供基础，他注意到像斯宾诺莎、^⑯杜威这样一些思想家的自然概念。40年代他超越心理学，企图在人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伦理学体系，这完整地表现在《自为的人》一书中，在其伦理学的人性表面的背后，潜伏着一种被批评者认为难以承受的自然主义。^⑰

40年代，弗洛姆不但离开研究所，也离开了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早先思想的各个方面，他后来认为“我从未离开过弗洛伊德主义。”

除非把弗洛伊德和力必多理论等同起来……我认为弗洛伊德的主要成就是其无意识概念（它体现在神经病、梦等现象之中）以及抵抗和人格的动态概念。这些概念在我所有著作中保持着基本重要性。那种认为我放弃力必多理论就是放弃弗洛伊德主义的说法，是一种只有从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的立场才可能有的非常强烈的说法。无论如何，我从未放弃过精神分析，我从来无意形成一个自己的流派，我被国际心理分析协会开除会籍，我现在（1971年）仍然是华盛顿心理分析协会的会员，它是弗洛伊德式的。我总是批评弗洛伊德的正统性和其国际组织墨守成规的方法，但我的全部工作都是以我所认为的弗洛伊德最重要的发现为基础，其心理玄学则除外。^⑱

90

然而，对其他观察者而言，放弃力必多理论和弗洛伊德原来思想中的其他一些重要成分如俄狄浦斯情结等等，就意味着弗洛姆已远离正统理论，有理由称为十足的修正主义者。弗洛姆在弗洛伊

同一期上，弗洛姆企图寻找社会心理学的基本规则，^⑧他一开始就以赖希的早期著作为例批评精神分析只能运用于个体的观点。^⑨虽然他曾攻击团体或大众灵魂的观点，但弗洛姆感到个体从来也不能完全从其社会情势中孤立开来，真正的任务是补充丰富他当时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一直被错误地指控为有一种追求物欲的简单心理学，在此他指责 B·罗素 (Bertrand Russell) 和德曼误认为自我的经济利益是马克思对人的基本观点。其实，马克思的心理学前提是很少的——比弗洛姆后来宣称的还要少。马克思认为人有寻求满足的基本的冲动 (饥饿、爱等等)，贪欲仅仅是特殊的社会条件的产物。然而，马克思主义需要补充心理学的成果。伯恩斯坦和考茨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天真的、唯心地相信天赋道德本能，已经不能提供这些补充，^⑩心理分析则能够提供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与社会经济基础之间已经失去的联结。简言之，它能更新关于人的本性的唯物主义观念。^⑪

然而，弗洛姆对心理分析中有助于构成社会心理学的方面有许多明确的看法。文章一开始，^⑫他就反对弗洛伊德的生本能、死本能理论，视之为生物学和心理学欠考虑的混合而抛弃。相反，他坚持早期弗洛伊德在爱欲与自我保存冲动之间的二分法，因为前者能够被移置、升华，或在幻想中满足 (如虐待狂能够以许多社会许可的方式实现)，但后者不能 (只有吃才能不饥)，性欲更能适应社会条件。^⑬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的任务是把无意识的动机行为理解为社会经济作用于基本的心理冲动的结果。弗洛姆认为儿童经验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家庭是社会的代理人 (弗洛姆对家庭的强调贯穿了他的一生，尽管他后来指出“分析者不应过多地研究儿童经验，而应转向现在存在的无意识过程”，以此来

我完备的。但后来弗洛姆对赖希的观点越来越持保留态度，他最终相信纳粹的情形表明性自由并不必然地伴随政治自由。^⑧

确立了性格类型的基本力比多根源的重要性后，弗格姆开始再次强调社会因素通过家庭的中介而产生的影响。作为一个例证，他指出过分的性压抑习俗可能影响健康的生殖欲的发展，滋生前生殖型的性格类型。然而，整体上弗格姆坚持一种适度的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由于性格特征植根于力比多结构之中，它们也就显示出相对的稳定性”。^⑨文章结尾，弗洛姆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精神”与肛门恋之间的关系，所持观点后来已成常识，但在当时却很新鲜。他认为资产阶级的理性、所有权及清教主义与肛门欲的压抑和守序有关，^⑩这些特征一直延续到20世纪，尤其见之于在小资产阶级中，甚至在某些无产阶级圈子中也有表现，因为他们的意识（在其广义上它包括性格特点）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变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后又出现在《逃避自由》中关于宗教改革的研究里面。但到那时，他对肛门欲和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的态度已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虽然关于肛门类型的临床描述没有变化，但后期著作对此的解释却有显著改变。

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临床观察，但也有其思想根源，这种思想帮助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新观点。20年代中期，弗洛姆首次接触到19世纪瑞士人类学家J·J·巴赫芬(Johann Jacob Bachofen)的著作。巴赫芬对母权制文化的研究，首次出版于1860年，他于1887年逝世后，其著作在20年内一直没能引起注意，比如弗洛伊德的人类学思想，主要取材于J·弗雷泽(James Frazer)爵士的图腾研究。然而，在弗雷泽影响衰退之前，巴赫芬及其他母权制理论家像L·摩尔根(Lewis Morgan)等等，已开始在社会主义者中发生影响，恩格斯的《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1884年)、倍倍尔

的《妇女和社会主义》(1883年)等都取资他们。

20年代,母权制理论在几个不同方面唤起了新的兴奋。在右的方面,资产阶级社会的反现代主义的批评家像A·鲍姆勒(Alfred Baumler)和L·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都被它的浪漫的、自然的、反智的含义所吸引;S·格奥尔格先前的几个信徒也谴责他的反女性立场,并离开格奥尔格小组寻找永恒的女性。正如E·M·波特勒(E·M·Butler)指出的,^④这差不多完全是70年前法国圣·西蒙式的(St. - Simonian)对“神秘母亲”寻求的重演;在更为正统的人类学家中,英国的B·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野蛮社会的性和压抑》中,研究了母权制文化,他削弱了弗洛伊德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遍性;与此同时,R·伯列福特(Robert Briffault)的《母亲:情感和制度的起源研究》也引起很大兴趣。

在心理分析的圈子中,对母权制理论也展开了新的思考。赖希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到1933年,他已在《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中写道,母权制是“自然社会”中唯一真正的家庭类型;^⑤弗洛姆也是母权制理论最活跃的鼓吹者,1932年他在《杂志》上写了一篇长文把伯列福特的《母亲》介绍给德国公众,文后紧随一篇伯列福特用英文写的名为《家庭情感》^⑥的文章,弗洛姆特别赞赏伯氏的一个观点,即所有的爱和利他情感最终都源自贯穿于怀孕和出生后一段时间的母爱,爱并不如弗洛伊德所假设的依赖于性,其实,性更多的是和恨、毁灭联系在一起;弗洛姆也欣赏伯氏对社会因素的敏感,男性和女性并不是如浪漫派所想象的“本质”上是性的不同的反映,它们源自不同的生活功能,部分地由社会所决定,于是一夫一妻制是由放牧时代的经济所要求的,这种生活要求运动并以男性牧羊人为权威。弗洛姆总结

说伯氏已超越仅仅是人种学的范围而进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正如他在《杂志》论述经济因素在家庭发展中的重要性一样。

在下一篇文章中，弗洛姆直接论述巴赫芬。⁴⁸开始，他仔细描述了母权理论对资产阶级社会右翼和左翼批评的不同意义，巴赫芬本人对过去时代含混的怀旧在右翼引起反响；另外他把自然浪漫化，即认为人对自然应当像婴儿屈从于母亲那样。⁴⁹巴赫芬与浪漫派而不与伯列福特一致，他把男女在精神上的不同绝对化（弗洛姆承认，这表达了一种合法抗议，反对启蒙运动把妇女“解放”到资产阶级男人的位置）。克拉格斯和其他的种族理论家仅对巴赫芬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感兴趣，使之转向神秘的“极乐”，忽视了他的心理学的成就。

另一方面，这又是巴赫芬取悦于左派的根源。母权制社会强调人的团结和幸福，其统治价值是爱和怜悯，而非恐惧和屈从，社会伦理中没有私有财产和性压抑；而父权制社会，正如恩格斯和倍倍尔解释的，是与阶级社会相关联的，两者都把责任和权威置于爱和满足之上。在一种特定方式上，巴赫芬的历史哲学类似于黑格尔，父权制社会的出现与精神和自然的分裂相应，所以罗马胜过东方。

正像所预料的，对弗洛姆来讲对巴赫芬进行社会主义理解会更中肯些。他认为研究母系社会的重要性并不是因为其历史兴趣——确实，无需证明它们的确在过去存在过——而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供现实选择的境界。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弗洛姆用母权制理论否定了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遍性。他承认，这个情结在父系社会中的强化，部分是由于儿子作为父亲财产与地位的继承者以及作为父亲老年的赡养者而造成的。这意味着儿子早期教育中经济考虑更重于幸福，因为儿子害怕失败，所以父子之爱很可能转化

为怨恨，爱的这种依赖性可能导致精神安全的丧失和作为生存核心的义务的加强。

而母爱却是无条件的，也较少与社会压力有关。但当代社会真正母亲的力量已受到侵蚀，她不再被看作保护神，甚至自身还需要保护。弗洛姆认为这也同样适合于母亲的替代物，诸如国家或种族。^④原来母亲式的信任和温暖代之以父亲的罪感、肛门压抑和独裁道德。新教的发展加强了父亲的影响，而中世纪拥有的子宫似的教堂和圣母崇拜的天主教的安全感却在实际上降低了。^⑤资本主义的精神基础明显是父权的，尽管资本主义自相矛盾地创造了回到母权文化的条件，因为它提供了大量商品和服务，允许一个较少成功取向的现实原则。弗洛姆认为社会主义应保持这一回转的承诺。

随着对巴赫芬的兴趣的增长，弗洛姆对正统弗洛伊德主义的热情不断减少。1935年他在《杂志》上著文说明失望的原因，^⑥他认为弗洛伊德受到资产阶级道德和父权价值的拘限。心理分析对童年经验的强调有助于分散分析者自力的注意力，当分析者不加批判地接受社会价值时，当病人的欲望和需要与这些价值相反时，他就会倾向于激起病人的反抗。当然在理论上，分析者支持价值中立并对病人道德表示宽容，但弗洛姆认为在事实上，容忍的理想在历史上就有两面性。

弗洛姆对容忍的讨论值得详细讨论，^⑦因为这一态度是研究所其他成员共有的，后来又为马尔库塞那篇最有争论和影响的论文所重复。^⑧弗洛姆开始写道，资产阶级为争取宽容的斗争是直接反对社会压抑，但当中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宽容就转变为道德上自由竞争的面具。其实，它从来没有扩大到能够抵御流行秩序的严重威胁，康德的著作就是典型，它更多的是运用到思

想、言谈而不是行为上。资产阶级的宽忍是自相矛盾的：意识上是相对的、中立的，但潜意识上却是有助维持既有秩序。弗洛姆认为，心理分析具有宽容的两面性特征，虚伪的中立常常被用来掩饰弗洛姆所谓的医生含蓄的虐待。^⑤

但弗洛姆并没有完成后来由马尔库塞所做的下一步工作（马尔库塞 1965 年说“解放的容忍，意味着对右派运动的不容忍与对左派运动的宽容”^⑥），而是致力于揭示弗洛伊德父权主义的其他方面，认为正统精神分析的目标是工作、生育、享受的能力，弗洛伊德强调前两个甚于第三个，他在文明和满足之间发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主张重建社会以使满足有更大可能的政治激进派，弗洛伊德的态度是持久的敌意。他们的所作所为，都被他认为是对父亲所作的恋母性的侵犯。^⑦事实上，按照弗洛伊德的定义，神经病就是不能适应资产阶级规范。弗洛伊德不能改变他的背景的进一步证据是，他坚持以钱支付所有治疗。最后，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的人格是古典父权制类型的，在其学生和病人的面前都是权威。^⑧

作为比弗洛伊德更为优越的选择，弗洛姆提到洛罗代克和 S·弗伦茨齐（Sandor Ferenczi）。他们的优越之处是治疗学上的改革，即对病人面对而地分析，有更多的平等关系。弗洛姆放弃俄狄浦斯情结意味着他现在所采取的治疗技术中感情转移的作用已大大减少，洛罗代克和弗伦茨齐在报酬问题上也较少僵硬态度，有时甚至放弃。与弗洛伊德父权制权威不人道的“宽容”相反，他们提出的治疗法已超越了适应当代社会非人道道德的短视目标，弗洛姆对由于弗伦茨齐早逝而产生的心理分析事业的损失感到十分遗憾。后来，他力图从琼斯的曲解中为他挽回声誉，因为琼斯认为弗伦茨齐晚期患有精神病。^⑨弗洛姆夫妇始终和格罗代

克保持友好，尽管后者在政治上极为天真——一度希望接近希特勒，虽怀疑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但赞成他一些工作，只是在希特勒取得权力后，他才对之失望。^⑤

同时，正如他对弗洛伊德不断增长的失望一样，弗洛姆与研究所其他成员也开始疏远了。1936年他参加了研究所的一个集体项目，为《权威与家庭研究》写了关于权威的心理分析的文章，此后他只为《杂志》写了一篇研究现代社会无能感的文章。^⑥1939年，他和研究所的联系中断，把更多的精力倾注在临床治疗上，不断绷紧思想中非弗洛伊德之弦。两年后，可能是他著作中最著名的《逃避自由》出版，作为对美国正与之作战的权威主义的解释，它受到广泛注意，一段时间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⑦由于此书已在别处评说，这里只就它与弗洛伊德及研究所的不同之处作些讨论。

如同早期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一样，弗洛姆开始就批评弗洛伊德文化上的狭隘：“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类关系领域和市场相似——它是一种生物学上天生需要的满足交换，在其中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关系总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而绝不是目的本身。”^⑧他还比以往更强烈地指斥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及其死本能观念，他把死本能视同毁灭的需要，这一观点后来受到马尔库塞的挑战。由于这样理解，弗洛姆才可能说：“如果弗洛伊德的假设是正确的，那我们将不能不承认指向他人和自我的毁灭的总量基本上是恒常的。但我们观察到的东西却与之相反，不仅个体间毁灭性份量是多变的，而且不同的社会集团的毁灭性也是份量不等的。”^⑨

弗洛姆继续毁坏弗洛伊德力必多理论的声誉，同时又保持其临床治疗的描述。这样做的时候，他明确否认了他在《基督教教

义的发展》中的解释⁶¹和1932年在《杂志》上他所坚持的力必多取向的性格类型。⁶²施虐—受虐的讨论是其非理性权威理论的一个中心概念，他企图净化这个概念中的任何爱欲成分。在下一部著作《自为的人》中，弗洛姆按照完全不同的路线发展了自己的性格类型。⁶³此书第一次出版时他承认他的思想与K·霍妮(Karen Horney)和H·S·苏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等人相似，⁶⁴他们在平行的方向上修正了弗洛伊德。他一再指出社会因素作为基础对自我保存冲动的不可避免的强制性影响。附录中，弗洛姆阐释了早期著作中所提出的“社会性格”的概念，他后来逐步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贡献……对社会心理学领域而言。”⁶⁵他说“社会性格”只包括一部分特征，“它是一个团体中多数成员的人格结构的基本核心，是作为该团体的共同的基本经历和生活方式的结果而产生的[着重号系弗洛姆本人所加了]。”⁶⁶

在这些方面，弗洛姆都站在一个熟悉的立场上，这在他早期著作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掩盖着。《逃避自由》的新颖之处在其对人的“生存”条件的更广泛的兴趣，弗洛姆认为“这本书的主题”是“人一旦从其与自然、与人的原始统一中分离出来，他越获得自由，就越成为一个个体。”在此情况下他的选择只有两种：或是通过爱的本性和生产性的工作建立起和世界的联系，或是放弃他作为个体的自由和完整，恢复和世界的联系以获得安全”。⁶⁷弗洛姆发现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异化概念是极富启示的，它是他新态度的根源之一，孤独和联系现在成了他思想的两极；神经病逐步用人际关系类型术语来界定，例如，施虐狂与受虐狂不再是一种由性而来的现象，而是“帮助个体逃避难以忍受的孤独感和无力感的一种冲动”，它们的真正目标是与他人的“共生”，⁶⁸意味着已经通过自我的分解而进入他人时的完整自我和个体性的丧失。

在《逃避自由》中，弗洛姆在否定性的“从……自由” (freedom from) 的孤立的原子化与肯定性的“到……自由” (freedom to) 的完整人格的自发活动之间，做出了区分。^①尽管他费尽心机地提出社会经济的变革将必然导致异化自由的结束实现肯定性自由，但他并没有过分强调这一转变的困难，他逐步以乐现主义的甚至是道德主义的态度看待改革问题。如果没有天生的毁灭冲动，那么希伯来先知的梦想，曾深深地感动过年青弗洛姆的“普遍和平与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幻想”就可能实现。弗洛姆后来的著作强调伦理学和心理学的结合，《自为的人》甚至可以这样说：“每一种神经病都是一种道德问题，未能成熟、未能整合整个人格也是一个道德问题”。^②后来他越来越欣赏东方的精神教义，特别是佛教禅宗大师的教义，^③对西方的精神教义也同样赏识。

然而，公平地说，弗洛姆思想的着重点虽然不断变换，但其立场并未绝对转移。针对有人指责他成为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弗洛姆生气地回答：“我总是坚持同一观点，即人的自由、爱的能力等等几乎完全取决于现实的社会经济能力，正如我在《爱的艺术》中指出的，例外的情况，只有在原则完全对立的社会中才能发现。”^④但是，要理解弗洛姆后期著作是困难的，除非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和放弃了 20 - 30 年代的尝试性希望的霍克海默等研究所核心成员比较而言，弗洛姆一直在捍卫一个更为乐观的立场。

霍克海默和其同事对弗洛姆早期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大体上赞同，甚至赞同他对弗洛伊德的最初批评。弗洛姆还记得在研究所迁到纽约的最初几年，霍克海默和霍妮曾非常友好，^⑤而

部分象征化，另外个性的不同也起了一定作用，弗洛姆作品表明他较之其他成员更少的讽刺性，他的生活方式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审美敏感相比也较少色彩。在弗洛姆行将离去之际，阿多诺却完全介入到研究所的事务，这意味着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基调将发生重大变化。

无论什么原因使他离开，40年代他的著作已被以前的同事所诅咒。在他离开后，研究所没有花多少时间来讨论心理分析的理论问题。1939年，霍克海默著文认为弗洛伊德优于狄尔泰，^⑧但他没有作出任何丰富的解释来支持他偏爱的理由。尽管战时及战102后，心理分析的范畴被广泛地用在研究所的著作中，但霍克海默及其同事仍然不那么热衷于宣传他们和心理分析理论的牵涉。1942年10月，著名的自我心理学家E·克里斯（Ernst Kris）与洛文塔尔相遇，询问研究所对弗洛伊德的态度，洛文塔尔写信给此时已迁到加州的霍克海默，询问如何答复，霍克海默以极其明确的语言写道：

我认为你应绝对地肯定，我们确实深深地受惠于弗洛伊德及其第一批合作者。他的思想是我们的基石之一，没有它，我们的哲学就不会是这样。最近几星期我再次意识到他的伟大。你会记得许多人说过，他开始时独出心裁的方法特别适合于维也纳世故的中产阶级，虽然这作为总体概观是不真实的，但对之持保留态度并无损于弗洛伊德的著作。越是伟大的著作，越是植根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但如你更仔细地考察自由主义的维也纳和弗洛伊德的独特的方法，你就会知道他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思想家。随着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衰落，他的理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主要表现在《超越

唯乐原则》和随后的著作中。在他的一些著作中，他的哲学转折表明他意识到我的那篇论理性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变化（可能是指霍克海默的《理性与自我保存》），这篇文章考察的是家庭和个人的沦落。没有力比多的心理学，在一定意义上就不成其为心理学，弗洛伊德伟大得足以在他自己的框架里超出心理学。心理学的恰当意义总是个体心理学，如果有必要的话，那我们得说我们通常指的是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和死本能相联系的一些概念是人类学的范畴，甚至在一些我们不同意弗洛伊德对它们的阐释和使用的地方，我们也发现它们的客观意图是非常正确的，这透露出弗洛伊德对形势伟大的敏锐洞察力。他的发展使得其得出的结论与当时其他伟大的思想家如柏格森所得出的相差无几，弗洛伊德客观上已经从心理分析中挣脱出来，而弗洛姆和霍妮却回到通常意义上的心理学，甚至把文化和社会也心理学化了。^④

这里的意见和弗洛姆有几个基本的不同。首先他否认了弗洛伊德思想中公认的资产阶级成分是无可争辩的遗憾这一指控。正如他在《传统和批判理论》一文说的^⑤，没有一个思想家能够完全逃避他的社会起源。在给洛文塔尔的信中他写道：“越是伟大的著作，越是植根于具体的历史环境”。因此，弗洛伊德的死本能的观念有一种“非常正确的”“客观意图”，这不仅是因为它与生物学的普遍性相应，而是它表达了现代人毁灭冲动的深度和强度。第二，弗洛伊德思想中公认的盲点，即对家庭作为社会代理人的作用的忽视曾被弗洛姆特别予以强调，并成为研究所早期权威研究的一个部分，这其实反映了弗洛伊德对现代生活中家庭没落的敏感。从此开始，标志着霍克海默在后来的著作中详细讨论了这

个问题。最后，弗洛伊德意识到心理学必然要研究个体，力必多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概念，更是人性存在中一个顽固地冲出整体社会控制的一个层面，因此把个体完全社会化是错误的。修正主义者错误地试图把“文化”和“社会”心理学化，霍克海默拒绝把心理学化为社会学或者相反，这样做的基础是强调非同一性这一批判理论的中心。除非各种矛盾在社会中被解决，否则方法论上的调和就不可能，阿多诺后来在《社会学和心理学》中对此又一次给予批评性讨论。^⑤

事实上，第一个公开指出研究所与其修正主义的前成员不同的正是阿多诺。1946年4月26日他在洛杉矶发表了《心理分析中的社会科学和社会学倾向》一文，^⑥它无论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对弗洛伊德的态度，还是作为马尔库塞对修正主义的严厉批评的著名的《爱欲与文明》的先声，都是很有意思的。阿多诺明确地说他是针对霍妮《心理分析的新途径》和弗洛姆11年前发表于《杂志》的《分析疗法的社会限制》两文的。这篇文章写成于战后，显示出与研究所过去著作根本不同的激越的声音。

阿多诺通过考察修正主义者对弗洛伊德本能理论的攻击开始。他认为本能主义既可指把人的心灵机械地分为固定的诸种本能，也可以指从快乐和自我保存的冲动与其几乎无限的变种出发的对心灵的动态推导。弗洛伊德属于后者，修正主义在指控他是机械论时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正是他们自己的性格类型实体化才真正应得此骂名。虽然他们都很强调历史影响，但他们却较少像弗洛伊德那样转向力必多的“内部史”。由于过分强调自我的重要性，他们忽视了它和伊特(id)的遗传性互动，“具体而言，抛弃弗洛伊德所称的本能主义就等于否认了文化乃是通过强化对性欲、特别是死亡冲动的限制而成为导致压抑、负罪感及自我惩

他继续说，修正主义者在解释社会紊乱的根源时也很幼稚。当他们宣称资产阶级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竞争的时候，是很愚昧的，尤其是在《逃避自由》承认独立的个体已丧失殆尽时。其实，“竞争从来不是中产阶级社会据以运作的规律”，^⑧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契约总是受到具体暴力的威胁，弗洛伊德清楚地发现：“在集中营时代，阉割而非竞争是社会现实的特征”。^⑨阿多诺认为，弗洛伊德属于资产阶级理论家中的霍布斯传统，他们把人性中邪恶的一面悲观主义地绝对化，这要比修正主义肯定的乐观主义能更好反映当前的现实，和叔本华不同，弗洛伊德把文明视为固定的和重复的。在想象真正的变化将推翻西方文明的重复性的连续时，修正主义再一次显得过于乐观了。

105

最后，阿多诺反对修正主义者著作中对爱的强调。弗洛姆曾批评弗洛伊德的权威缺少温暖，不过真实的革命常常被认为是粗暴和冷酷的。社会对立不能被一厢情愿地取消，它们必会发展到至极，而这对一些人来说不可避免地要遭难：“很可能我们的社会已发展到它的极端，在此爱的实现只能在存在着的恨中来表达，相反，任何直接呈现的爱则服务于加强恨的社会条件。”^⑩在结束这篇文章时，阿多诺用了一句短语，它使人忆起本雅明关于歌德《亲和力》的文章中一句常被人引用的话：“只因没有希望，希望才给予我们。”^⑪“我怀疑”，阿多诺写道：“弗洛伊德对人的蔑视不过是表达了这样一种无望的爱，它可能是仅有的仍然给予我们希望的表现。”^⑫

这就是40年代研究所对弗洛伊德和弗洛姆的态度。对革命可能性不断增长的悲观主义，很自然地伴随着对弗洛伊德强烈的欣赏。在一个社会矛盾看起来不仅无法解决，反而变得越来越晦暗的社会中，弗洛伊德思想中出现的二律背反是反对修正主义者

和谐幻像的必需堡垒，不仅弗洛伊德的思想，而且它的最极端、最骇人听闻的方面都是最有用的。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阿多诺以一段最著名的短语表达了这些：“精神分析中只有夸大是真实的”。^⑧

40年代研究所的许多著作——《权威人格》、《启蒙的辩证法》、洛文塔尔的《欺骗的预言家》——弗洛伊德的适度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研究所回到德国后，这一影响继续在其理论和经验研究两方面发挥有意义的作用。^⑨1956年，在纪念弗洛伊德100周年时，研究所表达了对他的感激之情，并出了专门一期《法兰克福对社会学的贡献》。^⑩但是，我们遗漏了研究所的一位核心成员，他在美国时期，对心理分析理论试图在一种乐观的方向上调和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很少感兴趣。后来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试图拯救为弗洛姆视为神话而丢弃的、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视为忧郁的预言家的“革命的弗洛伊德”。虽然它不在我们研究的编年史框架内，但《爱欲与文明》是批判理论早期对弗洛伊德兴趣的一个端绪，因此，在我们叙述中对此应有一简略的提要。

与其他核心成员不同，马尔库塞在去美国之前从未对心理分析有过认真的兴趣，早期的马尔库塞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以至于不能在无意识的晦暗世界中发现有兴趣的东西。他以一种远甚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非同一性强调的方式，强调主客体的潜在的谐调，对个人心理的兴趣远少于对社会总体的兴趣。在早期为研究所写的关于权威的文章中，^⑪他避免承认家庭作为社会代理人的作用，这恰恰是弗洛姆竭力鼓吹、而其他成员也很少有疑问的。

然而，正像P·罗宾逊（Paul Robinson）指出的，^⑫马尔库塞

30年代的著作中就有以后对弗洛伊德兴趣的微妙预示，比如，承认理性与幸福的辩证总体中享乐主义成分有效性，马尔库塞就已有反对唯心主义中禁欲主义倾向；大体上，性压抑被包括在他所批判的剥削之中，被赋予超越单纯的心理学方面的政治意义；而且，他也批判把责任和忠诚置于快乐之上的资产阶级爱的理想；他还攻击理想主义者“人格”观念，^⑨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阿多诺后来对修正主义者性格理想的拒绝。早在1937年，他就指出真正幸福中肉欲性的成分，在身体最极端的物化中看到真正快乐的“预期的记忆”；^⑩最后，马尔库塞已经看出性压抑与攻击之间的关系，这在《爱欲与文明》和论享乐主义的文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⑪ 107

但是，直到西班牙内战和苏联的清洗审判等震惊性事件发生时，马尔库塞才开始认真阅读弗洛伊德。^⑫对马克思主义，甚至是黑格式的马克思主义日益增长的不满，导致他像霍克海默、阿多诺曾经做的那样，开始考察有意义的社会变革道路上的心理障碍。对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而言，弗洛伊德强化了他们日趋低沉的悲观主义并助长了从政治活动中的退却；在马尔库塞这里，弗洛伊德却使他更坚定了激进主义的乌托邦方面。在长期蕴育之后，《爱欲与文明》1955年出版，它远远超过了前此批判理论调和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不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利用弗洛伊德关于现代人深刻矛盾的见解来支持他们的非同一性观点，马尔库塞在晚年心理玄学的弗洛伊德中发现他还是一位同一和调和的预言家；不像弗洛姆基本上把正统的弗洛伊德视为新的现实原则的敌人而放弃，马尔库塞试图揭示心理分析中实际上超越现代体制的成分。

详尽讨论《爱欲与文明》这本相当复杂而又丰富的书，超出

述的，他们做着黑格尔的后继者对黑格尔所做过的事。修正主义者在两条战线上做着同化工作，第一，他们放弃了弗洛伊德最勇敢、最有启发的假设：死本能，原始部落，谋杀原始父亲。修正主义者所嘲弄的古代的遗产是很有意义的。马尔库塞在其主要部分写道：它的“象征价值，这个假设所规定的古代事件可能永远无法得到人类学的证明，但这些事件的所谓后果却是历史事实……如果这一假设蔑视常识，那么正是由于这种蔑视，它才提出了一种注定要被常识忽略的真理”。^⑧第二，像阿多诺 1946 年已经指出的，修正主义抹平了个人与社会、本能欲望与意识之间的冲突。这就回到了前弗洛伊德的意识心理学，无论他们主观意图如何都成为顺从主义者。

马尔库塞也重复了阿多诺对修正主义完整人格的攻击。他认为在当代社会中，真正的个人主义的可能性实际上是零：“个人的处境不过是总体命运的衍生物，正如弗洛伊德所表明的，恰恰是后者包含着个人命运的线索。”^⑨与此相关的是修正主义者道德主义的不足：“弗洛伊德摧毁了唯心主义伦理学的幻想：‘人格’不过是一个把压抑和攻击内在化并成功地加以利用的‘破碎的’个体”。^⑩ 109

马尔库塞猛烈抨击修正主义对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的肢解。他认为本能理论的内在方向是从意识到无意识，从成熟的人格到童年经验，从自我到伊特，从个人到种系。在强调力必多时，弗洛伊德形成了一种唯物主义的满足概念，这与修正主义精神的最终也是压抑的观念相反。在回到弗洛伊德理论的性欲根源时，马尔库塞再一次留意俄狄浦斯情结，这是弗洛姆从其早期就大为不满的概念，在《爱欲与文明》的正文中，马尔库塞提到它并不多，也没有赋予它多少重要性。^⑪但在《异议》的文章中（它被

用作其结束语), 他的态度就不同了。弗洛姆“把它从性的领域转移到人际关系中去”^⑩的尝试是对弗洛伊德思想中批判锋芒的一次逆转。对弗洛伊德来讲, 恋母情结的希望不仅仅是弗洛姆所理解的那样对与母亲的分离、对痛苦的、异化的自由的反抗等意思, 它也表达了一种对性满足、对匮乏的免除的深切渴望, 在这里, 母亲是一位女性而不只是女保护人。实际上, 马尔库塞也认为: “对母亲—女性第一次‘性的渴望’威胁着文明的心理基础, ‘性的渴望’使俄狄浦斯冲突成为个人与社会之间本能冲突的原型。”^⑪俄狄浦斯情结, 无论它是普遍的或仅仅是社会最深问题的象征性表达, 否定它的力必多起源都是掩饰了它所指向的基本对立。

更为基本的是, 马尔库塞反对修正主义者拒绝弗洛伊德心理玄学阶段的另一个本能即死本能撒旦 (Thanatos)。马尔库塞在此也超越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 再一次追求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乌托邦整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只把死本能理解为象征性地代表了弗洛伊德对现实社会中深刻的破坏冲动的敏感, 马尔库塞接受这一解释, 指出破坏冲动的持续和加剧伴随文明而来, 修正主义者却想缩小之, 弗洛伊德的死本能抓住了现代人的暧昧本性, 远远比修正主义者对进步的信仰更为敏锐。

但马尔库塞并不终止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悲观主义, 他所理解的死本能并不意味着通常所认为的是一种侵略的内在冲动。^⑫弗洛伊德“并未假定我们活着是为了毁灭, 破坏本能或是反对生本能或是服务于生本能, 而且, 死本能的目标也不是破坏本身, 而是消除对破坏的需要”。^⑬在《爱欲与文明》中, 马尔库塞反复推敲他对死本能本性的真实理解, 死本能的真正目的不是侵略而是生存紧张的结束, 它奠基于所谓的涅槃原则之中。^⑭后者表达了对无机自然的宁静的渴望, 这一欲望与生本能有惊人的

相似：两者都追求满足和欲望自身的终结。如果说死本能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生存紧张，那么，一旦这一生存紧张被减少，它也就不再是强有力的了。这是一个关键性假设，使得他能把晚期弗洛伊德貌似悲观的结论转向乌托邦方向，正如他在总结这一观点时所言：“如果这种本能的基本目标不是终止生命而是终止痛苦——紧张消失——那么奇怪的是，生命越接近满足状态，生死冲突就越缓和，于是，快乐原则和涅槃原则就聚合到一起”。^⑧这样的推理，大多数弗洛伊德的正统皈依者是会同意的，马尔库塞和弗洛姆、霍妮一样是修正主义者，虽然是在不同的方向上。

这样，马尔库塞企图在批判理论的传统上把死本能历史化。如果生命通过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非压抑的再次色欲化而得到解放，那么死就不必拥有支配力了。马尔库塞认为，这要求生殖器的性专制的崩溃，回到儿童的“多型倒错”，^⑨这里他超过了弗洛伊德和赖希，更不用说研究所的3位前同事了。他认为，只有全部身体都再次色欲化，以身体中非生殖器区物化为基础的异化劳动才能被克服。一个变化了的社会，如果不再以压抑和过时的“操作原则”为基础，就会结束扎根于历史的“多余压抑”。这样，个人也将会从产生紧张的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审美游戏将代替苦役；涅槃原则及其戒律所引起的毁灭将不再统治人的生活，结果会是“生存的宁静”。^⑩这一同一性理论在心理学上的相关者，如上章所述，乃是马尔库塞的哲学之根。

如所周知，马尔库塞大胆地把弗洛伊德理解成革命的乌托邦 111
邦，不同于他的前同事们。^⑪对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保持机智的沉默，但弗洛姆却试图在随后几期的《异议》中予以反击。^⑫他的攻击在两个方面进行，首先，他企图揭示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的误解，而且他也缺乏心理分析的任何实践经验。如他先前所

少，破坏性是生命颠倒的结果”。^⑭当然，马尔库塞相信两种本能最终能还原为一。相反，弗洛姆始终是一个小心的二元论者，在他的二元论中，死本能和破坏的需要不能仅仅理解为生本能受阻的产物。后来，他在《人之心》中以这样的方式归纳他的立场：

这种二元性……并不是生物学上的两种固有本能之一，它们不是相对稳定的，一直在相互争斗直到死本能取胜为止，而是一种在首要的和根本的生命倾向即保存生命的倾向与其对立面之间的二元性，而这一对立面只有在人无能实现这一目标时才会出现。^⑮

这样，尽管两人坚持他们的立场是多么不同，但至少死本能的力量和持续方面是一致的。在结束时，马尔库塞这本最为乌托邦的书以赞同的语调提到霍克海默几十年前关于那些以前死亡的人的痛苦是不可救赎的说法。^⑯此外，它表达的乐观自信，与批判理论的其他大师的暗淡的反语保持着很大距离。

第四章 对权威的首次研究

危机中的家庭产生了一种使人倾向于盲目顺从的态度。

霍克海默

1934年以后，研究所得到的巴特勒的慷慨资助，其核心依然在欧洲保持了好几年。这在几个方面表现出来，尽管纳粹掌权后他们显然不可能重返德国，但直到战争爆发，大陆的其他地方都是可望可及的，个人和专业方面的联系使研究所的大部分人都可以不时访问大陆。最频繁的旅行者是波洛克，他为研究所的事务往返几次，在迁到纽约之前，由他指导的日内瓦办事处一直开放，第一个管理性领导人是斯特海默，他回到荷兰后则由J·弗厄夫（Juliette Favez）负责。由J·罗姆妮（Jay Rumney）领导的伦敦办事处持续到1936年；而以H·K·比莱尔（Hans Klaus Brill）为首的巴黎办事处却一直支撑到战争爆发，其主要作用是负责纽约中心机构和继续出版杂志的F·阿尔肯出版社的联系。巴黎办事处的另一个作用是充当那些不愿意离开欧洲的成员们的暂住地，格罗斯曼1937年去纽约前就分别在巴黎和伦敦各呆了一年；政治—法律学家基希海默1934年后加入巴黎办事处，他为研究所所做的工作将在下章讨论；经济学家G·迈耶尔1934—1935年在巴黎办事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H·麦尔（Hans Mayer）1934

年后在巴黎呆了几年；阿多诺 30 年代中期虽大多住在英国，但也常去巴黎任职，从那里他可以去看望由他介绍给研究所的老朋友本雅明；本雅明则选择巴黎作为其流亡地和其著作的中心象喻，在那儿住了 6 年，他对这个城市的依恋最后看来是不幸的。 114

讨论研究所在个人与组织两方面和欧洲的联系时必须指出，研究所不愿改变其原来的读者观念，德语始终是《杂志》在战前的主要语言，直到 1941 年，霍克海默还斥责其他流亡者的快速美国化：“一旦他们的语言无法带来大量的读者，德国知识分子就很快改用一种外语，这说明语言之于他们更多是一种生存斗争而不只是一种真理表达”。^①由于研究所财政独立，霍克海默及其同事可以超越大多流亡人士面临的“生存竞争”。但霍克海默保持研究所自觉的德国意识也源于一种要保护德国人文传统的严肃考虑，这一联系也许会帮助纳粹以后德国文化的重建。所以研究所不为其哥伦比亚的新同事的恳求所动，后者希望他们的工作能整合到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之中。

当然，《杂志》也偶尔刊登美国学者的文章，包括 M·米德 (Margaret Mead)、比尔德和 H·拉斯韦尔 (Harold Lasswell) 等等，^②不过总体上，《杂志》仍然是研究所自己的观念及其在经验工作中发现的论坛。新面孔通常是研究所伸出援助之手的流亡者，至少有一例，即 F·托尼斯 (Ferdinand Tonnies)，这位杰出的学者是因晚年所处的困境而得到了所里的帮助的。^③然而总的看，研究所还是坚持了它在 1938 年的一份油印材料上表述的政策，根据此后的事情来看，其中的陈述是有矛盾的：“可以说研究所的预备人员中没有‘杰出的名字’，其理由在于研究所相信德国的著名学者能够轻而易举地在美国研究机构中找到位置。但更年轻的德国流亡者则不同，研究所主要关心的是他们”。^④尽管

研究所的资金并不像其不满意的申请者所想象的那么雄厚，然而它确实支持了近 200 个流亡者，名单没有公布，但像斯特尔伯格、麦尔、拉扎菲尔德、卡尔森 (Fritz Karson)、迈耶尔、A·R·L·古尔兰 (A·R·L·Gurland) 等均属此列。在 1934 年后的 10 年中，约有 20 万美金用在 116 名博士候选人和 14 名博士后研究生上^⑤。据波洛克说，^⑥能否得到赞助并不取决于申请者在方法和政治上的倾向，明确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坚定地反纳粹。甚至像 E·齐瑟尔 (Edgar Zilsel) 这样的实证主义者，也无需委屈自己接受研究所的思维方式就可以得到赞助。

115

这并不是说研究所不加区分地接受其成员并不同意的著作，比如 L·马尔库塞 1938 年应邀写一篇论述 19 世纪早期体育协会的浪漫发起人神父扬恩 (Jahn) 的文章，他后来回忆说，此文因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为研究所不满：

(霍克海默) 是一位黑格尔式的、好战的社会学家，相信客观精神，希望我关于扬恩的著作体现左派黑格尔的社会科学。另一方面，我早年属于其对立面：早期的浪漫主义者、斯蒂纳 (Stirner)、叔本华、基尔凯郭尔、尼采……我对波洛克、霍克海默很友好，对其《杂志》和其集体性著述《权威与家庭》很推崇，不能和他们一道工作甚感遗憾。^⑦

其他的流亡者，如 H·巴彻特 (Henry Pachter)^⑧对研究者选择其赞助对象的过程有更为痛苦的回忆，声言研究所常常不信守对一些申请者所许下的诺言。研究所断言否认这一点，当近年来有人指控研究所对一个拿薪水的受惠者本雅明施加明显影响时^⑨，研究所也是否认的，这些争论的确实性如何将在下面讨论。

没有实现其作用的反应，霍克海默早期对心理分析的兴趣，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可以帮助解释社会的心理“凝聚力”。1930年开始执掌研究所时，他就提出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对魏玛共和国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做经验性研究^⑭。

虽然霍克海默从未满意，但这却是把批判理论运用到具体的、经验的、可证实的问题上的第一次真正尝试。弗洛姆是此计划的指导者，后来，A·哈特克（Anna Hartock）、H·海茨格（Herta Herzog）、拉扎菲尔德、E·沙哈特（Ernst Schachtel）等都参与了这项计划。约有3000份问题表发给工人，询问他们对儿童教育、工业理性化、避免新战争的可能性、国家实际权力的中心等问题的意见。A·列文斯坦（Adolf Levenstein）1912年首次使用这种解释性问卷^⑮，弗洛姆在心理分析方面的训练使之更为精巧，其基础是他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对弗洛伊德所做的修正。^⑯

117

这项研究的关键性革新是问卷表本身运作的方式，回答被逐字记录下来然后加以分析，像精神病医生倾听病人的联想一样，他们把一些关键性词语或一再出现的表达方式解释为表面内容下的心理实在。附带指出，这一技术与研究所后来的合作计划《权威人格》所采用的方法是不同的，但弗洛姆本人在若干年后研究“墨西哥村庄的社会性格”时又回到这种方法，^⑰那是和M·麦克贝（Michel Maccoby）在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合作项目。

总之，访谈揭示了公开信仰和人格特性之间的巨大差异。在586名应试者中，约10%的显示了所谓“权威”性格，研究所此后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探索这种人格症候；另有15%的人表达了反权威的心理承诺，如果环境要求的话，他们很可能滋长出左派革命情绪。然而，绝大部分人都是摇摆不定的，研究所得出结

论：德国工人阶级对右翼夺权的抵制之轻微远与其急进的意识形态不相配。

虽然这一结论极富预见——事实上，德国工人阶级在接受纳粹时没有任何真正抵抗——但这一研究从未由研究所实际出版，迟至 1939 年，才考虑以《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工人》为名出版^⑧。弗洛姆与研究所的分离可能是出版耽搁的主要原因。波洛克后来说，此书未出版是由于飞离德国时许多问卷丢失了^⑨；但弗洛姆否认这一点，认为自己和霍克海默对此一计划的价值有不同看法，事实是这一争吵也加剧了他们的分裂。^⑩当然，此一计划的一些成果后来被吸收到权威主义的研究中，如《逃避自由》。^⑪问卷在修正后又被纳入研究所的下一个研究《权威与家庭研究》之中。

在讨论这一巨大的工作之前，应该首先交代一下霍克海默任所长的第一个 5 年内研究所在权威问题上的一些理论前提。首先，批判理论以其总体的、综合的视野避免仅仅成为一种政治权威理论，那样做意味着把政治实体化为与社会总体不同的东西。霍克海默说：“权威的一般规定必然是极其空洞的，正如试图以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来包括全部历史的概念性定义一样，……作为社会理论基础的一般概念，只能在它们与理论中其他一般的、具体的概念的联中所具有的具体意义来理解，即作为一种特殊理论结构的诸要素来理解”。^⑫ 118

由于其马克思主义根源，批判理论倾向于把政治更多地视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副现象。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已开始质疑机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派生性观念，但同样行动在政治学方面做得慢一些，以至于在像纽曼和基希海默尔这样的政治家进入研究所之后，也没有推动建立一种独立的政治学理论。只有在他们离开研究所之后，才敏感到 20 世纪“政治的首要性”^⑬。此时，他们仍

和研究所的其他成员一样，低估了政治的重要性，这也是19世纪所有思想家从马克思到古典经济学家的烙印^②。30年代后期，当波洛克提出“国家资本主义”观念，强调政府的控制作用时，研究所才开始研究政治经济中的政治因素。不过在总体上，如同马尔库塞后来所说的：“如果说有一件事对这些论文（《否定》）的作者和其朋友们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把法西斯国家理解为法西斯社会，集权暴力和集权理性来自现存社会的结构，它存在于克服其自由的过去并吸收其历史的否定的行为中。”^③由于研究所视“社会”为基本事实^④，便无需再发展一种关于政治权威和义务的独立理论。在实际分析政治理论，比如马尔库塞分析C·施密特（Carl Schmitt）时^⑤，他们确实主要是揭示其意识形态性。具有反讽意义的是，研究所承认政治主导这一新观念的迟缓性，恰恰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其时苏维埃正统自身也转向这一方向，强调政治意志主义甚于客观条件，应对此一理论变化负责的斯大林却在仅仅认可苏维埃实践的现实性。^⑥

119

然而，批判理论自身也有一套明确的政治权威理论，其最终基础在其哲学前提之中。第二章已说过，黑格尔关于主体与客体、特殊与普遍、本质与现象的同一论，在批判理论的起源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研究所思想的指导原则是理性，其实质是诸种对立的综合，既是社会的也是政治的对抗的调和。在马尔库塞那里，同一论的作用要超过霍克海默，而阿多诺则处在与马尔库塞对立的另一端，但也在以诸矛盾的乌托邦调和为基础的黑格尔框架内。用政治术语讲，这是一种“肯定性的自由”的古典理论，它把对政治异化的限制与普遍有效的理性法则结合起来。霍克海默在1942年说：“民主国家应当像没有奴隶的古希腊城邦”。^⑦因此，可供选择的另一观念，即最容易与基督教和自由主义理论认

同的“否定性自由”，对研究所而言则是一个令人讨恶的东西了。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认为，^②自由意味着“自由到”而非“从……自由”；马尔库塞亦说：“我所谓自由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个体存在的真正自由（不是自由主义的意义）只有在一种特殊的城邦结构、一种合理的社会组织中才有可能”。^③

所以，有一种类型的政治权威可以称为合法的：理性的权威。顺便说一下。就弗洛姆赞同此一观念而言，J·施夏尔（John Schaar）以《逃避权威》批评他是不当的。在一种理想的政治体系中，个人应服从政府，因为它确实代表了他的利益，被统治与统治之间的分别实际上趋于消失，由此实现马克思预言的作为强迫人的外在机制的国家消亡。包括卢梭在内的一些人论证的完美的民主或平等，只有在人跟随自己的理性时才能实现。在其较为乌托邦的方面，霍克海默甚至对所有的政治权力都加以质疑，他在战时写道：人对权力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假如得到支持的条件消失，控制的权力便大于异化劳动。”^④

但在内部，他和其他成员都小心翼翼地反对政治权威未成熟的消解，他们不止一次批评无政府主义的不耐烦，^⑤认为在真正的社会转变发生之前，理性权威的仍然必要，这与老师指导学生练习一致。不过理性权威在自由主义时代比在当代更有可能性，^⑥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当代，自由企业家和独立政治主体都受到清除的威胁，这样自吹自擂的西方民主自由中的多元主义便堕落为一种意识形态，“真正的多元主义是属于未来社会的概念”，^⑦而统治现代人的政治权威越来越是非理性的。

应当注意，在坚持这一论点时，研究所与韦伯完全不同。韦伯关于权威理性化的思想在同一时期逐步支配了美国社会科学家，在《经济与社会》中，^⑧他提出了著名的3种统治类型（亦

称合法权威)：克瑞斯玛的，传统的，法理的，基本上，他把法理型权威的生长视为西方文明的世俗化潮流。这方面，研究所与之不同。简言之，韦伯认为法理型权威服从一种抽象的、统一的统治系统，此一系统通过协议或强迫面确立并由官僚人员得到执行。义务是对法律而非对人，官僚制是由那些经过合法程序以其管理能力基础而被正式选择的人组成，可计算性、效率、非个性是这种权威的基本特征。

法兰克福学派不否认官僚理性与法律形式主义趋势（尽管在法西斯主义兴起时期，他们都觉察到后者的脆弱性，而韦伯却不能），但认为不应把理性还原为形式的、工具的方面，韦伯受过新康德主义的熏陶，而他们则更多地受到黑格尔主义影响，坚持包括目的和手段的实质的理性主义。尽管韦伯也认识到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区别，^⑤但没有像研究所那样认识到社会主义将解决这些冲突，反面认为社会主义甚至可能拧紧理性化的“铁笼子”；而且，由于发现克瑞斯玛常常侵入甚至是最合理的权威系统中，韦伯显示了他对理性手段与非理性目的结合而出现的危险的敏感，这正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征。

121

法兰克福学派可以赞同后一种观察面拒绝前一种预测。他们认为韦伯的失败之处在于把目的和手段的区分实体化了，这一虚假的鸿沟在他对“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可能性的信念中得到了进一步反映。此外，研究所反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是社会合理化最高形式的主张，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没有社会化的生产手段的非计划经济一定是非理性的，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威不可能在统一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这一实质意义上是合理的。^⑥

其实，他们相信的是资本主义在发达的、垄断的阶段减少了

政治权威的合理性，韦伯所描述的形式的、合法的理性更紧密地与资产阶级社会自由主义时期相应，它是法制国家的特征。不过，正如资本主义导向垄断一样，自由政治和合法制度也逐步由极权人物取代，剩下的不过是新的非理性权威的虚伪外表，理性自身不断受到威胁。战时霍克海默说：“法西斯主义的秩序是这样一种理性：理性自身呈现为非理性”。^③

然而，从自由主义向极权主义的转变，比自由主义理论家承认的要更具有有机性。正如马尔库塞发表在《杂志》上的第一篇文章中说的：“从自由主义到总体一权威国家的转变发生在同一个社会秩序的框架中，注意到这种经济基础的统一，我们可以说是自由主义自己产生出总体一权威主义的国家，后者乃是前者在其高级发展阶段本己的完成。”^④总之，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密切，霍克海默 1939 年有一段广为人知的话：“一个不愿意批评资本主义的人，就应当对法西斯主义保持沉默。”^⑤不过下面将会看到，在讨论纽曼的《巨兽》时，研究所从未完全赞同这一关系的真实意义。

马尔库塞的《极权主义国家观中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一文，值得详细讨论，因为这里的大多数观点后来都由研究所的其他著作发展了；在极权主义既是自由主义发展倾向的反动又是其继续方面，此文也是一篇辩证思维的范例。马尔库塞认为集权主义世界观起源于对生活的合理化组织和 19 世纪枯燥的知性化思想的反动，资产阶级存在的“贫血症”受到一种英雄式的生机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本来，19 世纪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因其枯燥、脆弱的特性而导致生命哲学对它的纠正，但到了 20 世纪，狄尔泰和尼采有根据的洞察已退化为愚蠢的非理性主义，正如霍克海默经常指出的，^⑥其功能是为社会现状辩

护。类似地，马尔库塞认为传统自由强调内在性，其“理性的私有化”，^②把自由还原为“否定的方面”等等，都引发了一场普遍的反动，其中总体——在德国即是种族——优越于个体。于是，无阶级社会的虚伪外表，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都在资本家持续的阶级统治的基础上建立。

对自由主义的反动和对其前提的继续，都是对自然的极权主义的神圣化。马尔库塞指出自由主义经济总是建立在“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在自由主义体系的中心，社会通过它在其和谐化的功能中向‘自然’还原而被解释为：对一种矛盾的社会秩序的逃避性辩护”。^③但极权主义的新东西在于它把自然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结合起来，自然在种族思想中被提升为一种神话形态，种族被转化为自然现实的中心。自然以其全部残忍和不可理解性而转化为“历史的伟大对手”，^④使当代秩序的非理性绝对化，其结果之一是自我牺牲的伦理和英雄现实主义的禁欲式的否定性。

正像施密特的著作中表明的那样，在试图为这种邪恶的条件辩护时，极权主义理论只有一个回答：“存在着一种事态，其存在和呈现本身无须任何证明，它乃是一种‘存在的’‘本体论’状态，它只通过存在本身证明其正当性”。^⑤对政治存在主义的锐利分析，表明自1932年参加研究所后，马尔库塞的思想已有很大发展，他现在认为《存在与时间》之前的海德格尔在重获被笛卡尔到胡塞尔的抽象理性主义所否定的具体的主体中达到了“哲学的最高阶段”，^⑥但此后他用抽象人类学取代具体历史，以便为英雄现实主义的自自然主义意识形态辩护。马尔库塞援引海德格尔1933年声名狼藉的典礼致辞“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来显示其政治存在主义是多么深地卷入了把大地和血统作为历史真正力量来炫耀的非理性的自然主义。

施密特提供了一个例证，存在主义自觉的政治变种越多，在马尔库塞看来就越不吉祥。施密特及其同伙通过把政治约简为不受伦理规范制约的存在关系，而将至上权威的观念发挥到了极端。“至上权威”，施密特写道：“就是决定国家紧急状态的人”，^④统治权根源于决策权。曾一度被生命哲学拯救的个体，现在受制于国家，“随着总体一权威主义国家的实现，存在主义抛弃了他自身——或准确说，它遭到了抛弃。”^⑤开头作为哲学上的抗议的东西以政治上向社会统治力量的投降而告终。

所有这些中，有一个小小的安慰：“在有意识地把存在概念政治化和对自由主义、唯心主义的人的概念非个人化、非内在化时，极权主义国家观代表着进步——这一进步超越极权国的基础，迫使这一理论超越它所主张的社会秩序”。^⑥不过马尔库塞依然强调，种族国家中各种利益的意识形态的调和不应和马克思承诺的真正的调和混淆，这一点必须被认识到。正像霍克海默在战时说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化是对立的”，^⑦它也背离了黑格尔关于国家是诸种矛盾调和的观念。马尔库塞认为，纳粹和黑格尔在本质上是不可相容的——这一点在后来的《理性与革命》中得到了详细的讨论——尽管许多人对此有相反的看法。批判的唯心主义和存在主义在现实中是对立的两极。

马尔库塞著作中最清晰的含义也是研究所其他成员共有的。^⑧那就是自由主义连同支撑它的经济基础已无可避免地死亡，未来是权力的极权式权威主义或左的解放的集体主义。第三个可能，就是后来马尔库塞称之为“单向度”的社会，它将从30年代的极化中出现，对此，研究所在战前只是模糊地觉察到。研究所也从未想到自由社会的一些要素在后市场经济世界保留的可能性。他们强调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连续性，这肯定被那些认

为后者是右翼反动运动而非中产阶级极端主义的人所否认，^③但研究所却因此倾向于缩小两者之间的真正分歧。以为法西斯意识形态的非理怀主义不过是对社会现状的肯定，就遗落了社会现状的另一些因素——形式合理的保护机制，公民自由等等——它们正受到抛弃理性的挑战。法西斯主义和自由主义可能是在“一种社会秩序的框架内”，但这个社会框架之大足以包含许多不同的政治法律系统。

带着这些有关政治权威本质的理论前提，现在可以讨论《权威与家庭研究》。虽然如霍克海默在其引论中说明的，^④权威和家庭问题并非社会理论的中心，但由于家庭在调节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重要作用而依然值得认真研究。其实，研究所的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势必导致对家庭的考察，黑格尔认为家庭是社会能够最终建立的伦理制度的中心。^⑤当然，马克思根据家庭在他所考察的社会中的具体形态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共产党宣言》认为资产阶级家庭是非人道的、异化的纪念碑，与黑格尔不同，他感到助长自我主义的、交换价值支配性动机的市民社会已侵入到家庭，并歪曲了其“伦理”的方面，资产阶级家庭的现实即是其商品本性；而无产阶级家庭的现实则是在外部剥削中的分崩离析。我们将会看到，尽管研究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日益悲观，但家庭问题上的立场却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两种观点的调和。它也结合了诸如拉普莱（Le Play）、马奈（Maine）、巴赫芬等 19 世纪家庭学者的发生学方面的东西，这些学者们的 20 世纪后继者也关心家庭的社会作用。^⑥

《权威与家庭研究》是研究所成员 5 年的工作成果，其中不包括格罗斯曼和阿多诺（他是在此计划完成后才进入研究所的）。

主义实体化的理由之间的形式的对立才能最后被克服，“无政府主义和权威国家主义属于同一文化时代”。^⑤

以此为背景，霍克海默转而论述家庭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家庭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时代和当代社会的不同。在前一时期，父亲因经济提供者的客观作用而享有权威，加上体力上胜过其子女等其他权威之源，就此而言他是家庭中自然而合理的首领。但随着其客观的社会权力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瓦解，父系权威也逐步成为意识形态的、非理性的，工人阶级家庭由于其朝不保夕的经济条件而对此一重要转变特别敏感。伴随着父亲权威衰落的是从其“形而上”的氛围转向外在于家庭的社会机制，此一机制可以免除早期资产阶级父亲不得不承受的批评，从此，不幸被指责为个人的无能或自然原因而不是社会原因，结果只能将无能当作是不可避免的而加以接受，主动的自我主张不复存在了。^⑥

霍克海默的这些分析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家庭的批判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尽管这已由对人际关系更发达的心理学理解而丰富了。但是，霍克海默并不完全反对黑格尔关于家庭是反对社会非人化的伦理保护地的观念，他对黑格尔的批评是他把家庭和市民社会对立所做的没有远见的实体化。黑格尔曾把安提戈涅与其哥哥的关系视为家庭和社会必然冲突的象征，而霍克海默却认为它是未来理性社会的预示。^⑦然而，他确实同意马克思的观察，即资产阶级社会中家庭生活与夫妇之爱已受到严重腐蚀，马克思在此表现出的否定的、批判的冲动是黑格尔没有掌握的。20世纪这种趋向更为明显，比如与巴赫芬意义上的母权原则明显对立，现代父权社会已否定了妇女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这在斯特林堡（Strindberg）和易卜生（Ibsen）的戏剧中得到充分显现。所以霍

克海默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中妇女解放实际远不像人们一再认定的那么大，妇女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适应这一体制的，由于她们在总体上依赖丈夫而成为保守力量。事实上，儿童就是在母亲的膝盖上学会服从社会秩序的，尽管在传统的母权伦理如温暖、接受、爱之中潜在地含有变革社会体制的含义。

总之，霍克海默认识到家庭和社会既加强又矛盾的辩证关系¹²⁷，而否定因素则在衰落。文章是以悲观的语调结束的：“权威性格的教育……并非短暂的一瞬，而是相对持续的条件……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的辩证总体现在已被证明是相互加强的统一体”。^⑥此文和《研究》的基本含义是社会化过程中家庭作用的转化。因为“否定”、家庭反抗社会的作用的衰落，个人通过社会的其他机制而直接被社会化了。在考察研究所讨论大众文化时将会发现，这些供选择的社会化代理人是创造“权威人格”的一种工具，它比前现代社会中的任何东西都更微妙地反对变革。家庭危机的主题一再出现在研究所成员此后的著作中，包括受他们影响的心理分析学家如 A·麦夏尔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等人。^⑦

理论部分的第二篇文章是弗格姆的“社会心理学部分”，它在研究所后来的著作中有广泛的响应。如第二章所说，弗洛姆在30年代中期对正统精神分析的态度是矛盾的，所以这篇文章也表现出对弗洛伊德一定程度的游离。它一开始承认弗洛伊德关于大众心理和超我的理论是对权威进行一般心理分析的最佳起点，但很快就指出心理分析理论的不足。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有时把现实原则分配给理性自我，有时又分配给超成，而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它只能属于前者。虽然同化是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⑧但弗洛伊德把它视为超我的主要根源则过于简单了；尤其错误的

的感情，弗洛姆认为它们与异性恋的生殖欲的弱化、向前生殖期尤其是肛门性欲期的倒退有关。同性恋的对权力更多是精神而非肉体的认同也是施虐—受虐式权威主义的另一个特征。这后一方面在父权文化中相当显著，因为在这里男人自信比女人优越，并因此转化为受虐的爱的对象。

弗洛姆结束时讨论了反权威类型，他区分了造反与革命，前者指简单变换一个非理性权威，在基本性格上缺乏有意义的真正变革了，后者则反映了一种真正的变革。弗洛姆承认革命是较少出现的，它意味着自我强大得足以抵抗非理性的施虐—受虐权威的诱惑，在一个理性的、民主的社会中，领导人是以能力、经验、无私心而不是以其形而上的、天赋的优越性为其权威的基础。所以，并非所有的反权威冲动都是正当的，“造反”是一种假解放，个人其实是在爱一种新的非理性权威，即使看起来最激烈地与各种权威对立时也是如此。愤怒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僵硬的权威主义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水火不容，这就是表面上解放的无政府主义者常常会突然接受权威的原因。 129

弗洛姆对《研究》中理论部分的贡献有一种乐观主义的音调，他证明强有力的个人、成熟的、异性爱欲的、理性民主调和的社会的可能性，此后他一直坚持此一立场，加之他降低性欲的重要性，由此与研究所其他人产生了距离。我们将会看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开始向他竭力支持的自然统治、理性自我等提出质疑；马尔库塞也反对异性生殖欲作为能与美好社会相处的健全心理的标准。不过在20年代，所有成员都不加限制地接受弗洛姆心理乌托邦的一般轮廓。

马尔库塞50年代成为弗洛姆最有力的反对者，他并非弗洛伊德的入室弟子，给《研究》理论部分的文章是一篇非常明晰的

权威理论思想史，此文与他提交的有关文章目录表明，⁶⁷他非但无意于心理学，而且也从未卷入以心理学范畴为基础的研究所的经验性研究。在研究所的所有成员中，马尔库塞是最少经验倾向的人，他从未停止过对经验主义的批评。⁶⁸

在“思想史部分”，马尔库塞发展了他此前发表在《研究》上的其他论文中的许多观点，一开始就反复强调资产阶级思想家不愿承认的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指出，资产阶级思想家设定的，由康德最出色地完成的否定的自由的观念，意味着内在自我与外部自我的分离，内部的自律是以付出外部的他律的代价获得的，资产阶级理论中的反权威主义掩盖了对现行社会秩序的形而上学的认可，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是非理性的。⁶⁹ 130

接着便勾勒了思想史的简图。马尔库塞回顾了宗教改革时期和康德思想中否定的自由的古典模式，但他遗漏了霍布斯、洛克、休谟和卢梭等等，这些人的思想很少出现在研究所讨论“资产阶级”理论的著作中。⁷⁰接下来分析了左右两方面对资产阶级自由观念的挑战，包括黑格尔、博克（Burke）、柏纳德（Bonald）、德·马斯特（De Maistre）、斯托尔和马克思等。在论文结束时马尔库塞指出了自由主义的自由与权威的观念向其极权主义的继承者转化，特别集中评论了索列尔和帕累托（Pareto）的精英主义理论，认为它们预示了法西斯主义的“领袖原则”和列宁的“党”的观念。马尔库塞认为，极权主义思想的核心是非理性的形式主义，权威的来源不再以普适律及社会优先为基础，而是以自然的或种族的权力为基础，极权主义理论的实质完全没有肯定性内容，它的所有概念都是反概念的，比如反自由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等等。资产阶级坚持的内在的、否定的自由主义已

是这一理论的产物。弗洛姆承认，把答案材料和理论模型联系起来，需要一种解释技术，但对材料的深思熟虑并不必然导致对材料的歪曲，其他的一些有利证据，甚至沙哈特用以处理混合结果的形态学，也可能有效地利用。

一些特殊的答案和较一般的性格类型之间的关联一旦被确定，它们就可能与诸如社会阶级、宗教信仰等其他数据相关。但关键是这些经验操作背后应有一个总的理论，弗洛姆认为最有成果的是批判理论。其实，正如沙哈特在《杂志》发表的一篇长文中说的，^⑧美国式的人格测试严格地讲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反对理论基础。除了这些一般性结论外，还有许多具体结论。不过很明显，研究所的经验性努力还处于相对原始阶段，至少和其后来的工作比较而言，那时内容分析和有计划的测试已进入一个更好阶段。

《权威与家庭研究》的第3部分由洛文塔尔编辑，包括16篇文章，大多是长篇研究报告，^⑨由于《研究》没有足够的篇幅，而这些报告的总和达900页，所以大多数只能以提要形式出现。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这里也不能分开细述。其中几篇专门论述经济对家庭的影响，这是理论部分所忽视的；另外是几篇有关不同国家中与家庭有关的法律问题的。与整个《研究》一样，这一部分最大的欠缺是没有反犹主义及其与权威主义关系的文章，这或许反映了前面已经说的研究所轻视犹太问题的一般态度，在被问及此事时，波洛克回答说：“人们不要求宣传那些”，^⑩可见研究所不愿意对其绝大多数成员的犹太出身给予关注。但无论如何，这种否认并不长久，1939年霍克海默写了《犹太人和欧洲》，^⑪这是他最失望的一篇文章，也是研究所着手研究反犹主义计划的开始。尽管最初的设想没有完成，但它成为40年代《偏

见研究》的先驱，此一计划由研究所参予指导，其中有几篇关于反犹太主义的文章，20年代早期研究所创始人用以说服H·韦尔赞助的目的20年后才得以实现，这已是研究所在《权威和家庭》中第一次意图研究权威主义之后很久了。然而，如果没有第一次合作研究的经验，后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不可能的。

《权威与家庭研究》是研究所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连接点，但其对外影响是复杂的。主要是因为它用德语发表，美国学术界迟迟才认可其结论和方法，从而这一缓慢过程并不能归结为“社会研究新学校”的煽动，在H·斯皮尔（Hans Speier）控制该校期间，它对研究所一直怀有敌意，^⑩不仅研究所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激起了它的愤怒，研究所对弗洛伊德的热情也是如此。格式塔心理学的创始人M·韦太默（Max Wertheimer）从1934年到1943年去世，一直是新学校心理学的代表，他对心理分析的蔑视得到斯皮尔的回应。如前所说，整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努力在30年代一直受到各方面嘲讽，而不只是新学校。那么，《研究》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研究所对权威问题的兴趣并未因《权威与家庭的研究》的完成而衰落，随着纳粹威胁的增长，研究所理解它的热情也在增加，结果有足够丰富的材料供他们讨论，这是下一章的内容。在集中讨论德国情况之前，应先介绍一下研究所对权威主义探索的全部领域，确实，研究所解释纳粹主义的关键因素之一，是他们相信它并非是孤立于西方文明发展整体之外的现象。 134

研究所雄心勃勃地试图在全部上下关系中确定西方文明的危机。在这一方面，它可以依靠非欧洲问题的专家来拓宽其工作范围，不过这些学者使用的方法与《研究》不尽一致，维特夫的著

作尤为如此。前面已经介绍过他和研究所的距离，30年代，他的态度虽与霍克海默有别，但其关于中国的研究仍然定期出现在《杂志》上。^⑧1935年后，他在远东进行了近3年的研究，其著作始终以正统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较少研究所内部的立场。他的研究是由研究所发起的，但也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支持。40年代，他在意识形态和财政上都日益独立于研究所，不过在从中国回来后的几年中，他的联系被看作是和美国学术界的沟通而受到称赞，研究所的这段岁月的简短历史纪录中经常提到他的著作，他在研究所的哥伦比亚补习部讲座中也有杰出表现。1940年他和E·哥德弗兰克(Esther Goldfrank)第三次婚姻以后，在研究所的作用日益减少，直到1947年最后脱离关系。

研究所关于权威的非欧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其创始人F·韦尔，尽管他从未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上和霍克海默等人闹翻，但很少受到批判理论的影响。1944年《阿根廷之谜》在纽约出版，^⑨这是对他出生国的分析，此书不是研究所赞助的。正像维特夫更为艰涩的中国史研究一样，此书在方法上也未受到《研究》的影响。

受到研究所方法论影响的第一个美国研究是科姆诺夫斯基的《失业者及其家庭》，^⑩1940年出版，这是作者1935—1936年在纽华克的研究成果，是与纽华克大学拉扎菲尔德的研究中心合作完成的。^⑪拉扎菲尔德在发起这项研究时得到研究所的支持，他写了一篇导论，介绍其早先在《杂志》中设想的类型分类，^⑫此一研究用定性而非定量的技术探索压抑对家庭生活的影响。 135

这个计划的主要部分是失业对59个家庭的影响，它们是由紧急救济管理中心提供的，家庭的各方面成员都被设计为访谈的主体，以便提示家庭关系的改变。总的看，这一研究更坚定了

《研究》中家庭权威衰落的观点，也显示了大众社会中日益增长的个人原子化的倾向。正如科姆诺夫斯基小姐说的：“失业者和妻子没有家庭之外的社会生活，家庭在社会中的孤立程度令人吃惊”。^⑤不过她对这种变化的意义的解释，与40年代研究所相比较少阴沉之感，当她写了这一句时，其观点超过霍克海默和研究所的其他中心成员：“家庭中父系权威的部分瓦解，作为大萧条的结果可能导致新一代更易于接受社会变革”。^⑥研究所逗留美国的时间越长，就越相信对立才是它们之间的真实关系。从长远的观点看，无论研究所和科姆诺夫斯基谁是谁非，但家庭关系的危机——晚近以“代沟”而闻名——却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和大众关心的对象，这和其他许多场合一样，法兰克福学派预感到后来引起广泛兴趣的问题。

第7章将讨论研究所40年代的经验性工作，它支持了研究所增长着的悲观主义。在此之前，应简述一下研究所中较少经验取向的权威研究，特别有启发的是阿多诺、本雅明、洛文塔尔对文化现象的分析，这些文章发表于30年代的《杂志》上。3人之中洛文塔尔的方法与《研究》最有关系，这部分是由于他参加了这项工作的准备；另外两人则不然，尽管本雅明和阿多诺的文章也有对《研究》的反应——如阿多诺对瓦格纳的讨论^⑦——这些著作中的美学理论后面将专门论述。洛文塔尔著作源于一种更直接的文学社会学，这使他能洞察到《研究》所探索的权威模式的痕迹。

1928年到1931年，洛文塔尔专心研究19世纪叙事文学，全称为“叙事艺术与社会：19世纪德国文学中的社会问题”^⑧。L·许金（Levin Schücking）的趣味社会学、G·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 的文学批评, 更重要的还有卢卡契的《小说理论》是洛文塔尔选择来作为竞争对手的几个典范。论述的对象包括歌德、浪漫派、青年德意志派 (特别是古兹柯夫 [Gutzkow])、E·默里克 (Eduard Morike)、G·弗莱塔格 (Gustav Freytag)、F·斯皮尔哈根 (Friedrich Spielhagen)、C·F·迈耶尔 (Conrad Ferdinand Meyer) 和 G·凯勒 (Gottfried Keller), 洛文塔尔紧扣原作, 交叉使用心理学分析和社会影响来论述这些作者, 虽然避免了还原论的研究, 他还是试图确定文学在历史关系中的位置。比如青年德意志派就被解释为资产阶级意识的第一个代表, 他们好像在为自由竞争的“关税同盟”在思想上的对等物而斗争一样。^⑩与其先驱浪漫派不同, 在他们的著作中, 人类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世界之中, 在 19 世纪中叶的现实主义小说中, 这一倾向趋于强化并在弗莱塔格的《借与贷》中达到极点, 这本书被称为“19 世纪最不理想化、最不浪漫的书。”^⑪

洛文塔尔的书没有完成, 可能是由于他承担了《杂志》编辑的任务, 未能使本书直接出版, 只是从中选出几篇作为选集。^⑫开篇是关于方法论的讨论, 发表在《杂志》最初的一期上,^⑬在此他勾划了文学社会学的任务。

洛文塔尔在这样做时, 置身在一条狭窄的路上, 一边是像梅林这样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另一边是由新批评代表的理想主义。他认为, 尽管批评不应把艺术还原为一种简单僵化的社会趋势, 但可以合法把它视为社会的间接反映, 而把艺术作品看作孤立的、超社会的现象仅仅是诗学的理解而非批判的分析。另一方面, 尽管艺术家受到其社会经济环境中物质境况的限制, 历史的分析却必须由狄尔泰对艺术家目的的理解来丰富。同时, 有效的文学批评还须对艺术心理学开放, 它是社会与艺术成品之间的中

历史哲学基础。

如果说历史在迈耶尔的小说中被神化了，那么在洛文塔尔下一次探讨的文化现象中，它甚至被颠倒了，这就是德国在一次大战前对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接受。^⑧洛文塔尔考察了德国有关陀氏的 800 篇评论中的一部分，他实际上是读者反应批评的真正开拓者。^⑨后来，洛文塔尔承认其方法是粗糙的：

138

如果那时我就知道反应研究的完善方法和投射心理学，我就可能不从事这一研究了，因为它企图以这种方法的原始形式完成同样的目的。它假定作家的作品是一种投射机制，通过大量评论展示各种层次的大众中隐蔽着的特征和倾向模式。换言之，它通过印刷材料的中介来研究读者的间接反应，这种反应被推断为一种群体反应的典型代表。^⑩

无论此一方法多么原始，其结果也加强了研究所对权威主义的分析。迈耶尔的读者主要是中产阶级中适度富裕的人，而陀氏的最大多数读者则是没有成功的小资产阶级，其作品迎合了德国人群中混乱和恐惧的一部分。洛文塔尔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向他们提供了安慰，他对个人生活的神化也有助于把痛苦当作使人崇高和不可避免的东西来接受，种族主义理论家 A·M·V·D·布鲁克（Arthur Moeller Von Den Bruck）就特别注意其作品中鼓吹的精神调和，以服务于国家主义的超越阶级冲突和意识形态的普遍之爱。陀氏本人因其未能形成一种可以实现尘世幸福的信仰而帮助了这种理解，这也反映在他对政治的、社会的激进主义的敌意中，他以爱和怜悯来代替政治行动，与种族主义歪曲了的母权理论是相似的，它一直导向被动和依赖。

但陀氏与迈耶尔不同，他确实敏感地呈现了内在心理现实，吊诡的是，这恰恰是他对德国历史上一段不明确的时期——资产阶级势力上升和没落相交织——产生魅力的主要原因。如同其作品在战前德国的解释一样，“内在性”代替社会互动而成为文化生活的核心，陀氏娴熟地描绘了骚动和犯罪感的魅力，表达了对异化的真正兴趣，然而它也是一种因不能认识其社会根源而在意识形态上已被扭曲了的兴趣。^⑩总的看，陀氏小说在德国部分居民中的普遍流行，预示着对严峻现实的逃避和非理性权威日趋接受，所以战后陀氏和基尔凯郭尔一起被视为社会顺从的先知是不奇怪的。

139

但是，洛文塔尔承认，晚期资产阶级文学除去意识形态的涵义外，也有一些作家能够穿透资产阶级文化所承诺的虚伪调和的表面，揭示了没有吸引力的现实的深层，这样的作家是他在《杂志》下一期中的研究对象。^⑪他认为，易卜生既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又是晚期自由主义最有生气的批评者，尽管没有自觉写作“社会剧”，但他探索了自由主义在看起来似乎无懈可击的领域即私人生活和家庭中的衰落，他生动地描绘了在一个毁灭性的竞争阶段个人的自我实现根本不可能的形象，破除了个人幸福的自由神话。洛文塔尔说：“竞争已不仅仅是在众多的个人中为社会和经济上的成功而搏斗，它也是一种内在斗争，即个人必须强有力地约束自己的存在，约束他人格的某些方面以实现个人的野心。”^⑫

而且，通过叙述家庭的衰落，易卜生还揭示了社会通过角色的特殊化面穿透私人范围。洛文塔尔说：“丈夫、妻子、朋友、父母的地位，被看作是与个人本身以及家庭的其他成员的特权不相谐调的存在形式”。^⑬易卜生戏剧中的家庭证实了《权威与家庭

其实，在亨姆生关于自然的论述中，洛文塔尔已经发现了其权威主义的萌芽。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后来称之为人和自然的调和，但我们将会看到，这与亨姆生小说完全不同。与在卢梭作品中得到最有力表现的浪漫的自然观念不同，亨姆生没有批判的、进步的视界。在他的小说中，人不是与自然和解，而是屈服于它的威力和神秘，传统自由主义的统治自然的目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曾对之质疑，但此时洛文塔尔并不批评它）已被抛弃，代之以被动的屈从。洛文塔尔写道：“对亨姆生而言，自然意味着和平，但这种和平已失去其自主性和求知、控制的意志，而以屈服于各种专断权力为基础，它也是一种可以从历史灰暗的框架中逃出来的泛神论，自然逐步成为一种不可移易的、普遍的安慰”。^⑧康德式的人的自律的骄傲让位给对自然专横性的接受。在亨姆生的小说中，敏感和无情以一种典型的纳粹方式统一起来（比如，戈林 [Goering] 就是德国动物保护协会的头头），无时间性、自然的重复节奏取代了人的实践的可能性。研究所后来把这一现象称为“模仿”，“与自然节奏的规律相反，社会是盲无规则的”。^⑨洛文塔尔总结道，所有这些，都是弗洛姆在《权威与家庭研究》中描述过的施虐—受虐型的人格证据。

亨姆生的权威主义还进一步表现在他的英雄崇拜之中，表现在他对农民和传统的赞美中，也表现在他将妇女简约成繁殖和性功能这一做法中。所有这些征兆与亨姆生著作中的对都市生活的玷污及疯狂的反智主义一道，也都可以在德国种族主义文学中见到。^⑩早在1890年的《饥饿》中，亨姆生就已表露出把生命哲学庸俗化，这是霍克海默常常在《杂志》上提到的，从抗议开始的生命哲学，以为现存秩序辩护而结束。正如德国接受陀斯妥也夫斯基一样，对苦难的慰藉是亨姆生的主要意义，然而这种慰藉已

“转而反对被慰藉者”，人们“按其所是来接受生活，意味着存在一种统治和服从、命令与服务的关系”。^⑩亨姆生突出表现了欧洲自由主义已精疲力尽，开始向极权主义投降。文章的最后部分（后来没有收入文集《文学与人的形象》），洛文塔尔讨论了战后欧洲对亨姆生的接受，战前他曾受到社会主义评论家、甚至包括资产阶级一部分人的批评，现在则相反，他受到普遍欢迎。1918年之后，《新时代》和 A·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的纳粹圣经《20 世纪的神话》都对之赞美有加，表明对权威行为不断增长的麻痹。

已经说过，研究所 30 年代的工作主要是对法西斯主义威胁的揭露、分析和斗争，虽然本章把权威主义放在一个较为一般的研究系统中进行讨论，但研究所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它的成员直接经历过的德国方面。附带说一下，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杂志》和《研究》中被忽略了，虽然 P·特莱夫（Paolo Treves）偶然评论过从米兰来的意大利书籍，但意大利的流亡学者从未给研究所的刊物写过东西，这说明两个流亡集团之间缺少交流。很显然，研究所把纳粹视为西方文明崩溃时最重要的、也最恐怖的表现，为此投入了全部注意，它对纳粹的问题进行的更丰富、更多样的分析，下一章将专门讨论。 142

第五章 研究所对纳粹的分析

国家资本主义是当前的权威国家……是统治的新的喘息机会。

霍克海默

“国家资本主义”一词本身是自相矛盾的。

纽曼

“可以这么说，抨击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这一共同信念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大家都感到我们有一个使命，包括所有的秘书，所有参加研究所并在那里工作的人，这个使命确实使我们产生了忠诚和一体的感情”。^①霍克海默在纽约的秘书 A·迈尔（Alice Maier）是这样描述 30 年代末、40 年代初研究所压倒一切的关心的。然而，共同的目标并不必然意味着分析的完全一致，这是本章所要讨论的内容。由于欧洲不断有流亡者参加研究所的事务，他们带来了新的、有时是相互抵触的观点，在有些情况下，比如阿多诺 1938 年成为专职人员后，研究所原有的学术倾向得到加强，阿多诺对法西斯主义的探讨，立足于《权威与家庭研究》中形成的心理—社会的构想上，正如第 2 章讨论的那样，他在理论上和霍克海默很接近。可是，由于新成员参予研究所生

活，这种一致就不再存在了，新成员中3个最主要的是纽曼、基希海默、古尔兰。第4个是马辛，尽管1941年以后，他在研究所的事务的某些方面是很重要的，但在争论方面没有直接影响。这些人在纽约为研究所的纳粹研究作出了贡献，但也引发了对批判理论基本前提的微妙挑战。

3人之中，纽曼影响最大，这主要是因其《巨兽》一书对纳粹所作的经典研究，^②我们将看到，这本书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原有成员在许多方面并不一致。1936年，由于拉斯基的推荐，纽曼进入研究所。拉斯基是研究所伦敦办事处的发起人之一，也是纽曼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老师。不过，此前纽曼对研究所并非一无所知，1918年他在法兰克福见过洛文塔尔，当时他们都致力于学生社会主义者协会的创立。尽管拉斯基对他的帮助是公认的，但纽曼在其第一个流放地伦敦就证明他们的旨趣并不相投。纽曼后来写道：英国“社会太单一、太刻板，它提供的机会（尤其是在失业的条件下）太狭窄，其政治也太沉闷。所以我感到，一个外国人绝不可能真正成为一英国人”。^③而美国就截然不同，外国人在那里受到热情欢迎，于是纽曼选择美国，在大西洋彼岸度过自己的余生。

144

迁移之前，纽曼既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又是一个学者，他和霍克海默周围的研究所核心成员是同一代人。1900年，他出生于靠近波兰边境的卡托维茨镇一个同化的犹太之家，像马尔库塞一样，他的第一次政治介入是战争后期参加士兵委员会；魏玛时期，他逐步接受社会民主党温和的马克思主义，尽管他是其中的左派，并经常批评其领导人的政策。频繁的政治活动致使他1935年4月被捕入狱，同年5月，在被囚禁了1个月后，他越狱逃到伦敦。^④

纽曼的学术背景不同于研究所的大多数成员，他在布列斯劳、莱比锡、罗斯托克和法兰克福的学术训练主要是法学而非哲学。在法兰克福，他师从杰出的法理学家 H·希茨海默，后者的其它学生包括未来的流亡者如 H·摩根索 (Hans Morgenthau)、E·弗兰克尔 (Ernst Fraenkel)。在魏玛共和国崩溃的前 5 年，纽曼住在柏林，是社会民主党和它的一个同盟团体的法律顾问，并为学术和政治性的杂志撰稿，^⑤同时他也在著名的德国政治学院任教，这所学院 1933 年以后曾把一些学者如 A·沃尔弗斯 (Arnold Wolfers)、H·西蒙 (Hans Simon)、E·约克 (Ernst Jaekh)、S·纽曼 (Sigmund Neumann, 与 F·纽曼无关) 等输送给美国各大学。纽曼在柏林还继续其法律事务，并有机会到联邦最高劳工法庭去。如所预料，他在德国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在英国是无用的，因此在拉斯基的指导下，他把自己的研究限制在政治科学范围内。1936 年，他参加研究所，同年被伦敦经济学校授予博士学位。

145

从法学背景转向政治理论，纽曼与霍克海默等研究所核心成员在观点上是不一致的，他们总感到，纽曼的马克思主义较之批判理论，辩证较少而机械较多；与霍克海默、弗洛姆、阿多诺相比，他也更少关心社会现实的心理方面，这也拉大了他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总之，尽管纽曼有一个分析的、探索的脑袋，但在许多方面更接近格罗斯曼和维特夫，虽然他并不喜欢他们的斯大林主义。

纽曼 1937 年为《杂志》写的最初文章就反映了他的法律兴趣，^⑥其中他追述了法律理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功能变化，特别强调了它在 20 世纪的发展。在诸多事情中，他集中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义观念，认为它既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的掩护，又帮助了靠法律的可计算性运行的自由企业制度。纽曼提出，所谓法律统治，包含着一种蒙骗，因为它拒绝承认法律

背后总是人，或更精确地说是一些社会团体在起作用。^⑦

然而，他同时也指出了自由理论的肯定方面以及法律平等最低限度的保证，“诚然法律面前的平等是‘形式的’，也就是否定的（可以回忆一下前面提到肯定性的自由与否定性自由的区别）。但黑格尔清楚地看出自由的纯形式的否定本质，他警告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抛弃它。”^⑧在如此推理时，纽曼有些类似于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关于形式逻辑的观点：虽然自身不足，但形式主义提供了一种有效保护，而实质的合理性无论是法律的还是逻辑的，都忽视其自身的危险。总之，形式主义是辩证总体的真正要素，不应简单否认。

在魏玛时期及其以后，纽曼转面分析法律形式主义的功能，特别强调法律的一般观念。他指出，法律的一般性在世纪之交一度不为人重视，近来已得到法律理论的支持而再度复活，只有在现在，它的作用才不同于19世纪自由主义发展的鼎盛期。变化的根源在于经济：“如果立法者不是平等地和强有力的竞争者，而是和颠倒自由市场原则的垄断企业打交道的话，国家应该只由普通法律统治的要求，在经济领域就是荒谬的了”。^⑨换言之，法律概念已不再起到以前那种同样均等的作用。事实上，魏玛的权威主义继承者已觉察到法律正逐渐过时，并用专横、非平均主义的决定论代替。的确，法西斯法律理论的制度或合作社取代合法个体，声称引进了“制度主义”。但纽曼认为，对决定论来说，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面形式，因为这个制度是从“权力关系中分裂出来的，没有它将是不可思议的”。^⑩

纽曼下了这样的结论：法西斯国家的法律是不合理的，因为它缺少自由的概念；实证主义法律没有以自然法的合理基础为本。^⑪他进而暗示，非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势也将出现同样

力”。^⑭自然法的理论，如果建立在天赋人性的乐观主义观点上，逻辑上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如果建立在天赋人性的悲观主义观点上，就又暗含着专制主义。换言之，不可知论的观点可能导致一个民主的国家，在这种国家“君主的权力不再是至高无上，也不再是一种面对臣民的外部权力，确切地说，是社会本身统治和管理自己”。^⑮

总之，在自然法的所有理论中——包括纽曼讨论过的其他理论，如托马斯主义者和立宪主义者——他发现了一种与肯定性自由的人人平等最一致的理论，这种理论指出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同一性。据此，他反驳了政治权力和国家权威被内在削弱的观点，至少在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完全统一前是如此。^⑯他同意批判理论的假设，即人们应当服从的权威，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法律的，都应该是理性的。相应地，由于自然法理论源于规范理性，所以它们必然要批评普遍的法律条件。

纽曼之所以和霍克海默等人有距离，并非在这个结论上，而是在他用以达到这一结论的墨守成规的方法上。这也来自他在心理学上将人单一化地界定为理性的禀有者，这就忽略了《权威与家庭研究》中关于非理性力量对现代人行为的影响的所有发现。尽管如此，纽曼发表在《杂志》上的有关法律理论的文章在许多方面还是显示了他在研究所的讨论中以及霍克海默编辑性建议中受到的影响。他们之间的真正争吵是1942年《巨兽》的出版而引起的。

在开始这个非常艰难的讨论之前，应先介绍一下另外两个对纳粹分析有贡献的新成员。其实，《巨兽》的许多地方都显示出他们合作的影响。2人中，基希海默参与研究所的事务更积极些，其背景与纽曼有很多相似。^⑰他比纽曼小5岁，1905年生于

海尔布隆一个犹太之家，1924年到1928年分别在明斯特、科隆、柏林、波恩学习法律和政治，他的老师有舍勒、R·斯门德（Rudolf Smend）、H·海勒（Hermann Heller），最重要的可能要算施密特。基希海默在波恩的博士论文是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国家观的比较，受施密特的决定论和“偶然境遇”（Emergency Situation）观点的影响很深。^⑧在魏玛衰弱时期，基希海默和纽曼、古尔兰一样，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诸如在工会团体演讲、为《精神》之类的期刊撰稿等等。

这一时期，他最锐利的文章是对魏玛宪法的分析，即《魏玛——以后会怎样？》^⑨文章融马克思和施密特于一体。20年代后期基希海默没有同情社会民主党的改良派，同样也不接受列宁主义左翼倡导的雅各宾派思想，像施密特一样，他表明真正的民主只有摆脱了社会矛盾，在人民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存在。但他不同意老师的观点，反对种族国家是一个同质社会的观念。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基希海默认为真正的统一性要等将来的无阶级社会才能出现。

在纳粹执政前的一个时期，基希海默像在法兰克福的研究所成员们一样保持一种谨慎的希望，即无产阶级仍然可能完成其历史使命。1932年，他反对以大众文化作为充足理由，来解释工人阶级不愿意实现自己的革命潜力。当然，在这一点上他比未来的同事们更乐观一些：“无论如何，一个人可以评论O·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在《群众的造反》中提出的进程，很显然，被解释为自我限制或屈从于大众，并依赖于意识形态态度的条件已经过时”。^⑩事实上，基希海默的乐观主义使他认为社团制度的国家实际上加剧了社会中的对抗，而施密特却赞美这种国家能超越社会对抗。由于基希海默相信工人的革命潜力，所以他认为社

会民主党不应支持勃鲁宁 (Brüning) 的总统制政府, 尽管这一点与更为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相反。^②对基希海默而言, 权威主义的“国家高于政党”与其说是法西斯主义的障碍, 不如说是它的预兆,^③防止魏玛向右衰败的办法是加速左派潜力的发挥。 149

当然, 他的乐观主义在 1933 年已被证明是错误的, 基希海默像许多其他人一样被迫逃离。1934 年, 在流亡的第一站巴黎, 他作为研究助理参加了研究所巴黎办事处。巴黎期间, 他为法国法律期刊写文章^④, 并为批评第三帝国工作, 在当时的国家议员施密特的公开保护下,^⑤这些批评在德国用笔名发表了。1937 年, 他在研究所的中心机构以研究助理的身份重新居住美国。

在纽约, 基希海默受命完成卢夏 1931 年开始写的关于刑事实践和社会趋向的书, 1939 年这本书以《惩罚和社会结构》为名正式出版, 是研究所用英文出版的第一本主要著作。^⑥卢夏已完成 1900 年以前的第一部分, 基希海默从他停下的地方接着写, 最后一章写到法西斯主义, 在 M I·芬克斯坦 (Mose I. Finkelstein) 的帮助下, 他把手稿译成英文。研究的基本前提是“惩罚必须独立于它的法律概念和它的社会目的, 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理解……各种生产体系都意图发现与其生产关系相联系的惩罚”。^⑦在考察囚禁、罚款、单独监禁、放逐和强迫劳动这些惩罚方式中, 卢夏和基希海默发现, 在变化的劳动力市场、资金循环和特殊的刑法形式之间, 有一种大致的相应关系。在关于 20 世纪权威政体的各种变化的一章中, 基希海默指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法律的普遍崩溃。对此纽曼曾评论过, 基希海默本人后来又在为《杂志》写的文章中作了探索。^⑧他写道: “法律与道德的分离, 作为竞争性资本主义时期的公理, 已被一种直接来自种族良心的道德信念所代替”,^⑨结果是更为严厉的刑法政策, 其特点是

重新引进死刑、减少使用罚款。因此，德国、法国、美国的统计资料都表明，刑罚措施和犯罪率之间没有联系。他最后得出这样结论：只有社会变革才能导致犯罪率下降。

基尔海默在分析纳粹方面为研究所作的贡献，是他为《杂志》和1939年后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写的一系列文章。150
在我们讨论《巨兽》之前，尚需介绍一下研究所的另一个新成员，并应注意研究所原有成员的工作，他们对纳粹的分析与纽曼、基希海默在许多方面分歧很大。第三位写过大量论述纳粹文章的是古尔兰，他和研究所的联系时间比纽曼、基希海默都短，1940年开始1945年结束，其影响也比较小。古尔兰1904年生于莫斯科，是一个工程师之子，1922年来到德国，在柏林和莱比锡学习经济、哲学和社会学，在莱比锡大学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专政概念的。^④20年代后期，他对社会民主党热心起来，为党的左派刊物如《阶级斗争》之类写过文章。

那时他的立场与研究所独立宣扬的相似，比如他猛烈抨击考茨基的机械唯物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源在黑格尔辩证法；^⑤他也责备共产党附属于莫斯科，不愿冒险进行革命；^⑥像纽曼和基希海默一样，他是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成员，呼吁其成员积极从事实践，不要坐等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的矛盾冲突而自取灭亡；也像上述两人一样，他因1933年事件而流亡，在巴黎，他从事的政治新闻业的生涯很难继续下去，便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纳粹经济学的研究者，当1940年来到纽约、参加研究所时，他正大量写作这方面文章。尽管早期对哲学感兴趣，但古尔兰在研究所的刊物上没有任何理论文章，他在《杂志》上的论著表明他在方法上更接近原在社会民主党的同事而不是批判理论。

如果纽曼、基希海默和古尔兰的思想与在法兰克福蕴育、在纽约成熟的研究所成员不一致，那么，他们也并不是研究所历史上第一批和霍克海默意见不同的人。我们已经讨论过维特夫更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他与研究所联系减少的原因，格罗斯曼是研究所中格吕堡一代剩下的最后一个成员，他也是批判理论的一个更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④在伦敦、巴黎呆了几年后，他于1937年移居纽约，此后10年，他与晨边峰上研究所其他成员的关系越来越淡薄。事实上，他对《杂志》最后的杰出文章是对博克瑙1934年问世的《从封建向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转变》一书的长篇评论，除偶然写写评论外，他的论著已不再由研究所出版。30年代后期，他在家里的的工作时间多于117号大街研究所大楼办公的时间，战时《杂志》的停刊使他未能发表关于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的关系方面的成果，^⑤在这方面他花了许多心血，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其著作批评的严肃性。40年代，他有好几篇文章出现在非研究所的刊物上。^⑥ 151

显而易见，格罗斯曼的多产期是1933年以前的10年，而以其论述资本主义崩溃的论文达到顶峰，由纳粹带来的欧洲精神生活的崩溃使这些著作不能引起在和平时期可能引起的注意。此后，格罗斯曼不固定的个人生活也影响了他的写作，他把妻子和孩子留在欧洲，自己在美国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在纽约，他和哥伦比亚大学或其他大学没有正式联系，和研究所也更多是形式上的关系。^⑦有迹象表明，40年代初他和研究所其他成员思想上的区别由于个人关系的紧张而加剧了，他对斯大林俄国的支持使他很难得到其他人的喜爱。^⑧加之，根据A·迈尔的叙述，^⑨他开始担心以前的同胞波尔（Poles）有意加害于他，因伤风而引起的不健康更加重了他总的不幸。最后，战争结束后，他决定到欧洲

批判理论新的基础在其认为：经济的作用在 20 世纪已发生重要变化。事实上，研究所关于法西斯本质问题的争论，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一变化的特性上。《巨兽》和像格罗斯曼这样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具有许多关于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的相同设想；另一方面，研究所原有的核心成员都跟随其副所长波洛克，尽管他身负管理之责，但还是找时间致力于学术。

波洛克著作的中心点是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据此他描绘了现代社会的普遍趋势。这个理论部分是他早期对苏联经济实验分析的推演，^④波洛克并不认为俄国在引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方面已取得成功。其实，研究所对苏联事态保持相对沉默的原因之一是认为尽管俄国经济有其独特性，但也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变种。早在 1932 年《杂志》的第一期上，尽管当时是大萧条时代，但波洛克还是讨论了达到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前景，^⑤他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于格罗斯曼之类的危机论理论家，后者曾预言不久会出现制度变化，而波洛克则表明：政府指导的经济计划的运用的增多会作为一个无限期控制资本主义矛盾的途径。他也讨论了其他一些外加因素，如积极鼓励技术革新、不断增加的防务部门的效果等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资本主义的生存。

153

1941 年，波洛克把他关于这种体制的持久观察扩展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⑥他指出自由放任的经济已被垄断资本主义代替，进而又被一种以政府指导为特征的新型资本主义代替，虽然欧洲的专制政体首先采用了全面控制，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政体也可能仿效。不同于早期的两个阶段，国家资本主义中止了有利于价格和工资控制的自由市场，它同样追求政策经济的合理化，它为政治目的而控制投资，并限制消费品生产。

波洛克认为，这一体制最能区别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的特征

是：在总的计划需要面前，个人或团体的利润已处于从属地位，社会关系不再是仅仅通过市场中介而形成的雇主和雇佣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互动，取而代之的是个人直接而对作为命令者和被命令者的他人。在波洛克看来，虽然“利润的动机”并未完全丧失，但它“已被权力的动机取代了。”^⑤他以一种令人想起J·伯哈姆（James Burnham）^⑥的方式继续说道，作为此一现状的反映之一是原来凌驾于管理之上的股东们失去了控制权，传统的资产者逐步和靠不断减少的利润来养活自己的食利者差不多。

在波洛克的分析中，对崩溃的一般预言是暗淡的。通过公共工程消灭失业现象被国家资本主义用来防止马克思预言的无产阶级的贫困；分配问题被管理价格和预定需要解决了；格罗斯曼特别强调的过分积累将由经济的军事部门的不断扩张而解决。总之，现在存在一个指令资本主义的新制度，并且这个制度要持续一段时间。

然而，波洛克的悲观主义被一些限制条件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矛盾——阶级斗争、利润率下降等等，正如它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样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而且，控制了经济的国家自身，又被那些官僚、军事领袖、党派官员以及大商人（纽曼也分析了同样的组成部分）的混合统治团伙所控制，他们的冲突现在虽然减少了，但并非没有可能；这个体制中不稳定的根源还有，资源和技能的自然限制，大众提高生活标准的要求和持久的战争经济的需要之间可能产生的磨擦等等，波洛克认为总的趋势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和不断强化。最后结束这篇文章时，他提出了几个与独裁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相反的关于民主的生存性问题，他说，这是只能留待历史给予回答的问题。

在《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波洛克又写了《国家社会主

出，利润的动机是权力的动机的变种，⁵⁵但今天，市场提供的调节已经流失，在独裁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控制经济”中，统治已成为值得炫耀的东西。应当说，在这样的推论中，波洛克仍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总是把经济理解为“政治经济”，所有马克思的著作，包含《资本论》，都隐含了经济关系是人类基本关系这一设想，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关系总是黑格尔曾称为主—奴关系的变种。⁵⁶

这样，在创立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中，波洛克一直在为霍克海默、很可能还有洛文塔尔、阿多诺辩护（马尔库塞本人和纽曼很靠近，其《理性与革命》一书与纽曼的态度比较接近，他说：“最有权力的工业团体为了组织垄断产品，倾向于采取直接的政治控制，并诋毁社会主义的反抗，恢复帝国主义的扩张”。）⁵⁷然而，对于霍克海默来说，国家资本主义的是“当代的权威国家……是统治的新喘息机会”。⁵⁸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这段时期内，霍克海默所有著作都强调经济、政治和法律的自由中介的终结，它曾预告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实现（以后他把这些扩展到整个西方的启蒙传统），正像他为《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专辑的前言中说的：“由于纳粹的出现，自由主义时代的双重类型，如个人与社会，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法律和道德，经济与政治等等，并未被超越，而是被搅混了。”⁵⁹现代社会实际上是公开的“歹徒”统治，⁶⁰霍克海默用本雅明喜爱的范畴说，欺骗（Racket）的保护是现代统治的原初现象（Urphenomenon）。附带说一下，欺骗的概念在基希海默的纳粹分析中也很突出。⁶¹

霍克海默认为，在这种统治机构中，统治集团利用了技术理性。正如他经常说的，技术理性是对理性的真正本质的背叛，霍克海默将其间接地和自己的哲学对手联系起来，他写道：“法西

斯分子从实用主义中学到了东西，甚至他们的判断也不再有意义，而只是一种目的。”⁶⁵在《权威主义国家》中，霍克海默形成了对这种也运用到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技术理性的批判，预示了他后来与阿多诺合写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的许多论点。他对法西斯主义分析的焦点已从垄断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概念转向一个更为普遍的技术分析中，这和他对马克思过于强调生产过程及其劳动拜物教的批评有关，这在第二章讨论批判理论的起源时已经提到。在《犹太人与欧洲》一文中，霍克海默说：“不愿意讲资本主义的人，就应对法西斯主义保持沉默”。⁶⁶应当明白，他说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而非其自由的或垄断的先驱。

事实上，霍克海默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技术理性的厌恶，导致他对自以为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继承人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重大质疑。他认为，⁶⁷恩格斯及其有同样信念的人把生产方式的社会化等同于统治的终结是真正的乌托邦，幼稚地期望这种社会化结果的自由不过预示了权威国家的到来，拉萨尔和俾斯麦反常的联合是此一事实的象征。霍克海默认为，真正的自由只有在挣脱了国家资本主义锻造的、社会主义（至少是苏联所体现的）使之永存的技术束缚之后才能实现。在纪念本雅明的许多文章中，也有类似思想，本雅明也认为：自由的实现只能是历史统一性的断裂。⁶⁸《权威国家》表达了批判理论最激进的倾向，在一段最重要的陈述中，霍克海默写道：

辩证法和发展不能划等号。两个对抗的要素：接管国家控制以及由此而来的解放，都包含在社会革命的概念中，（社会革命）并非自发地导致这些：生产方式的社会化、生产的计划指导和对自然的总体控制。它也会导致在没有积极

反抗，没有不断为自由而斗争的情况下也不会出现的结局：剥削的终止。这样的目标（社会革命）不再是进步的加快，而是跳出了进步的轨道。^⑧

当霍克海默 1942 年写下这段话时，他还没有绝望，以为这种积极的反抗也可能即将出现，这方面他多少比波洛克更乐观些：“权威国家的永恒制度虽然咄咄逼人，但并不比市场经济的永恒和谐更真实，当等价交换仍旧是不平等的外壳时，法西斯的计划已成为公开的偷窃……这种可能性使人绝望”。^⑨他还谈到，法西斯的凝聚力不仅仅是对权威人格的心理屈从，当然这很重要，但它也以经常不懈的运用恐怖和高压为基础，^⑩统治阶级不同成分的联合基于他们害怕群众的这一共同点上，没有这些共同点，他们将成为一盘散沙似的吵闹不休的歹徒。^{⑪*}

此外，霍克海默还谈到，实现自由的物质条件已最后完成，与马尔库塞在《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论技术的文章提出的思想一致，他坚持认为匮乏的终结和新的统治形式可能由于技术

158

* 正如布莱希特在一个剧作中显示的，许多流亡者把纳粹视为歹徒，至少在一种隐喻的意义上使用。但阿伦特与此不同，比如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纽约，1958）中写道：“极权形式的政府与权力的欲望或者与权力机制的欲望无关……极权政府并非由小集团或一帮人统治……原子化的孤独个体不仅是极权统治的群众基础，也延伸到其结构的最顶端”（P407），阿伦特小姐就此在一个注释中批评了《巨兽》。后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也放弃了歹徒的比较，认为法西斯主义的领导人与他的领导的群众是同样的。他们指出，在卓别林的《大独裁》中，独裁者与理发师是同一个人。

精神的传播而引起。实际上，他曾要求的与过去决裂现在全取决于人的意志了，作为批判理论中的“卢森堡主义”或工团主义倾向的最直接表达，他写道：“新社会的形式首先在转变中发现。理论的概念，依据先驱者设想的委员会制度，被认为是指明了到达新社会的道路，这个新社会由实践而产生。它可以追溯到1871年、1905年和其他事件。革命依赖于它的连续的理论传统。”^⑳这样，与列宁主义的过渡期的专政相反，霍克海默似乎支持人民的直接控制，选择是很清楚的：“或是退入野蛮社会或是历史的起点”。^㉑

虽然《权威国家》是劝告的语气，但霍克海默已日益看清野蛮主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谈到：精神生活正在成为革命实践的最后避难所，这一观点在法兰克福学派后来的著作中不断出现。霍克海默写道：“思想本身已是一种反抗和努力使自己不再被欺骗的标志”。^㉒一旦野蛮或至少其法西斯主义方式被击败，而又没有导向看来是唯一选择的“历史的起点”，批判理论就开始质疑实践自身在现代世界的可能性。

然而，现在就详细讨论这一发展势必忽略我们的中心问题，即研究所对纳粹的论述。正如前面已说过的，在诸如纳粹的经济本质等问题上，纽曼、基希海默和古尔兰带来了与霍克海默、波洛克以及研究所早期成员不同的观点。3人中，基希海默思想上虽有实证主义的偏好并有法学教育的基础，却是最接近批判理论的一个。^㉓《惩罚和社会结构》出版后，他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表露了对犯罪学的持久兴趣。^㉔在解释纳粹德国的刑法方面，基希海默把1933年后的法律理论分为两个阶段：权威的和种族的，前者在纳粹掌权以后只持

续了很短的时间。R·弗赖斯勒 (Roland Freisler) 的法律的意志理论流行开来，它强调了被告的主观动机而非客观行为。这很快就被现象学法学的基尔学派的反规范的、反普遍性的“具体的”法学理论所取代。^⑦ 据此法官对被告“本性”的直觉代替了他对其实际行为的判断。失职罪增加了，通过他们的领导人的声明所披露的“人民的社会感情”以及司法官僚的裁判都影响到法庭的判决甚至影响到追溯法。司法的部门化——党卫队，劳动服役，党等等，都有独立的司法等级制度——代替了1933年以前盛行的统一的刑法制度。总之，法院制度已被改变为一种从属的行政官僚机构，而日益反映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

现象学派和纳粹政治理论的一个主要主张是把法律和道德混为一谈，而它们在自由主义法理学中已被分开了。在基希海默后期的文章中，他试图通过揭露纳粹法规的潜在性格来显示其意识形态本质。他认为作为自由主义法律原有支柱的个人财产和契约自由，前者虽然仍然存在，但当后者实际上已无意义时，它也就“被粗暴地抵押给了政治机器”。^⑧ 从而人们感到，纳粹法律的教义已经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自由主义的鸿沟之间架起了桥梁，只是它是以前者的消蚀为代价的。纳粹宣称的一种“具体的”政策已在某些领域实现，如反犹法规和鼓励人口增长的措施（如减少对非法出生的制裁、支持大家庭制等等），但在大部分其他领域就并非如此，如农业，在那里“血统和土地”的意识形态不得不让位给现代化的要求。其实，纳粹法律最基本的要素在于霍克海默曾强调的技术理性取向。基希海默写道：“这种理性并不意味着有一般可适用的法则，其结果能被那些受其影响的人预测出来。这种理性仅仅意味着法律的整个结构和法律实施是由那些统治者所专有，是对他们有用而制定的”。^⑨ 他在描绘后私营资

本主义的新秩序时，没有像波洛克那样走得远，用他的话说：

纳粹政权政治与社会的发展特性是经济权力的集中，具体表现为在维护工农业生产方面私有财产的制度的倾向中同时又取消了私有财产的相关者即契约自由。行政认可取代契约已成为财产本身另一个自我。^④

160

然而，更甚于纽曼和古尔兰，基希海默尔感到国家的权力，或至少是希特勒周围的统治集团并未受到根本的挑战。在对纳粹统治下的政治变化的更广泛的讨论中，他提出了自己的理由。^⑤他区分了近代西欧史中政治妥协的三个阶段，在自由主义时代，是一种“国会代表和在他们与政府之间工作协议的复合体”占据优势，^⑥在政治中金钱的影响尤其重要。但1910年左右大众民主的时代到来时，妥协的各种因素开始转变，自发的资本与劳工的组织在权力斗争中是主要参与者，而中心银行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扮演了调解的角色，垄断在政治和经济中代替了个体所有。在第三阶段，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经济因素的影响已急速衰落，法西斯政府是如此强大，以至投资者拒绝投资或其他私有经济压力都丝毫不能限制它。显然，尽管垄断仍然存在于劳动力（由政府控制）、工业（仍然是私有制）和所谓粮产（也有私有的）之间，但政府已经卡住了咽喉。事实上，纳粹党已经着手建立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帮助它提高官僚化的经济机构，但这意味着它背叛了早期的允诺：“党不仅不支持那些在为生存而斗争的独立中产阶级，而且还要在实际上比现代德国史上的任何其他独立因素都更有力地加速他们最后的衰亡”。^⑦

由所有这一切而引起的政治妥协的新结构现在取决于元首及

中得到)。总之,虽然这种制度建立在统一于帝国主义扩张追求之中的政治官僚和经济的共同管理之上,但它仍然是垄断资本主义。

古尔兰不愿意小看垄断资本主义的顽固性,纽曼也是如此,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讨论他的《巨兽》了。尽管这本书在冷战中受到相对冷漠,但最终还是成了一部经典,这是一部花费巨大劳动、极富学术成果的著作,更以纽曼与其原始资料的适当距离而著称于世。在好几个领域,如德国工人运动史,纽曼居然能引用他在1933年前的个人经历。所有这些,都得到霍克海默和研究所其他成员的确认,但纽曼的结论以及他用以得出这些结论的方法与批判理论无关,研究所内部成员并不把《巨兽》看成是反映了研究所观点的书。^⑥

162

确实,他和其他人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有相似之处,例如纽曼总体上降低了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独立的重要性,^⑦这和霍克海默从《黄昏》到战时所有文章中的观点是一致的。他甚至认为德国人是“最少反犹主义”的,^⑧这也是研究所成员共有的一种奇特信念;*^⑨纽曼也赞同法西斯主义因其非理性而缺少一种真正

* 当我向洛文塔尔提到纽曼的观点时,他说研究所的许多成员流亡到美国后,都认为德国人的反犹主义要少于美国人。他们所说的种族差异是社会的——而这在魏玛时期并不明显——而非政治的。和我谈过话的研究所成员都强调,在被迫离开德国前,他们是如何被完全地同化了。对德国反犹主义的这种态度,在1939年研究所关于一般问题的计划书中又一次表现出来,计划书结论中的陈述今天听起来是相当天真的:“在德国公众已暴露出对政府的反犹主义的真诚厌恶的同时,反犹主义的承诺很快淹没在法西斯政府从未设想过的地方”。

的政治理论的观点，因为一种“政治理论不可能是非理性的”；^④最后他也感到没有自觉的政治实践，纳粹体制就不可能从内部必然崩溃，“制度内部的缺陷和冲突，甚至德国的军事失败，也不会导致政体的自动崩溃，它只能由利用这一体制内部冲突的被压迫群众的自觉政治行动所推翻”。^⑤

但是，总体上的不同才更有意义。纽曼对心理学的轻视已多次提到，正像对他影响很大的左翼史学家 E·凯尔（Eckhart Kehr）一样，^⑥他也认为精神分析比资产阶级的思想方式高明不了多少，《巨兽》确实有一小部分是关于克瑞斯玛心理学的，但它完全忽视了研究所早期关于权威心理的研究，在《巨兽》超过 600 页（包括 1944 年加上去的附录）的篇幅中，没有任何地方透露出纽曼接受了弗洛姆的受虐—施虐性格类型的概念；^⑦而且在分析魏玛时期工人阶级的失败时，他也忽略了弗洛姆关于德国无产阶级矛盾心理的研究。

更重要的是，纽曼不同意波洛克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对他来说，“‘国家资本主义’一词是自相矛盾的”，他引用希法亭的话，“一旦国家成为生产方式的唯一主人，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可能起作用，它破坏了维持经济循环的过程主动运行的机制”。^⑧政治第一和管理革命还未取得成功。纽曼着手通过经验地考察德国经济来证实这一点。在这样做时，他也不同意波洛克关于这个制度牢不可摧的悲观态度，“本书作者并不接受这种非常悲观的观点，他相信资本主义的对抗在德国正处于更高然而也更危险的状态，虽然这些对抗因素被官僚机构和人民团体的意识形态所掩饰”。^⑨

纽曼首先引证的是纳粹领导自身的证据，没有一个能表明是国家控制的谨慎政策。^⑩然后，他提出了值得重视的数据，即魏

官僚。他表明他并未过分简单地断定法西斯主义仅仅是垄断的产物，“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仅仅是德国工业辅助工具，但它确实意味着在帝国主义的扩张方面，工业和政党有相同的目标”。^④和波洛克、霍克海默的分析不同，纽曼的分析属于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范畴，波洛克曾论及权力的动机，纽曼回答说：“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表明正是利润动机才使各种机构联合在一起。但在垄断体制中，没有权威的政治权力就不能产生和得到利润，这是国家社会主义与众不同的特征。”^⑤因此波洛克所描述的新秩序实际上根本不是什么东西。

那些认为纳粹德国是一个没有阶级区别，无组织的群众社会的理论家们，诸如研究所的一位反对者，社会研究新学校的 E·莱德勒 (Emil Lederer)，也同样是错误的。事实上，纳粹群众的原子化在没达到社会上层的自我原子化时就早已止步了。纽曼认为，如果说还存在一些的话，那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的实质在于接受和加强德国社会的优等阶级性质”。^⑥他同意出现变化的是下层和中下层的阶级团结，纳粹引进的新等级制是建立在地位的基础上而不是传统的阶级基础上的，这就推翻了 H·梅因 (Henry Maine) 爵士的从地位向阶级过渡的阶级公式^⑦。这已由使群众原子化的有计划的尝试所实现，这一过程的具体细节，纽曼已在对宣传、恐怖、劳工、工资政策和纳粹法律的分析 (以他和基希海默此前发表于《社会研究杂志》及《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上的文章为基础) 中作了探索。

纽曼更为正统的阶级分析阻止了他从技术角度来看统治，而这正是霍克海默周围的人注意研究的。和古尔兰一样，他感到经济的合理化和中央集权制与私有资本主义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事实上技术革命实际上已“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构内部，这

就驳斥了那些相信资本主义已丧失动力的人的信念”。^⑧然而，纽曼觉得从长远的观点看，技术理性化的逻辑与最大利润的要求之间的紧张可能会日趋严重。“我们相信，工程师，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技术员和工头，他与极权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乃是这种社会制度的决定性缺陷之一。”^⑨

与波洛克不同，纽曼论据的要点是，纳粹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另一种方式的继续。然而，《巨兽》也有一种附属的理论，它更接近研究所核心成员的某些观念。这在该书的书名上就可以看出，它暗示着霍布斯对17世纪英国内战的混乱状况的研究。^[译注]* 纽曼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是——或者（是）倾向于成为一个——无国家，无秩序，无法律、无政府的统治”，^⑩而国家资本主义，不仅是用词不当，而且在国家（state）的任何传统意义上，这种国家也是可疑的。相反，统治越来越变得明显直截了当，自由国家（Liberal state）所提供的尽管是不完善的缓冲与防御机制已不复存在了。

换言之，与霍克海默及其他人一样，纽曼感到过去半人道的中介在权威国家已很快丧失作用。他们的不同在于对非中介统治的本性的描绘。纽曼觉得没有国家缓和阶级冲突，它仍然会站在被剥削的工人之上的资本家一方。因此他这样写道：“两个阶级之间仍然客观地存在一种深刻的对抗，我们不知道这种对抗性是否会爆炸。”^⑪另一方面，霍克海默认为，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的缓冲，统治正日益成为心理的，继波洛克之后，他断言国家是统治

* [译注]：这是指霍布斯《利维坦》一书。“利维坦”（leviathan）是《圣经》中述及的一种力大无穷的巨兽名字的音译，霍布斯以此比喻一个强大的国家。

心神不安的自由主义者，可能部分是出于对此一现实的承认。另一方面，霍克海默阵营虽也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抱有悲观态度，但并未成为纽曼、基希海默尔、古尔兰式的自由主义者。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激进主义在马尔库塞的理论中反而加强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谨慎得多，但其基本分析的前提绝非真正的自由主义或多元主义。不过，现在谈到战后的发展是为了预告我们的叙述，下一章在讨论研究所重新把其注意力集中于美国时将详细评论。

167

在转到研究所对美国社会的分析前，必须再次提及其战时的历史。随着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扩张和美国参战，出现了研究所制度机构的普遍重组和其目标的重新评价。战争爆发时，研究所留在欧洲的唯一阵地是法国办事处，它在1940年法国被占后被迫关闭，30年代，法国办事处不但是研究所与其出版商的联系者，也是《权威与家庭研究》的资料提供者之一，同时还承担和法国学术文化团体的联系。在巴黎，给《杂志》供稿的并非本雅明一人，伯格、R·阿隆、A·科利、J·都普勒（Jeanne Duprat）、霍因夏姆、M·勒鲁瓦（Maxime Leroy）、B·格勒图生（Bernard Groethuysen）、A·迪门森（A. Demangeon）等也为《杂志》写文章，1938年，伯格是研究所纽约办事处系列演讲的两个杰出的欧洲学者之一（另一个是金斯伯格）。

现在这一联系中断了，而F·阿尔肯出版社也不能继续印刷《杂志》了。为弥补这一点，研究所决定在美国出版1939年卷的第3部分，它于1940年夏问世。这必然使研究所调整其长期不愿用英语出版刊物的习惯，正如霍克海默在为改名为《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写的序言中解释的：

哲学、艺术和科学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已失去了她们的家园，英格兰正在为反对极权国家的统治而战。美洲，尤其是美国是科学生活可能继续的唯一大陆，在这个国家民主机构的框架内，文化仍然享受着自由。我们坚信，没有这种自由，文化就不能生存，在用新形式出版我们的杂志时，我们希望能具体表达这种信念。¹⁹

然而，在美国出版刊物的费用更加昂贵，研究所的资金已今非昔比。30年代后期，捐赠的资金遭受一些严重挫折，不成功的股票熊市投资；一次在纽约北部地区损失惨重的不动产交易；研究所在扩大成员方面用以安置其他流亡者的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等等，都导致财政分配的限制。因而，当研究所于1941年把最后的资金从瑞士和荷兰转移到美国，由库尔特·格拉赫（Kurt Gerlach）纪念基金会、H·韦尔纪念基金会和社会研究协会管理后，²⁰这部分资金已不允许研究所继续实施其全部计划了。第一批受影响的就包括《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它最初被改为年刊，1942年3月第9卷第3期发行后，战争的持续使其停刊了，它再也未能以原来的形式重新出版过，这就结束了一个有显著特征和成就的杂志。事后看来，研究所存在的这短短10年是其真正的黄金时期，是其伟大的创造时期。

研究所的财政问题也迫使它裁员，他们是由于欧洲新难民的涌入而增多的。研究所的一些伙伴——如兰道尔、斯特海姆和最杰出的本雅明——直到很晚还在抵制研究所要他移居国外的请求，但在许多情况下，逃离是成功的。战争爆发时，经常和研究所保持外围联系的新“研究协会”，包括K·W·卡普（Karl Wil-

helm·Kapp 经济学)、I·格雷布纳 (I. Graebner 反犹问题)、卡尔森 (教育)^⑧、O·兰格 (汉学)、W·马考尔 (Wilhelm Mackauer 历史学)、A·沙哈特 (Alois Schardt 艺术)、拉扎菲尔德 (社会学)、J·苏德克 (经济学)、E·齐瑟尔 (社会学)、马·贝克 (哲学)、K·平图斯 (Kurt Pinthus 文学)、H·弗莱德 (Hans Fried 社会学) 等人, 其中只有 A·迈尔的丈夫 J·迈尔 (Joseph Maier) 是研究所同意的接受者, 其他许多人都不能在研究所削减预算的情况下留下了。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研究所资格较老的成员中。到 1939 年, 弗洛姆已离开研究所去从事自己的研究; 古姆佩茨作为证券经纪人已被他的事务所牵连; 维特夫已找到新的工作; 阿多诺的业余时间受雇于先在普林斯顿, 后在哥伦比亚的拉扎菲尔德的无线电研究计划, 洛文塔尔也在那里从事研究和秘书助理工作。政府咨询也是研究所收入来源之一, 纽曼是第一个到华盛顿帮助做这件事的人, 1942 年他作为首席顾问参加经济竞争委员会, 不久又到战略服务处负责中欧研究分析部。纽曼离开研究所是由于和研究所原有人员在理论上的分歧,^⑨ 与弗洛姆、维特夫的情况一样。霍克海默不满《巨兽》中对波洛克的观点的概括, 此外在哥伦比亚从研究所人员中选一位教授问题上, 他们之间也有明显的敌对情绪, 法兰克福时期的成员对观点相反的纽曼作为研究所在哥伦比亚全体成员的代表一事颇为不悦。事实上, 战后纽曼才接受这一邀请, 而那时研究所已决定和哥伦比亚中断联系。

战争期间, 其他研究所成员都在华盛顿度过大部分时间。基希海默和完成了《理性与革命》一书的马尔库塞一起参加国务院情报研究所 (OSS), 这是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团体, 包括一些杰出的学者, 如 H·霍尔本 (Hajo Holborn)、N. O. 布朗 (Nor-

年他就在格吕堡的指导下从事专题论述。^⑩但有一个方面，他在研究所中是一个独特的例外，和研究所历史上大多数重要人物不同，他是异教徒出生，这是一个他以后感到妨碍他为研究所核心成员接受的一个因素。20年代，马辛无论在个人还是在政治两方面都是维特夫的密友，和后者一样，他是研究所流亡前与之有联系的几个共产党员之一，他是1927年入党的。和他的老朋友一样，马辛1902年出生于科布伦茨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小维特夫6岁；希特勒执政时，因为政治原因他被投入集中营，他们两人差不多同时被释放，并于1934年离开德国。两人在用笔名发表的小说中分别描绘了自己在集中营的生活：维特夫用“Klaus Hinrichs”之名写了《国家集中营 VII》，马辛的题为《拘留 880》一书则用“Karl Billinger”的笔名出版，他把一个重大罪犯 J·狄林杰（John Dillinger）和被纳粹囚禁的诗人 R·Bilinger）奇特地结合起来。^⑪和 L·斯蒂芬（Lincoln Steffens）关于前苏维埃的介绍一样，1935年马辛的小说也被译成《祖国》用英文出版，为此他付出很高代价，直到40年代后期才成了正式公民。

另一个共同之处是他们两人都逐步对共产主义丧失幻想。1934年维特夫离开大陆到英国时，他已不再缴纳党费而脱党，那是他移美前的8个月。但他最后与自己共产党的过去脱离关系是1939年夏，其时在30年代中期中国之行之后。^⑫马辛的脱党更有戏剧性，虽然从集中营出来后他到美国做过短期旅行，但还是和妻子海德（Hede）回到欧洲为党工作。1937年他和上司一起被召到莫斯科讨论事情，其时党内正值大清洗的高峰，和许多人一样，马辛开始对斯大林主义失去信心。尽管妻子曾劝阻过他，但他还是出于一种荣誉感决定去苏联宣布脱党，原打算两周的访问结果以生存无定的8个月恶梦而告结束。^⑬1938年，马辛

终于被允许离开莫斯科和脱离共产党。不过他和共产主义的联系并未完全结束，回国后，他开始把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和《我的奋斗》中宣称的意图相比较，希望由此写出一本书。《希特勒不是傻瓜》一书于1940年由“现代”发表，这个杂志当时由共产主义者编辑所秘密控制，西方的战争仅仅是向东进攻的序幕这一“Karl Bllinger”的观点是与苏德条约后党的新路线唱对台戏的。结果，这本书被自己的出版者查禁，已出版的尽一切可能查封。

祸不单行，马辛不但自己的书遭到厄运，他和维特夫的友谊也中断了，虽然这恰好出于相反的原因。维特夫从中国回来后不久就开始右转，他的第3个妻子哥德弗兰克是保守的，看来对维特夫的转变是有影响的。他不但脱党，而且也不信任那些和共产党有过联系的人，马辛是其中之一，他们的关系渐渐恶化了。马辛回忆说，他们的最后分离是1948年，在那时他完全拒绝支持R·弗希尔（Ruth Fischer）《斯大林主义的德国》一书中的主张；但维特夫则说，他们的争吵更多是个人原因。^⑩最明显的是，马辛虽不再是党员，却不愿站在维特夫偏激的反共产主义思想的一边，当时他已得到一个与研究所领导人不同的政治位置。1941年，当马辛加入他那个阶层时，其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了。40年代的文章中已看不出有多少他早期曾积极拥护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了。这一点，反映了研究所逐渐从其进攻性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退却，本章已涉及到这方面的情况。其实，在法兰克福学派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中，战时和战后都有些因素有助于这些变化，这在我们讨论40年代研究所工作时将会更加清楚。

战时研究所历史上发生的可能是最重要的变化是由于霍克海默的健康状况造成的。由于心脏问题，医生劝他离开纽约到一个气候更温和的地方，于是1941年初霍克海默搬到加州圣特莫尼 172

卡附近温和的绝壁处疗养，阿多诺出于个人的忠诚陪伴着他。^⑧没有霍克海默个人的推进，研究所的纽约中心失去了一些活力，洛文塔尔和波洛克作为领导和马尔库塞、基希海默、古尔兰、马辛及 F·韦尔留在那里工作。由于上述种种因素，战时他们的研究工作趋于衰弱。1944 年 6 月，他们在纽约第 117 街的办公大楼转让给美国海军训练班，研究所重新在洛威纪念图书馆的一个小地方和晨边峰的另一幢大楼里办公。显然，当研究所 1944 年出版《晨边峰 10 年》（其中叙述了这一时期的成就）时，其哥伦比亚时期已近尾声。^⑨

在西迁加州的过程中，研究所与其欧洲创办期日益增加的距离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作了象征性的确认。1940 年 2 月还在纽约，霍克海默、波洛克、马尔库塞、洛文塔尔就已把所属的出版物停刊了；战争结束时，所有成员都加入了美国籍；《杂志》的结束意味着研究所拥有新的英语读者的开始，1939 年的《惩罚和社会结构》是第一本，以后研究所的全部出版物都以英语和读者见面；40 年代，《偏见研究》弥补了《权威和家庭研究》的不足，但现在的集中点是美国形式的权威主义问题。

主题的这种改变带来研究所工作中心的微妙变化，权威主义在美国的出现带有与欧洲不同的伪装形式，不是恐怖和高压统治，而是一种更缓和的强求一致的方式，这在文化领域可能最有成效，因此，美国的大众文化就成为法兰克福学派 40 年代的主要研究对象。为了理解它的工作，现在我们必须回到推迟很久的研究所关于文化现象的分析讨论，我们已经论过了洛文塔尔的贡献，下一章我们将回过头来，在研究所讨论被霍克海默称之为“肯定性文化”的背景下，^⑩重点讨论阿多诺和本雅明内容广泛而深刻的著作。

第六章 审美理论与大众文化批判

没有一件文明的记录不同时是野蛮的记录。

本雅明

必须搞清楚：口香糖并不消灭形而上学，而就是形而上学。

霍克海默

大众文化是相反的心理分析。

洛文塔尔

G·斯坦纳（George Steiner）认为^①，马克思主义美学批评传统上有两条分离的线索，第一条源自列宁著作并由日丹诺夫在1934年第一次苏联作家大会上加以编纂，它认为只有展示了公开的政治党性的作品才有价值。列宁对党的文学的需求是在与世纪之交的形式主义美学的斗争中产生的，并最终培育出乏味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统。斯坦纳和其他人一样，认为更值得重视的成果的是第二条线索，即源自恩格斯的传统。恩格斯评价艺术较少根据创造者的政治意图，而更着重其内在的社会意义。他认为作品的客观的社会内容，可以与作家的公开意图相

反，进而超过他的阶级出身。追随第二条路线的非苏联集团的批评家，被 M·克鲁兹 (Michel Crouzet) 一度称为“变异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中最杰出的有 (往往是其多变生涯中的一段) 法国的 J-P·萨特和 L·哥德曼，美国的 E·威尔逊 (Edmund Wilson) 和 S·芬克斯坦 (Sidney Finkstein) 的及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

与其他评论家一样，斯坦纳认为，卢卡契因其可同时放在两个阵营的特点而代表了一种复杂情况，他是保留在苏联阵营的最有天才的批评家，企图沟通列宁主义者和恩格斯阵营之间的鸿沟，在发展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著名二分法时，卢卡契与否定这一点的正统日丹诺夫主义有重要区别。现实主义的典范是莎士比亚、歌德和巴尔扎克的作品，它们有机地协调了客观世界和主观想象；自然主义在左拉的作品中得到显示，机械地反映作家没有同化的现象环境。所以卢卡契坚持，尽管左拉的同情无疑是在被压迫者方面，但在艺术上却低于保皇党人巴尔扎克，后者的艺术想象允许他以巨大的忠诚再现历史总体。出于同样的考虑，卢卡契在《历史小说》中对 W·司各脱爵士的作品作了出人意外的好评。^②

174

然而，因为党的统治集团的批评，卢卡契放弃了自己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他一直没有真正从列宁主义的紧身衣中挣脱出来。这表现在许多方面，最明显的之一是他从未削弱对各种现代主义艺术的敌意，^③对普鲁斯特 (Proust)、乔伊斯 (Joyce) 和卡夫卡 (Kafka) 等人，卢卡契总为他们宣扬形式主义和主体性而置若罔闻，他把 20 世纪的许多艺术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尼采、基尔凯郭尔作品中的所谓的非理性主义联系起来。^④在这种态度下，他相当保守地偏爱资产阶级文化的杰作，同时又无批判地恭

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这后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他过于乐观地估计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矛盾已经得到了协调。^⑤另外他坚持列宁主义标准还表现在他忽视技术革新对艺术的影响，他的批评以阶级冲突是历史的唯一动力为基础。包含在他的批评全集中的许多洞见，由于对政治权威的妥协和对现代主义神经质的反感，使得他不能取得批评的灵活性，而这种灵活性是和法兰克福学派相联系的西方变异的马克思主义所具备的。

但也要承认，如果没有卢卡契的著作，西方变异的马克思主义所写的许多著作就不会统一起来。无论作者本人后来对《历史与阶级意识》如何，但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本开山著作，如本雅明所承认的。^⑥阿多诺在后来许多关于卢卡契的文章中也认为他的批评基调具有普遍意义，即第一个认真研究异化这一重要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而且法兰克福学派与其他变异马克思主义一样，参加了卢卡契所着力发掘的现

175

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恩格斯式”的二分法，虽然较之前者他们更赞同他对后者的定义。^⑦无论此后的岁月中他们如何因异议而分离——他们是真诚的——研究所和卢卡契都是在一个共同的传统中讨论着相似的问题。

本章的目的是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批评中既不同于传统资产阶级也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对手的内容，并特别注意阿多诺、本雅明的贡献，同时也对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格文塔尔予以扫描，他们对大众文化的讨论也将涉及到，本章最后将论述研究所把艺术批评和对现代社会一般分析结合起来的方法。

当然，从一开始，研究所成员中后格吕堡一代就对美学和文化现象感兴趣。科奈留斯是研究所不少成员在学术上的主要影响者，他是一个落魄的艺术家，写过有关的艺术哲学大量论著^⑧；

与阿多诺研究音乐一样，霍克海默常常偏离主题写小说，一直延续到 40 年代；^⑩在阿多诺研究基尔凯郭尔时，美学扮演了主要角色；还有维特夫的戏剧和文学批评；最后我还注意到洛文塔尔在《杂志》上大量的文学批评。

现在要做的是对研究所广泛的文化分析的其他内容作更完整的介绍，尤其是阿多诺和本雅明的著作，这一任务的困难是不易克服的，批判理论反体系的冲动也浸透到它所鼓励的文化批评，因此要总结概括它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是很困难的。另外，批评形式是其总体效果的一个本质方面，阿多诺和本雅明文章的独特结构和复杂文风都是难以翻译的，^⑪更谈不上删繁就简、提纲挈领了。他们的推论模式很少是归纳的或演绎的，每一个句子都须以文章总体为中介才能得到充分理解。阅读阿多诺和本雅明的文章的心理感受就像电影制作人 J·高德特 (Jeanluc Godard) 在被问及其电影是否有一个头、身、尾时做的回答一样，“是的，176但不一定按照这个顺序”。阿多诺认为象征主义的原则也透露在他们的著作中，“反抗社会包括反抗其语言”。^⑫这样，对一般读者来说，困难主要不在于作品的反复无常和表达不清，而更在于它以相当的严肃性直接向读者的反应挑战。在论述勋伯格时，阿多诺明确说出自己的目的：“它要求听众自发地构成其内在运动，要求他们不是静观而是实践”^⑬对像卡夫卡这类的艺术家，^⑭阿多诺特别赞扬其作品，看来也是出于同一想法。

本雅明对语言和文体也很关心，其实正如阿多诺曾暗示的那样，^⑮本雅明是把自己当作表达客观文化趋势的媒体，他相信形成特定的表达方式是尤为重要的。明显的表现是，他曾希望写一篇仅仅引述其他著作而排除所有主观成分的文章，^⑯虽然没有实现，但本雅明努力使其语言具有正常散文所没有的丰富和共鸣，

《判断力批判》的，差不多 20 年后，他又回到康德的观点，认为共同人性和对人类潜能共同希望，关涉到每个审美活动。^②但是，超个性的主体不是像康德所相信的是抽象的先验的，而是历史的。^③艺术主体在一定意义上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因此艺术作品表达的客观社会趋势不是创作者的意图，艺术家所宣称的创造自由在某些方面是一种幻觉。阿多诺在《瓦勒里和普鲁斯特》一文中写道：“像艺术家的生活一样，其作品只有从外部看起来才是‘自由’的，作品既非心灵的反映也非柏拉图式的理念的具体化，它不是纯粹的存在而是主体与客体的‘力场’”。^④

这样，对法兰克福学派而言，流行于德国年青一代中的表现主义的美学基础便是虚假的。在 40 年代论卡夫卡的文章中，阿多诺回到他早期论述基尔凯郭尔的观点：“绝对主体性也是无主体的，……表现主义的我越是被抛回到自身，它就越像是被排斥在外的事物世界，……纯粹主体性也必然要与自身疏离并成为一件物事，它正是通过对自己的疏离才占有了能表现它自身的客观世界。”^⑤尽管在真正艺术中，主体创造的独立性是一必要因素，但它也只能通过对象化才能实现自己。而对象化必然意味着与已被现存的社会基础过滤过的材料发生作用，这也包含着至少是某种物化的必然性。在批评 A·赫胥黎时，阿多诺说：“人性包括异化和其对立面，这不仅仅是作为从其解放出来的可能条件，而且从肯定的方面说，尽管它或许是脆弱的不充分的，但它也是作为主体冲动得以实现的形式，当然这只能通过对象化而实现。”^⑥这里，阿多诺把异化和对象化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也说明他对整体上消灭异化的悲观看法。此处和上面一样，他对非同一性的强调是特别明显的，主体想象和客观材料的完全统一可能在伟大的艺术中接近，但从未实现。这样，即使讨论瓦勒里、普鲁斯特、格

奥尔格和霍夫曼斯德尔 (Hoffmanstahl) 这些他非常尊敬的作家时也是如此,^⑧阿多诺在辩证的两方面讨论他们以超越个人成就中固有的不足。

如果艺术创造力受到社会因素的限制,那么对艺术的主观的欣赏也是如此。阿多诺与洛文塔尔一再指出,^⑨个体趣味的自由观念,在现代社会中随着自律主体的逐渐消蚀而全部瓦解,这一转变的含义对理解大众文化是很重要的。在大众文化中,对喜好的操纵几乎是完全的,正如第四章讨论洛文塔尔论战前德国对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理解一样,研究所把艺术接受的变化视为其研究的有效领域。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哲学与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前辈之间的区别,是它拒绝把文化现象还原为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反映。用阿多诺的说法,“批评的任务并非去寻找承受文化现象的利益集团,而是去辨认总体的社会趋向,这一趋向乃是表现在这些现象中并通过它来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文化批评应成为社会的观相术。”^⑩事实上阿多诺与本雅明之间分歧的根源之一是后者倾向于在社会集团和文化现象之间寻找特殊的对应。^⑪

批判理论强调辩证和否定,避免把艺术分析变成翻译社会关系的简单练习,虽然不能说这已在研究著作中完全绝迹。艺术不只是对现有社会趋势的表达与反映,而且——这正是研究所和列宁主义的批评,也是和卢卡契的深刻分歧之处——真正的艺术也是人类对现实彼岸的“另一个”社会的渴望的最后保存者。“艺术”,霍克海默写道:“自它成为自律以来,就已保存着从宗教中脱胎而来的乌托邦”^⑫所以康德审美无利害性的观念是错误的:真正的艺术是人类未来幸福中的合法利益的一种表现。用研究所特别喜爱引用的司汤达的话说,“艺术是幸福的承诺”^⑬。这样,

尽管文化超越社会的主张在一种意义上是假的，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真的。

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像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是资产阶级的欺骗，^④所有的艺术也不简单的是虚假意识或意识形态。阿多诺认为，一种辩证的、或“内在论”的艺术批评，“是认真对待这个原则的：即它不是不真实的意识形态本身，而是与现实相对应的主张”。^⑤艺术可能提供一个未来社会的“真实的”预示，其途径乃在于它和谐地统一了形式和内容、功能与表现、主体与客体，虽然“艺术的乌托邦超越个人作品”，^⑥一些艺术家如贝多芬或歌德，在其作品中至少能够实现这完满的瞬间。事实上，按照批判理论对统一矛盾的任何肯定性表现的不信任，在其极其称赞的这种和谐时总是包含这样一种认识：仅仅审美的统一是不够的：“根据内在批评，一个成功的作品决不是一种在假和谐中解决客观矛盾的作品，而是表达了真正和谐观念的作品，这是通过将纯粹的不妥协的矛盾否定性地体现在作品的最内在的结构中完成的。”^⑦换言之，在社会矛盾被现实地消除之前，艺术的乌托邦和谐必须一直保持抗议成分。阿多诺说：“艺术和所谓古典艺术恰恰在于其无政府主义的表现方式，它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也是人类对作威作福的制度、宗教和其他方面压迫的一种抗议力量，也恰恰在于它反映出客观的实质。”^⑧简言之，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的，^⑨审美领域不可避免地也是政治的一种实现，这最清楚地表现在席勒《美育书简》中。

然而，并非所有艺术都包含这种否定性因素。其实，研究所对大众文化批判的核心是它相信“幸福的承诺”，即另一个社会

的幻象，已经随着“肯定文化”（affirmative culture）* 的增长被系统地消除了，下面我们将看到法兰克福学派是多么严肃地看待这一发展。在此处一般性讨论研究所对文化的态度时应当提到的是，即使在他们为否定性的消除而极端悲观的时候，也通常会做出一种辩证的限制。（也许可以说马尔库塞后来的《单向度的人》中把这一分析通俗化了，尽管其辩证限制不多不少。）这种不愿消除否定之可能性的最好例子，是1941年出现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上阿多诺对T·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分析，凡勃伦“挥霍消费”的观念因其非辩证的浅薄而遭到阿多诺的攻击，此一观念可能是任何大众文化分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类实际追求的幸福，不可能与挥霍消费分开，不答应去实现一个社会所形成的愿望就不可能有幸福，但这种满足中如果不承诺一些质的不同的东西，也不会有幸福。”^⑩换句话说，即使被扭曲的追求身份、地位的欲望，也在其要求中包含着批判成分，首先是对现实幸福的要求，其次是其中这样的条件必然包含社会的成分。无论消费如何挥霍，也仍然包含着对法兰克福学派相当厌恶的禁欲主义的抗议。

“肯定的文化”的一个突击特征就是禁欲主义色彩。如我们在讨论研究所唯物主义性质时说的，对幸福的要求是批判理论的

* “肯定文化”，马尔库塞写道：“是指资产阶级时代按其本身的历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在这个阶段，它把作为独立价值的心理和精神世界这个优于文明的东西，与文明分离开来。这种文化的根本特性在于认可普遍义务、永恒美好和必须无条件肯定的更有价值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日常为生存而斗争的实际世界有本质的不同。然而，无需实际状态的任何改变，只要通过每个个体的‘内心’就可以实现”。（《否定》P95）

基本成分。阿多诺后来关于本雅明的一段话可看成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最好的总体描绘：“本雅明说的和写的每一件东西听起来好像思想并不拒绝神话和带有通常失体的‘成熟’的儿童书中的希望，相反它把它们认真对待以致于真正的满足本身已处在知识的视界之内了。在他的哲学版图上，放弃满足是完全受到谴责的。”⁴⁰而且研究所幸福观念与成为许多正统马克思主义思维特征的经济福利不同。其实，文化与物质满足的分离本身是一条线索，据此可以看出研究所是如何背离正统马克思主义无力超越肯定文化的。然而，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法，在描述资产阶级历史的某一阶段时无论多么准确，也不应该永恒化。在未来的社会中，这两个领域将会以一种健康的方式整合起来，正如马尔库塞在论享乐主义的文章中谈的，生产和消费分离的持续，是一个不自由的社会的一部分。⁴¹

181

但这种整合仍然是一个乌托邦的希望。在当代最大的威胁来自诸种文化趋势，它们暗示着大众意识层次上各种矛盾未成熟的调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还原论自身就是这一趋势的表现。正如其一般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批评也坚持强调中介⁴²和非同一性的重要，因为阿多诺和其他成员都否认哲学第一原则的存在，即使是肯定的文化中的最具体的工艺品，他也总是解释为基本现实的派生性反映之外的某种东西，“今天，辩证的方法越少取决于黑格尔的主客观同一性，它就越得去留心诸要素的二元性。”⁴³

阿多诺经常依赖辩证的反还原主义的一个例子，是他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商品拜物教（它被马克思用来意指商品从其人类起源中分离，成为神秘的、不透明的、异己的对象而不是社会关系的透明的具体化）。在这里，他不同意本雅明，1935年8

月2日他写信给本雅明：“商品的拜物教特性不是意识的事实，但在辩证法的突出意义上它产生意识。”换句话说，它是社会现实而不仅仅是心理现实。在谈论商品自身的形式时，本雅明赋予其形而上学的意义而不是历史的意义^④。另外，在他论凡勃伦的文字中，阿多诺又以相似的方式说：“商品拜物教不仅仅是晦暗的人类关系投射到物的世界，它也是主要产生于原始交换过程的幻想的诸神，但这些神不过代表了一些没有完全被吸收于该过程的东西。”^⑤在批判卢卡契和凡勃伦等文化批评家时，阿多诺总是仔细指出他们著作中能被察觉到的还原主义踪迹，它的一个经常表现是把现象当作全然的幻相而打发掉，对此他在评论哲学现象学时也指出过：“作为真实的反映，现象是辩证的，拒绝所有现象也就完全落入它的支配，因为真实是连同破碎的现象被抛弃的，没有破碎的现象，真实就无法显现。”^⑥

182

阿多诺在其一生中把大部分的精神能量献给了音乐。正是在音乐研究中，阿多诺对辩证中介的敏感得到了清楚显示。他认为复调音乐作为审美方式的最低限度的表现，^⑦可能最适合表现批判理论拒绝正面规定的无形象的“彼岸”。而且，由于它中介的复杂性——作曲家、演奏家、乐器、演奏技巧——使音乐成了表现他辩证想象的特别丰富的领域。音乐起源于日常生活的节奏和礼仪，但它早已超越其纯粹功能作用，它既与物质条件联在一起又超越其上，既响应社会现实的变化又不仅仅是它们的反映。

早在20年代，阿多诺在维也纳时，^⑧就开始探索音乐表现的各个方面、古典作品的历史、先锋音乐的流行作品、音乐形式的复制和接受、流行音乐的创作和心理功能等。^⑨1932年在最初两期的《杂志》上，他勾勒了研究音乐的基本原则。^⑩从一开始，阿多诺就清楚地表明他不是个通常的音乐学家，他认为，音乐

在其结构中包含着社会冲突，尽管它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是需要探索的，正如在各种文化现象中的情况一样，它既不完全是反映的也不完全是自律的。在当代，其自律仍然受到严重威胁，大多数音乐表现出商品特性，更多地受到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的支配。阿多诺宣称，真正的二分法不在“轻”音乐与“严肃”音乐之间——他从来也不是传统文化标准的捍卫者——而是在音乐的市场取向与非市场取向之间。如果后一种音乐在当代不能为大多数听众理解的话，这也不意味着它客观上是反动的，像理论一样，音乐应当超越大众的流行意识。^⑤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阿多诺着重论述了当代作曲的最初倾向，他重点讨论勋伯格和斯拉文斯基的对抗。他们是作为一定审美原则的具体体现而不是作为个性来理解的，这两位作曲家在阿多诺后来的《现代音乐哲学》中是中心人物，^⑥如一般所料，阿多诺的同情的是他在维也纳求学的老师。他认为勋伯格对无调性可能性的发展，表现出拒绝向当代社会无法解决的不和谐作妥协，他早期的表现主义作品已脱离了虚假的调和，带着真正艺术家的非自觉性，勋伯格听任无意识的冲动来表现它们的矛盾。但是，因为无调性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有调性，这就导致离开纯粹的随意性进入一种以十二音系为基础的新秩序之中，他禁止任何一个音符的重复直到十二音都响过以后，在这样的进行中，勋伯格以一种保持和古典传统接触的方式把他的冲动客观化了。新十二音序列的发音是他早期音乐的辩证产物，而不是外在秩序径直强加的。通过回到音乐自身的逻辑，勋伯格能够从外在社会势力的压力下保护自身的一些重要东西。

但是，在转向能够克服异化和矛盾的音乐形式时，也许可以说勋伯格使自己顺从了社会范围内的永恒异化。在最深的层面

上，古典艺术现成的艺术作品的理想，可能与他用来实现它的手段不相一致，像克劳斯关于“纯粹”言说一样，“纯粹”音乐的创造，最终也许是不可能的。^④但勋伯格努力获得它，提供了一个能测度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持久标准。

顺便说一下，阿多诺后来认为勋伯格型的音乐中否定的、批判的精神已衰落了，特别是十二音系对其后继者成了创作的僵化的命令之后。1952年阿多诺写道：“并不是说方法自身是假的——没有人能再作曲，如果他没有以自己的耳朵感到十二音技巧的引力——但毋宁说是它的实体化……要忠于勋伯格就得对所有的十二音派保持警戒”。^⑤但在30年代，阿多诺还是把勋伯格归入进步的音乐流派。

在阿多诺在简要地论述了勋伯格的学生贝格和韦伯恩（Webern）之后，他开始考察与勋伯格相反的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在阿多诺看来，他是反心理的新古典的“客观主义”的代表，这种新客观主义不顾现代社会中的异化和矛盾而退回前资产阶级舞蹈般的音调形式。与浪漫派用过去来否定当代不同，客观主义属于民间文化的一伙，他们非辩证地采纳旧的形式来套新的需要。尽管很难令人满意地说明其中介联系，但阿多诺还是走得这样远，认为客观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与法西斯主义有关，它运用的新原始派节奏与法西斯社会滋养的破碎的体验相呼应。客观主义作曲原则的非理性——作曲家的“趣味”而非音乐的、内在的辩证法成了决定性的东西——暗示了法西斯主义元首的独裁控制。^⑥斯特拉文斯基也可能因其“破坏性”被法西斯主义攻击，但无论他们知道与否，他的音乐确实表达了他们的思想。

也许更“反动”的还是D·亨德米特（Paul Hindemith）的音乐，他是法兰克福的名人之一。他天真、“健康的幽默”^⑦和反讽

刺的风格进一步推进了客观主义音乐思想的扩展。斯特拉文斯基在《一个士兵的经历》之类的作品中偶尔表现的绝望之情已在亨特米特作品中绝迹，他的作品与新客观主义建筑学虚假外表和种族宣传家的虚幻团体相似。一些无产阶级音乐，像 H·艾斯勒 (Hanns Eisler) 的一些作品，也遇到同样问题，无论它如何有宣传价值。阿多诺暗示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音乐中如同在一切艺术中一样，差不多和新古典的客观主义同样反动，两者都建立在没有成熟的和谐之上，忽视了勋伯格并未忽视的社会矛盾的存在。其结果只能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音乐，它依赖技术理性的模式，启蒙作用让位于消遣。在 K·韦尔 (Kurt Weill) 的音乐中，功利性音乐才偶尔转向了批判性。阿多诺赞扬韦尔片断的蒙太奇风格，它以与斯特拉文斯基不同的方式运用震动节奏，是当代进步的、批判的流行音乐。

文章的第二部分，载于《杂志》的下一期，在这里阿多诺从作品分析转向再创作的历史辩证法，转向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中介环节。他把音乐中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作了区分，前者存在着创作、再创作和即兴创作的连续体，后者则不存在这样的关系。在后者那里，作品像孤立的商品一样，与表演者分开，表演者解释的灵活性受到很大限制。19世纪已出现了“非理性”的表演者，他的个人主义与自由社会中持久的主体性领域相应。但到20世纪，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兴起，他们的合作者真正被本文的暴君制服了，此处阿多诺一再说到斯特拉斯基把自己的“趣味”强加给表演者，虽然他也担心演奏勋伯格音乐也可能避免不了同样的问题。^⑤

185

在理性化、管理化的当代世界，公众仍然渴望19世纪艺术家的灵性。有机被誉为高于机械，个性高于匿名，内在高于空

虚。客观主义在其创作中试图抓住这些特性，但没有成功，因为它们较之创作本身更应属于再创作的特性，阿多诺没有解释其中原因。他认为，客观主义矫正这种处境的努力失败了，带着傲慢的命令姿态的“富有灵性”的指挥不过是真正的自发性的糟糕替换，事实上，他是音乐中的极权主义专制者。

阿多诺接着转入一些音乐形式的普及性及它们在历史背景中的意义。他认为，歌剧已经在中上等阶级失去感染力，虽然小资产阶级仍然受到它压抑成分的吸引。相反，上层中产阶级日益光顾音乐会，因为它提供了主体内在性的虚假感觉，并暗示了财富和教养的虚假的协调。⁶⁹但是，追求真正的内在性在现代社会已再也不会实现，R·斯特劳斯（Richard Strauss）是最后一个有“意义”的资产阶级作曲家，但即使他的音乐，正如布洛赫所说，也失去了全部的否定。他所使用变音和不协和音都失去了批判力，而成了世界经济流通的象征。⁷⁰

斯特劳斯之后，除去先锋派无调性音乐之外的就是工艺美术，艺术成了纯粹的商品。曾一度用来嘲笑贵族的轻音乐，现在却用来使人服从于命运，民间音乐不再存在，因为自发的民族性，在流行音乐像所有的流行文化一样沦落为受上面操纵、利用的傀儡的过程中被毁灭了。文章的结尾，阿多诺评论了各种流行音乐的意识形态的功能，预告他此后几篇文章的计划。

这些文章的第一篇是《论爵士乐》，⁷¹主要写于他在英国期间，以“H·罗特维勒”（Hektor Rottweiler）的笔名发表，因为他依然时常回到德国。其内容大多来自1933年以前他和法兰克福音乐学校的爵士乐专家M·塞伯（Matyas Seiber）的谈话。⁷²那时，阿多诺尚未去过美国，对爵士乐没有亲身经验，和论述对象的距离使他的辩证想象显得动摇。这篇文章是以一种压倒而非说

学描述的施虐—受虐狂现象非常相像。”^⑦

在贬低黑人对爵士乐的贡献时，阿多诺是否表现了一种欧洲优越感呢？确实，在他的性格中有点地域色彩，这清楚地表明在他对非欧洲音乐形式缺乏兴趣。1934年认识阿多诺的麦尔在评论他的人格特征时说：“据我看，阿多诺从来没有带着单纯的看一看的愿望外出旅游的。对他来说欧洲已足够了，在他那里没有印度和中国，也没有第三世界，没有人民民主和工人运动，甚至在他必需的生活体验中，他也是一个老百姓——一个独立自主的小国的老百姓”。^⑧应当记住的还有，他最关心的爵士乐是由T·P·阿里（Tin Pan Alley）制作出来的商品性变种而非扎根于黑人文化自身的非流行性爵士乐，他表现出来的大部分明显迟钝都来自他未能把两者适当区分。

阿多诺认为，从纯音乐的观点看来，爵士乐也一无是处，它的节拍和切分来自军队进行曲，这透露出它和权威主义的关系，尽管它在德国遭到禁止。冷爵士乐和德彪西（Debussy）、德卢斯（Delius）的印象主义音乐相似，只不过被淡化和习俗化了。它的主体成分取自沙龙音乐，但很早就失去其自发性，事实上，把真实的自发性引入爵士乐的任何尝试都很快被其实体化的体系所吸收。在另一篇同一论题的文章中，他又说：“爵士乐的虚假发音与留声机、收音机时代中产阶级的私人‘乐器’钢琴的淘汰有关。”^⑨无须补充，钢琴是阿多诺自己的乐器，明显地受到偏爱。

更有意义的是，爵士乐倾向于音乐运动中的空间化而非时间化，这里阿多诺指出研究所理解的大众文化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神秘的重复取代了历史发展。在爵士乐中，一种永久的同一运动的稳定性代替了时间”。^⑩时间性的退化是与独立个人的瓦解含蓄地联系在一起。康德曾认为时间的展现是个性的重要属性，

阿多诺 1937 年在为此文写的补充中指出，^①爵士乐中个性主体解体的另一个证据，是它越来越经常地用作舞蹈或背景音乐，而不是直接被聆听。这意味着它不要求康德意义上统觉的综合，听众也就不再像聆听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一样被强迫参与一种实践，而是被降低到受虐狂式的被动状态。

如果说爵士乐中存在着一种否定的因素的话——当然阿多诺是不愿意承认它的存在的，尽管他具备自己的辩证观——那么它也只存在于其潜在而含糊的性含义之中。^②阿多诺写道，以生殖器为中心的主体压抑虽然可能暗示向性虐狂或同性恋的倒退，但它也可能提供一种超越家长制权威主义的社会秩序，这一看法实际上预示了马尔库塞后来对多型倒错的赞美。爵士乐器中最有特征的萨克斯管就有一种性解放的暗示，因为它是一种演奏起来类似于木管乐器的金属乐器。^③但几乎在其他每一个方面，爵士乐都表现出是向现有的秩序投降。

应当指出，对爵士乐的这种评价，即使在阿多诺到美国后也没有改变，1953 年在《持久的时尚——爵士乐》^④中，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对其保持敌意，就在去世前不久，他还以为早期的“H·罗特维勒”为名的文章对爵士乐的自发性的估价过分乐观了^⑤。阿多诺关于流行音乐的思想与 60 年代学生抗议运动的关系，是很难弄清楚的。据我所知，他从未正式讨论，这与马尔库塞不同，^⑥可能是爵士乐留给他的印象更多是虚假解放的方面而不是真正解放的方面。

发表《论爵士乐》后不久，阿多诺不必等太久就可以亲自抽样调查美国的流行文化了。他的牛津生涯行将结束，在这里他写下了关于胡塞尔的论文并开始研究贝多芬和瓦格纳（只完成了对后者的研究）。很清楚，回德国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而且霍克

海默和其纽约的同事早在亟盼他渡过大西洋了。30年代中期，他对研究所的吸引力已大到这一程度，以至霍克海默1936年7月13日欣然写信给洛文塔尔，说阿多诺现在“真正属于我们了”。此时研究所削减预算，难以接受一个正式成员，但是由于霍克海默的促成，阿多诺1937年6月第一次踏上了纽约的土地，^⑧印象总体上是好的，并决定一旦有机会就来美国。没多久，当时设在纽约的拉扎菲尔德的普林斯顿无线电研究中心，于1938年2月为他提供了一个主持其音乐研究的兼职工作。^⑨

阿多诺在无线电研究中心的期间是心神不定的，这主要是由于方法论上的原因，对此我们放在下一章再谈。另外，当时他面临各种各样的适应问题，这些问题研究所其他成员移美后的最初岁月也遇到过。同年3月，拉扎菲尔德在给其两位同事H·坎特
189
尔（Hadley Cantril）和F·斯坦顿（Frank Stanton）的备忘录中，谈到了对这位新来者的第一印象：

确如你们想象到的，他看起来像一位心不在焉的德国教授，举止怪异，让我觉得他像是五月花号的成员。然而你一旦开始和他谈话，他就有许多有趣的思想，正如每一个新到者一样，他试图改变一切。如果你细听他的话，其中大部分都是有意义的。^⑩

在以后的几年中，阿多诺拒绝成为美国的永久居住者，而且他对美国文化批判性距离并未实质上缩小。

虽然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他在学术上继续硕果累累。1938年他在《杂志》上发表来美后的第一篇文章《论音乐中拜物教特性和听觉的倒退》。^⑪这是针对本雅明面写的，本雅明的文

章发表在上—期杂志，^④我们很快会讨论到它。阿多诺继续坚持他对当代音乐总体的批判性评价，反对本雅明对流行文化的另一种形式电影的社会意义所作的乐观主义的分析。他还再一次攻击许多当代音乐中的虚假和谐。相反，他为新的禁欲主义辩解，因为在其对肯定性艺术中欺骗性幸福的根本否定中，它暗示了一种幸福的许诺。而且如前所述，他强调社会和艺术中的真正主体性目标，“个性的泯灭是新音乐的特有标志”。^⑤

这篇文章中的新东西是他对拜物教和听觉“退化”概念的探索。我们已经注意到，总体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中心范畴之一，对研究所而言，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基本特性之一是它对过去历史、当代现实、未来潜能的相互关系，及其一切伴随的中介和矛盾的响应。仅仅专注于三个要素中的一方面——比如实证主义，把目前的“事实”作为唯一的现实——就成为对全体中某一部分的拜物教。但是，拜物化并不只是一种方法上的失败，如马克思所说，它更应被视为异化的资本文化的一个基本特性，在这里，人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异己的对象来盲目崇拜。阿多诺按照马克思的方式，认为拜物化不仅是心理学范畴，它也是经济学范畴，其根源在于由交换价值而不是由使用价值统治的社会中的商品特性。^⑥ 190

由于音乐已受到资本主义精神的侵蚀，其拜物化程度几乎是全面的。在创作方面，表现在过度地注重乐曲的改写而不注重乐曲本身，表现在频繁引进色彩效果以及表现在因挑逗性价值面对过时音乐风格的怀旧式复活；在接受方面，重视古典（如托斯卡尼尼 Toscanini）和流行音乐中的“明星”，在乐器上崇拜斯特莱迭瓦里（Stradivarius）和埃曼第（Amati）的小提琴，把去“名牌”音乐厅而不是去听音乐看得更为重要；还表现在那些仅仅为

听而听的爵士热衷者的空洞迷狂中。但是，通过一般社会科学技术来改变拜物化是不可能的——这是阿多诺与拉扎菲尔德冲突的关键。咨询和交流都是不够的，因为听者自己的意见就是不可靠的，不仅因为他们不能克服文化规范的一致性，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的听觉能力已经退化，不仅是生理上，也在心理上。这个倒退不是倒回早期音乐时代，而是回到一种驯服的并害怕任何新东西的婴儿状态，这一状态与弗洛姆在《无能感》中所描述的被动的依赖很相似。像儿童只要过去品尝过的食物一样，听觉退化的听众只能欣赏他们以前曾听过的音乐；也像儿童对明亮的颜色产生反应一样，他们为色彩图案所迷惑，这些图案能提供令人激动而又有特点的兴奋印象。

阿多诺认为退化的听众并不限于任何一个阶级。^④如果说存在一种表现在其地位中的社会成分的话，那就是失业者的游手好闲。他们受虐式的自我贬抑虽然在目前是非政治化的和被动的，但它有可能转化为外向的毁灭性狂暴，疯狂的吉特巴舞的性受挫便表达了这种被抑制的敌意。阿多诺对这种压抑的恼怒可能转向建设性的目标这一点并不乐观；对大众艺术的革命潜力至少在当代肯定性的形式上，他也没有本雅明那样的充满信心。“在音乐中，集体权力不可挽救地在消蚀个性，但只有个体还能够有意识地、否定地反映集体关切。”^⑤可以预料阿多诺在这里看到了他自己和研究所其他成员的作用。他在普林斯顿无线电研究计划任期内，虽然在方法上与拉扎菲尔德更为经验的取向不同而招来麻烦，但决不是没有成果的。在 G·西姆森 (George Simpson) 的“编辑助理”下，^⑥阿多诺为该计划写了 4 篇文章，第一篇是《无线电音乐的社会批判》，1940 年送出，1945 年才出版。^⑦这是阿多诺在勋伯格以前的学生 E·克伦克 (Ernsk Krenek) 的工作基

础上完成的，他们在维也纳时就是朋友。

克伦克 1938 年就在《杂志》上发表论述无线电音乐文章，^⑧其结论是据 11 个国家的 67 个电台的调查作出的。他说大多数电台，对他自己参与写作的现代派无调性音乐极少播放，他的解释是，无线电的主要作用，即信息传播已经渗透到音乐传播之中，并且，通过音乐传送的信息必须整齐划一。他认为音乐已被电台退化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装饰品了。而且，无线电作为第二等级的再生产的媒介，处在实际演出之后，这就给听众的审美经验带来一个重要改变，在模拟参加音乐会的亲临感中，电台只能够保存演奏的“此时性”而不是它的“此地性”。这样它就摧毁了本雅明所说的艺术品的一个重要特性“氛围”（aura），即其仪式性、灵光性。与体验音乐的原封不动的“氛围”特性相反，无线电听众是在非个人化的、集体的、客观化的形式中聆听音乐的，其否定的功能已被剥夺了。

阿多诺同意克伦克的结论，他从论述一些基本原理开始：现代社会的商品性格，社会一切部门包括通讯的垄断化倾向，社会加强其服从因素以抗拒对它生存的威胁，社会冲突在文化领域的存在等等。^⑨在这些前提之后便是对克伦克论文和他自己著作的分析，上面已描述过，此处无需重述。此后三篇论文都是探讨流行音乐的，包括国家广播公司的“音乐欣赏一小时”和电台交响乐。^⑩

第一篇《论流行音乐》发表在《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与无线电研究计划合作的讨论大众传媒的专号上。^⑪文章仍然坚持他在欧洲就开始对爵士乐的敌视。他认为标准化和假个性是流行音乐的显著特点，只认熟悉的东西是大众听觉的本质，它以自身为目的，而不是导向更深入欣赏的手段，一旦某些程式取得成功，

工业就会反复鼓吹或大肆渲染某种同样东西，通过令人神魂颠倒的、移置了的愿望满足和被动的强化，最终使音乐成为一种社会的粘合剂。但阿多诺又认为，就爵士乐而言，流行音乐中仍然存在一种孤立的否定成分，他在吉特巴舞者的伪主动性所暗示的对被动性的怨恨愤怒之中看到它潜在地存在着的否定性。他认为如此表现出来的能量至少表达了一种未曾泯灭的意志的残余，这一争辩方式让人想起尼采对禁欲僧侣的分析，阿多诺就舞蹈写道：“为了变形成昆虫，人得需要一种能实现转变成人的能力。”^⑧

为拉扎菲尔德写的第三篇文章是对国家广播公司“音乐欣赏1小时”的内容分析，揭示它如何推广其荒谬的音乐知识。比这一项目（它从未出版，不久就过时了）更有趣的是他为无线电研究中心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这是分析无线电交响乐的。^⑨和克伦克一样，音乐的“现场”对无线电听众来说已失去，与此一道，音乐“氛围”的一部分也已失去。演奏的实际音量和作为现场观众的一员而产生的共同感也同样失去了。通过孤立的个人，电台摧毁了交响乐的“空间”——这有点像大教堂的空间，在真实的音乐会上这一空间环绕着每一个听众。它也使观众回到连续时间而不是使之沉浸在“时间意识的悬置”中，^⑩后者才是贝多芬式的伟大交响乐的特性。（阿多诺赋予这一“悬置”的意义不同于肯定性文化中重复的无时间性，通常的时间确实被伟大的艺术品所悬置，代之而来的是一种内在发展，它是“另一个”社会的时间秩序的预示。本雅明特别喜欢在“同质的空洞的”时间和“被当下现场充实的”时间之间作出区分。）^⑪连续时间与真实个性的瓦解相应，真实个性意味着有意义的发展以及与总体性的关联。阿多诺认为“原子化了的收听趋势”可能是当代最普遍的音乐意识”。^⑫剥夺其作为审美总体的统一，交响曲堕落为孤零零旋律的

型” (gestural type) 等概念来说明音乐的社会内容。另一个新概念是“幻影” (Phantasmagoria), 显示出瓦格纳企图通过看起来“自然有因”而来掩饰其音乐的社会心理起源, 这与马尔库塞和洛文塔尔已经指出的许多权威思想的欺骗特征一样。阿多诺将瓦格纳的意识形态特征和其歌剧中的神秘成分联系起来: 这些成分寻求解释无意识的同时又把现实消融于其中。阿多诺还从“叛徒”的背叛革命的角度来讨论《尼伯龙根的戒指》, 再次使用了《权威和家庭研究》中弗洛姆的理论文章所提出的一些概念。在发表于《杂志》的是后片断中, 阿多诺分析了瓦格纳取自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 他承认瓦格纳的幻想中包含一定程度的乌托邦抗议, 但在其辩证探索中总是或几乎总是能感到一种被抑制了的否定情调, 甚至在其最肯定的文化作品中也是如此。

关于瓦格纳的手稿虽未发表, 但还是在洛杉矶的流亡朋友中传了开来。当时纽约显然是大部分流亡者的居住地, 也有一些人迁到加州, 其中一些受到好莱坞的吸引开始从事电影业, 这其中值得一提的人物有 H·曼 (Heinrich Mann)、A·柏尔伽 (Alfred Polgar)、布莱希特、A·杜勃林 (Alfred Döblin) 和 W·狄特莱 (William Dieterle)。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1941 年到达后, 很快被接受进流亡社会。^④这些人中最杰出的是托马斯·曼, 关于他, 霍克海默早期曾写过不完全赞同的文章, 1938 年时认为,^⑤曼突出的嘲讽有消极的含意, 他支持魏玛也是病态的幻想。然而, 霍克海默认为曼拒绝纳粹是一个进步的方向, 并预言他将越来越激进。

在他们到达加州时, 原来的分歧已经缓和, 曼成为这两个流亡者的好朋友。40 年代, 曼偶尔还参加研究所的发起的研究会, 让研究所借用他的名义研究德国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迫害问题, 这是在 1943 年通过流亡者的报纸《建设》中的调查来进行的。^⑥

由于越来越想以小说的形式表现纳粹的起源和经历，曼终于发现可以用一个作曲家的生平和著作来象征地表现德国文化的堕落。不出所料，阿多诺独特的音乐和哲学的背景吸引了曼，引起他注意的第一部著作是论瓦格纳的手稿，曼认为它是“极其机敏的论文……从未完全疏忽否定方面……与我自己的文章《瓦格纳的苦难与伟大》有一定相似。”^⑩

阿多诺 1943 年 6 月将随后的著作送给曼，给他留下更深的印象。其中一部分后来称做《现代音乐的哲学》，主要是论述勋伯格的，它发展了阿多诺 1932 年发表在《杂志》上的一些论题。40 年代阿多诺已开始对原先偶像的音乐持批判态度，特别针对勋伯格接受了他的学生对十二音系的实体化。在曼看来，此时也生活在南加州的勋伯格“在他的学生的尊敬中感到批判的口气”，^⑪从而引起关系紧张。另一方面，曼却对阿多诺谈到的东西有很大的热情并准备体现到正在写作的小说中去。

在后来讨论小说《浮士德博士》时，曼表达了他对阿多诺帮助的感激之情：“系列体系的分析 and 批评已改编成《浮士德》一书的第十二章的对话，这是完全以阿多诺的论文为基础的。这也包括后来对贝多芬音调语言的评论，像书中出现的克莱特辛玛（Kretschmar）的胡言乱语：死亡建立了天才和习俗之间的离奇关系。”^⑫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曼经常向阿多诺讨教，1943 年 10 月，曼聆听了阿多诺“以一种高超的启发方式演奏贝多芬第三歌剧奏鸣曲的全部。”印象是深刻的，他回忆道：“我从未这样聚精会神过，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早，并连续 3 天沉浸在讲演的修改和深化之中；它使这一章，甚至全书更加丰富生色。在我为咏叹调的主题所写的诗意而非写实的词语中，我无意中提到了阿多诺的姓 Wiesengrund（青草地）以此来表明我的感谢。”^⑬1945 年

12月，曼给阿多诺写了10页纸的信，为自己以“谨慎的放肆”采用他即将出版的书而道歉，^⑩并征求他进一步的意见，他很快得到乐于帮助的答复。小说最后在1947年出版，阿多诺收到由曼题有“私人顾问”的献书。^⑪附带提一笔，曼和勋伯格的关系由于作曲家指控他的思想被无回报地剽窃而瓦解了，曼在此后各版中都加了说明。^⑫《现代音乐的哲学》于次年出版，其中加进了战时写的论斯特拉文斯基部分以平衡勋伯格的章节。后来，阿多诺把整本书作为《启蒙辩证法》的一个长的附录，我们在第8章会讨论《启蒙辩证法》。

196

40年代，阿多诺还和加州的另一位流亡者艾斯勒合作研究电影音乐，但由于阿多诺不愿和较多卷入政治的艾斯勒搅在一起，所以此书于1947年出版时，他没有署名。^⑬在此期间他也写了一些论述赫胥黎、卡夫卡和一般文化评论的文章，回到德国后以《棱镜》为名收集出版。1948年夏，《现代音乐的哲学》刚刚完成，他就转而思考苏联集团的音乐，其结果是高度批评性的《管教音乐》(Gegängelt Musik, 管教的大意是处于被束缚被监视之中)，^⑭其中他攻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鼓吹的“健康”艺术。

除了评论文化问题，阿多诺还坚持他的理论兴趣，写了《启蒙的辩证法》和格言集《最低限度的道德》。^⑮在《权威人格》和对一个美国煽动者的研究中，他也不惜时间尝试使用美国的经验主义方法。^⑯1949年和霍克海默一起回到德国后，他在加州的工作并未结束，1952—1953年冬季，他又回到美国几个月，主要是为了保持其美国国籍。通过写作《权威人格》所形成的各种联系，他成为海克尔基金会在伯弗利·赫尔斯(Beverly Hills)科学分会的会长。在这里，他完成了论述美国大众文化的最后两部作品，第一本和B·T·爱德生(Bernice T. Eiduson)合写，论述新

的大众传播媒介——电视。他们经由对原作内容的分析来揭示电视表演的潜在意义；^⑭第二篇长文更有独创性，是对《洛杉矶时报》占星学专栏的研究，^⑮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已有一些关于神秘术的见解，^⑯在《权威人格》以后的其他著作中，他能鲜明地拓展其批判。

阿多诺把这个研究叫做“诸星落地”，就占星术影响诸如阶级之类第二集团而不是像家庭之类第一集团的意义上，它被称之为“第二等”迷信。这样，尽管阿多诺使用了心理分析的洞见，¹⁹⁷并得到了受过心理分析训练的 F·海克尔（Frederick Hacker）博士的帮助，但是这些洞见主要针对的不是个体而是集团。更准确地说，它们是用来探索的是存在于个体心理与被称为个人意识之间的心理社会（Psychosocial）层面。阿多诺对弗洛伊德最有兴趣的是其《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一书。^⑰结果，这一研究成了研究所以其权威分析来批判大众文化的汇集地，阿多诺得出结论说占星学是一种“依赖的意识形态”，^⑱适应了人的非理性需要，这些人在《权威人格》中属于 F 表上的高分获得者。

阿多诺在加州的岁月是多产的，在论赫胥黎的文中写道：“这是很清楚的，来自外国的知识分子，如果他希望得到什么或被接受为高度信任的被雇者，他就不得不消除自己的独立存在进入一个紧缩的人生。”^⑲不过阿多诺从未追求也未得到这种接受，至于他有什么所得的话，那么他也只是加强了他顽固保持着的外在性。与屈从于美国文化的“高度信任”的要求相反，像研究所的大多数人一样，他能够为一批理想而非现实的读者写作——研究所论权威问题的著作除外。反讽的是，他回到德国之后，这种读者才得已现实化，其人数之多使阿多诺成为其时代中主要的欧洲思想家。

对研究所或美国的精神生活来说，本雅明移居纽约意味着什么？当然无从知道；他如何会将自己的才能和其他成员统一起来，也只能是猜测一下而已。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曾希望他更紧密地靠拢批判理论，也曾遥遥相劝，至于他是否会继续拒绝，这只能靠臆测了。可以确定的是，研究所对他的早死感到极度失望和痛惜，在以后的岁月中，又努力为他赢得他生前不曾有过的名声与称赞。最初的表现是1942年油印了一本（因为此时研究所财政困难）怀念他的文集，在小范围内流传，它收集了霍克海默、阿多诺及本雅明自己的文章。^⑩研究所迁回德国后，阿多诺在本雅明的老朋友G·索列姆（Gershom Scholem）的帮助下，出版了本雅明的作品与书信，在后来10年中，它激发了对本雅明的广泛兴趣。关于阿多诺对他这位友人思想的解释，无论可以提出多少批评，也无论人们对阿多诺勾划的本雅明形象反应如何，人们都不能否认，正是由于阿多诺在索列姆合作下所做的努力，本雅明才成为一个如此引起争论的人物。 199

阿多诺从未否认，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神学和唯物主义成分统一起来的观点，全是本雅明自己的。充分探讨这一点需要另外的研究，况且这已由R·泰德曼（Rolf Tiedemann）写出了，^⑪所以此处不再做此尝试。其实，仅仅梳理出过去10年中围绕本雅明的争论就是一件庞大的任务，^⑫这里只讨论本雅明和研究所的特殊关系及他为研究所写的著作，特别是他对大众文化的分析。

本雅明1892年生于柏林，和大多数研究所成员一样，本雅明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同化了的犹太之家。他的父亲是艺术古董商，从他那里，本雅明继承了收集古籍和艺术品的雅好。^⑬但本雅明和家庭的关系并不和睦的，尽管他在书中一再回忆童年的生活，但这显然是他十分悲伤的时期。^⑭像德国许多不满的资产阶

级少年一样，战前他参加了 G·韦尼肯（Gustav Wyneken）的青年运动，加入其中最激进的一派，这一派多由犹太学生组成。^④这期间，他成为柏林自由学生协会会长，并以“阿德尔”（Ardor）的笔名频频为韦尼肯的《先锋报》撰稿。战争期间，他对另一种逃避资产阶级生存压迫的方式产生了兴趣，因而被排挤出青年运动派。此后几年，犹太复国主义吸引了他的热情，这一兴趣由于他和索列姆的友谊而强化，后者也唤起他对犹太神学和神秘主义的兴趣。本雅明 1927 年与之结婚的夫人道拉（Dora），是著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L·凯尔纳（Leon Kellner）的女儿。但是本雅明对复国主义的承诺从未虔诚不二，1922 年他拒绝索列姆到巴勒斯坦的请求，尽管后来的信件表明他对这样的变动似感兴趣。^⑤但他 20 年代的婚姻变故——1930 年离婚——也许是他不再坚持犹太复国主义热情的另一个原因。^⑥

不过，他在索列姆的影响下的犹太教的研究却强烈的影响着他一生，尽管 1922 年以后——这一年索列姆离开，一个从宗教观点进行文学评论，被称为“新三钟经”（Angelus Novus）的计划失败——它已不像从前那样成为他的注意中心。我们已讨论过 200
研究所著作中一些犹太倾向：不愿称呼或描述“另一个世界”这一思想是批判理论中心；弗洛姆对哲学人类学的兴趣与布伯尔及其在法兰克福的同事相近。犹太思想和习俗对本雅明的影响有点不同，他最感兴趣的是卡布拉（Cabala），这是犹太神秘著作中最奥秘的一种，就此而言他和索列姆的友谊是很重要的。当《瑞士评论》编辑 M·雷赫纳（Max Rychner）向本雅明询问其关于巴洛克悲剧的《德国悲剧的起源》的深奥导言时，本雅明要他参阅希伯来神秘教义，^⑦引起本雅明兴趣的是其用来探索意义层面的注释技巧，1931 年，当本雅明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之后，

应并不特别好，^④阿多诺的反应也显示出他不赞成本雅明思想中残存的犹太思想。^⑤

另一方面，研究所对20年代中期本雅明所采用的马克思主义牌号也没有表现出全部热情。不像其他人，本雅明接近辩证唯物主义是在其战后岁月的英雄时期，^⑥虽然他的好奇心早在1918年就已产生，当时他在波恩与布洛赫是好友；^⑦卢卡契的著作，特别是《历史与阶级意识》、《小说理论》是他走向马克思的另一桥梁。^⑧私人交往在这方面也有关键作用，1924年在坎坡里度假时，本雅明遇到了苏联女演员兼导演A·莱茜（Asja Lacis），她正同剧团巡回演出布莱希特的《爱德华二世》。本雅明此时与道拉的婚姻已遇到麻烦，可能因此而掉入了与莱茜小姐的爱河中。总之，她把本雅明介绍给她的马克思主义的朋友们，并帮助安排了本雅明1926年冬天到莫斯科的旅行。在苏联首都，他见到马雅可夫斯基与皮埃利（Byeli），并应邀为苏联百科全书写歌德的条目，它实际上没有完成。然后在1929年，莱茜小姐又把他介绍给布莱希特，后者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布莱希特和本雅明的关系是近来的争论的主要根源之一。索列姆和阿多诺认为这种影响有害多于有益；^⑨阿多诺的学生泰德曼认为这一种关系主要应从心理上面非思想上来理解，因为本雅明畏惧布莱希特。^⑩他们一致认为，特别有害的是本雅明接受了布莱希特粗糙的，甚至是庸俗的唯物主义。至少在阿多诺的眼中，本雅明接受了他的朋友对流行艺术和技术革新的革命潜力的过分乐观主义的态度，这几乎是不幸的。对布莱希特人格的不信任无疑增加了他们对他控制本雅明的厌恶。应当说，法兰克福学派从未在政治问题上和布莱希特一致，尽管他们尊敬他的文学成就。本雅明死后，布莱希特搬到加州，与霍克海默、阿多诺作了

社交性交往，但正如他们的日记显示的，^⑭过去的敌意并未消减。对布莱希特而言，研究所由“收费的知识分子”组成，为了美国财团的支持而出卖自己（他准备写一本小说，是虚构一个收费的中国皇帝，但从未完成）。他们回敬他是小资产阶级的装腔作势，是斯大林主义的辩护者。

202

另一方面就本雅明而言，布莱希特对他却极有吸引力。“我赞同布莱希特的作品”，1933年他写道：“这是我主张中的最重要也最有力的观点。”^⑮30年代在巴黎认识他的阿伦特认为，吸引力在于布莱希特的“粗糙的思维”，^⑯这种粗糙思维恰恰是对辩证法细致精妙的拒绝，而阿多诺对此是非常厌恶的。她继续认为本雅明在布莱希特非中介的唯物主义中发现它更多地诉诸现实而非实践，对他来说，现实最直接地表现于日常语言的谚语和习语之中。^⑰并不只是阿伦特小姐一人认为布莱希特对本雅明充满魅力，研究所的其他诋毁者甚至控告阿多诺、索列姆为了自己的目的而蓄意减少布莱希特的重要性^⑱。然而看起来情况并非如此，通常属于阿多诺、索列姆阵营的泰德曼就在1966年编辑了本雅明有关布莱希特的文章和评论的集子。^⑲至于他们坚持认为这一关系的有害性则是无人否认的，事实上可以说，本雅明对布莱希特在充满敬意之中也有对此友谊的警惕，他拒绝永远离开巴黎和布莱希特流亡到丹麦。^⑳另一方面布莱希特似乎依然忠实于他们的友谊，直到本雅明去世。事实上，他关于1940年事件写过两首极为动人的诗。^㉑

阿多诺发现，本雅明接受布莱希特庸俗唯物主义中非辩证的成分，可能是本雅明与研究所其他成员不同精神背景的产物。本雅明的大学训练在柏林、弗莱堡和波恩，战时他在那里以其关于德国浪漫派的论文得到学位，^㉒对他影响最大的哲学是新康德主

义，生命结束之前，他写信给阿多诺说 H·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⑭但从一开始，本雅明看来就对康德不可知的二元论以及现象和本体的区别不满意，早期的文章写道：“新认识论的任务是找到一个与主客概念相关的中间地带，换言之，查明一个自律的、最初的范围，在其中这个概念决不含有一种形而上学实体的关系。”^⑮当然，这样做时他的立场是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阿多诺相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较少地受到黑格尔的影响。总的看，本雅明追求从哲学的晦涩语言的负担中解放出来，这被他当作不厌其烦的饶舌而放弃，^⑯在这一要点上他与霍克海默是不同的。^⑰

203

摩擦的另一个根源，至少就他和阿多诺而言，是他对音乐不感兴趣，特别是他无意将它作为批判的潜在媒介。据阿多诺说，^⑱本雅明年青时就有一种对音乐的敌意，此后一直未能克服，他的重要文章《作为生产者的作家》，^⑲写于布莱希特的影响最大的时期，本雅明认为，文字必须赋予音乐以政治内容。在《量取》中，他选择布莱希特和艾斯勒的合作作为典范。在他的著作中，几乎没有有迹象说明他和阿多诺一样嗜好现代音乐苛求的形式或相信音乐的非表象性的重要性。

而且，本雅明的思想总是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思想更富推论性，更关心特殊中包含的普遍意义。虽然所有的批判理论都对总体与部分的相互作用感兴趣，但霍克海默等人不会不加限制的接受本雅明的观点：“只有在他面对的历史主题处于一个单元的情况下，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才能进行探索”。^⑳研究所的思考方式总是比他更富说明性，更集中于揭示各种社会现象中的不连续性和中介。对本雅明而言，非同一性的重要并不像其他同事说的那样大。所以他不像他们那样热衷于拯救主体，他的静态“辩证

评论。^⑧尽管其作品常常是高质量的——他的童年回忆录开始在《法兰克福时报》上连载，后以《1900年的柏林童年》^⑨出版——但几乎没有引起注意。

纳粹掌权意味着本雅明在德国的收入来源的完结，在尝试以笔名 D·赫尔兹 (Detlef Holz) 和 C·康拉德 (C. Conrad) 写作失败之后，他意识到必须移居，巴黎是他以前出访中感觉舒适的地方，因此被选来作为流亡之地，在许多方面，这个现代城市成了他著作的中心。^⑩巴黎是欧洲繁华的大都会——早在 1927 年，他就开始研究 19 世界前史的资产阶级文化，它以巴黎作为中心比喻，名之曰“拱廊计划”（指巴黎的过道或拱廊），这占据了本雅明一生中的剩余时光。虽然多达数千页，也只是他并不满意的未完稿的一部分。

研究所在这一计划发展中的作用是争议的另一根源。1935 年以后本雅明在巴黎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研究所供给的。另一些计划如书信选集以“Detlef Holz”为名在瑞士出版，^⑪可能带来一些收入，但如他自己说并不太多。本雅明与阿多诺 1923 年在法兰克福相会并结交，^⑫1934 年本雅明从德国出来后，阿多诺说服霍克海默在《杂志》上发表他的一些著作。第一篇论文是研究当代德国作家社会地位的，发表在这一年的第一期上；^⑬接着不久是一篇语言社会学的概述，显示出他终生对语言及其广泛含义的兴趣。此后不久霍克海默邀请他加入在美国的研究所，尽管 1935 年 4 月本雅明写道：“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比这更紧迫的了：把我的工作尽可能紧密而富有成果地和研究所联系起来”。^⑭但他还是谢绝了邀请，不过在同年底，他完成了一件与研究所巴黎办事处合作的研究，并开始定期接受研究所的薪水，虽然不多，但也使他可以说“立即使我摆脱负担。”^⑮

因为本雅明承认他对研究所的经济依赖，所以《选择》小组认为他的著作由纽约的编辑们在基本方面作了改变，甚至是被检查过了。这里无需考察错综复杂的文本问题，也可以无误地说本雅明著作的偶尔的文字改动是在无关大局的方向上进行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他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本雅明原来的结尾是这样的：“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将政治艺术化的情形。而共产主义便报之以艺术政治化。”这段话也出现在《彩饰》的英译本中。但在《杂志》的印刷文本中，“法西斯主义”被代之以“极权主义”，而“共产主义”却代之以“人类的建设性力量”。在同一页上，原文中“帝国主义的战争”被改成“现代战争。”¹⁸

这些改动通常是和本雅明联系后作出的，而不是在他把已完成的文章送给研究所的纽约办事处之后。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即他们并不特别要求本雅明与论断式的批判理论一致，而是《杂志》为避免政治麻烦而常用的伊索式语言的一种反映。新学校其他流亡者的指控阿多诺后来不情愿地和艾斯勒合作、格罗斯曼书籍英文版书名的微妙改变等等，这一切都在前面提到过了。有充足的材料表明研究所在美国感到不安全，它希望其所为尽可能不使处境危险化。还在实际迁移之前，霍克海默就在《黄昏》中写道：“或早或迟政治避难的流亡权实际将被废除……一旦它不再关心难民是来自苏联还是种族恐怖，流亡的权利将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中消失。”¹⁹ 毕竟已被迫逃离一个大陆，他和他的同事们不希望再次招惹相同的命运。

这一恐惧在霍克海默和洛文塔尔的通信中也明白地表现出来。例如，1939年7月30日，格文塔尔写信给霍克海默谈到参议院正在考虑一个范围相当广的新的驱逐出境法。据此，他建议

霍克海默在写文章时，在“自由主义”之前加上“欧洲”。1940年6月30日和8月4日，他提到警察查访研究所，虽是例行公事，但也是不祥之兆。甚至到1949年6月26日，研究所在研究美国工人中反犹主义时，霍克海默还担心美国右翼对“一伙外国出身的知识分子多管闲事地探听美国工人的私事”的反应。这种不安全感 and 研究所传统的坚持一个“科学的”而不是政治机构的愿望结合起来，使他们对本雅明文章中更有煽动性的段落感到吃惊。

另一方面，同样明显的是《杂志》确实发表了一些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不完全同意的文章——《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和《Eduar Fuchs, 一个收藏家和史学家》，^⑨对他们来说这两篇太激进了，然而，出版时究竟改动了多少是不明确的。^⑩《拱廊计划》中重要的一段完全被删去，看来这主要是由于阿多诺有保留。1936年，本雅明对19世纪法国革命家A·布莱克维（Auguste Blanqui）不出名的宇宙论思考印象很深，它出现在布莱克维的一本叫做《星体的永恒性》的书中。^⑪布莱克维机械的自然观看来与本雅明的由一种永恒的轮回统治着的社会秩序有关。在《波德莱尔的第二帝国的巴黎》一文中，本雅明要做的是在布莱克维和这本书的中心人物波德莱尔之间发现一种隐蔽的关系。这篇文章是其三部曲研究的第二部，三部曲是《拱廊计划》的一个缩影，或者试着叫“巴黎，十九世纪之都。”第一部分是讨论作为寓言家的波德莱尔，第二部分是反题包括刚刚说的那些内容，是对诗人的社会解释，第三部分以分析作为诗人对象的商品来综合前两部分。^⑫

在第一次阅读《波德莱尔的第二帝国的巴黎》手稿时，阿多诺作了评述，那是1935年夏天，在他霍恩伯格的黑森林度假——纳粹掌权后阿多诺偶尔还回到德国——时给本雅明写了一封

长信，概述了他的反对意见。^⑤最基本的批评是本雅明把商品拜物教这样的范畴作了寓言的、非辩证的运用。正如上述，阿多诺视物化为所有人类客观化的必要成分，因此他反对本雅明在商品和“古风”(archaic)本身之间划等号。

和这一批评联系在一起的是阿多诺不满意本雅明对“辩证的想象”的运用，它把历史过程客观结晶化了。在他的信中，阿多诺认为本雅明设想的那种辩证的想象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太紧密了。相反，阿多诺认为“辩证的想象不是社会产品的模型，而是客观化的群集，社会条件只是其中的一个特例。结果，辩证的想象不能期望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一般的社会产物。”^⑥而且，把辩证的想象还原为一种荣格式的集体无意识，像本雅明偶尔做的那样，就否认了个体延伸的重要性。“当我反对集体无意识时，”阿多诺解释说：

当然，这并不是让“资产阶级个人”充当实际基础，它是使内在性（这一词语使人想起他研究基尔凯郭尔时的使用）的社会功能透明化并揭示其作为幻影的包容性。但作为幻觉并不与人格化的集体意识相对立，而是与真实的社会过程相对立，这样“个人”是辩证过渡的工具，它不应该被神秘化地打发掉而只能被扬弃。^⑦

在11月给本雅明的信中，阿多诺对波德莱尔和巴黎论文的进展仍不满意。^⑧他详细说明了他反对本雅明非辩证的神学和哲学方法：“可以这样说，神学按照事物的名字称呼事物的倾向势必转化为对简单事实作令人震惊的表达，如果要严格地说，这部著作是处在巫术与实证主义的交叉点，这交叉点被魔幻化了。只 208

有理论能破除符咒：用你自己的无情的、善的、思辨的理论”。^⑧作为其保留的结果，阿多诺提议不接受这篇论文，而洛文塔尔主张部分发表，因为这样“就不会让你想起这本书必定向你描述的方式”。^⑨

尽管采取了克制但并不愿完全放弃，本雅明回信作了一些辩护。^⑩主要观点是偏袒文中的语言学的探索：

封闭事实的现象是语言学研究中固有的，并给研究者一种迷惑，只有当客体在历史远景中建构时，它才消失。这一建构的基础路线聚集在我们的历史经验中，所以客体是作为一个单元建构自身，在这个单元中，神秘地固定在这一文本中的每一件事情都将产生活力……如果你回想我的其他著作，你将发现语言学立场的批评对我来说是一个老问题——与神话批评是天生同一的。^⑪

但是，阿多诺仍然对这篇文章辩证优点的持有异议，它也从未由研究所出版。^⑫在此后的通信中，两人继续就本雅明 19 世纪的“前史”进展进行争论，最后在 1939 年第一期的《杂志》上，《巴黎，十九世纪之都》的部分内容由本雅明改为“波德莱尔的一些主题”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本雅明提出了全部研究的许多主题，有些我们已说过。其中之一是他对两种经验的划分：综合的经验和原子的经验，他援引普鲁斯特、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的一些洞察，为真正经验中传统的位置辩护：“经验确实是传统的问题，无论是集体经验还是私人经验，与其说是紧紧停泊在记忆中的事实的产物，不如说是积累起来的记忆和不断的无意识材料聚集的产物。”^⑬阿多诺也强调勋伯格音乐中活生生的、能被唤起的

传统的相关性，虽然它是异常新鲜的。他们都看到对真实经验的侵蚀是现代生活的特征，一个例子是本雅明给出的——以被分离的信息作为主要交流方式取代连贯的叙述——这在克伦尼克论无线电音乐时也被用过的。另外，创伤性震惊 (traumatic shocks) 的增加作为现代生活的刺激，^⑨也可以在研究所各种心理研究中找到回音。第三，波德莱尔著作中人群的作用，也是研究所论述大众文化的常见主题。应当说，本雅明对波德莱尔关于人群的理解多少有点批评：“波德莱尔认为把群体中的人……与游手好闲者等同起来是适合的。这是难以接受的观点，群众中的人并不是‘游手好闲的’。”^⑩

209

本雅明对那些悠闲地逛在巴黎拱廊下的游手好闲者的迷恋，有利于那些强调他著作中静止成分的批评者，^⑪更鲜明的证据是本雅明对波德莱尔力图保留艺术所揭示出来的感应很感兴趣。他有点隐秘地解释道：“波德莱尔感应的意义”：

可以描述为一种经验，即在抵御危机的形式中寻找自我确立的经验，这只有在礼仪的领域中才有可能，如果它超出这一领域，那么它就将自身呈现为美的，在美中，艺术的礼仪价值表现出来。感应是回忆的资料——不是历史的资料，而是前历史的材料。^⑫

在其他地方，本雅明对歌德称之为“原始现象”这一贯穿历史的永恒形式“也表示了相似的迷恋。”^⑬所有这一切使其思想的神学根源昭然若揭。

还必须理解的是其思想中的历史部分，这由于他走向马克思主义而得到加强。在同一篇论波德莱尔的文章中，他指责柏格森

以绵延时间的观念来消除死亡，其论点和霍克海默关于柏格森的论文相似^⑨：“消除了死亡的绵延，是一卷糟糕的没完没了的卷轴，传统也被它清除，它是流逝时刻的实体化，穿着借来的经验之衣而到处炫耀。”^⑩而且，正如泰德曼已指出的，^⑪歌德的“原始现象”已被本雅明从自然的转化为历史的，“拱廊计划”是19世纪的一个“前史”，而非全部人类史，甚至本雅明对克劳斯的名言“起源就是目标”的喜好——他在《关于历史哲学的论文》中引用过^⑫——也不能理解为一种回到柏拉图或歌德式的原始形式的欲望。起源也意指新颖，^⑬而且对本雅明来说，神话的一个基本方面是它的重复性和非创造的同一性，始终划一（总是同一个）是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神秘的感性的一个显著特征。

为了对那些强调本雅明思想中静止成分的人公正起见，应指出本雅明还写了许多与其对相关于感应礼仪价值的怀旧病相背离的东西^⑭，这在《论波德莱尔的一些主题》的结尾可清楚地看到，这里他接触到了“艺术复制的危机”问题。^⑮但更明显的是他早期发表在《杂志》上的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在这里他指出了后来为研究所的文化分析频繁使用的概念“氛围”（aura），如上所述，氛围是围绕在艺术品原作周围的独特性，它是赋予作品本真性的独特的“此时此地”感。本雅明认为它也存在于自然中，“无论它会多近，但总有一种距离的独特现象”。^⑯艺术中也是这样，不可接近性是艺术品“氛围”的基本成分，是和礼仪、巫术等艺术所由而来的作品相联系的，艺术品的真正氛围不能在复制的艺术中一再保持，——显然，本雅明更多指造型艺术而非音乐和戏剧，尽管阿多诺和克伦克讨论无线电时所表明的，音乐也可能有氛围。

任何附着于“氛围”的史前的礼仪性质，本雅明都承认它的

超越感应的历史因素。“一个事物的真实性是它一开始可传达的全部实质，它从其实体的绵延趋向对其经历的历史的显示。”^⑧在同一文的后面写道：“一个艺术品的独特性是与它置于传统构造中的存在不可分割的。”^⑨这样，“氛围”艺术在大众文化时代的结束不仅意味着艺术感应的丧失，也是意味着植根于传统的经验的结束，它是现代社会文化危机的一方面。对此，研究所的同事都是赞同的，他们也乐意接受由氛围的失去而得到的结论，“真实性的标准一开始不再适合艺术创造，艺术的总体功能就被颠倒了。与以礼仪为基础相反，它开始以另一种实践——政治为基础。”^⑩随着机械复制的进步，礼仪价值被展览价值取代，本雅明认为最好的例子就是电影。

研究所的其他成员，特别是阿多诺不同意本雅明对这一变化的影响的评价。首先，他们总是认为艺术有其政治功能：是被当代环境否定了的“彼岸”世界的暗示。他们现在担心的是大众艺术 211 具有一种新的、与传统的“否定”直接对立的政治功能。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致力于调和广大观众和现存秩序。对此，本雅明是不同意的，在悲悼“氛围”丧失的同时，他自相矛盾地坚持相信政治化的、集体性艺术的进步潜力。在此他又一次追随布莱希特，后者对电影的革命功能持乐观态度，虽然本雅明个人对电影颇感失望。^⑪用本雅明的话说：

艺术的机械复制改变了大众对艺术的反应，对毕加索画的反动态度改变为对卓别林电影的进步反应。这种进步反应特征是视觉的情感的欣赏与行家取向的直接而又密切的相融合……面对屏幕，公众的批判和接受合为一体。^⑫

Adler)《艺术与审慎》的机会,发表了一个关于大众文化的一般声明,^⑧他的许多论点本书已编入相关章节。

研究所成员中,对大众文化分析最广的是洛文塔尔。早在1929年在柏林和法兰克福时,他就写过正式的戏剧批评和有关人民舞台的美学问题的文章,尽管早期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主要是论述像易卜生和迈耶尔这样的文学人物的,他也对高级文化的大众接受感兴趣,如论述战前德国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读者等等。40年代他把注意力转向大众艺术更直接的样式,由于拉扎菲尔德项目给他提供了秘书和助手,他在费城写作新闻评论和新闻节目的分析的手稿。他也对德国一次大战后的流行的传记进行了内容分析,许多年后在献给马尔库塞的纪念文集上发表。^⑨他关于美国杂志中传记的类似论文发表于拉扎菲尔德的《无线电播音研究:1942—1943》。^⑩他还写了一些讨论文章,预示了《启蒙的辩证法》中的对文化工业的讨论。其实,整个40年代及此后他和研究所的联系中断了,洛文塔尔继续探索大众文化,其顶点是1961年出版的选集《文学,流行文化和社会》。

霍克海默迁移到加州后,和洛文塔尔的通信,值得在这里评述一下,由此可以看出研究所对大众文化概念的认识。1942年2月3日,洛文塔尔谈到他即将完成的论述杂志传记的论文:

另一方面,历史信息对大众来说成了一个谎言之网,一个最没有意义的人和事的可笑堆积之网,同样的,大众通过他们对这些人及其“消费”方式的占有而表现出渴望清白的人生。从我的全部内在生活中,就生产的永远变化、转换的意义上来说,我能越来越多地减少对整个生产观念的憎恨,通过机械和组织不停地对待人和自然,应该成为多数人意识

和无意识的生活。在一定意义上，我前几年研究的德国传记和美国材料紧密相关的。前者通过玄奥的形而上学和心理玄学幻境的魔法之网来伪造历史，后者则刚好倒过来，它不是严肃地对待历史，而是使之滑稽化了（原文如此）。但是：两者都代表了人的概念的被扭曲了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是我们的肯定的方式所固守的，也就是说，两者都意味着真实的、活着的、存在着的个人的无条件的重要物：尊严、幸福。

几个月后，霍克海默在一封信中提到这一文章并涉及到他自己的《启蒙的辩证法》，这封信写于6月2日：

我特别为论“重复”的段落高兴。这个范畴将在全书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生活与艺术中缺乏你所说的对永恒重复的反抗，这表明了现代人坏的顺从，可以这么说，这既是你论文的主题，也是我们书的基本概念。……我们不能责怪人们更多地对私人消费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感兴趣，这一特征包含着—个乌托邦成分。在乌托邦中，生产不是决定性的部分，它是淌奶与流蜜之地。我认为艺术和诗的深层意义总是显现出和消费的亲和性。

10月14日，霍克海默给洛文塔尔的信中又讨论了这篇文章：

你过多地强调，活动和被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的对立，认为读者的生活是被他得到的而非他做的所规定和统治。然而，真实的情况是，做的和得到的（拥有）在社会中趋于同一，机械主义对人的统治无论是闲暇时间还是工作时

间都是绝对相同的，我甚至可以说理解消费领域中行为模式的关键就是人在工业中的处境，他在工厂、官方组织、工作场所的日程安排。消费趋于消失，或者按我说，吃、喝、看、爱、睡成为“消费”，那么这种消费意味着人已成为一个机器，不论他是在车间外部还是内部。

你会记得电影里的恐怖景象，主人公一生的许多年在一两分钟内就以一连串镜头出来，如他怎样成长直到耄耋之年，战争如何开始以及进行，等等。完整的生存被整理为一些徒劳的瞬间，这些瞬间能够概略地、富有特征地象征人被分解成管理的成分。大众文化的各个分支都反映了人的存在被骗取了柏格森称之为“绵延”的东西，这无论对传记的主角还是对大众而言都是真实的。……大众文化中的反潮流反映在对它的逃避中。由于人的觉醒状态今天在全部细节上都被规律化了，真正的逃避就是睡眠和发疯，或至少是某种缺点或弱点。反抗这些电影不是在尖锐的批评中，而是在人们睡眠或相互做爱的事实中。

最后，洛文塔尔在10月22日的回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反应：

你对电影画面中人生故事蒙太奇的评论对我有特别启发，因为它更加说明了我对童年和成年生活的断裂与艰辛的孤独、破碎的后果的观察。看来这些都和没有爱相关，因为爱的标准是连续性，而这些现象恰恰是不承认这一点。大众文化在总体上阴谋反对爱和性，你认为旁观者被其虐待狂的幻觉引入歧途，被剥夺了真正的快乐，我觉得这击中了要害。虐待狂对防止心理和生理的欲望有特殊功能，比如最近

的电影“假日酒店”中，在芭蕾场景中有一对舞星跳了一分钟，但很快这一分钟就变成了色情的情境，人们很容易想象舞伴会以接吻而结束。甜蜜、和谐的音乐突然代之以爵士，它几乎是不加修饰地阉割了舞者。这非常好地阐明了阿多诺的评论：爵士与阉割之间的联系。

研究所批判大众文化的一些特征在这些信件中得到证实。比如他们不止一次地关心真正的幸福，不同于流行文化的更保守的批评者，法兰克福学派拒绝把高级文化当作远离物质关切的目标来保护。像尼采一样——尼采对分析大众文化所做的贡献常常为研究所承认——霍克海默和其同事在声称高于物质生活的超越文化和心理禁欲主义之间看到了一种隐藏着的关系。在批判大众文化时，他们经常攻击像赫胥黎这样有清教徒气味的批评家；^⑧他们也以同样的热情痛斥加塞特这类精英主义者的怀旧病。霍克海默写道：“怀旧的、超验知识的、危险的人生的权利是不能得到支持的，”“反对大众文化的斗争仅仅通过指出它和社会不公正的持久联系就行了。”^⑨正如马尔库塞 1937 年说的，文化生活从其物质基础中分离出来是为了调和人与不平等的物质基础的关系。在这一意义上，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文化是“肯定的”。

这些信也反映出在研究所全部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中，传统的价值是多么强烈。如我们看到，阿多诺在勋伯格看起来革命的音乐中发现了传统成分；本雅明把传统看作是艺术“氛围”的一部分；在 10 月 22 日的信中，洛文塔尔指出“爱的标准”是连续性，这是他随着霍克海默前一封信中断定大众文化剥夺了人的绵延而作的观察。然而，还应当理解的是，研究所所说的传统与启蒙思想中“进步”的连续有很大不同，这在上章考察的《权威国

因社会变化而被废弃了。康德把艺术形式主义地规定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但在现代世界上它已成为“有目的的无目的性”，目的由市场控制。^⑧甚至本雅明曾提出的流行艺术是一种消遣的观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表示怀疑：闲暇是劳动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被文化工业唯一许可的笑是幸灾乐祸的笑，笑那些不幸的人。压抑代替了升华，欲望被刺激只是为了被否定。总之，大众文化成了可望不可及的礼仪。^⑨

研究所日益感到文化工业对人的奴役比早期统治实践的粗暴方式更为微妙而有效，特殊与普遍之间的虚假统一在一些方面比社会矛盾的冲突更为不利，因为它能把它的牺牲者安抚进入被动接受状态。随着社会中中介力量的减弱——这里研究所引用了它早期关于家庭在社会化过程中作用减弱的研究——形成一种否定机制的机会也减少了；而且，技术在美国广泛服务于文化工业，恰像它在欧洲帮助权威政府的控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无线电之于法西斯正如印刷术之于文艺复兴。

217

总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中所有的悲观主义都在论述文化工业的《启蒙的辩证法》中预见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中仅有的否定保存在肉体艺术而非观念艺术中，比如竞技表演者，他充分外观他的身体，并把它客观化到极致而冲破了大众艺术的商品性，所以它揭示了一直被掩盖着的东西。^⑩此外，研究所担心，转向未来的各种可能性的封闭，以及“历史连续性爆炸”的突然终止，这在本雅明纪念专号的文章中已尽可能引用了。

在许多方面，研究所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以及它对美国权威主义潜力的分析已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精神生活。^⑪一个明显的理由是，不同于30年代的理论文章，这里的大部分是用英文写的。更重要的是，美国人自己也开始恐惧托克维尔(Tocqueville)以来的

外国游客关于大众民主后果的可怕预言成为现实。^⑧二战前,社会学家 R·帕克(Robert Park)和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 H·布鲁姆(Herbert Blumer)已对大众文化作了初步研究,但一般而言,他们是孤立的并带着较有希望的结论。然而 40 年代中期,对这类分析的兴趣已在学术团体内外兴起,C·格林堡(Clement Greenberg)和 D·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已开始广泛的公众中传播大众文化批判,后者主要通过他对《政治学》杂志的影响;社会学家 D·里斯曼(David Riesman)增加了这类问题的学术自觉;^⑨R·霍加特(Richard Hoggart)也穿过大西洋向英语公众做了同洋工作。^⑩这是第一次对大众文化进行激进的而非保守的攻击,在此,研究所与其前成员弗洛姆的影响对这一攻击的实质和深度起了明显作用,这在后来已得到承认。

激进批判的重要在其明确的政治暗示。认为研究所把注意中心从基础转向上层建筑是放弃了早期的理想承诺是错误的,传统的“否定的”文化的衰亡并非孤立的精神事件,大众文化是政治集权主义的温床,所以霍克海默和他的同事们感到,文化和政治的中介机制最好在心理学意义上来理解,这样他们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就和他们 40 年代进行的美国权威主义潜力的研究联系在一起,虽然它们建立在批判理论广阔的前提之上,但这些研究大多被当作心理分析而看待。由于美国理论家很少理解这些理论前提,《偏见研究》常常被视为严格的心理学,我们下章将会看到情况并非如此。正如阿多诺 1935 年向本雅明解释的:资产阶级个人只是辩证转换的工具,总体性保留在中心现实中。如果说在其大众文化和心理的权威主义研究中,研究所看来重重陷入防御的个人之中,那么,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追求的乌托邦选择只有在文化之外的“毁掉的人生”中才有点踪迹。^⑪

第七章 40 年代的经验性工作

这本书的中心主题是一个较新的观念——一种人类学的人、我们称之为极权主义型的人的出现。

霍克海默

战争岁月带来了研究所目标的严肃重估，也导致研究所机构的逐步重组。霍克海默经常生病，需要移居加州，其他成员又不断参予政府机构的工作，这就使得 1934 年以来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合作方式难以为继。而且，哥大社会学系的一种新的内在因素也潜在地给未来带来麻烦。以麦克夫为首的更思辨性的一派和莱昂德周围更重经验的一派在争夺控制权，已经出现的迹象更利于后者，至少在洛文塔尔 1942 年 2 月 23 日给霍克海默的报告信中是如此。所以，霍克海默准备同意因战争和自己患病而放松和哥大的联系，就毫不奇怪了。事实上，早在 1941 年 5 月，莱昂德—麦克夫的冲突解决之前，他就向洛文塔尔表示过对继续和哥大保持联系的矛盾态度。^①研究所的领导虽然知道需要维持机构同一，但又总是耽心，过分的制度化可能会带来某种僵化。

战争结束时，研究所仍然试图保持与哥伦比亚的联系。霍克海默的病情已明显好转，1944 年和 1945 年曾多次回到纽约，虽然一些成员如马尔库塞继续留在政府，但另外一些人急于回到专

业性学术生活，哥大内部也仍然希望能容纳研究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恢复与研究所关系的主要努力竟然来自校内经验派的社会学家。拉扎菲尔德把他的无线电研究中心转移到新成立的应用社会研究处，^②尽管战前他和阿多诺的合作未能成功，他还是提议和研究所合并。并对批判理论和“管理研究”^③的相互影响持乐观态度。在和系里的其他成员 T·阿贝尔（Theodor Abel）和 R·默顿（Robert Metton）的通信中，拉扎菲尔德赞扬了研究所的成就。1946年2月5日，他写信给阿贝尔谈到社会学系对研究所的不公正，不过并非由于前者的短视：

全部麻烦都来自研究所那伙人的愚蠢，多年前我就告诉他们用德语写作会毁了他们，但他们固执地以为如果能在美国保护德国文化的最后一个岛屿，那么对美国的贡献也更大些，他们的《杂志》尤其如此。我已向其前主编洛文塔尔要求搞一个已在美国出的10期内容提要，每个人都会吃惊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被埋葬在那里。^④

结论是他建议研究所经验性方面和应用社会研究处合并，洛文塔尔、马辛和马尔库塞将成为专职成员，波洛克和纽曼是半专职的。霍克海默由于健康原因和阿多诺一起希望留在加州，这里可以看作是研究所的理论中心。拉扎菲尔德为霍克海默敞开大门，期待如果健康好转的话他能回来。虽然社会学系由于拉扎菲尔德的推荐扩大了对研究所的邀请，但最后仍未成功。霍克海默以其健康为理由推托了，^⑤所有成员中，只有纽曼在战后立即回到哥大。

研究所拒绝这一提议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其财政好转。1938年不成功的财政投资以及对新的流亡者的支持已严重损耗了研究

的、经验性社会科学中的还原论倾向。他们认为在探索社会现象时理论应优先于“事实”的结合，正如在政治学中把理论放在实践之前一样。当然，研究所从未随便否弃所有的经验研究，包括其结果的量化，这无疑是德国反启蒙主义的社会学流派的特征。如同弗洛姆在研究德国工人和《权威与家庭研究》显示出来的那样，研究所希望用经验方法来丰富、矫正并支持（尽管从未完全检验过）它的理论假设，虽然在迁移前研究所就承认了它在技术上幼稚，它也相信能随着时间而日趋提高，所以它愿意发起诸如科姆诺夫斯基的《失业者及其家庭》的之类的分析，希望用美国的技术来研究大众文化。

222

但是，困难常常大于期望，正如阿多诺在无线电研究所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他的音乐收听模式改变的观点，就是不可验证的假说。阿多诺感到，其原因不仅是技术的，30年后他说：

对我来说，迄今仍然相信，在文化范围内，仅仅被接受心理学视为“刺激”的东西实际上具有质的规定，是一个“客观精神”的事件，其客观性是可知的。我反对不参照其“刺激”，即文化工业的消费者、无线电播音的听众对客观内容的反应就去陈述和测量效果……从主观的反应出发，仿佛它们是社会知识的主要的和最后的根源，在我看来，这是完全浅薄的，迷误的。^⑧

使阿多诺特别苦恼的是他的美国同事们用以把文化现象转换成量性数据的非中介方法。在他看来，把文化和可测数量完全等同是大众文化物化特性的典型体现。他后来回忆说：“当我面对‘测量文化’的要求时，我想这种文化可能正是排斥能够测量它

的精神的条件”。^⑨这一前提使他与以严格运用定量方法的拉扎菲尔德的“管理研究”的合作从一开始就不能成功。到 1939 年夏，两人都已明了这一点。

拉扎菲尔德写了 5 页纸的信给阿多诺，声称他们对他们合作的成果极其失望，^⑩其语调是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刺耳的。很明显，他感到委婉的时期已过去了，针对阿多诺的一份备忘录，他写道：

你以攻击其他人自豪，因为他们是神经病或拜物者，但你却没有这些，无论你怎样攻击……你不认为你通篇使用拉丁词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拜物主义吗？……我一再恳求你使用更负责的语言。很明显，你在心理上不能接受我的建议。

223

信的另一端，在批判阿多诺“严重缺乏逻辑程序”时，拉扎菲尔德已不是人格批评了。他也指控阿多诺在评论实证技术时表现出来的傲慢和天真，“当你的著作使人怀疑你根本不知道对一种假设前提的经验检查是如何完成时，你对你自己观念之外的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的不尊重，就更令人不安了”。最后，他对阿多诺文风的缺陷也表示了极其惊愕，考虑到阿多诺经常声言要关心正确语言的重要性，这一点就更加令人不安。

拉扎菲尔德最后一段值得全部引述一下，这并不只是为了举一个特殊例子来明确两个意志坚强的、高智力学者之间的冲突，而且也是为了显示一个在研究所历史上起了中心作用的人物的复杂性格。认识阿多诺的很少有人怀疑他的杰出和想象力，但也更少有人——霍克海默是主要的例外——发现他是一个容易合作的人。“给你写信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拉扎菲尔德这样结束：

当然，并非只有阿多诺一人在 40 年代就获得方法上的经验。研究所的纽约办事处虽然在战时减少了活动，但并未停止其作用，《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停刊后，它的几个成员花了更多时间用于经验工作。计划之一是探讨德国非犹太人帮助受希特勒迫害的犹太人的模式，借助托马斯·曼的威信和合作发起，数据的收集是通过在德语流亡者主要报纸《建设》上登广告之类方式进行的。虽然从未出版，这次研究确实显示出天主教徒和保守主义者比新教徒和自由主义者给予了更多帮助。据马辛的说法，这一结论被霍克海默用来支持他的论点：保守主义者常常比自由主义更多地保存了批判精神。^③

更具雄心的是对美国工人中反犹太主义的集体研究，它是研究所 1943 年开始组织的，持续了两年。大约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答应扩大它的支持的同时，由 A·赫德 (Adolph Held) 任主席的犹太工人委员会给予了一笔更合适的捐赠，有利于研究所在自己兴趣范围内进行研究。犹太工人委员会已创立一个以 C·S·齐美尔曼 (Charles S Zimmerman) 为首的委员会抗击反犹太主义，并渴望对此进行科学分析，它和 AFL、CIO 和各种没有合并的组织一起收集资料，这是在纽约、加州和底特律进行的。

积累起来的资料是如此之多，以致难以整理出版，1944 年向犹太工人委员会提交了 4 卷各 1300 页的报告，但是以后的删繁就简以便出版的努力失败了。古尔兰、马辛、洛文塔尔、波洛克、韦尔都参加了这些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在资料的量化方面又得到应用社会研究处海茨格的帮助，阿多诺接着就其全部进程从方法和内容上写了备忘录，但组织和编辑还是存在难以克服的问题。闲置了几年后，1949 年曾作出新的努力，拉扎菲尔德和 A·巴尔顿 (Allen Barton) 重写了一篇方法论导言，1953 年，格伦

克的自由出版社宣布它即将出版，并附有一份原来主要是为反犹太主义信仰模式的定量分析而准备的内容说明，只是由于研究所对几乎 10 年前的研究的现在价值有不同意见，^⑭最后这本书一再未能出版。

因为在这个中间出版了《偏见研究》，工人计划的成果现在看来就是多余的了。其目标也被改变，正如阿多诺在他的备忘录中说的，它现在是“发现怎样研究反犹太主义，而不是去得到最后结论”。^⑮《偏见研究》各卷在方法论上的成就再一次使早期报告中简单幼稚的技术黯然失色。而且研究所不愿出版这本书的另一个理由也在起作用，象波洛克回忆的，^⑯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如此损害美国工人，以至以谨慎为特点的研究所对传布其发现而迟疑不决。早在 1944 年 7 月，霍克海默就担心美国公众对“一伙外国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预美国工人的私人事务”的反应。^⑰大约一半以上的美国工人表现出这种或那种反犹太主义偏见，^⑱而在 1953 年，研究所领导人希望缓和这一点。而且，试图缩短手稿也导致一定程度上的过分简单化，马辛写信给洛文塔尔对这一改变表示愤慨：

226

我非常反对这些“结论”，这些纪录表明这项研究经历了从社会—政治向纯心理学的转化，在目前的文本中，不能有任何像“危险的信号”、需要教育之类的老式评论，任何涉及到“美国工人”的部分也是可笑的。就出现在这项研究的第一部分中的美国工人而言，他们是反犹太主义的。

他指责第一部分的修改已损害了它：“读起来像一个平庸的高中生的尝试，靠着两三个宽泛僵死的心理学定义，无限制地重复下

研究的表面上的目标。这一点曾引起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布莱希特的藐视。^②“我们的目的不仅是描述偏见”，霍克海默和 S·弗洛曼（Samuel Flowerman）在导言中写道：“还要解释它，以帮助根除它，这是我们遇到的挑战。根除意味着在获得科学理解的基础上加以科学地、有计划地再教育。严格意义上的教育本质上是人格、心理的教育”。^③这其中任何一卷都没有因其自身目的而批评容忍，对容忍的批判曾首先出现在弗洛姆著作中，后来又在阿多诺、马尔库塞的书中重复。

但最显著的改变是不寻常地突出了对偏见的心理学的而非社会学的解释，如此选择是与这一计划的教育目标相联系的。^④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以至于《权威人格》两位最严厉的批评者 H·H·海曼（Herber H. Hyman）和 P·B·希思莱（Paul B. Sheatsley）能认为它是作者们“把非理性从社会秩序中取出来，并转嫁给反应者，通过这一置换它确认有偏见的反应者是以一种非理性方式获得他们的判断的”。^⑤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批判理论确实在放弃原来立场方面走得太远了。冲淡其激进内容的另一证据可在各种研究中实际使用的心理类型的分析中发现。尽管基本观点是弗洛伊德式的，但一定程度的自我心理学也被加进分析框架，就是这同一个哈特曼（Hartmann）和克里斯的自我心理学，阿多诺在别处曾批判其顺从主义倾向的。^⑥相似的还有，《权威人格》中的性格类型的使用初看起来也与阿多诺对弗洛姆类型学的批评相矛盾，^⑦通过描述统一的性格类型，他和他们的同事看来已放弃了批判理论中心之一的非同一性。确实，阿多诺想通过保卫历史基础上的类型学运用来回答这一批评：

然而类型方法所具有的合理性，不是因为它是稳定的、

生物学的，而恰恰相反，它是动态的、社会的，……社会压抑的标态遗留在个体灵魂中，……与人类之家（Human Pigeonholing）相反，个人主义最终可能成为实际上是不人道的社会中单纯的意识形态的面纱，……换言之，类型学的批判不应忽视以下事实：大批人已不再或从未是 19 世纪传统哲学意义上的“个人”。^②

但这只可以解释那些用来解释异化人格的类型学的用法，而不能解释那些仍然存在的某些真正主体性的类型，也许，这样会更宽容一些，不过阿多诺是用一种类型学来描述他们的。

然而总的看，较之仓促读一下《偏见研究》的印象，实际情形是更加复杂了。首先，研究所的马克思主义起源虽然在某些方式上改变了——这一点将在下一章考察——但并没有全部消失，这在著作的之外以许多方式表现出来。比如，有一个成员在一个评论中表示他在冷战初期拥护一边是多么的勉强，1946 年霍克海默因此写了一段后来看来很天真的话，“当前看来，唯一没有任何反犹太主义的国家是苏联，这有非常明显的理由，不仅因为它通过了反对反犹太主义的法律，而且因为他们真正实行了它，刑罚是很严峻的”。^③差不多同时，他在解释洛文塔尔的“目前历史时期的理论任务”时，使这一点更为清楚了：

虽然应该指出苏联或德国专制主义的恐怖，但按我的看法，概念性思维的努力仍然应当关心作为整体的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发展。一想到恐怖就像看到黑夜一样。人类世界的恐怖应被理解为反对社会自我保存的特殊形式的判决。今天，世界已过分地成为整体，把一个权力集团孤立起来是没有道

理的。把它孤立起来而使之成为文明世界其他部分或善或恶、或好或坏的对比，这一过程在实践方面可以得到辩护却不能带到理论思维中。此处我应该说较少恶的原则在理论思维中要比在政治方面更加危险。⁹¹

总之，虽然研究所拒绝为斯大林主义辩解，——这决不是它历史的新发展——它也拒绝参加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人痛骂“失败的神”的合唱，它把批判扩展到“作为整体的工业社会”，其中当然包括美国。 229

在方法论上更重要的是《偏见研究》中对心理学的强调并未多得如其左派批评者讲的那样导致批判理论的解体。事实上，通篇不断出现这样的提示——尤其是阿多诺撰写的那一部分——偏见在根本上还是被理解为社会的而非个体的。比如，在讨论政治学中的人格化时，他写：“更多的无名的、晦暗的社会过程比个人经验的有限范围与客观的社会动力学间的整合更加困难了。社会异化被隐藏在每一对立都被强调的表而现象背后：政治态度的人格化和习惯为社会的非人化作出补偿，它乃是当今苦况的根本原因。”⁹²不顾海曼和希思莱的主张，法兰克福学派继续认为社会秩序是内在非理性的，这样，心理学方法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充足的。充满疑问而又引起许多混乱的是社会学和心理学在分析偏见现象时的适当作用。虽然《研究》没有详细明白地说出，但研究所（如果不算其合作者）对两种解释的正确关系确实有强烈意见。弗洛姆 40 年代出版的著作，曾被研究所批评为心理学和社会学不成熟的调和，在这样批评的时候，阿多诺及其同事认为，弗洛姆已经淡化了弗洛伊德不妥协的“生物主义”所保存的非同一性迹象。在同一方式上，研究所一方面向理论与实践统一，另

义视为对犹太人在西方文明中作用的反动。像马克思在其论犹太人问题的文章中那样，^④他们反对犹太人仅仅在宗教上与他人不同的自由主义的假设，而是认为，犹太性也是一个社会经济范畴，虽然从古到今都主要是因为非理性需要而把它强加到犹太人身上。“资产阶级的反犹主义”，他们写道：“有一个特殊的经济原因——掩饰生产中的统治”。^⑤在一定意义上反犹主义是资产阶级投向犹太人的自我憎恨，这些犹太人已没有力量，大多限制在流通领域而非生产领域。由于资本主义诸矛盾的连续性，犹太人或者类似他们的群体成了被压抑的受挫和攻击的必然出路，这样关于同化的自由希望就是一种欺骗，因为它假设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类是潜在的统一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自由主义已向犹太人和大众许诺下没有权力的幸福，但在实际中大众却被完全剥夺了幸福和权力，因此由于他们错误地相信从他们那里扣留的东西被给予了犹太人，而把狂怒转嫁给犹太人。

231

这一部分的分析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内的，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在许多方面超越马克思。首先，在他们讨论反犹主义的“客观精神”时，在认识论和社会学的背景下，利用了心理学范畴如妄想狂和投射。比如他们认为妄想狂不是纯幻觉，就其否定了仅有的给予、就其否定直接中介而言，妄想狂超越了对世界的天真的、实证主义理解，^⑥这样，所有真实的思想都包含着可以称之为妄想狂的成分。其实，在把内在恐怖和欲望投射到外部对象时，妄想狂的思想表达了对调和特殊和普遍压抑的一种扭曲了的抗议，这种压抑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被置于普遍性表面的背后而永久化了。

当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不否认这种抗议中的扭曲性，妄想狂基本上是一种欺骗，一种“知识的阴影”。^⑦他们主张，真正

的知识意味着区分知识和情绪投射的能力，妄想狂其实是缺乏教养的人格，其超越直接性只是为把现实减化为一个具体化模式。他不能沟通内在与外在、表象与本质、个人命运和社会现实，妄想狂的和谐是以失去其本己的自律为代价的。他们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条件已普遍化了，集体性投射如反犹主义发生在个体人身上，其结果是半教育人格成为“客观精神”，^⑧最终在法西斯主义下，自律的自我完全被此集体投射的统治所毁灭，妄想狂欺骗体系的总体性与极权主义的法西斯社会相应。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还超越马克思，认为反犹主义还有某种古老的根源，而不只限于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根源已超出了宗教的起源，虽然他们的确花大精力研究基督教在反犹太主义中的作用。在他们心目中这些根源可追溯到西方人晦暗的前史。在写于 1940 年没有发表的论文中，^⑨阿多诺提出了一个半是历史的，半是超历史的理论假设。他认为犹太人被放逐之前是游牧的、流浪的人，是“历史上秘密的流浪者”。^⑩放弃这种生活方式有利于他们定居下来生存，这是随着耕作技术的发展、付出令人吃惊的代价才实现的，西方关于工作和压抑的概念与后游牧时期人和土地的联结有内在联系。然而，关于流浪的犹太人的隐秘的记忆一直存在于西方文化中，犹太人的这一形象，阿多诺认为：“反映了未曾劳作的人类的情形，至于后来对犹太人寄生的消费特性的攻击则不过是文饰而已。”换句话说，犹太人体现了无需辛劳而可满足的梦想，在这个梦中，人的挫折会导致狂暴移置投向那些仿佛已实现了这一愿望的人们。

在 1944 年给洛文塔尔的信中，^⑪霍克海默提出了一个相似的观点，特别指出犹太人与德国命运之间一种奇怪的纠缠。这里作为历史参照的不是放逐前流浪的犹太人，而是在一个陌生土地上

来，犹太人却对“去魅的世界”（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及其所蕴含的统治自然作了巨大的贡献。1946年6月，霍克海默在给洛文塔尔的信中，指出了犹太人在此一过程中对语言工具化所发挥的作用：

法西斯主义的冲动植根于此一事实，语言自身中已有腐朽的东西。据我看来，腐朽性是……一种现象，它在犹太教反对妄称上帝之名和巴比塔的故事中表现出来。语言的败坏表现在从乐园中被赶出来的传说中，在那里，所有的造物都由亚当命名。我们应当知道，法西斯主义的语言运用在我们社会中是极其新的，……农民对城市居民及其对语言的控制的不信仰是部分正当的，这种不信任是反犹太主义的一个要素，犹太人如此从容地操纵语言，在你所解释为的法西斯操纵语言的前史中，是难脱罪责的。由此也可见犹太人是资本主义的先驱。^④

总之，犹太人的两难处境在其既是启蒙的同伴又是它的对立面。犹太人作为人的真正解放只有在统治——资本主义的，尤其是工具性、操纵性的启蒙形式的统治结束之时才能实现，只有当社会范围内的再次调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恰好是犹太信仰的最高价值^⑤——实现后，反犹太主义才能结束，而部分的解决如犹太复国运动、^⑥同化等等，最终会失败。

最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同盟国战胜希特勒从而导致反犹太主义的“失败”并不满意。和犹太人的公然对立可能会消除，但其主要原因却可能在一种可称为“票据心理”（ticket mentality）

迹。他们写道：“代替反犹主义心理学出现的，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票据’、是对喧嚣的大工业口号的‘唯唯诺诺’”。^⑧当然，这也可以运用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正如霍克海默在给洛文塔尔的信中所说的，理论思考中“较少恶的原则比在政治上更加危险”，希特勒的征服者可能会剔除明显的反犹行动，但不会摧毁其根本原因，《启蒙辩证法》——我们在下一章讨论它——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源自这些原因的可供替代的现象学。

在研究所对反犹问题的主体方面作经验性探索的同时，对反犹主义客观方面的这些分析，使其思想充满活力。然而，这仅仅是用德语或在私人通信中才表达出来。结果，阿多诺方法论划分的一个方面不再为公众所掌握，剩下的看来只是某种心理学还原主义的东西以及批判理论对总体论强调的放弃。若干年以后，阿多诺要求好奇的读者注意《反犹主义要素》，^⑨但《偏见研究》面世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建议。这是研究所小心地面对美国公众而背叛其激进方面的一个不利后果。

当然，还必须记住的是从一开始，包括研究所成员参与最多的《权威人格》在内的这一套丛书就是一项集体项目，非研究所成员在心理学上训练有素，但对批判理论的大部分观点都不熟悉，从而虽然此一计划由霍克海默主持，他也不能像过去在研究所内部那样发挥其指导性影响，在他因健康状态被迫回到加州而由弗洛曼 1946 接替他后，情形更是如此了。洛文塔尔和霍克海默的通信中有大量材料证明，他们和 AJC 官员的合作并不愉快，尤其是在这一计划临近结束之时。个人之间的摩擦确实有，但理论上的分歧也是存在的。

按照 1944 年纽约会议上的最初设想，这项研究包括两个类

型，第一类是比较有限的，针对教育功能的特殊问题的研究，第二类是面对综合性问题的内容广泛的研究，短期研究和长期研究都是用跨学科的方法进行的。当《研究》最终于 40 年代末出版时，其形式已经有变化了，5 卷中有 3 卷基本上是从主体现象方面处理偏见的：由 B·拜特尔海姆 (Bruno Bettelheim) 和 M·詹维兹 (Morris Janwitz) 写的《偏见的动力：一个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⑧由 N·W·艾克尔曼 (Nathan W. Ackerman) 和 M·雅赫达 (Marie Jahoda) 写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紊乱：一个心理学的解释》、^⑨由阿多诺、E·F·布伦维克 (Else Frenkel - Brunswik)、D·J·列文森 (Daniel J. Levinson) 和 R·N·桑福特 (R·Wevitt Sanford) 写的《权威人格》。第 4 卷《欺骗的先知》由洛文塔尔和 N·盖特曼 (Norbert Guterman) 撰写，^⑩分析了煽动的技术。最后一卷是马辛写的《毁灭的预演》，^⑪对德国反犹太主义提供了一个透彻的历史解释。

在 3 卷主体取向的研究中，《权威人格》对我们分析研究所经验性工作是最合适不过了的。但对其他 2 卷作一简括评论也是有必要的。其中，最严格的心理学分析是艾克尔曼—雅赫达的研究，艾克尔曼本人是与哥伦比亚精神分析培训研究所有联系的职业分析家，其学术取向是弗洛伊德式的，虽然自我心理学改塑了他的正统性。在 AJC 的科学研究部门成立之前，他已接受了斯洛生关于反犹太主义的弗洛伊德式研究的可能性。当研究开始时，他提供了其中之一的基础。其合作者雅赫达是因与研究所的间接联系而与他合作的，她是拉扎菲尔德的同事，合写过《马林塔尔的失业者》一书，^⑫战前在维也纳曾一度是他的妻子。流亡英国 8 年后 1945 年移到美国，成为 AJC 的研究助理，她所受的训练是社会心理学，但她本人也曾一度受过人格分析并熟悉弗洛伊德理论。

资料收集工作于 1945 年底开始，主要是来自纽约地区的 25 位分析家，应邀提供他们临床实践中的材料，在最终提供的 40 例研究中显示出来的模式只是予以概括而没有任何量化的努力。同样的谨慎也见之于将特殊的情绪紊乱归于偏见类型之中，事实上，这个研究中没有什一般化结论，尽管其描述内容有高度启发性。确实没有社会学的考虑进入此一讨论。

236

同样源于弗洛伊德，对社会偏见主观方面的第二研究《偏见的动力》，在其引进统计学分析和社会学洞见方面超过了艾克尔曼—雅赫达的部分。拜特尔海姆在写作本文之前就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④于 1939 年从维也纳来到美国，参加 AJC 工作时是芝加哥大学教育心理学的助教，后来是副教授。其合作者詹维兹是同一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对政治社会学特别有兴趣。

《偏见的动力学》以芝加哥 150 位男性退伍兵 4—7 小时的访谈为基础，之所以选择退伍兵，是因为在一战后欧洲的男性退伍兵中已表现出非常易受法西斯主义的吸引的倾向。拜特尔海姆和詹维兹希望搞清楚相似的错误的重新整合进社会的情形是否也会在二战后的美国流行。他们探讨这样一个心理假设：由于缺乏自我力量、过去挫折和未来的焦虑会被投射到圈外（out-groups）；他们想发现种族的不宽容与个人的社会动力之间的关系，并寻找反犹太主义与反黑人情感之间的对应。但是，他们无意于提露不宽容人格的一般症状，这是他们在贝克利竞争者的研究目标。

拜特尔海姆和詹维兹的结论是，宽容肯定与自我力量及接受外部权威的变化度有关（应当指出，接受是与屈服不同的，不过无论是什么意义，这个结论都是和《权威人格》不同的），反犹太偏见与反黑人偏见之间的关系是存在的，尽管异化的超我特征倾向于投射到犹太人（如犹太人控制国家），而异化的伊特性格却投

射到黑人（如黑人是肮脏的、淫荡的）。附带说一下，这一结论与欧洲的情况不同，在那里犹太人是两种投射的对象。

不宽容与社会经济条件、包括与家庭的相互关联较难确定。的确曾出现过这样一种看法，即快速的社会流动，特别是向下的流动，确实常常与偏见有关。但决定性因素主要不是个人的客观经历而是被剥夺的主观情感，在童年经历妨碍了强大自我的发展的那些情形中，突然的社会变化所提出的要求是很难妥当地被对待的。“人格越弱，社会领域的影响就越强”，^⑤这一结论与《权威与家庭研究》很接近，家庭的衰落被看成是软弱自我的根源，而这种衰落又被置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中介因素被清除的大背景中。不过拜特尔海姆和詹维兹限制自己在更普遍层面上的思考，《偏见的动力学》结尾时的建议也是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包括较好的父母训练以创造更完整的人格、强化作为外部社会控制基本象征的法律系统、增加学前的宽容教育等等。

237

正像拜特尔海姆詹维兹后来说的，^⑥他们的著作在许多方面与贝克利研究不同，最重要的是《偏见的动力学》发现不宽容在那些反抗社会、拒斥其价值的人群中最为流行，而加州的研究却发现偏见与顺从之间的联系。N·格莱泽（Nathan Glazer）指出，^⑦差别可能是由于两个计划选取的对象不同，在芝加哥是下层和中下层人士，在贝克利则是中等阶层。当然，这一不同的含义是：《偏见的动力学》缺乏《权威人格》对社会总体的明确批判。

洛文塔尔在《欺骗的先知》的写作中起了主要作用，因而此书更接近批判理论的传统。此书主要使用内容分析法，这也是洛文塔尔在研究早期运用到文学与流行传记研究中的方法。所以作者解释说，^⑧这一研究的历史框架，是霍克海默在《自我主义和解放运动》中分析早期的鼓动者如黎恩济、萨沃那罗吉、罗伯斯

席尔时发现的；而且这本书的基本假设——统治现代社会的是操纵而非自由选择——也曾是研究所分析大众文化的基础。如同研究所多数早期著作一样，它追求透过表象揭示对象的“客观内容”。洛文塔尔和盖特曼写道：“应根据其在当代社会大背景下的潜在效果，根据其动力而非直接结果来研究煽动者。”⁶⁹这意味着在个人对煽动的敏感外，社会总体中潜藏着的趋势也至为重要。

238

在写作政治煽动的现象学时，洛文塔尔和盖特曼是有先驱的，如没有出版的马辛关于 J·E·麦克威廉斯 (Joseph E. Mc Williams) 的研究、阿多诺有关 M·L·托马斯 (Martin Luther Thomas) 的研究、洛文塔尔本人关于 G·A·菲尔伯斯 (George Allison Phelps) 的研究等等；他们也受惠于这一计划中其他作者关于偏见的主观方面的著作。但与其他研究集中在最容易接受煽动性宣传的人的反应不同，《欺骗的先知》则考察易于唤起反应的各种机制，两位作者坚持，鼓动者的语言必须翻译成一种心理学上可传达的符号。⁷⁰如所周知，这种符号主要起源于精神分析学，它也是阿多诺两年前有关法西斯宣传的更理论性分析的基础。⁷¹

洛文塔尔和盖特曼也采纳了另一位流亡者 E·艾力克生 (Erik Erikson) 的著述以补充弗洛伊德的启发性见解。艾力克生的著作《希特勒的形象与德国青年》，⁷²认为希特勒既是造反的大哥也是权威父亲的具体化，渴求权威又拒斥权威的对立的冲动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征，艾力克生对法西斯人格中混乱的造反性的觉察恰好与弗洛姆在《权威与家庭研究》中提出的“造反”相符。他还进一步评论了德国父亲“本质上缺乏真正的内在权威——整合了文化理想和教育方法的权威”——这也与《权威与家庭研究》中关于家庭稳固性崩溃的观察一致。不过在表面上，艾力克

的最后部分阿多诺的那一章提供了内容分析。另外，贝克利公众意见研究小组的其他成员也为此提供了个别专题研究：B·阿隆（Betty Aron）的主题联觉测试、M·H·列文森（Maria Hertz Levinson）对临床精神病人的研究、W·R·默罗（William R. Morrow）对囚犯的研究等等。

全部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探索一种“新的人类学类型——权威人格”。^⑥其特征被设想为与弗洛姆《权威与家庭研究》中的施虐—受虐型结构相似，也与纳粹心理学家 E·R·约恩希（E. R. Jaensch）1938年提出的所谓 J 型相似，^⑦虽然这些作者的同情与约恩希显然不同。约恩希的 J 型人格由其刚强不屈来规定，与之相反是 S 型人格，它能容纳多种含混意义，被约恩希等同于腐朽的、动摇不定的民主心理。另外，《权威人格》也与萨特的《反犹太主义与犹太人》一书提出的反犹特征相似，萨特此书是在《权威人格》之后面世的。^⑧赖希和 A·马斯洛（Abraham Maslow）也被承认为是这一症状解释的先驱。^⑨霍克海默最终把权威人格描述为下列特质：

向流行价值的机械投降；对权威盲目顺从，而对与之相反或与之不同的一切则盲目憎恨；拒绝自我反省，僵化刻板的思维；嗜好迷信；天性中半道德的、半冷嘲的中伤投射性。^⑩

这种人格毫无疑问是实际存在的，阿多诺后来坦承：

我们从未把这一理论简单地视为假设，在一定意义上，它是独自成立的。我们无意通过自己的发现来证明或否认这

一理论，而只是从具体问题的调查获得它，而这必须根据事实真相来判定并演示出某些流行的社会心理结构。^⑧

所以，尽管使用了美国的经验方法和统计技术，但研究所并未真正放弃批判理论的方法。总体上，它保留了《传统与批判理论》中勾划的方法论目标，虽然有了很大改变，比如不再强调实践是对理论的检验。然而，研究所对社会研究中假设—验证—结论模式的批评仍然是有效的，归纳法还是未被接受。霍克海默于1941年写道：

诸范畴必须通过归纳过程才能形成，该归纳过程与传统的归纳法相反，后者通过收集个人经验直到足以获得普遍律来证明其假设。相反，社会理论中的归纳应在特殊中求普遍，而非在此之上或在此之外。它不是从一个特殊到另一个特殊的移动以达到抽象的高度，而是不断深入特殊之中以发现其中的普遍。^⑨

241

据此，《权威人格》把被访的个人当作统计性观测的极其重要的补充，它非常细致地对访谈材料中的两例进行了复制——其一是严重偏见的马克（Mack）的谈话，另一是得分较低的拉里（Larry）的谈话——这些复制品并不是作为抽象类型的样品而更多是体现普遍的单子一样的特殊。在一定意义上，此一方法与韦伯的“理想类型”并无多大不同，特别是在强调个体性、厌恶抽象律方面。

依靠桑福特小组的专业知识，统计学的改进被引进了这一计划，结果比研究所过去所做的要更好。在《权威与家庭研究》及

桑福特的悲观主义研究中，基本假设存在着明显的和潜在的不同的人格层面。而《权威人格》的目标，则是揭露基本心理动力，它或相应于一种偏见的意识形态的外部表现，或显示它在未来被采纳的潜力。以信念的有意表达为基础的公众意见问卷表因两方面理由被摒弃了，一是它不能揭示意见的一贯症状，二是它不能探索与此症状相应的心理素质。^⑥也许，这个计划在方法论上的主要目的是形成一种相对简单的机制，来测试基本心理结构，或滋生权威信仰及权威行为的结构的存在。

研究从发放问卷开始，包括实际问题、意见—态度等级表和投射性，以及发给 700 个大学生的公开回答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在以前的《权威与家庭研究》和工人计划中已经用过。意见—态度等级表是为了对反犹主义（A—S 级）、种族中心主义（E 级）、政治经济上的保守主义（PEC 级）作定量估计。在实践中，这个等级表又加改进，使每一个特殊项目都成为更一般的意见类型的可靠指示，“通过假设和临床经验，各种项目被编排成一个序列，它可被视为存在于人格深处各种倾向的‘泄露’，这些人格倾向构成了一种（在适当时机下）自由表达或受法西斯主义观念影响的性情”。^⑦

242

最终，这个计划的被访者为 2099 人，他们被分成若干小组。然而，几乎所有被问的人都是白色的、本土出生的、基督徒的和中产阶级的美国人。为了使统计材料清晰，那些来自问卷、临床访谈和主题联觉测试的结果被编排在问卷曲线中最高和最低之间。访谈持续 1—1.5 个小时，分为意识形态的和临床—遗传的两类，像在工人计划中一样，被试者事先并不知道问题。在布伦维克夫人的指导下，设计了一个有 90 个种类或亚种类的记分手册，以帮助 9 个被访者辨认结果。“基本的”和“外显的”问题

被送到男女各 40 名被试者面前，TAT（主题联觉测试）也被送到相同的被试者面前。在两种场合都对结果加以量化。

在研究过程中，各种技术既被“扩展”又被“缩小”：

扩展表现在努力把越来越多的反民主的意识形态因素组织进正在形成中的图式中，表现在努力探索足够多的潜在的反民主人格因素以抓住总体性。缩小则连续发生在量性程序中，作为增加理论清晰程序，它容许一定的浓缩，以便通过较简单的技术来揭示同样重要的关系。^⑧

这里使用表格程序是由 R·利开尔特（Rensis Likert）于 1932 年制定的，它是对 L·L·塞斯顿（L. L. Thurstone）早期方法的修正。^⑨在两种情形中，对问题的赞成或不赞成的程度都在加 3 到减 3 的范围内变化，中性的零度被排除在可能的反应之外。表格的改进包括除去一些与总分无关的或明显缺乏不公正权力的部分。如果说利开尔特的表有主要不足的话，那就是不同的反应模式可能在最后拥有同样的记分，^⑩部分地是为了克服这一潜在问题，才设计了可以揭示个体信仰特殊构型的访谈。

这项计划最有价值的方法论成就是 3 个最初态度表被浓缩为一个问题系，它可以测量潜在心理层次中的权威潜能，此一新的测量设置是“F 表”的建立。^⑪对各种煽动性机制的内容分析，此前经验性的《权威和家庭研究》和纽约工人反犹主义研究都有助于此分析结构，“F 表”试图测试 9 项基本人格的变化：

保守主义：僵硬地坚持传统中产阶级的价值；

权威服从：对属于圈内理想化的道德权威屈从的、非批

判的态度；

权威性进攻：倾向于警戒、责备、拒绝和惩罚、褻渎传统价值；

反内心体验：与主体、想象、柔心肠相对立；

迷信和成见：相信个人命运的神秘决定，在僵化的范畴内运思；

力量和坚韧性：对统治一服从、强—弱、领导—追随方面的全神贯注，认同强权人物，过分强调自我的传统品性，夸大地估量强力和坚韧；

破坏性和犬儒主义：对人的总体上的敌视和中伤；

投射性：倾向于认为世界上充满野蛮和危险的东西，外化无意识的本能冲动；

性：夸张地关心性方面“发生的事”。^②

表上的另外一些问题是为了尽可能间接地揭示主体在这几方面的立场，没有明确提到一些少数团体。随着测试的增加，F表和E表的相互关联差不多达到75，这是成功的标志。然而，成问题的是F表和PEC表也有57的关联，为了解释这一点，引进了真假保守派的区分，只有后者才是真正的权威人格。没有尝试（至少在最后结果的报告中）在F表和A—S表中建立关联，被试者的亚群体中更特殊的关系显示了所有不同群体中显著的一致。如上所述，临床访谈是用来支持这一发现的，对其结果的考察看来是支持F表的准确性的。 244

然而，F表作为权威潜能的指示表已成为热烈争论的话题。对其效果最竭力的批评来自海曼和西斯莱^③，他们在总体上坚决批评，在许多具体方面也是明确的。另一方面，拉扎菲尔德虽怀

专横的家庭中培育出来，父母的价值观通常是非常因循的、僵化的、外化的，所以很可能他们的价值也以异化的自我保留给儿童，从而妨碍了完整人格的发展。对父母严酷的怨恨常常被移置到他人身上，但同时父亲的外表形象却是高度理想化的，被试者中F表的高分获得者常常提及的“严厉而疏远”^⑧的父亲，看来促成了儿童的被动性与被压抑的侵略性和敌意的结合，这些特征也正是弗洛姆在《权威与家庭研究》中提出的施虐—受虐型的表征。相反，在低分获得者的记忆中，他们的父母都不是因循守旧的、身份焦虑的，也没有专横要求，他们是均衡的、情感外露的、温顺的，他们在孩子心中的形象不是理想的而是现实的。也许最重要的是，道德规范自我异化并不显著，这有可能形成一个更完整人格。

后来一些评论家提出的问题之一是，权威家庭的观点与研究所在其他地方提出的现代社会中家庭的衰亡这一主张的相容性问题，L·勃拉姆生（Leon Bramson）是这一观点的经常批评者，他认为衰亡的观点（他错误把它归结为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而没有看到它在《权威与家庭的研究》中的先声）“与弗洛姆早期的著作及贝克利小组的著作直接矛盾”。^⑨按照勃拉姆生，这些研究表明了权威家庭的连续性力量。然而仔细地考察，两种解释并不像勃拉姆生说的那样不可调和。

首先，研究所对艾力克生的德国家庭的描述印象很深，其中父亲缺乏真正的内在权威，弗洛姆称之为“造反”的假反抗实际上不过是寻找新权威，这部分是因为家中没有肯定性权威模式产生的，这是《权威人格》明确承认的一种症候，阿多诺在分析 246
“高分”获得者的性格类型时把它置于一个显著的位置上。

甚至在认同外表强大的父亲而不是反对他的情况下也存在着

统治——此乃公认的最常见的症候——这与《权威与家庭研究》的早期分析的对比并不是那么明显。其实，在描述“权威症候”时，^⑧阿多诺曾提醒读者注意弗洛姆的施虐—受虐特性并运用弗洛伊德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观点解释其起源，^⑨假如恋母的冲突在童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的话，对父亲的侵犯就转化为受虐的屈服及移置了的虐待的敌意。把这种纯心理学的解释与《权威与家庭的研究》中更为社会学的观点联系起来的是霍克海默的理论：“外在的社会压抑伴随着内在冲动的压抑，为了达到社会控制的‘内在化’，它从未给予个人像它取走的那么多，个体对权威及其在心理上的代理人即超我的态度，带有非理性的外观”。^⑩阿多诺认为这是一种症候，它普遍流行于欧洲中低等级的人群中，也可能在“美国那些实际地位不同于实际期望的人中间”发现。^⑪总之，经典的权威症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和强有力的父亲形象的认同，而是意味着这一关系中的混乱和冲突，外部压力在其紧张时，将加剧曾勉强解决的俄狄浦斯情境中的内部紧张。

阿多诺还勾勒了这种混乱可能被发泄出去的其他症候，包括“表面的怨恨”，“怪诞”和“操纵类型”。在高分获得者中发现的另一症候是“因循守旧”，它最接近父母与社会规范之间无冲突的内在化，看来它最易于在父系家庭结构中产生，其中父亲权威仍然是相对完整的。

从访谈数据中看出的权威家庭本身即是不断增长的外部压力的一个反映。关心其社会地位，固执地坚持那些已不能自发坚持的价值，权威家庭明显是对其核心空虚的过度补偿，试图如此狂妄地保护的权威其实已不再合理。像霍克海默 1949 年说的，^⑫家庭的社会和经济功能的消失的越多，就越会极度地强调其过时的、习惯的形式，甚至以其温情和保护性一再作为专横严厉的父

是“F表”而不“C表”或至少是“A表”？为什么是政治经济上的保守主义而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要求与权威主义相联？总之，当真正的对立存在于自由民主与两种极端的极权主义之间时，为什么仍然沿用陈旧的左一右之分？

这一攻击的讽刺性在于：研究所在其为 AJC 写的著作中早已放弃了许多激进的观念。《偏见研究》的基本前提是自由民主，即使是凯斯克米特这样充满敌意的批评者也认为：“就美国的立宪传统而言，作者们的自由主义明显是保守的”。^④宽容从来都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目的本身，但非权威主义人格就其定义而言，却被设定为一种对多样性的灵活的容忍的人格。研究所担心的是把宽容物化为一种目的而非手段，一个好的、却是间接的例子可以在拜特尔海姆和詹维兹的《社会变化和偏见》中发现，其中受到贝克利研究者重视的非顺从的、反权威的性格却受到了如下批评：“如果一些非顺从者表现了高度的宽容，它可能是一种反作用形式的结果，也可能是对权威关系的不满而产生的敌意的移置。称这些人是假宽容是自然的，因为他们可能会容忍少数人，却常常不容忍已被接受的社会生活方式”。^⑤

研究所的最后目标也不是代表制的政治民主，然而，《权威人格》并没有早期著作中传统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在希尔斯的陈旧的左一右之分已过时的评论中，还有一个反讽之处。我们以前曾指出过，霍克海默强调，必须揭露各种政治形式中的统治，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伪装的、冒牌的社会主义或其他等等。早在法兰克福的第一年，研究所就怀疑苏维埃的实验，与时俱进，怀疑变或彻底失望。波格克就认为，苏联不过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与西方的类似体系没有什么差别。这一看法与希尔斯以及其他美国思想家的根本不同在于研究所不把

极权主义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非意识形态的多元论视为对立的
的两极，我们在他们论述大众文化时看到，研究所发现统治以一种
新的、微妙的方式摧毁隐藏在多样性后面的个人主义痕迹。《启蒙的辩证法》
扩展了对所有现代社会流行趋势令人沮丧的分析。这样，法兰克福学派在
一定意义上同意左—右之分、至少在它体现在实际政治结构中时，已不再
有意义。当然，它仅仅在理论层面上不同意，其同情则仍然和过去一样。

249

《权威人格》没有这种悲观主义的直接证据，它并未从有限的被试者中
做出社会整体中权威主义盛行的任何推论，它甚至也没有像从被试者中
提出高低分百分比的工人计划那样走得那远。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权威主义
和非权威主义人格的描述性模型，没有暗示任何它们各自频率。虽然，
它偶尔也暗示一些被试者中权威人格的程度，比如阿多诺写道：“我们研
究中不愉快的结论之一，我们不能不正视的是社会接受假保守主义已相当
严重了——它有一个牢固的、不容置疑的群众基础”。^⑩然而在总体上，
它坚持这样一个观点：“人口中的大部分并不是极端的，按照我们的理
解，他们是中性的”。^⑪

希尔斯对此计划中隐含的政治偏见的批评，更可能是针对其保守主义
和权威主义有某种关联的预设。PEC表与F表有意义的关联是不可靠的，
它导致对真假保守主义的区分。前者指这些人，“无论其政治观点有什么
优点”，他们都“认真关注于培养美国民主传统中最有生机的东西”；^⑫
后者则仅仅在外表上是保守主义，其基本人格使之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潜
在候选人。这一区分的本来目的是要避免在右翼意识形态和权威人格结
构之间划等号，但由于没有下同样的功夫构造一种假自由主义或激进权
威主义的类型，这一联系还是在下意识中保留下来。事实上，没有进行任

何真正的尝试在各种非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做出区分。自由主义者的原型，即那些“积极追求进步的社会变化、激烈地批评当前现状（虽然无需总体拒绝）、反对或蔑视许多保守的价值和信仰……通过增加工人权力和政府的经济功能以减少商业权力”^⑧的人，被视为真假保守主义的主要衬托。当新政的自由主义逐渐被当作维持社会现状的意识形态而受到强烈攻击的时候，这一描述是多么的成问题在下一代人中才变得明显起来。

如果《权威人格》确曾想解释左的权威主义，那么这是通过建构一种含混的限定范畴“固执的低分者”来完成的。^⑨阿多诺后来以此亚类型来回答希尔斯的批评。^⑩不过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并非令人满意，在 PEC 表的情况下，自觉反应与下意识人格结构的不同能够解释其与 F 表的不充分的关联，而在 F 表自身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不同，因为它原先就是为了设计来测试潜意识人格的种种趋向的。因此，说低分者僵化的就等于说这个表不能够测试他们的僵化性、守旧和顺从这些高分获得者症候的主要特征。这一点将否定这个计划中建立一种测量意识水平下权威潜力的机制的目的本身。显然，必须进行左的权威主义的研究，许多美国研究者确实在下一个 10 年从事这一工作。^⑪

还应当提到《权威人格》在方法和结论上的另一些困难，只是过分地详述这一点将会忽略这本书作为整体的巨大成就。阿多诺后来坦陈：“如果《权威人格》确有贡献，那么并非指其肯定性观点的绝对有效，甚至也不是统计学上的有效，而是首先在于这些问题的提出乃是出于真正的社会关切并与以前从未被转化成量化研究的理论相联系。”^⑫虽然长达千页，最后一卷按作者的意思还是“实验性研究”。^⑬假如这确实是它的目的，那么它无疑是成功的。《偏见研究》的早期评论中，就有人称之为“社会科学

中划时代的事件”，此后，在它、尤其是在贝克利研究的刺激下形成了一股研究大潮。^⑭

附带说一下，这项研究的影响并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在研究所 50 年代早期回到德国后，它也带回了在纽约和加州学得的社会科学技术。研究所返德后第一个合作项目是 1955 年以波洛克名义出版的群体互动研究，其基本目的是把美国方法介绍给德国公众。^⑮其实，就是阿多诺也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不习惯的位置上：提倡经验技术来减少德国传统中对任何有着盎格鲁—萨克逊实证意味的东西的敌视。1952 年在科隆社会学家会议上，阿多诺认为社会学不应是一种“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一种文化科学），因为世界已为物化统治，很难被理解为“有意义的”。他说：“经验方法中充斥的非人性，总是比非人的人性化更人性些”。^⑯所以即使在批判的构架中也应运用管理研究的方法来探讨社会现象。尽管理论不能被经验所证实或否证——这是 he 不想放弃的批判理论的目标——但在被转化成研究问题时，理论观念能被大大丰富。比如，虽然心理分析最初陈述决非归纳的，然而它却因其被转变成经验问题而得到了有效的改进。

251

然而，到 50 年代末，研究所对经验主义的态度却发生了严重的重心的颠倒。^⑰把美国方法引入德国社会科学家的视野之中是太成功了，以至再度引起法兰克福学派对简约论者滥用经验方法的敏感。此后 10 年，德国社会学分裂成对峙的辩证方法和经验方法两大阵营，他们的争论引发了可与威廉时代比拟的方法论之争，^⑱尽管研究所及其像哈贝马斯这样的盟军在法兰克福大学是辩证立场的主要代表，他们也小心翼翼避免全盘否定研究所在美国有效地掌握的经验方法。

真正的问题是：究竟怎样在强调理论主导的真正的批判立场

上整合经验方法，这不仅是方法上的两难，也反映了整体社会的分裂和矛盾。《偏见研究》的成功，来自它部分地回避了这些麻烦。《权威人格》和《反犹主义要素》中对反犹主义的两种分析——一种论述主体方面，另一种重在客观方面——从未得到真正的调和。贝克利计划成功了，阿多诺和拉扎菲尔的合作失败了，原因之一是前者并不像后者那样关心现代社会的“客观精神”。当法兰克福学派真正思考这些客观倾向时，其预言是暗淡的。到底如何，我们将在专门论述研究所在美最后 10 年的理论著作的下一章中看到。

第八章 走向历史哲学：启蒙的批判

如果通过启蒙和知识进步，人类可以从对各种邪恶势力、恶魔和神话、盲目命运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总之从恐怖中解放出来——那么眼下所说的理性是能够提供的最大服务的理性。

霍克海默

非连续性问题可能是批判理论 40 年代内在困境的核心。我们知道，研究所一直倾向于综合众多学科，其创始人也希望统一理论和经验研究，他们还企图从其实际含义中克服传统理论的学术独立，同时又并不把理论降低为各种争论着的利益的实用工具。总之，虽然批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缺点，他们也并没有放弃其雄心勃勃的设想：批判理论与革命实践的最后统一。然而到了 40 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对其综合的可行性产生严重怀疑，其兴趣仍然是跨学科的，但在理论与经验研究、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中介上却不断出现问题。

如上所述，《偏见研究》中即使是最受研究所成员影响的那部分，也常常与他们在《杂志》上论述的批判理论的目标不同。最突出的是，《权威人格》中反犹太主义分析显然不同于《启蒙的辩证法》中的分析，虽然贝克利计划中非研究所学者在这方面

甚至更困难了。1942年6月20日，他在给洛文塔尔的信中写道：“现在看来我不再可能从事哲学著述了，因为随着流行范围的废除，它也失去了自己的基础。”虽然他可能在传统哲学和批判理论之间作了区分，后者也变得日益艰难了。9月27日他又给洛文塔尔写信：“我再次从事我的工作，它从未像现在这样困难，我感到就我的力量而言，这一工作太大了。在今天给波洛克的信中，我提醒他这一事实，甚至胡塞尔也需要10年功夫完成《逻辑研究》，而出版其《理念》则要13年……”次年2月2日，他仍在这种情绪的包围之中，还增加了关于孤独感的动人表述：

哲学是相当复杂的，其进程则令人沮丧地迟缓。想到你至少和我一样一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存在的理由，就觉得这不是支持：它加剧了我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是我正在从事的工作的基础，在我们这三、四个人之外，肯定还有别的心灵与我们有同感，但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也许他们避免表现自己。

霍克海默关于其思想的孤立是有事实依据的。他在40年代最后出版的理论著作和《偏见研究》相比只有很少的影响，《启蒙的辩证法》写于战争期间，直到1947年才出版，然后由道奇书屋在德国出版。^②《理性之蚀》同年由牛津大学出版，虽然对英语读者是可能接受的，但几乎没有收到任何赞扬的批评和商业的成功。^③只有到了60年代，《启蒙的辩证法》成为德国的地下经典时——它的盗版广泛流传直到1970年正式出版——《理性之蚀》才被译成德文作为《工具理性批判》的一部分，^④找到了应有的读者。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也从未译成英文，

没有在美国发生影响。

这些著作所表现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批判性转变，是他们在美最后 10 年的产物。这对我们研究研究所在美国的经历形成了一个合适的结论。虽然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回到德国后除了发挥这些著作的意义外，少有作为是不公正的——这尤其对阿多诺是一个误解，他继续以其特有的狂乱步调写作——但这种观察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启蒙的辩证法》、《理性之蚀》、《最低限度的道德》对西方社会和思想的批判是如此彻底和全面，以至于此而后来的工作就只能是对它的进一步阐发而已。甚至马尔库塞后来在美国的不属本研究范围的著作，也不能算是真正代表新基础的突破，虽然常常有细微差别。正如我们几次看到的，《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中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可以在他和其他人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中找到萌芽形态。但我们现在考察的是其同事著作中的其他观点。

256

说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批判的“彻底”，这个词应在其进入到问题根本的词源学意义上理解，这对掌握法兰克福学派不断增长的对后来岁月中冒充“激进”的政治的不信任特别重要。奇怪的是，当理论变得更彻底时，研究所发现它很难与激进实践发生联系。霍克海默在战时的论文《权威国家》中渺茫的希望不久就让位给对一种有意义的变革机会的更深的悲观。对苏维埃国家希望的幻灭，甚至对西方工人阶级不再持有最起码的乐观，震惊于大众文化整合力量，法兰克福学派走完了它背离正统马克思主义长途跋涉的最后路程。

这一变化最清楚的表达，是研究所以一种新的历史动力来替换真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的阶级冲突，焦点是人与其内外自然的更大范围的冲突，其根源应追溯到资本主义之前，在资本主义

之后仍将继续存在甚至得到加强直到结束。新的侧重点的标志出现在研究所成员内部关于法西斯主义的争议上，对霍克海默、波洛克、阿多诺、洛文塔尔而言，统治越来越采取直接的、非经济的方式。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在一个更大范围内被视为西方历史上资产阶级时代统治的特殊的历史形态，国家资本主义和权威国家是这一时代结尾，或至少是这一时代的彻底转化。他们认为，目前的统治更加直接，更加恶毒，已失去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中介特性，在一定意义上它是西方人经历了几代的残酷与剥削后的本性报复。 257

事后看来，研究所早期著作中即有此一主题的暗示，^⑤虽然是在次要位置上。阿多诺曾在他关于基尔凯郭尔的研究^⑥和前研究所时期的音乐著作^⑦中运用过它；《黄昏》中的几条格言也严厉地攻击了虐待动物和工作伦理的禁欲前提，^⑧这已在某种方式上预示了《启蒙的辩证法》；洛文塔尔在批评亨姆生对自然的扭曲的抗议时提到统治自然的自由主义观念；^⑨弗洛姆是关于母系文化的讨论包含着对父权社会统治妇女的明显忧虑，它通过把女性和自然的非理性等同起来而得到强化。^⑩

也许，这一主题最清楚地表现在霍克海默为取得授课资格而写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起源》中。^⑪事实上，他在这里直接把文艺复兴的科技观与政治统治联系起来，他认为，自然界作为人类操纵和控制的一个领域这一新概念，是与人自身作为统治对象的概念相似的，这一观点最清楚的表达者是马基雅维利，他的政治工具主义被运用在上升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制中，霍克海默坚持，构成马基雅维利政治学基础的，是人与自然非辩证的分离和这一区分的实体化。他反对马基雅维利，认为事实上“自然”以两种方式依赖于人：文明对它的改变以及人关于自然的观念的改

变，这样，历史和自然就不是不可调和地对立的。

但是，它们并不完全同一，霍布斯和后来的启蒙思想家曾通过使人成为对象而把人与自然同化，正如自然在新科学中被对象化一样，在他们的眼中，人和自然都不过是机器。结果，自然永远自我重复的假设又被投射到人身上，与人的主体性紧密相联的发展的历史能力被否定了。由于所有这些进步倾向，人的“科学观”包含着当前的永恒轮回。

但是，维科与此不同，他是霍克海默选来用以结束其现代早期历史哲学研究的人物。维科反对笛卡尔式的形而上学和增长着的数学崇拜，这使他不同于他的同时代的人，维科洞察到人认识历史超过认识自然，因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维科也超越了启蒙主义对神话起源的解释，不是僧侣的诡计而是人类需要向自然的投射。在这些论述中，维科暗示了后来马克思意识形态的观点；这样，尽管他的文明的上升与衰落的循环论观点与马基雅维利相似，但人的活动是理解历史发展的关键这一点，则是他独一无二的发现；维科也理解实践与人统治自然不是一回事，尽管他把人和自然分离开来，但他避免了把人置于自然之上，通过坚持人的主体性，他保护了自然主体性的潜能。

在后来的写作中，霍克海默几乎没有说到维科，但这位意大利理论家对启蒙的批判一直被继承下来。在《杂志》上的一些文章中，他不断批评西方思想中笛卡尔二元论的神话，批判理论对非同一性的强调从不意味着主客体的绝对分离，法兰克福学派坚持，这样的分离是和资本主义秩序上升的需要联系起来的。霍克海默在《理性与自我保护》中写道：“笛卡尔以来的资产阶级哲学企图使知识成为统治的生产工具，只有黑格尔和他的同伴冲破了这一点”。^②战前，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是法兰克福学派

著作的一个持续性特征，但即使在当时，其准确关系也从未被搞清。^⑧这是特别困难的工作，因为在不同时代，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者像霍布斯、经验主义者像休谟、唯心主义者像康德，都被视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到40年代中期，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运用在研究所的工作中更为微弱。如我们已提到，《启蒙的辩证法》论反犹主义一章以一种马克思会反对的方式，讨论了它的前资本主义的、古代的根源。其实，启蒙观念在40年代经历了一个根本变化，与作为上升的资产阶级文化伴随物相反，它被扩充到全部西方思想范围，“启蒙在这里是和资产阶级思想同一的，而且是和一般思想同一的，因为正确地说在城市之外再没有什么思想了。”^⑨这是霍克海默1942年写给洛文塔尔的信中说的。在《理性之蚀》中，他竟至于说：“作为主人的精神（这是启蒙思想的本质）可以追溯到《创世纪》开头几章”。^⑩

虽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仍然使用可能回想到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像“交换原则”^⑪这类词在他们的分析中扮演了关键作用——但他们已不再在社会的物质基础上寻求文化问题的回答。事实是，他们把交换原则的分析看成是理解西方社会的关键，这既使人想到马克思《资本论》的讨论，也使人想到尼采《道德的谱系》中的主张。^⑫

259

而且，法兰克福学派不仅抹掉正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痕迹，而且也明确地把马克思置于启蒙传统中。^⑬马克思过分强调劳动作为人类自我实现的中心，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理由，对此霍克海默早在《黄昏》中就提出过质疑。他认为把自然异化为人类剥削的领域，实际上已暗含在把人还原为劳动的动物之中了。^⑭如果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全部世界将被转换成“大工作车间”。^⑮

这种希望对于韦伯这种认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不可调和的新康德主义者来说是不可能有的，虽然他认识到“实质理性”被其形式上的对手取代，但韦伯从不考虑其恢复的可能性，现代社会的“合理化”仅仅是在其非实质的意义上说的，韦伯与其同时代的浪漫主义者不同，不希望时间倒流。不过有一点是明显的，就是他几乎没有什么热情看待世界的世俗化。

当然，法兰克福学派也不欢迎，事实上他们焦虑地指出世界实际上是多么不“合理”，正如霍克海默书的题目指出的，理性已严重消蚀了，尽管它宣称通过引入合理的分析已超越了神话时代的混乱，但启蒙自身实际上也已成为一种新神话的牺牲品，这是《启蒙的辩证法》的主题。对启蒙的统治计划的根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控为是一种神控制世界的宗教信仰的世俗化版本，其结果是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内在对峙。缺乏自我意识的原始的万物有灵论至少已表明它知觉到两个范围是相互贯穿的，这在启蒙思想中已完全失落，在它看来世界由无生命的可以替换的原子组成，“万物有灵论”把客体精神化了，工具主义把精神客体化了。

概念式的思维，至少在黑格尔的意义上，曾保持了主客体中介的原始敏感。德语词“概念”（Begriff）与掌握（greifen）相联系，Begriff就是那些能完整掌握其内容的概念，包括肯定性的和否定性的要素。其实，人和动物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分是前者能概念地思维，后者却不能超过直接知觉。人的自我意识，穿过时间的同一性意识，无论是潜在的还是现实的，都是其概念化能力的产物。但是，启蒙在认识论上的主要趋势却是以教条来代替概念，它不能超过非辩证的直接性。“概念在启蒙主义这里，就像食利者在工业信托那里：都未觉得自己有把握”。^②而且，启蒙

过分强调逻辑形式主义，以及它假定所有真实的思想都倾向于数学的前提，这意味着它保留了神话时代的静态的重复，而阻碍了历史发展的动态可能性。

最不幸的是，启蒙的统治自然的观念对人的相互作用上的影响。提出这一观点时，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继续马尔库塞在《极权主义国家观中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中提出的看法。^④极权主义不是自由主义和启蒙价值的否定，而是它固有动力的发展，交换原则是启蒙思想关于自然是可替换的原子的基础，这又与现代社会中个人原子化的增长并行一致，这一过程在极权主义压抑性的平等中被滋养，人对自然工具性操纵不可避免地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启蒙主义世界观中主客体的无法沟通与现代极权国家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相对位置相应，世界的对象化已在人类关系中产生一个相似后果，如马克思所说，尽管将之限制在资本主义的后果上，还是死的过去逐渐统治活的现在。

所有这一切变化都反映在最基本的文化创造即语言上。如上所述，本雅明总是对言说的神学方面感到兴趣，^⑤其语言理论的根源是这个世界由“上帝的字词”创造。对于本雅明来说，“初始是语词”（“太初有道”）意指上帝的创造行为部分是由各种命名组成的，这些名称当然完美地表达了对象。不过，人是按上帝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也有独特的命名权，但他的名字与上帝的名字是不同的，这样名物之间产生隔阂，神圣言谈的绝对自足性失去了。本雅明认为形式逻辑是隔离天堂语言和其人间副本的栅栏，人倾向用抽象化、概括化来编排事物，事实上，“翻译者的任务，是用他自己的语言释放另一个魔力下的纯粹语言，解放因他自己的再创造而遭囚禁的语言”。^⑥类似的，“文化批评的任务就

使，企图从虚假结局的残骸中拯救相对真理”。^⑧事实上，阿多诺曾指责本雅明依名称物的神学尝试乃是魔法与实证主义的结合。^⑨在《启蒙的辩证法》论述文化工业的一章中，他却和霍克海默运用同样的两极对立结合来描述大众文化产生的意识形态的工具性的语言。否定而不是不成熟地寻找各种解决方式是真理的真正避难所。

其实，启蒙精神的最大失败不是没有能力创造一种名实可合法统一的社会条件，而在它从语言中系统地清除了否定，这就是何以它用教条代替概念最终颇具毁灭性的原因，启蒙哲学是过分的唯名论者而非实在论者。在本雅明的意义上，它的认识只是借助于人的言谈而非上帝的言谈，人是唯一的命名者，其作用与其统治自然相当，这样用马尔库塞后来的话说，语言就成了单向度的，^⑩它不能表达否定，不能再抗议压制，与揭示意义相反，言说除了成为社会中统治力量的工具外，什么也不是。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来作为《启蒙的辩证法》两个附录的前一个即荷马的《奥德修斯》的文化材料中，也可以见到语言衰败的预期。奥德修斯自称“非人”来欺骗库克洛佩斯(Cyclops)，这也是对自己的身份的否定，对初民来讲，巨人的前启蒙的心灵是与其名完全同一的。但是最后受欺骗的是奥德修斯，因为，西方人实际上已失去了他的身份，正如能够进行概念化和否定的语言已被仅仅作为现存秩序的一种工具的语言所替代一样。

在另一种方式上，荷马史诗——正确的说是半神话的史诗，半理性的原小说——已经暗示了启蒙的主题。自我否定和克制化作为主体理性的代价已成为现实，此即是例证。正像第二章讨论霍克海默《自我主义与解放运动》、马尔库塞《论享乐主义》及研究所其他早期著作时指出的，禁欲主义的各种形式成了他们不

断批评的目标。在《启蒙的辩证法》中这一批评被扩展了，“文明史是牺牲的内化史，换言之是放弃的历史”。^⑩其实，对人和自然一体的最初否定，是此后所有文明缺憾的根源，《奥德修斯》中不乏对西方思想中自我放弃与自我保存之间关系的清晰的例证：他拒绝吃荷叶或小牛，只有从她那里得到誓言不把他变成猪时才和赛西睡觉，他把自己绑在船的桅杆上以抵制女妖歌声的诱惑。

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来说，最后一个事件是特别富有象征意义的。^⑪奥德修斯的水手用蜡堵上耳朵的以免听到塞壬的歌声，就像现代工人，他们压抑满足以便继续苦役一样；另一方面，奥德修斯不是工人，所以能听到歌声，但其条件阻止了他去响应引诱，正是这一特权，文化仍然保持着没有可能满足的“幸福的承诺”，奥德修斯体验到的理想与物质领域的分隔乃是研究所所说的“肯定的文化”的特征。

更基本的是，奥德修斯的理性观是即将来临之物的不祥预兆。在与神秘的命运统治斗争时，他被迫否认他和总体的统一，理所当然，他不得不成为一种特殊的主体理性以确保其自我保存。像鲁宾逊一样，他是一个原子化的、孤立的个体，凭其才智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下生存，其理性是建立在诡计和工具性的基础上的。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来说，奥德修斯是启蒙价值观的模范和现代“经济人”的原型，他的背叛历程预示了作为利益的道德辩护的危险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甚至他和佩涅洛佩 (Penelope) 结婚，也卷入了交换原则——在他不在期间她的忠诚和对求婚者的拒绝乃是为了换取他的归来。

而且，尽管荷马史诗中有启蒙运动的重要暗示，它也包括着强烈的怀乡情绪和统一的愿望。只是奥德修斯力图回去的家是与自然疏离的，相反正如诺瓦利斯 (Novalis) 说的，“真正的乡愁只

有在“家”意味着自然时才是值得的。在《启蒙的辩证法》的另一个附录《朱丽埃特，或启蒙与道德》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考察了被扭曲的“回归”自然，它像暗流一样贯穿启蒙运动之中。这种回归常常意味着野蛮化的自然报复，这一现象在20世纪的野蛮生活中臻于巅峰。研究所早期论述法西斯主义的假自然主义的著作——尤其是洛文塔尔论亨姆生的尖锐论文——为此讨论提供了一个背景。 265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再次强调以康德为象征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以萨德(Sade)、某种程度上还有尼采为原型的极权主义之间的连续性。他们认为，康德把伦理学奠基于实践理性的尝试，最终是失败的。启蒙运动把自然乃至人看作是对象，这在根本上是与范畴规则的极端形式主义一致的，尽管康德主张应将人视为目的而非工具，计算的、工具的、形式的理性发展到其逻辑极端即导致了20世纪野蛮主义的恐惧。萨德是此漫长历程中的一个中途站，他的《朱丽埃特的历史》是功能理性的典型——没有器官闲散着，没有孔没有填满，“朱丽埃特的信条是科学……她象最现代的实证主义者那样操纵语义学和逻辑方法。而不象近代管理下的工人，他们直接对现代思想和哲学提出语言学批评。她是启蒙主义反宗教斗争的女儿。”^②萨德的其他书如《所多玛的120天》是对康德知识系统的怀疑和颠倒；而《朱斯蒂娜》则成了失去神话遗迹的荷马史诗。在精神与爱的肉体方面无情分离中，萨德仅仅是笛卡尔二元论的产物，他残酷地压服妇女也是启蒙精神统治自然的特征，^③妇女仅被还原为其生物功能，其主体性被剥夺了。教会的玛丽亚崇拜——本是对母权制下温暖和协调的部分让步——最终也失败了，近代早期女巫审讯是启蒙运动对妇女态度的一个象征，虽然它表面上支持她们的解放。萨德吵吵嚷嚷的

残暴不过是一个相当普遍现象的明显例证。事实上，启蒙运动虐待“较弱的性”已预示了后来犹太人的毁灭——妇女和犹太人皆被等同为统治的对象。

尼采的权力意志不下于康德的范畴命令，它通过设定人之独立于外部力量而预示了这一发展，其人类中心的傲慢也根源于康德“成熟”的观念，这是康德所理解的启蒙运动的主要目标。人作为万物的尺度内在地意味着人是自然的主人，正是过分强调人的自律，才不可思议地导向人的屈服，如同自然的命运成为人自己的命运一样。事实上，法西斯主义为实现其极端统治的邪恶目的，利用被压抑的自然的反抗来反对人的统治，^④一种方向的统治可以转向相反的方向，真正的“回到”自然与法西斯主义的假自然主义不同。

266

可以顺便说一下，在不再强调人的总体自律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忠实于批判理论拒绝规定一种肯定的人类学观念的原始出发点，他们认为这样的计划含有一种人类中心的认可，而这必然会玷污自然界。就其全力坚持世界的非理性可被测量的标准而言，批判理论在其核心深处并非彻底的人道主义，^⑤霍克海默晚年表而上对宗教的兴趣，乍看起来在根本上也并没偏离他早期著作的前提。

在《启蒙的辩证法》行文的末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考虑到启蒙精神在文化工业和现代反犹主义方面的后果，这在前面都讨论过了。在书的结尾他们插进了许多格言，论述像肉体的秘密历史和鬼魂理论这些迥然不同的主题。我们已多次指出，贯穿全书的音调是悲观的，凄凉的，人与自然的异化作为当代西方文明危机的中心看起来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在一条关于历史哲学的格言

上恢复自然的主体。⁶⁸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讨论投射时主张，调和的乌托邦并不存在于客体和知觉的统一之中，而是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反射性对立之中。⁶⁹在别处，他们还表明是自然的记忆（memory）而非自然本身才是统治的敌人。⁷⁰

事实上，记忆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解西方文明的危机中扮演了中心作用，弗洛伊德的成分在此颇惹人注意。⁷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一条格言中写道，进步的最大代价之一是由统治自然引起的苦难和痛苦的压抑。自然不仅被理解为人之外部之物，也是一个内在现实。他们说：“所有的物化都是一种忘却。”⁷²如前所述，在完整的重获过去之中追求解放的未来曾是本雅明著作的主题，他的经验理论和童年记忆就是这一兴趣的反映⁷³“所有的物化都是忘却”，⁷⁴这一短语就是在阿多诺1940年写给本雅明的信中首次提出来的。本雅明在《杂志》上发表论波德莱尔的文章中，268讨论了完整经验和普鲁斯特的随意记忆，这一点诱发了阿多诺。

解放的过程被部分地理解为自我意识的形成和消逝的过去的恢复，这当然是批判理论黑格尔根源的明显表现。对黑格尔来说，历史的过程就是精神意识到它的异己客观化的行程，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不同于黑格尔的是，首先他们拒绝把主体实体化为个体之上的超越实在；第二，他们不把它视为客观现实的唯一根源，法兰克福学派从未回到意识创造世界的唯心主义观念。阿多诺1940年2月29日给本雅明的信中说，一些忘却是不可能的，通过扩张，一些物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反思的主体与被反省的客体的完全统一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⁷⁵

如我们所料，法兰克福学派颇为怀疑它在唯心主义推崇意识的核心中所察觉到的人类中心论的冲动，甚至当意识成为理论的“对象”时。1945年，霍克海默回到哥伦比亚后，就其著作的主

要部分作了系列讲座。在其中的一个讲座中，^②他指控德国古典哲学要求克服人神二元论，这一欲望致使其体系中包容了恶魔。这样产生的神正论像莱布尼茨和黑格尔的神正论一样都带有寂静主义的含义。在所有古典哲学著作中，都没有优雅（grace）观念，这是他们内在傲慢的表现。为避免这些，法兰克福学派暗示道，自然对象的独立整体不得被保护，尽管这并不忽视它和人类主体相互作用。马克思曾称之为“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③是必须的，但不能以取消它们之间内在不同为代价。

当然，还应理解的是，研究所在40年代强调主客体统一的方面要重于坚持区分的方面，他们的设想是最终沟通自然和社会科学之间的隔阂，这也是狄尔泰及其追随者在19世纪晚期所做的。应该指出这种二分法，到20年代就已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了。^④卢卡契在反对恩格斯、考茨基及其第二国际的追随者们把马克思主义简约成自然科学的斗争时就接受了它。青年马尔库塞在参加研究所之前，也强调自然与历史之间无法沟通的距离，他在1930年写道：“历史性和非历史性的界限是本体论的界限”。^⑤甚至霍克海默在赞成维科与笛卡尔的不同同时，也支持人的研究与自然的研究是不同的观点。

虽然从未明确否认这一观点，法兰克福学派在40年代，已攻击人与自然区分的永久性，而使这一观点成为可疑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回到一种历史的“科学观”——这留给了后来的阿尔都塞和他的追随者^⑥——但它确实是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严格二分法的修正。谈论需要协调人和自然，纵然并不是同一，这也是和历史性与非历史性之间“本体论界限”信仰不相一致的。当然，这对未来的人的科学到底意味着什么从未在研究所著作中得到详细说明。

同样成问题的是发生在心理层面的统一，法兰克福学派的词汇表中引进了一个新术语：模仿（mimesis）。当然，作为对社会行为的一种解释，模仿为一些社会理论家长久喜爱，比如杜克海姆曾在其《自杀论》中专设一章，来推题一些先驱如 G·塔德（Gabriel Tarde）对模仿的运用；^⑧弗洛伊德在其《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也讨论了塔德的著作，但他把模仿置于更一般的范畴“暗示”之下，后者是 L·邦（Le Bon）用过的。^⑨但是，运用这一概念的，主要是那些试图解释群体行为的类型，尤其是大众或团体行为类型的理论家们。研究所也出于自己的目的使用模仿，它是在另一种背景中形成这一概念的。

1941年，研究所开始计划反犹研究，童年模仿的重要性就用来反对纳粹种族特性的遗传论。^⑩在哥伦比亚的讲座及《理性之蚀》中，霍克海默扩展了这一最初暗示，他认为模仿是童年期的主要学习手段，但此后的社会化又教给儿童忘记模仿以有利于合理的、有直接目标的行为。这种个体发生模式的种系关联是启蒙的主要模式之一。西方“文明”以模仿开始，但最终超过它，“自觉地适应和最终的统治取代了各种形式的模仿，科学的进步就是这一变化的理论表现：公式代替了形象，计算机械代替了仪式舞蹈，使自己适应即意味着使自己成为对象世界以自保”。^⑪但是，西方文明没有完全克服模仿，“如果模仿冲动最后被否定”，霍克海默警告说：

270

并不导向实现人的潜力，这个冲动将永远是在等待之中，并作为一种毁灭性力量随时会爆发。这就是说，如果在社会现状之外没有其他规范，如果理性所提供的所有幸福的希望都只不过是维持现状，甚至是增强其压力，那么模仿冲动

就永远不会被真正克服，人会以倒退的或扭曲的形式而重新回到它的怀抱中。^⑤

现代的虐待狂常常模仿其受害者的感伤姿势，政治蛊惑家们经常拙劣地模仿人们的目标。^⑥按照阿多诺在研究爵士乐时的说法，甚至无恶意的大众文化形式在其重复现存秩序时也表现出某些虐待成分。

但是，模仿自身并非恶的根源。相反，霍克海默认为，当它模仿自然中肯定生命的方面比如母亲的温情和保护时，它是健康的。他在哥伦比亚的讲座中提议，^⑦哲学的任务是重新唤醒被后来的社会化遮蔽了的童年模仿的记忆。家庭的衰亡必须被逆转，至少应使已固定于家庭之外机构上的儿童的模仿冲动恢复到它在家庭中的原来对象上。这个目标是与纯粹语言中所体验到的词与物的统一紧密联系在一起。霍克海默认为：“语言反应了自然中被压抑的渴求和困境，它释放了模仿冲动，这种冲动转化为普遍的语言媒介而不是毁灭行为，这意味着潜在的虚无主义能量在致力于调和”。^⑧从发生学上看，这一条件存在两岁左右儿童的意识中，对他来说，在一定意义所有名词都是专名。

如果目标是恢复人性发展的这一阶段，或至少是恢复其某些较好的特征，那么这对自我而言，会有什么发生呢？根据弗洛伊德，自我是后来形成的。在他们40年代的思辨性著作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讨论自我时就采取了与《偏见研究》明显不同的调子。不是强调需要一个完整的自我来反对作为异化自我的特征的向少数替罪羊的投射，而是把自我的发展与自然的统治结合起来。在《理性之蚀》中，霍克海默主张：

当然，霍克海默及其同事持这样的观点时并不是孤立的。事实上，有相当一些思想家，虽然他们在其他许多问题上并不一致，但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正如 F·林格指出：魏玛时代学术上的“文化贵族”被世界的理性化及其后果所困扰，^②比如舍勒早在 1926 年就批判过对自然的合理性统治；^③相似的情绪也在另一个对手海德格尔的笔下流出来，他对马尔库塞的影响常常被认为要对其前学生反技术的偏见负责。^④在 40 年代，保守主义者从一个完全不同的传统对工具理性及其后果进行激烈抨击，M·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一篇有影响的论文《政治学中的理性主义》^⑤是和《启蒙的辩证法》、《理性之蚀》同一年出版的。

法兰克福学派和这些思想家的距离是：它的成员坚持理性的多样性，其中之一可以避免和自然冲突。他们与其他人的观点不同在于他们不承认实质理性可以在社会中直接实现，非对立的理性总是一种希望，即使否定了现存秩序，这种理性的存在也会避免对自然非批判的神化。在《理性之蚀》中，霍克海默专设一章论述“回归”自然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观点与《启蒙的辩证法》中讨论萨德主义观点相似。在霍克海默看来：

自然人对理性增长的反抗——就其人类中落后一层的意义上——实际上促使了理性的形式化，并促成禁锢而非解放自然。按照这一观点，我们可以把法西斯主义描述为自然和理性的恶魔般综合——这恰恰与哲学总在梦想的两极统一相对立。^⑥

达尔文主义是自然的造反和统治联结的征兆，至少是在其社会形态上。霍克海默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颠倒了内在于达尔

文的人和自然一体的最初洞见中的统一潜力。相反，“适者生存”的概念仅仅把形式化了的理性概念译成自然史的语言”，^②所以不奇怪，他把他一贯厌恶的实用主义称为达尔文主义的支流。^③本雅明在其论E·福希（Eduard Fuchs）的文章中已确定了达尔文进化论和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浅薄的乐观主义的关系。^④理性与自然的这种统一是无法解决的，它实际上是把前者还原为后者的工具，倒退到前启蒙的“自然主义”明显是后果不妙的谬误。“帮助自然的唯一途径是解除对它表面上对立的独立思想的限制。”^⑤

当然，“独立思想”并不是回到前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自律的静观。在《理性之蚀》中，霍克海默明确反对复活早期的形而上学体系。40年代末达到兴趣高潮的新托马斯主义成了他进攻的主要目标。新托马斯主义者寻求绝对教义，被他视为通过训谕来克服相对主义而不予理会，而它的倡导者希望使托马斯的教义合乎现代世界，又被他讥为顺从主义和唯唯诺诺。在霍克海默看来，新托马斯主义在否认“否定”方面本质上是和实用主义同类的，他指责：“托马斯主义的失败，在于它乐于默认实用的目的而不在于它缺乏实践性。当一种教条实体化为一个孤立的原则而排斥了否定之时，它就会自相矛盾地使自己倾向于顺从主义。”^⑥像所有实证主义体系一样，托马斯主义这种天生的不足“在于它把真理、善与现实等同在一起”^⑦

战后出现的另一个流行的“独立思想”的尝试是存在主义运动。还在它流行之前，研究所就对那些后来被认为是其主要发言人的思想家持对立态度，阿多诺对基尔凯郭尔的批判是最具影响的攻击；霍克海默颇不同情地论及过雅斯贝斯^⑧；而马尔库塞在参加研究所后，也最终开始批判海德格尔^⑨和施密特的政治存在

主义。^⑥战后，存在主义最重要的著作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它在1946年引起了霍克海默注意，他写信给洛文塔尔：

在品尝了萨特之后，我深深感到尽快出版我们的著作是我们的责任。尽管我内心拒绝，但还是读了萨特的大部分……这是一种新型的哲学大众文学……从哲学观点看，最令人吃惊的现象是辩证概念粗陋的物化……辩证思想的技巧与复杂性已转化成一架光辉的金属机械，一些词如“自在的我”和“自为之我”像活塞一样起作用，对范畴的拜物化的处理甚至出现在印刷形式中：里面不乏令人失去活力、不堪忍受的斜体字的运用。所有概念都是严格的语词意义上的技术行话。^⑦

274

不过《理性之蚀》并没有提到存在主义。破坏的任务留给了马尔库塞，他在战后国务院任职期间，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⑧他对《存在与虚无》的评估和霍克海默的批评一样，在几个方面，他的批判预示了萨特后来的自我批评。^⑨在马尔库塞看来，萨特错误地使荒诞进入本体论而不是历史条件之中，结果，他陷入把自由视作与外在他律的世界相对立的唯心主义的内在化的某种东西。虽然他怀有革命意向，但其政治学与哲学总体上是相反的。由于把自由定位于自为（黑格尔哲学的译语），并否认自为能成为自在，这样萨特就把主体性与客体性完全分离开来，而否认了它们作为乌托邦可能性的统一。而且，由于他过分强调主体的自由而忽视历史条件的限制，萨特已最终成为社会现状的不自觉的辩护者。人选择自己的命运，即使是在一种恐怖中，萨特的这一主张是颇为怪诞的。

假如一种哲学借助其对人或自由的存在一本体论的观念，能够把被迫害的犹太人和刽子手屠刀下的牺牲品证明是完全自白的，那么，这些哲学的思想就堕落到纯属意识形态的水平上，这种意识形态本身可以为迫害者和刽子手提供最得心应手的解释。⁹⁰

对马尔库塞而言，“存在主义”哲学的全部计划如果没有本质的先验观念是不可能的。萨特自己的著作就违背其初衷：自为及其完美的自由，是在其属类状态下而不是在其经验条件下对人的规范性描述。把否定吸收到人的本性的肯定性描述中，萨特已失去了本质哲学的辩证紧张。其实，“自为”的概念作为不断行动和自我创造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已是一种特殊的肯定性功能，“在存在主义的虚无主义的语言之外，潜伏着自由竞争，自由进取，机会均等的意识形态”。⁹¹萨特的主体类似于斯蒂纳无政府主义的自我，在统治自然的启蒙传统中是非常多的。⁹²

275

在《存在与虚无》中，唯一得到马尔库塞勉强称道的是对性的讨论。如罗宾逊指出的，⁹³马尔库塞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是他后来融合弗洛伊德的中途站；也与他10年前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有关。⁹⁴在萨特对性的论述中打动马尔库塞的，是性欲中“否定的否定含义”，当它被发展到极端时就会否定自为的主动性。在性活动中，身体完全成为物化的、被动的对象，它被快乐原则而不是现实统治原则所控制。早在1937年，马尔库塞就写道：

当身体已完全成为一个客体，一件美妙的物品时，它就成为一种新幸福的预兆，人在忍受最极端的物化时也就战胜了物化。美的身体的艺术展示，他表现出来的轻松自如和裂

巧舒展，今天只有在马戏团、滑稽剧、讽刺剧中才能见到——预告了人们只有从理想中释放出来才能达到的快乐。一旦人类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体，就会成功地征服了物质。⁹⁰

虽然不再谈“征服物质”，马尔库塞仍然感到总体的性异化中的被动自由否定了存在主义者把自由还原为侵略性的自为的活动。事实上，这对社会潜在的转化提出了更多的创见，超过了萨特从其哲学中引出激进政治学的笨拙的尝试。⁹¹自为的否定——看来是根据马尔库塞后来说的“操作原则”而运作的⁹²——提示了一种与自然的调和，虽然只是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第一步。完全物化意味着不仅仅是否定自我的统治方面，而且也包括其非统治方面，这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论述身体的异化时关心的现实。⁹³

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在战后年代最担心的是这些主体性成分的取消。如我们在考察研究所论述大众文化和权威人格的经验性著作时看到的，真正个体的存在以一种令人吃惊的速度衰落。当然，研究所并不希望复活古老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性自我的个人，但它的确感到，个人在某些方面被受操纵的大众所代替确实意味着自由的丧失。正如阿多诺在给本雅明的信中说的，⁹⁴“个体”是中间工具，一个过渡的工具，这一点不能视为神话而打发掉，相反，它不得不保存在一个更高的综合中。资产阶级个人就其与总体性对立而言，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我们以上已提到，法兰克福学派根据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统一而含蓄地坚持的肯定性自由的目标，但另一方面，否定性自由也是总体性的一个成分。这样，资产阶级主体同时是自由的，也是不自由的。然而，

在大众社会总体性的强迫性同一中是完全没有自由的。至少早期资产阶级社会包含着明确的矛盾，在其统治趋势中保存着否定。自我主义因其察觉到个人幸福被保存在诸矛盾的真正调和中而受到霍克海默的保卫，同样的观点也出现在马尔库塞对享乐主义哲学的辩护中。

现在，这些矛盾的存在本身，至少对它们存在的意识已处在危险之中，尽管资本主义没有被社会主义代替。^④在马尔库塞后来称之为“单向度的社会”中，否定的救赎能力在总体上已丧失殆尽，剩下的是肯定性自由之梦残忍的拙劣模仿，原是追求人的解放的启蒙运动最终竟颇具讽刺地以一种比前此更有效的手段来奴役人，人类不再有任何行动的清清楚楚命令，唯一的出路在于保存和培养残留的否定的东西，这条路是向能够逃脱文化工业使人麻木的力量的那些人敞开着。“哲学理论本身，并不能决定是野蛮的倾向还是人道的展望盛行于未来。”霍克海默警告道：“然而，通过公正对待在特定时期绝对地统治了现实的想象和观念，比如统治资产阶级时代的个人观念——当然这些观念已经在历史进程中被放逐了，哲学是能够作为历史的矫正物而起作用的。”^⑤

这是阿多诺在其最富个人特色的著作《最低限度的道德》中自己定下的任务。这本书是在40年代一点一点写成的，1951年出版。其片断的、格言的风格不是偶然的。他认为，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的否定和真理只能通过尝试的不完全的方式来表达，这里，批判理论对体系的根本不信任发展到了极端。哲学洞察的位置再也不像黑格尔时代那样存在于抽象的、内在的、建构的体系，而是存在于主观的、私人的反思之中。在序言中，阿多诺强调哲学的发展已经远离了黑格尔，后者在其大度的时候曾容忍过“谈话”式之类的格言。^⑥黑格尔不断攻击自为存在的主体性的不

解这一不可能性：“在来自现实的挑战面前，拯救自身现实或非现实的问题几乎是无关紧要的”。^⑧

临死之前，本雅明写道“我们的幸福幻象永远和赎罪的形象绑在一起……像我们以前的每一代一样，我们都禀有一种微弱的弥赛亚力量。”^⑨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阿多诺看起来是赞同赎罪和幸福的联系的，但他甚至否定在他的时代有一种较弱的弥赛亚力量，他认为弥赛亚所承诺的肯定的自由和真正的统一，将永远是乌托邦的希望而不可能在尘世实现。黑格尔和马克思所幻想的异化回到自身的动力否定之否定，必然会遭到挫折。辩证法，正如他后一本书名所说的，只能是否定的。^⑩霍克海默后来对叔本华的兴趣坚定了批判理论的这一立场，当霍克海默写道：“在叔本华意义上，坚持世俗的立场反抗残忍的永恒是道德的”。^⑪这与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的下述立场是一致的：不毁灭有限和偶然，总体性的要求不能实现。

当然，法兰克福学派同时也继续坚持乌托邦的希望，虽然它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但仍然要坚持。所以矛盾的是，只有这一希望能避免历史回到神话，正如霍克海默在给洛文塔尔的信中谈到纳粹的历史意义：

他们的历史概念表现为对纪念物的崇拜，如你指出的，如果里面缺乏乌托邦精神，也就根本不存在任何历史这样的东西。法西斯主义极端抬高过去，是反历史的。纳粹参照历史只是意味着强者必须统治，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指导人性的从永恒规律中的解脱，当他们说历史时，他们是在指相反的东西：神话。^⑫

在如此主张中，法兰克福学派把自己置于这些一样思想家之列 279
中：他们的乌托邦幻想不是提供行动的计划，而是与当代现实的
引力保持距离的批判的源泉。¹⁹

研究所 40 年代在理论倾向上这一微妙而又重要的转移，正
是上述第二个不连续性的主要原因。随着研究所强调重心从阶级
斗争向人与自然斗争的转变，历史主体引导革命时代的可能性也
消失了，可以被视为研究所英雄时期之一的实践，再也不是它思
想中的一个有机部分了。阿多诺在 1969 年去世前有一句话经常
被人们援引：“在我构建理论模型时，我不能设想人们会用汽油
手榴弹去实现它。”²⁰这并不是曾错误估计了其思想的实践意义的
人的哀歌，相反它反映了理论自身的结论，否定绝不能真正被否
定。到了《最低限度的道德》或许在此之前，阿多诺已接受了此
一忧郁的现实：“一度看来过时的哲学，现在仍然不适宜地活
着，因为它失去了实现它的机会”。²¹

仍可追寻的实践类型是很不清楚的，如霍克海默在《理性之
蚀》中警告的，理性并不提供政治活动的指导，批判理论的激进
化已增加了它和激进实践的距离，但法兰克福学派从未退回到作
为一种被迫选择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保持非同一性和否定看
来意味着自由的多元主义，但研究所不信任大众社会中竞争团体
的现实性。在另一种方式上，他的立场也是与自由主义相反的，
后者是启蒙的产物，不断的进步，对自然的技术统治，作为目的
本身的容忍等等，所有这些自由主义信仰都是霍克海默和其同事
不接受的。柏克的保守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前提更是如此，尽管它
的一些现代解释者如奥克肖特以同样的热情攻击工具理性主义。
至于相信现存世界的内在理性的黑格尔右翼保守主义者，他们肯
定性的陈词滥调对法兰克福学派也没有吸引力。其实，批判理论

现在不能提供一个批判实践，肯定性自由的内在紧张颇为有力而不容忽视，自由作为理性和自我实现行为的统一已分崩离析，法兰克福学派遵循其初衷只能选择理性，即使在 20 世纪被管理的恶梦中发现它只能以缄默的否定的形式出现。霍克海默和其同事也许会说，即使是在一种微弱的否定的形式上，理论是向那些诚实的人敞开着和实践的唯一形式。^⑩ 280

结 束 语

1946年春，洛文塔尔告诉霍克海默一些来自德国的令人鼓舞的消息：

J·迈尔（研究所原先的学生，A·迈尔的丈夫，当时是纽约办事处的行政领导）写信给他的妻子，说德国的优秀学生和知识分子对我们著作的热衷有甚于食物。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有大学都想尽可能地拥有《杂志》。^①

法兰克福学派长期坚持用德语写作，它期望的读者现在开始出现了。迈尔信后几个月，法兰克福社会开始接近研究所，部长顾问克林格赫弗（Klingelhöfer）、大学校长霍尔斯坦因（Rector Hallstein）、系主任索尔曼（Sauermann）第一次提出研究所回到其诞生地的具体建议。^②

但此时，霍克海默并不想作出肯定回答，《偏见研究》尚未完成，研究所此后几年在美国的承诺使他可以延缓作出决定。然而1947年3月，有迹象表明霍克海默开始动摇，他写信给洛文塔尔，^③说如果德国要研究美国反偏见项目的效果，法兰克福办事处是有用的；而且研究所可以把美国社会科学的技术教给德国

学生，以矫正传统德国学术界过分的理论偏见。这时他还没有提到把研究所的实际中心移回去，事实上，和洛杉矶地区大学合作的可能性直到1947年8月还在考虑。^⑥

次年春，霍克海默作了自1933年匆匆离开后的第一次德国之旅，应邀参加法兰克福议会100周年纪念典礼。作为城市的客人，他受到热烈欢迎，并在大学作了一系列讲演。法兰克福官方急于希望前纳粹时期的著名知识分子回来，是吸引研究所回迁的重要因素，最后证明他们的努力是成功的。由于美占区官方，包括其高级代表J·J·麦克劳(John J·McCloy)的鼓励，法兰克福市发出了一个霍克海默觉得不能拒绝的邀请。9月，他决定回国，写信给克林格赫弗告诉其决定，并很快得到答复。1949年7月13日，大学的讲座在撤销16年后恢复了，不过有点变化，它现在是社会学和哲学讲座而非社会哲学讲座。当然研究所及其资金、图书也随着霍克海默一起回来了。他后来说，^⑦研究所的重建并非接受一个后悔政府的补偿，因为没有什么事能够弥补德国做的一切。相反，它意味着对那些因帮助犹太人而抵抗希特勒的奥们的尊敬姿态。^⑧而且面对德国学生，霍克海默的决心立即坚定起来。^⑨那是令人吃惊的^⑩，^⑪并说他写信给潘文塔耳，^⑫研究所的经历多么深刻而持久地发生在许多欧洲知识分子的心中，直到1933年，这一经历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也未被怀疑，我们现在的责任是在未来巩固它、深化它。^⑬学生的热心在他这里得到了适当的热情反应：“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我不分昼夜地工作”。3月份他又在信中说：“最美妙的还是教学，即使假期，我也从未失去和学生的联系”。^⑭霍克海默讲课的功效——那时曾在法兰克福任访问教授的E·休斯(Everett Hughes)记得，霍克海默是他听过的最好的

波洛克也愿意回去，主要是出于对霍克海默和研究所的忠诚，而非对美国的厌恶。但研究所的其他核心成员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当大学教授的位置不能得到保证时，这就更明朗了。1946年2月8日，洛文塔尔写信给霍克海默：“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可笑的辩证位置上，1938年，我是我们当中最有力的鼓吹解散我们组织机构的人，今天我更清楚地看到这种危险的可能”。但当真的可以回到德国而实现这一愿望时，洛文塔尔就不能应承自己了。他与美国心理学家 M·费思克 (Marjorie Fiske) 行将举行的婚礼，无疑加强了她的勉强与迟缓。1949 上，他接受美国之音研究部主任一职，结束了他在研究所 23 年的任期。几年后，他参加了加州大学贝克利分校社会学院。

284

马尔库塞 40 年代和研究所的联系逐渐减少，在政府部门一直呆到 1950 年；此后到哥伦比亚讲社会学并担任苏联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此后的两年也为哈佛苏联研究中心做研究，出版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书；^①1954 年，他参加布兰德斯大学的思想史研究计划，持续 11 年。此时他建立在《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基础上的声誉持续增长。1965 年，他离开麻省诸塞的韦泰姆到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此时他正处在新左派的国际导师的中心位置。

基希海默战后继续为政府工作，起初在国务院欧洲研究部，1950 年到 1955 年任中欧部主任；此后 7 年，他在研究所的老对手，纽约社会研究新学校的研究院任教；1961 年出版了大部头的著作《政治正义论》；次年他参加哥伦比亚政府部门，直到 1965 年去世，此时刚刚过了 60 岁生日。研究所其他成员也在美国大学找到了位置，纽曼在哥伦比亚、G·迈耶尔在芝加哥大学、马辛在罗特吉大学、J·迈尔和芬莱 (M. I. Finley) 也参加了罗

特吉大学研究院；曼德鲍姆改名马丁（Martin）成为英国曼彻斯特的经济学家；格罗斯曼回到德国，但不是回研究所，而是去了苏占区莱比锡，在那里抑郁地活到1950年；古尔兰1950年回德后先在柏林政治学院、后在达姆施塔特技术学院任教。

维特夫的生涯此时发生重要变化，值得在此评述一下。1947年他负责由华盛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发起的中国史研究计划，这是他摆脱研究所的最后一步。4年后，在所谓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已渗透到政府和学术机构的狂热宣传期间，他被传唤参加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麦卡锡议员的国家安全小组^⑨，维特夫后来说他本人很不愿意去。1951年8月7日的证词是他对那些年月反共歇斯底里所做的唯一工作，^⑩研究所仅仅是在与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最初联系时被提到，他用了一定的篇幅谈到后者被渗透的情况。5天前在海德·马辛（Hede Massing）的证词中被认作共产党员的古姆佩茨，现在被当作了中间人。维特夫提到的另一个与研究所有外围联系的人物是芬莱，他后来离美赴英，无疑是考虑到维特夫证词的反应。附带说一下，芬莱的最后选择是很成功的，60年代他成为剑桥古代史的讲座教授。

维特夫承认当他成为公开的反共分子时，他和研究所的学术联系已经中断，这给他的证词加上了一个悲哀的注释。无疑，研究所的同事们确实讨厌他的新立场，特别是他对前政治盟友的揭发；他们确信他和授寻迫害者的合作已超过了他们参加麦卡锡小组的时候，尽管他对此持相反的愤怒的辩解。无论是真是假，从那时开始，维特夫成了法兰克福学派不受欢迎的人，对于这个国家的许多自由主义的学者来说也是一样。霍克海默对研究所的一些成员留在美国表示失望，但对维特夫的选择从不遗憾。

所以，回到法兰克福的研究所大为缩小，不用说，其支持还

是相当可观的。1949年6月,提出了一份研究所重新开张的申请,签名人是引人注目的,它表明研究所受到其学术同仁的尊重,这些名字中有G·阿尔泡特(Gordon Allport)、阿隆、G. D. H. 科尔(G. D. H. Cole)、G. P. 高赫(G. P. Gooch)、金斯伯格、E·科甘(Eugen Kogon)、拉扎菲尔德、莱昂特、T·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蒂利希、麦克夫、J·肖特韦尔(James T·Shotwell)。申请书中说:“恢复法兰克福办事处的作用是双重的:设计和实施研究计划,也许更有意义的是在社会科学的现代发展中指导新一代学生”。^⑥财政支持有许多来源,麦克劳基金提供236000马克,这是重建所需的一半;研究所基金的管理者“社会研究协会”提供了它的全部存留,占总数的1/3强;其他部分则来自法兰克福市及私人的资助。由于阿根廷通货膨胀,F·韦尔已不再能提供支持。^⑦

1950年8月,随着阿多诺任副所长——5年后接替霍克海默任所长——研究所重新开始工作;地点在森肯堡拉格大街,位于原来研究所的废墟旁边。^⑧次年9月14日,新建筑在同一条大街距离原建筑不远的地方落成,建筑师A·盖弗尔(Alois Geifer)设计了简洁的功能主义的风格,使人想起F·罗克儿以前的新现实派的风格。F·韦尔、著名的社会学家R·科林格(Rene König)和L·韦兹分别在开幕式上讲话,勋伯格的音乐很恰当地被选来演奏。“马克思咖啡店(Café Max)是研究所在新学生中的称呼,现在再一次流行。新绰号不仅指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也指研究所战后作为“马克思咖啡店”的声誉,“Max”中“r”的丢弃象征着研究所从其美国阶段的激进主义的转移。有趣的是,它的第一批任务之一是把《偏见研究》译成德文;《杂志》虽然没有复刊,但不久就开始出版一系列《法兰克福社会学》,第一卷是霍克海默60寿辰的纪念卷。^⑨

在回德后的最初年月中，霍克海默主要忙于重新组织研究所和大学中的学术事务，²³1950年他当选为哲学系主任，次年9月当选为大学校长。²⁴此前一周，W·利赫特（Werner Richter）已就任波恩大学校长，他是第一个美籍德国大学校长，霍克海默是第2个；更有象征意义的是，他是战后第一个犹太人大学校长。1952年，他连任12个月；任期结束后，他获得法兰克福市最高奖歌德奖；7年后，他退休后到了瑞士，该市授予他终生荣誉市民。

但霍克海默与美国的联系仍很频繁，研究所纽约办事处在后来的20年中虽然没有活动，但还是以A·迈尔为负责人。霍克海默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外国顾问，为它提供了《西德社会科学概况》的报告。²⁵1954年，他短期赴美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兼职研究员，此后5年他都定期赴美。阿多诺自海克尔基金会赞助他在洛杉矶度过1953年的大部分时间后，终生留在法兰克福，从未再回美国。1958年，霍克海默和波洛克退休后到了瑞士蒙塔戈诺拉镇，在那里建筑了毗邻的房子，可以俯视洛迦诺湖。阿多诺继任所长，直到60年代，霍克海默和波洛克都对研究所的事务保持兴趣，甚至在一些新人如研究所统计方面的领导R·冈察尔特（Rudolf Gunzert）和经验工作方面的领导I·V·弗里德堡等开始担负更多的管理责任时也是如此。霍克海默仍然写文章，尽管速度大不如前，新论文由A·施密特编辑在《工具理性批判》中的《理性之蚀》中，1967年出版。此时，有人说服他出版当年发表于《杂志》上的文章，他没有同意。1965年6月在给S·F·维拉格（S Fischer Verlag）的信中解释说，他之所以不同意，是因为他当时写作这些文章的环境改变了，现在再版可能导致对文章内容的误解。²⁶但1968年，他最终同意了，两卷本《批判理论》在长期等待后出版了。他们的出现是引发对研究所早期历史兴趣的

主要诱因之一，其结果包括我们现在的研究。

我们现在不可能对研究所返德以后的历史及其中心成员回德以后的情况进行学术概括；类似地，对阿多诺从 50 年代初到 1969 年夏出版的卷帙浩繁的著作的分析也得留在别处；^②由于马尔库塞的影响而导致的 60 年代美国新读者对法兰克福学派著作产生的兴趣，^③在此也不能予以讨论。由于限制在 50 年代之前，我们可以无愧地排除研究所影响最大的时期，我们选择的是其创造力最伟大的时期，也就是流亡美国的时期。

其实，可以说这一创造性丰收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其相对孤立的环境中完成的。50 年代早期重新定居后，霍克海默被法兰克福社会奉为名人，对他恢复魏玛文化的遗风颇为感激。他和 K·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来往，并经常出现在广播、电视和出版物上^④。他曾这样给洛文塔尔写信：“在我们这三、四个之外，肯定还有其他心灵与我们心心相印，只不过是见不到他们，或许他们避免表达自己。”^⑤这样的日子显然是一去不返了。

288

由于早期的外在地位而得到加强的批判锋芒，现在则却因大众的认同和喝采而开始消蚀，“法兰克福学派”与其含有的内在僵化的区分开始明显，阿多诺说过：“忠于勋伯格，即是要警惕所有的 12 音派”，^⑥而忠于批判理论的原来的精神即是要警惕“法兰克福学派”的异化。^⑦而且，使研究所的年青一代更感沮丧的是，其激进追随者都不过是这一变化的意识形态上的回应。霍克海默及其同事在 40 年代曾艰苦地与之斗争的冷战氛围，已开始渗透进他们在 50、60 年代的言论中了。^⑧不断拉大的鸿沟使霍克海默、阿多诺与马尔库塞分开，后者的政治倾向仍然是坚定的左派。但这一裂缝并未被分开，因为他们仍然保持个人联系，但私下的分歧已很尖锐。马尔库塞逐渐声名显赫，并非因为他是一个

国家支持的美国大学的领袖；事实上，公众对他与之联系的法兰克福学派也知之不多；除了美国一些大学的研究院外，他和其他机构也没有什么联系；他也并没有因要对满怀期待的公众表现出一副“责任”相而矫揉造作。因此将他和前同事分离的唯一的，或者是主要的原因归之于此，当然是太夸张了，但它的确可能存在某些影响。

指出1950年以后法兰克福学派机构一致的重要，并不是说其全部历史上缺乏这种一致。正如希尔斯说的。^①提高法兰克福学派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之一，恰恰是它将近半个世纪的组织的连续性，至少与一些孤立的人物如曼海姆相比时是如此。霍克海默尽管公开承认他厌恶管理方面的世俗事务，但他确是一个精明的管理者，并能巧妙地得到财政支持。负责研究所管理事务的波洛克是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曾半开玩笑地说他在管理基金方面并不比哲学家霍克海默更好；^②原来的联系人拉扎菲尔德是一个高度熟练的“管理型学者”^③，虽未明说，但也承认过霍克海默类似的品质。^④研究所在经过一系列成功的变化后仍然顽强地保持集体一致，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霍克海默丰富的人格、思想的力量和实际组织的才能。波洛克评论说：“研究所历史上无论多少事情，其成员不论有多少论著，都来自霍克海默，没有他，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走上不同的道路。”^⑤在说服失败时，比如弗洛姆和纽曼的情况，霍克海默情愿看到不让步的对手终止在研究所的事务，而不允许不同意见的长期存在。马辛在描述其他成员对霍克海默的忠诚时，令人感动地引用席勒《华伦斯坦》的诗行，可粗译为：“既然我无法与他相匹敌，我立意无限去爱他”。^⑥把研究所的其他核心成员说成是环绕着霍克海默的卫星是不恰当的，但他的卓越是无人可以挑战的。所有同事中，看来只有阿多诺能

同样地对他发生影响。

美国时期的研究所与重回法兰克福的研究所不同，不是其组织的一致性方面，而是这一组织在研究所与其社会的、精神的环境的相互影响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同。在美国，其作用是保证霍克海默及其同事与外部世界保持很大程度的孤立，与其理论工作一样受到关心的财政独立和 117 号大街建筑的独立性，使研究所在不受外部压力和干扰的情况下工作。它蓄意用德语写作的决定，意味着不可能争取大量美国读者，虽然一些本地出生的学者如 B·纳尔森 (Benjamin Nelson) 和芬莱受到研究所在晨边峰上的训练，但“法兰克福学派”并非真的在这个海滨形成，它和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这类有声望的帮助者有联系，但其独立性始终保持着。

这一需要的代价也是很明显的，尽管常常和哥伦比亚正规学院联系，法兰克福学派基本上独立于美国学术主流之外，这使它能够设想诸如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等等，都缺乏充分的有效性；它也切断了研究所与美国思想传统的潜在联系，^①比如与米德的联系。^②最后，它也无意让美国公众基于那几本英文出版的样本而形成对其工作的不均衡的看法。^③

研究所审慎地拒绝其他流亡者追求的同化，其原因是复杂的。它的基本成员都是些政治参与者，尽管他们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程度上都处于魏玛激进主义的边缘。其早期核心成员中确有人参加政党，不过在总体上，研究所是独立于任何正式的政治组织的；而且从一开始，它就自觉地与德国学术团体保持一定距离，尽管它与法兰克福大学有松散联系；最后，其成员虽然大多出生于同化了的犹太家庭——弗洛姆因其更正统的背景除外——他们仍然是那些未能克服其德国社会边缘地位的犹太人。总之，

不像其他流亡美国的人，法兰克福学派在被迫去美国之前差不多就是一个局外团体。

所以不奇怪，纳粹掌权的创伤加强了研究所的被疏远的地位，在不少时候研究所成员用笔名就是一个象征：霍克海默用“*Heinrich Regius*”、阿多诺用“*Hektor Rottweiler*”、本雅明用“*Detlef Holz*”和“*C. Conrad*”、维特夫用“*Klaus Hinrichs*”或“*Carl Peterson*”、基希海默用“*Heinrich Seitz*”、马辛用“*Karl Billinger*”、博克瑙用“*Fritz Jungmann*”、曼德鲍姆用“*Kurt Baumann*”。更严重的是，一些和研究所有各种联系的人的生命都被纳粹消灭，他们中有斯特海默、兰道尔、兰兹伯格，间接还有本雅明；其他一些人如维特夫和马辛一度被关进集中营，不过有幸在集中营或类似机构变成毁灭中心前而被营救出来。所以，迁到美国若干年后，研究所成员对其安全问题都半信半疑。这种不确定性也转向研究所内部，迟至1946年，霍克海默还在给洛文塔尔的一封信中引用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话：

在类似的方式上，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清楚：一个非常丰富的精神——所承认的仅仅是真实感情——不可避免地会在多方面遭到误解——它的动机也被误解了。正如大智会被视为愚顽，大义亦会被视为平庸——其他的美德也概莫能外。这确是一个令人痛苦的话题。个人尽可以超越他的种族，这是无疑的。但回顾他们存在的历史的踪迹，我们应该忽略所有“美好和伟大”的传记，而去小心地寻找苦难的轻微的记录：死于囚牢、精神病和绞架。

接着他又写道：“最近几年，我从未读到比这些更接近我自己思

想的句子。”^⑧

回到法兰克福以后，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帮助做出这一决定的目标之一是研究所可以对新一代德国学生发生影响，这意味着可以在德国大学的正常学术生活中发现重大的希望。与相对独立的发展不同，法兰克福学派现在是德国社会学和哲学的主流之一；也不再受轻视了，它的理论著作现在是激烈争论的源泉，如上所述，其重要性可与半个世纪之前把德国社会思想分裂为二的方法论之争匹配；曾经阻碍研究所思想广泛传播的语言障碍没有了；其影响前所未有的，甚至社会科学中最保守的分支历史学，也受到批判理论的影响。^⑨在战后贫乏的思想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异军突起，即使它处在魏玛盛世，也不会如此显赫。总之，1950年以后，法兰克福学派的组织充当了其成员的思想与广大的社会之间肯定性的中介，它在新背景下的发展过程中，终于走出了孤立，找到了一个宣传批判理论的讲台。

我们的目的不是详细论述研究所回到德国后的局部调整，而是强调其新的处境与其在美国的孤立不同。注意到批判理论的内容与创造者的经历直接相联并非多余，法兰克福学派强调否定、非同一性以及经常被引用的“不加入（nicht mitzumachen）”的需要，是和其经历相一致的。

不过将此暗示成是为了揭短则是徒劳的，因为法兰克福学派已明显提出这一点。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通过把哲学还原为对“毁掉的人生的反思”而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研究所从来不接受曼海姆对“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的颂扬，阿多诺写道：“对曼海姆把知识分子当作‘自由漂浮’来尊敬的回答，不是相反地去设定其‘存在之根’，而是要提醒许多声称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根本上是植根于这一存在之中的，这一存在

必须被改变，而他们却只声称去批判。”^⑩

研究所热衷于保持他们的外在地位，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此一位置一定意义上是他们在理论工作中坚持真正的批判立场的前提。然而，这意味着，独立不仅是相对于现行的政治、学术制度和大众文化而言，也包括多种自称体现了否定的社会力量。与许多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法兰克福学派从未感到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相互作用会对任何一方有益。早在1937年的《传统与批判理论》中，霍克海默就否认了激进理论与无产阶级的必然联系，而代之以与各种愿意“说真话”的进步力量的联盟。^⑪到1951年，阿多诺已经排除了任何集体性存在拥有真理的可能性，并把剩余的进步力量定位在批判的个人。此后，这一观点又导致否认学生激进派及其他新生的“否定”团体是真正社会变化的合理力量。1950年后，研究所已重新整合过了，但不是和那些其成员早期与之认同的人们，或者和那些自称是其后继者的人们，尽管他们蔑视曼海姆自由漂浮的知识分子概念，但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却越来越像这种典型。

当然，仅仅用其成员的个体异化体验来解释研究所的工作是不够的，因为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与其同时的文化环境相疏远，那么，它却与一个特殊的历史传统相联系。本雅明在1938年写道：“社会研究所的著作汇集了对资产阶级意识的批判，这个批判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自我批判。”^⑫虽然霍克海默和其朋友曾抱有社会主义热情，但都毫无例外地出生于上等资产阶级家庭，在一定意义上都怀有同时代中等阶层的反资产阶级感情。但是，与托马斯·曼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清楚地表现出来的阶级世系——第一代挣钱，第二代巩固社会地位，第三代撇向审美的抑郁

——不同，他们是另外一种模式，在这里与社会责任感相结合的精神上的反偶像崇拜直接继承了既得的财富。作为没有干扰的社会上层体面的一代，他们较少通过造反的生活风格来强迫自己独立，而是反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之子；他们也避免他们之前的表现主义一代的过分。霍克海默和其同事使其批判力量进入到相对非个人的社会思想领域，除了弗洛姆和洛文塔尔放弃了早期的宗教立场外，他们看来也逃脱了后来人们所说的“认同危机”，而典型的表现主义者的转变（Wandlung）——它在 E·特勒尔（Ernst Toller）的同名戏剧《转变》中得到清楚显现——他们并没有经历过。他们与魏玛时代及美国生活中的日常荒谬性保持距离，而避免了怨恨与愤怒之类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特征，不必像 K·图赫尔斯基（Kurt Tucholsky）那样。因为在局外，他们侨居生活一直比较舒适。本雅明是研究所中最不幸的人物，如果不是因为他性格中奇特的生活与工作的完全分裂，他倒会很有理由在自己的著作中表达怨恨的^④。其他人对自己不安全的反应，则诉诸于强化了他们坚持其从一出生就浸润于其中的上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研究所成员不但坚持其生活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忠实于可比较的文化价值。事实上，他们和一些受德国教育的精英之间有惊人的相似；对这些人，F·林格在《德国文化贵族的衰落》^⑤（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作了描绘。当然，研究所之创立本来就是为了抵制格吕堡称之为：“预备贵族”^⑥（Mandarinanstalten）的。但格吕堡对文化贵族的界定与林格不同，在格吕堡，它指的是运用技能服务于社会现状的技术知识分子；在林格，指的是类似于韦伯所说的中国人文学者：“一种社会与文化的精英，其地位乃是基于教育资格，而不是权力和财富的世袭。”^⑦19世纪末期，林格的“文化贵族”达到了短命的辉煌，此

时由于土地贵族的衰落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崛起，产生了一种新的制衡，差不多在1890年，他们已感到后者对前者临近的胜利在威胁着自己。此时，工业国家正开始取代农业国家。结果，“文化贵族”不断采取保护和固执的姿态反抗现代性和大众社会的兴起。

在一些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可以纳入林格的模式。像文化贵族而不是像正统社会主义者，他们的著作渗透着失落和衰亡之感，较少期待和希望；他们和文化贵族一样对大众社会及其鼓吹的实用的、实证的价值没有兴趣；同样，他们还反对弥漫在现代精神生活中的专业化，林格书中的一句话很容易运用到研究所上：“真正令他们烦恼的不是学科之间的孤立，而是诸学科之间、学术与某种哲学之间不断增长的分离”。^⑧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的不信任，也是文化贵族保护传统德国“文化”的一个根本因素；在流亡中，他们自视为文化承担者的城堡，这种自我形象文化贵族也肯定会认同。最后，他们内在固有的非政治的态度，甚至当实践在其著作中是一种命令宣示的时期里，这也可和文化贵族不屑屈尊于有关实际政治的小吵闹相比较。

然而，尽管有如许相似，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在流亡中并不能和近代的文化贵族划归同一范畴。首先，林格的文化贵族基本上是学术范围内的，是常规的知识精英的领袖，但研究所却一直试图把自己和传统的大学社会分开，并严厉批评其沾沾自喜和精英主义。其次，其价值的历史定位与文化贵族不完全相同，如林格所说：“文化贵族的学术遗产中，最重要的形态是康德的批判、唯心主义理论和德国的历史传统”，^⑨而法兰克福学派在观点上却更接近19世纪40年代的黑格尔左派，从而与多数文化贵族不同，他们拒绝以庸俗的唯心主义对抗庸俗的唯物主义，批判理论根源于传统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二分法的辩证克服，而许多文化

理论的目标——工人阶级的革命潜能，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的动力，^①经济基础作为任何社会分析的中心——它还是在其早期为马克思主义做了许多工作。在斯大林主义炙手可热的时候，通过保护马克思主义自由意志冲动的完整性，霍克海默及其同事为斯大林激进主义之后恢复这一冲动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前提的质疑，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范围内讨论的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有助于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他们范围外探究的合法对象；在其受到僵化的教条主义威胁时，通过坚持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一个开放的、批判的而非现成真理的系统，他们帮助恢复了它的有效性；为了拓展新的基础，研究所使心理分析与马克思主义这类看似互不相容的体系之间富有成效的互渗成为可能；最后，他们极富创意地把马克思的一些主张熟练地运用到文化现象上，从贫瘠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中拯救了唯物主义的文化批评。

296

不过，研究所最后提供的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如此根本，已无权利把它包括在马克思主义分支中。由于向实际的或潜在的可以实现合理社会的历史主体的挑战，研究所最后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承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其成员与60年代新左派的冲突，不过是早期这种转变的结果，甚至马尔库塞的“大拒绝”，在许多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也不过是对政治行动的一个含糊而不准确的刺激，不过是无政府主义传统中的对社会现状“不坚决的否定”。^②1962年，卢卡契就称它为“深渊上的楼阁”（Grand Hotel Abgrund），^③以此表达他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轻蔑。随着马尔库塞声望日隆，甚至其批判理论的激进形态也成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咒骂的目标，这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F·韦尔曾回忆过1929年发生的一个事件，他做的某件事情招来了

一位社会民主党的中央委员的反驳：“太遗憾了，你没有入党，否则，我们现在可以开除你”^④（同样的话，图赫尔斯基 1932 年也听过）。^⑤新东西是 1950 年以后法兰克福学派日益显著，这使它唯物主义的反叛成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更大威胁，结果也就成为更大的鄙视目标。

同样成问题的是，研究所在知识迁移中的作用。知识迁移的集体影响对美国来说是巨大的，研究所花费很大力气帮助流亡者，尽管在它公开所有帮助者的名单之前，其准确情况不太清楚。在它的门下，差不多有 50 多位青年学者成为美国的教授，^⑥包括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霍因夏姆、格尔斯、巴兰，他们和贝克利公众意见研究小组的合作也增加了双倍影响。

不过，研究所思想的影响是不均衡的，40 年代经验性研究的显著效果已经谈过，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也很重要。但总的看，297其理论著述影响不大。研究所防止哲学堕落为实证的社会科学的努力没有真正成功，这部分是由于它倾向于用极端的语汇宣讲他们的批判理论，阿多诺说：“在心理分析中，除夸大外别无真实”^⑦。批判理论看来有时也应如是观。比如它在批判美国社会时，有时暗示说在纳粹的强迫和“文化工业”之间没有真正区别，因此，一些非难者就有理由指责：纳粹的经验深深刺伤了研究所成员，使他们仅仅根据法西斯的潜能来判断美国社会。^⑧他们孤立于美国社会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无视使美国的发达资本主义和大众社会不同于他们在欧洲遭遇的独特历史因素。研究所总是认为极权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产物，而不是其反动，但在美国，自由的资产阶级社会确实在抵抗这一转化，为什么会如此？研究所从未有深度地予以探讨；欧洲和美国的相似被其成员煞费苦心地理清楚了，其不同却未涉及。

与后纳粹时代的桥梁；它在法兰克福重建后，不仅传授在美国获得的方法论技术，而且也恢复了与曾被希特勒抹杀的丰富遗产的连续性，它帮助把德国文化带到美国，然后又把美国文化带到德国；它的一些学生如哈贝马斯、施密特（他刚刚继任所长）、内格特、韦尔默的影响愈益重要，尽管其组织机构到了 70 年代由于老一代领导人的去世以及学生中增长的激进骚动而出现麻烦。

如果不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法兰克福学派并未因其地理上的还乡而结束其真实的疏远，那么，黑格尔的精神回归自己的观念在这里是可以作为一个严格的隐喻的。研究所早期强调的重新统一，确实是部分的、不完全的过程，“奥兹维辛之后写诗”，^②阿多诺在极为痛苦的时刻写道，“是野蛮的”。写作社会理论和进行科学研究，只有在其批判的、否定的冲动被保持的情况下，才是较可容忍的。所以，法兰克福学派总是坚持，只有拒绝赞美现状，²⁹⁹才有可能保存一个未来：在那时，写诗将不再是野蛮的行为。

注 释

The following abbreviations are used:

Grünbergs Archiv: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SPSS: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ZfS: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INTRODUCTION

1. William Butler Yeats, "The Choice" (1932).

2. The failure to distinguish sufficiently between the Weimar Institut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has marred certain treatments of its history. See, for example, Peter Gay, *Weimar Culture: The Outsider as Insider* (New York, 1968), in which the Institut during Weimar is erroneously described as "left-Hegelian to the core" (P. 41).

3. Herbert Marcuse,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trans.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1968), which contains many of the essays republished in German as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2 vols. (Frankfurt, 1965).

4. Max Horkheimer, *Kritische Theorie*, ed. Alfred Schmidt, 2 vols. (Frankfurt, 1968).

5. Walter Benjamin, *Schriften*, ed. Theodor W. Adorno and Gershom Scholem, 2 vols. (Frankfurt, 1955); Theodor W. Adorno, *Prismen* (Frankfurt, 1955),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Prisms*, trans.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London, 1967); *Versuch Über Wagner* (Frankfurt, 1952); and *Dissonanzen: Musik der verwalteten Welt* (Frankfurt, 1956); Leo Lowenthal, *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 (Boston, 1957); and *Literature,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1); Franz Neumann, *The Democratic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ed. Herbert Marcuse (New York, 1957). Other, more recent collections of the work done by Institut figures include Erich Fromm, *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1970); Otto Kirchheimer, *Politics, Law, and Social Change*, ed. Frederic S. Burin and Kurt L. Shell (New York, 1969); and Leo Lowenthal, *Erzählkunst und Gesellschaft Die Gesellschaftsproblematis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19. Jahrhunderts* (Neuwied and Berlin, 1971)

1. THE CREATION OF THE INSTITUT FÜR

304

SOZIALFORSCHUNG AND ITS FIRST FRANKFURT YEARS

1. Carl Schors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 - 1917* (Cambridge, Mas., 1955).

2. The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about Weil comes from a series of letters from him to me during 1970 - 1971.

3. Felix Weil, *Sozialisierung: Versuch einer begrifflichen Grundlegung (Nebst einer Kritik der Sozialisierungspläne)* (Berlin - Fichtenau, 1921).

4. Originally, I followed Felix Weil in saying it took place in summer, 1922, a date challenged by Ulrike Migdal in *Die Frühgeschichte des Frankfurter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Frankfurt, 1981), p. 34, where she says it must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spring. This claim has in turn by corrected by Michael

12. Letter from Weil to me, January 31, 1971.
13. *Ibid.*
14. Pollock interview, March, 1969.
15. F. W. Deakin and G. R. Storry, *The Case of Richard Sorge* (London, 1966), P. 32.
16.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an der 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 (Frankfurt, 1925), P. 13.
17. Gustav Mayer, *Erinnerungen* (Zurich and Vienna, 1949), PP. 340 - 341.
18. For data on Grünberg's life, see *Österreichs Biographisches lexicon, 1915 - 1950*, vol. II (Graz - Köln, 1957 - 1959).
19. Gustav Nenning, *Carl Grünberg und die Anfänge des Austromarxismus* (Graz, 1968), P. 94.
20. Norbert Leser, *Zwischen Reformismus und Bolschewismus: Der Austromarxismus als Theorie und Praxis* (Vienna, Frankfurt, and Zurich, 1968), P. 177.
21. Georg Lukács, "Moses Hess und die Probleme der idealistischen Dialektik," *Grünbergs Archiv* XII (1926).
22. Letter from Weil to me, June 8, 1971.
23. See, for example, Heinrich Regius, "Die neue Sachlichkeit," *Dämmerung* (Zurich, 1934), P. 216 Heinrich Regius was a pseudonym for Horkheimer, which was necessary to permit the book's distribution in Germany.
24. Carl Grünberg, "Festrede gehalten zur Einweihung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an der Universität Frankfurt a. M. am 22 Juni 1924," *Frankfurter Universitäts - Reden* XX (Frankfurt, 1924).
25. Parenthetically, it might be noted that Grünberg's use of the term was the exact opposite of the use to which Fritz Ringer put it in his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Cambridge, Mass., 1969).

26. Wilhelm von Humboldt, *Schriften*, selected by W. Flemmer (Munich, 1964), P. 307.
27. Grünberg, "Festrede," P. 11.
28. Friedrich Pollock, *Sombarts "Widerlegung" des Marxismus* (Leipzig, 1926), a *Beiheft* of the *Grünbergs Archiv*; Max Horkheimer, "Ein neuer Ideologie Begriff?," *Grünbergs Archiv* XV (1930).
29. Letter from Oscar H. Swede to Max Eastman, October 1, 1927, Eastman collection, Manuscripts Department, Lilly Library, Indiana University. I am indebted to Jack Diggin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for bringing this letter to my attention.
30. In 1930 Franz Schiller wrote a long, laudatory article entitled "Das Marx - Engels Institut in Moskau," *Grünbergs Archiv* XV.
31. This aspect of the Institut's work was continued after the emigration by Hilde Rigaudias Weiss, who uncovered a hitherto unknown questionnaire of Marx's on the condition of French workers from 1830 to 1848 (*Les Enquêtes ouvrières en France entre 1830 et 1848*; Paris, 1936).
32. Deakin and Story, *Richard Sorge*, P. 32
33. Pollock interview, March, 1969. in Montagnola.
34. As late as the Institut's 1944 unpublished history, "Ten Years on Morningside Heights," Korsch was listed as a "Fellow," but this seems to have meant little. The history is in Lowenthal's personal collection.
35. Weil called him "a typical loner, incapable of working in a team" (letter to me, June 5, 1971).
36. Pollock interview, March, 1969.
37. Letter from Matthias Becker to me, June 7, 1971. Becker is Horkheimer's current guardian of the Institut's files, which are kept in Montagnola and are not yet open to the public.
38. H. Regius, *Dammerung*, PP. 122 - 130.

39 *Ibid.*, P. 130

40. Henryk Grossmann to Paul Mattick, a letter included in the appendix to Grossmann's *Marr, die klassische Nationalökonomie und das Problem der Dynamik* (Frankfurt, 1969), with an afterword by Mattick, PP. 85-86 (italics in the original).

41.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about Wittfogel come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him in New York on June 21, 1971, and from G. L. Ulmen's soon-to-be-published biography, *Karl August Wittfogel: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His Life and Work*, which the author graciously allowed me to see before publication.

42. Karl August Wittfogel, *Die Wissenschaft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Berlin, 1922), and *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Vienna, 1924); his first book on China was *Das erwachende China* (Vienna, 1926).

43. Helga Gallas, *Marristische Literaturtheorie* (Neuwied and Berlin, 1971), P. 111.

44. Franz Borkenau, *Der Übergang vom feudalen zum bürgerlichen Weltbild* (Paris, 1934). 306

45. New York, 1964. For the comparison, see George Lichtheim,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New York, 1967), P. 279. Lichtheim, during our conversation of February 16, 1969, stressed Borkenau's brilliance and claimed that he had been treated unfairly by the Institut.

46. H. Grossmann, "Die gesellschaftlichen Grundlagen der mechanistischen Philosophie," *Z/S* IV, 2 (1935).

47. Grossmann, *Österreichs Handelspolitik, 1772 - 1790* (Vienna, 1916).

48. Interviews with Pollock in Montagnola (March, 1969), Leo Lowenthal in Berkeley (August, 1968), and Alice Maier, the former secretary of the Institut's New York branch, in New York (May, 1969).

19. Quoted in Grossmann, *Marx, die klassische Nationalökonomie und das Problem der Dynamik*, P. 113.

50. Grossmann, *Da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Leipzig, 1929).

51. For a recent treatment of the book, see Martin Trotzman, *Zur Interpretation und Kritik der Zusammenbruchstheorie von Henryk Grossmann* (Zürich, 1956). Mattick's discussion in the afterword to *Marx, die klassische Nationalökonomie und das Problem der Dynamik* is a more sympathetic appraisal.

52. See, for example, Alfred Braurthal, "Der Zusammenbruch der Zusammenbruchstheorie," *Die Gesellschaft* VI, 10 (October, 1929). Mattick has strongly attacked this type of criticism in his *Nachwort to Marx, die klassische Nationalökonomie, etc.* (p. 127).

53. For a discussion of Marx's own neglect of service industries and his stress on production, see George Kline, "Some Critical Comments on Marx's Philosophy," in *Marx and the Western World*, ed. Nicholas Lobkowitz (Notre Dame, Ind., 1967). Pollock's own observations were never printed.

54. F. Pollock, *Die planwirtschaftlichen Versuche in der Sowjetunion (1917-1927)* (Leipzig, 1929).

55. D. B. Ryazanov, "Siebzig Jahre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Grünbergs Archiv* XV (1930).

56. For a description of his dissenting behavior at the Eleventh Party Congress in 1922, see Adam Ulam, *The Bolsheviks* (New York, 1965), pp. 544-546.

57. Regius, *Dämmerung*, pp. 152-153.

58. Rudolf Schlesinger, "Neue Sowjetrussische Literatur zur Sozialforschung," *ZfS* VII, 1 (1938), and VIII, 1 (1939).

59. For a description of Rabbi Nobel, see Nahum Glatzer, *Franz Rosen-*

zweig; *His Life and Thought* (New York, 1953), passim.

60. For a description of their relationship, see Theodor W. Adorno, "Der wunderliche Realist. Über Siegfried Kracauer," *Noten zur Literatur III* (Frankfurt, 1965).

61. Siegfried Kracauer, *From Caligari to Hitler* (Princeton, 1947).

62. Adorno, *Alban Berg: Der Meister des kleinsten Übergangs* (Vienna, 1968), P. 20.

63. René Leibowitz, "Der Komponist Theodor W. Adorno," in *Zeugnisse: Theodor W. Adorno zum sechzigsten Geburtstag*, ed. Max Horkheimer (Frankfurt, 1963).

64. Arthur Koestler, *Arrow in the Blue* (New York, 1952), p. 131.

65. Adorno, *Alban Berg*, P. 37.

66. *Ibid.*

67. Adorno, *Die Transzendenz des Dinglichen und Noematischen in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Frankfurt, 1924).

68. For discussion of Tillich's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stitut and of the interaction of his theology with Critical Theory, see the reminiscences of Horkheimer and Adorno in *Werk und Wirken Paul Tillichs: Ein Gedenkbuch* (Stuttgart, 1967). 307

69. Adorno, *Kierkegaard: Konstruktion des Aesthetischen* (Tübingen, 1933, rev. ed. Frankfurt, 1966).

70. See footnote on pp. 6 - 7 for an explanation of these terms.

71. F. Weil, "Rosa Luxemburg über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Grundbergs Archiv* XI11 (1928), and "Die Arbeiterbewegung in Argentinien," *ibid.* XI (1925).

72. Horkheimer, *Die Anfänge der bürgerlichen Geschichtsphilosophie* (Stuttgart, 1930).

73.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r Sozialphilosophie und die Aufgaben eines

Grossmann, Paul Cuggenheim, Maurice Halbwachs, Jean de la Harpe, Max Horkheimer, Karl Landauer, Lewis L. Lorwin, Robert S. Lynd, Robert M. MacIver, Sidney Webb (Lord Passfield), Jean Piaget, Friedrich Pollock (chairman of the board), Raymond de Saussure, Georges Scelle, Ernst Schachtel, Andries Sternheim, R. H. Tawney, and Paul Tillich.

88. Letter from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April 17, 1934.

89. According to Paul Sweezy, "there is no doubt that Paul'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was profoundly and permanently influenced by his experiences and associations in Frankfurt" ("Paul Alexander Baran: a Personal Memoir," *Monthly Review*, XVI, 11 [March, 1965], P. 32). Baran's friendship with members of the Institut continued after he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9. His untimely death in 1964 occurred in Leo Lowenthal's house in San Francisco.

90. Josef Dunner, *If I Forget Thee...* (Washington, D. C., 1937).

91. Horkheimer [Regius], *Dammerung*, P. 80.

92. Not until after the war did Horkheimer come to the melancholy conclusion that Zionism had been the only way out for the Jews of Europe. See his "Über die deutschen Juden," in his *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Frankfurt, 1967), P. 309. 308

93. Letter from Weil to me, June 1, 1969.

94. Conversation with Wittfogel, New York, June 21, 1971.

95. 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 - 1944* (New York, rev. ed. 1944), p. 121.

96. L. Lowenthal, "Das Dämonische," in *Gabe Herrn Rabbiner Dr. Nobel zum fünfzigsten-Geburstag* (Frankfurt, 1921).

97. See, for example, Edgar Friedenberg, "Neo-Freudianism and Erich Fromm," *Commentary* XXXIV, 4 (October, 1962), or Maurice S. Friedman, *Martin Buber, the Life of Dialogue* (New York, 1960), pp. 184 - 185.

98. Istvan Deak, *Weimar Germany's Left - Wing Intellectual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8), P. 29.

99. Letter from Pollock to me, March 24, 1970.

100. Pollock interview, March, 1969. Many years later, Adorno defended his name change indirectly in a memorandum he wrote for the Institut's project on anti-Semitism in labor. "The idea that the Jews should show more pride by sticking to their names is but a thin rationalization of the desire that they should come into the open so that one might recognize and persecute them the more easily" (November 3, 1944, memorandum in Paul Lazarsfeld's possession).

101. Interview with Paul Massing, New York, November 25, 1970.

102. Jürgen Habermas, "Der deutsche Idealismus der jüdischen Philosophen," *Philosophisch - politische Profile* (Frankfurt, 1971).

103. Hannah Arendt, Introduction to *Illuminations* by Walter Benjamin,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1968), p. 29.

104. Adolph Lowe, a childhood friend from Stuttgart, remembers Horkheimer and Pollock giving their fathers an ultimatum when they were in England: either they were to be allowed to return to Germany to begin their studies or they would emigrate. The senior Horkheimer and senior Pollock seem to have given in without much resistance (conversation with Lowe, New York N. Y., December 28, 1971).

105. Letter from Pollock to me, July 16, 1970. Although never an intellectual like Adorno's wife, Gretel, Mrs. Horkheimer was a constant source of support until her death in the fall of 1969. When I saw them together in March of that year, at the time of their forty - third and last anniversary, I was touched by the warmth and affection they showered on each other.

106. Regius [Horkheimer], *Dammerung*, p. 165.

107. *Ibid.*

108. Andries Sternheim, "Zum Problem der Freizeitgestaltung," *ZfS* 1,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Sorolian attitudes of Ervin Szabo, the spiritual teacher of the Hungarian Social Democrats left opposition. See Lukács's 1967 preface to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 Mass., 1971), P. x.

5. For a discussion of their impact, see Furio Cerutti, "Hegel, Lukács, Korsch. Zum dialektischen Selbstverständnis des kritischen Marxismus," in *Aktualität und Folgen der Philosophie Hegels*, ed. Oskar Negt (Frankfurt, 1970).

6.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Report on Its History and Activities, 1933 - 1938* (New York, 1938), p. 28.

7. See for example, Max Horkheimer, "Schopenhauer Today," in *The Critical Spirit: Essays in Honor of Herbert Marcuse*, ed. Kurt H. Wolff and Barrington Moore, Jr. (Boston, 1967). 310

8. Conversation with Horkheimer, March, 1969, in Montagnola.

9. Horkheimer, *Kants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als Bindeglied zwischen theoretischer und praktischer Philosophie* (Stuttgart, 1925).

10. Letter from Pollock to me, March 24, 1970

11. Hans Cornelius, "Leben und Lehre," in *Di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in Selbstdarstellungen*, ed. Raymond Schmidt, vol. II (Leipzig 1923), p. 6.

12. Letter from Pollock to me, March 24, 1970.

13. Cornelius, *Die Elementargesetze der bildenden Kunst* (Leipzig, 1908).

14. Letter from Pollock to me, March 24, 1970.

15. Cornelius, "Leben und Lehre," P. 19.

16. *Ibid.*, P. 65. Interestingly, when Horkheimer wrote about Kant in 1962 ("Kants philosophie und die Aufklärung," in *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Frankfurt, 1967), p. 210), he praised Kant for the

tiharmonic, critical elements in his philosophy

17. So it has been interpreted in an anonymous article in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From Historicism to Marxist Humanism," (June 5, 1969), p. 598. The article is by George Lichtheim. For a discussion of Hegel's importance to Critical Theory, see Friedrich W. Schmidt, "Hegel in der Kritischen Theorie der Frankfurter Schule," in *Aktualität und Folgen der Philosophie Hegels*.

18. Horkheimer [Heinrich Regius], *Dämmerung* (Zurich, 1934), p. 86.

19. Horkheimer, "Zum Problem der Wahrheit," *ZfS* IV, 3 (1935), p. 333.

20. Horkheimer, "Ein neuer Ideologiebegriff?," *Grünbergs Archiv* XV, 1 (1930), p. 34.

21. Horkheimer, "Hegel und die Metaphysik," in *Festschrift für Carl Grünberg: Zum 70. Geburtstag* (Leipzig, 1932).

22. *Ibid.*, p. 197.

23. *Ibid.*, p. 192.

24. 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 xxii.

25. Horkheimer, "Gedanke zur Religion," *Kritische Theorie*, ed. Alfred Schmidt (Frankfurt, 1968), 2 vols., originally "Nachbemerkung," *ZfS* vol. IV, 1 (1935).

26. *Ibid.*, p. 375. See also Horkheimer [Regius], *Dämmerung*, p. 55.

27. Horkheimer, "Zum Rationalismusstreit in der gegenwärtigen Philosophie," *ZfS* III, 1 (1934), p. 9.

28. Horkheimer, "Materialismus und Metaphysik," *ZfS* II, 1 (1933), pp. 3-4.

29. "Zum Rationalismusstreit," p. 36.

30. *Ibid.*

31. Horkheimer, "Der neueste Angriff auf die Metaphysik," *ZfS* VI, 1 (1937), p. 9.

32. Karl Mannheim had made the same point in his essay, "Conservative Thought," in *From Karl Mannheim*, ed. Kurt H. Wolff (New York, 1971), pp. 213. But this was written in 1925, well before the Nazi takeover.

33. See Lukács, *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 in *Werke*, vol. IX (Neuwied, 1964). Here Lukács repudiated his own origins in Dilthey, Simmel, and others, especially as they had appeared i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34. Horkheimer, "Geschichte und Psychologie," *ZfS* I, 1/2 (1932) *passim*.

35. Horkheimer, "The Relation between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in the Work of Wilhelm Dilthey," *SPSS* VIII, 3 (1939) *passim*.

36. See Horkheimer, *Anfänge der bürgerlichen Geschichtsphilosophie* (Stuttgart, 1930), for a discussion of Vico.

37. "Zum problem der Wahrheit," p. 361.

311

38. Horkheimer, "Bemerkungen zu Jaspers 'Nietzsche,'" *ZfS* VI, 2 (1937).

39. "Zum Problem der Wahrheit," p. 357.

40. "Zum Rationalismustreit," p. 44.

41. Theodor Adorno, in a review of Ernest Newman's biography of Wagner (*Kenyon Review*, vol. IX, 1 [Winter, 1947]), made a similar point. Nietzsche's negativism, he wrote, "expressed the humane in a world in which humanity had become a sham." His "unique demonstration of the repressive character of occidental culture" was what set him apart from Wagner (p. 161).

42. See Horkheimer, "Zu Bergsons Metaphysik der Zeit," *ZfS* III, 3 (1934), and his review of Bergson's *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 in *ZfS* II, 2 (1933).

43. Review of *Les deux sources*, p. 106.

44. Quoted in Horkheimer, *Kritische Theorie*, vol. I, p. 175, from a

letter to Celestin Bouglé (January 24, 1935).

45. He did not, however, ignore its origins in the Reformation. See, for example, his discussion of Luther in Horkheimer, "Montaigne und die Funktion der Skepsis," *ZfS* VII, 1 (1938), pp. 10–13.

46. Horkheimer, "Materialismus und Moral," *ZfS* II, 2 (1933), p. 165.

47. Adorno, *Minima Moralia* (Frankfurt, 1951), p. 80.

48. "Materialismus und Moral," pp. 183–184.

49. *Ibid.*, p. 186.

50. Horkheimer, "Materialismus und Metaphysik," *ZfS* II, 1 (1933).

51. *Ibid.*, p. 14.

52. Karl Marx, "Theses on Feuerbach," *Marx and Engels, 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ed. Lewis S. Feuer (New York, 1959), p. 243.

53. Adorno,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Stuttgart, 1956), p. 82.

54.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p. 162 (italics in the original).

55. For an example of this consideration in the Institut's work, see Adorno, "Veblen's Attack on Culture," *Prisms*, trans.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London, 1967), where he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p. 87).

56. For a discussion of Marx's attitude towards the state, which makes this point, see Avineri,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Marx*, pp. 202f.

57. *Dämmerung*, P. 18.

58. Horkheimer, "Bemerkungen zur philosophischen Anthropologie," *ZfS* IV, 1 (1935), p. 5.

59. Adorno,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Marcuse, "The Con-

cept of Essence,"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trans.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1968) (originally in *ZfS* V, 1 [1936])

60. Anon., "From Historicism to Marxist Humanism," P. 598.

61. See interview with Horkheimer in *Der Spiegel* (January 5, 1970); entitled "Auf das Andere Hoffen."

62. See, for example, "Montaigne und die Funktion der Skepsis," pp. 21, 45, and "Zum Problem der Wahrheit," p. 363.

63. *Dämmerung*, p. 116.

64. Jürgen Habermas, "Der deutsche Idealismus der jüdischen Philosophen," *Philosophisch - politische Profile* (Frankfurt, 1971), p. 41. Horkheimer made a similar point in "Über die deutschen Juden," *Zu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p. 311.

65. See H. Marcuse,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1969), pp. 6f.

66. Avineri,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Marx*, p. 85.

312

67. *Dämmerung*, p. 181.

68.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trans. Harry Zohn, with an intro. by Hannah Arendt (New York, 1968), p. 261.

69. Horkheimer, "Egoismus und Freiheitsbewegung," *ZfS* V, 2 (1936).

70. Marcuse was to make the same point in his article "The Affirmative Character of Culture," *Negations*, p. 119 (originally *ZfS* VI, 1 [1937]).

71. Horkheimer, "Egoismus und Freiheitsbewegung," P. 171. Marcuse was later to expand this idea in psychoanalytic terms with his concept of "repressive desublimation."

72. *Ibid.*, pp. 174 - 215 *passim*.

73. Marcuse, "On Hedonism," *Negations* (originally "Zur Kritik der Hedonismus," *ZfS* VI, 1 [1938]).

74. *Ibid.*, p. 160.

75. *Ibid.*, p. 168.

76. *Ibid.*, p. 190.

77. "The Concept of Essence," *Ibid.*, P. 191.

78. *Ibid.*, P. 193.

79. (Boston, 1964).

80. *Ibid.*, P. 199.

81. For a discussion of "positive freedom," see Franz Neuman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Freedom," *The Democratic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ed. Herbert Marcuse (New York, 1957), and Isaiah Berl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1969).

82. See, for example, Horkheimer's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1947).

83. Marcuse, "Philosophy and Critical Theory," *Negations*, pp. 135-136 (originally *ZfS* VI, 3 [1937]). Further amplification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reason can be found in his *Reason and Revolution*, pp. 44-46.

84.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identity theory in Marcuse's work, see my article "The Metapolitics of Utopianism," *Dissent* XVII, 4 (July-August, 1970).

85. "Zum Rationalismusstreit," P. 1; "Der neueste Angriff auf die Metaphysik," p. 6.

86. "Zum Problem der Wahrheit," P. 354.

87. *Ibid.*, p. 357.

88.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Vienna Circle's e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see Herbert Feigl, "The *Wiener Kreis* in America," i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ed.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Cambridge, Mass., 1969).

89. See *Eclipse of Reason*, *passim*.

90. "Der neueste Angriff auf die Metaphysik," *ZfS* VI, 1 (1937).

91. *Ibid.*, p. 13.

92. For an expansion of this point by a second generation Frankfurt School thinker, see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passim*.

93. "Der neueste Angriff auf die Metaphysik," p. 27.

94. *Ibid.*, p. 49.

95. *Ibid.*, p. 29.

96. "Zum Problem der Wahrheit," pp. 337-338.

97. "Philosophy and Critical Theory," *Negations*, pp. 147-148.

98. "Ein neuer Ideologiebegriff?"

99. *Ibid.*, p. 50.

100. *Ibid.*, p. 56.

101. *Ibid.*, p. 55. Marcuse, in his article on Mannheim ("Zur Wahrheitsproblematik der soziologischen Methode," *Die Gesellschaft* VI [October, 1929]), makes the same point (pp. 361-362). Marcuse was a bit kinder to Mannheim than Horkheimer, arguing that Mannheim's reduction of Marxism to the consciousness of a specific class pointed to a valid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xis*. He did, however, criticize Mannheim for missing "the intentional moment of all occurrences" (p. 362) and for his relationism, with its quietistic implications. Adorno, when he wrote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was harsher still; see his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d Its Consciousness," *Prisms*.

102. *Reason and Revolution*, P. 322.

103. Hannah Arendt, "What is Authority?,"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Cleveland and New York, 1961).

104. Adorno, *Kierkegaard: Konstruktion des Aesthetischen* (Tübingen, 1933), and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Stuttgart, 1956).

105. Letter from Adorno to Lowenthal, July 6, 1934.

106. For Benjamin's review, see *Vossische Zeitung* (April 2, 1993).

Tillich, newly appoin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New York, wrote a review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XXXI, 23 (November 8, 1934). Karl Lowith wrote another in the *Deutsche Literatur - Zeitung*, V, 3F, 5 (1934).

107. "Notiz" in the third edition of *Kierkegaard: Konstruktion des Aesthetischen* (Frankfurt, 1966), p. 321.

108. Quoted in *Kierkegaard* (1966 ed.), p. 29.

109. *Ibid.*, p. 29

110. *Ibid.*, p. 46

111. *Ibid.*, p. 135

112. *Ibid.*, p. 111

113. *Ibid.*, p. 62

114. *Ibid.*, p. 67

115. *Ibid.*, p. 90

116. *Ibid.*, p. 97

117. In *SSPS*, VIII, 3 (1939 - 1940), Adorno wrote an article "On Kierkegaard's Doctrine of Love."

118. This was the word Adorno used when I spoke with him in March, 1969, in Frankfurt.

119. *Kierkegaard*, p. 137.

120. Adorno,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pp. 24 - 25.

121. *Ibid.*, p. 79

122. *Ibid.*, p. 82

123. Adorno, "Husserl and the Problem of Idealism," *Journal of Philosophy* XXVII, 1 (January 4, 1940), p. 11.

124. *Zur Metakritik*, p. 43.

125. "Husserl and the Problem of Idealism," P. 7.

126. *Zur Metakritik*, p. 47.

127. *Ibid.*, p. 55

128. *Ibid.*, p. 79

129. *Ibid.*, p. 84

130. *Ibid.*, p. 90

131. *Ibid.*, p. 146

132. *Ibid.*, p. 154

133. In his article on the decline of story-telling ("The Storyteller: Reflections on the Works of Nikolai Leskov," *Illuminations*), Benjamin wrote: 314
 "Experience has fallen in value: . . . Never has experience been contradicted more thoroughly than strategic experience by tactical warfare, economic experience by inflation, bodily experience by mechanical warfare, moral experience by those in power" (pp. 83-84).

134. *Zur Metakritik*, p. 221.

135. *Ibid.*, p. 180.

136. *Ibid.*, pp. 28-29. Marcuse was to state this even more forcefully in his article "The Concept of Essence," *Negations*.

137. Adorno, "A Portrait of Walter Benjamin," *Prisms*, p. 235.

138. Georg Picht entitled his article on Adorno's death "Atonale Philosophie." (*Merkur*, XXIII, 10 [October, 1969]).

139. For one recent example, see Jerry Cohen, "The Philosophy of Marcuse," *New Left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1969)

140. Habermas, "Zum Geleit," in *Antworten auf Herbert Marcuse*, ed. Jürgen Habermas (Frankfurt, 1968), pp. 11-12.

141. See, for example, Alfred Schmidt, "Existential-Ontologie und 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 bei Herbert Marcuse," *Antworten auf Herbert Marcuse*; and Paul Piccone and Alex Delfino, "Marcuse's Heideggerian Marxism," *Telos* (Fall, 1970).

142. Marcuse, "Beiträge zu einer Phänomenolog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

alismus," *Philosophische Hefte* I, 1 (1928).

143. *Ibid.*, P. 52.

144. *Ibid.*, P. 55 According to Schmidt ("Existential - Ontologie," PP. 28 - 29), there were elements of an expressionistic action for action's sake in all of this. In general, Schmidt is very critical of Marcuse's efforts to combine Marxism and phenomenology.

145. Marcuse, "Beiträge," p. 46

146. *Ibid.*, P. 68.

147. *Ibid.*, P. 59.

148. *Ibid.*, P. 65.

149. *Ibid.*, P. 60.

150. Marcuse, "Zum Problem der Dialektik," *Die Gesellschaft* VII, 1 (January, 1930), p. 26.

151. "Das Problem der geschichtlichen Wirklichkeit," *Die Gesellschaft* VIII, 4 (April, 1931).

152. Marcuse, *Hegels Ontologie und die Grundlegung einer Theorie der Geschichtlichkeit* (Frankfurt, 1932).

153. For a discussion of both Hegel books, see Alain de Libera, "La Critique de Hegel," *La Nef* (January - March, 1969).

154. *Hegels Ontologie*, p. 368.

155. Marcuse, "Neue Quellen zur Gr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Die Gesellschaft* IX, 8 (1932).

156. *Ibid.*, P. 151.

157. *Ibid.*, P. 167.

158. *Ibid.*, P. 147.

159. *Ibid.*, P. 173. Marcuse also wrote an entire article on the ontological centrality of labor, "Über die philosophischen Grundlagen des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sbegriff,"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LXIX, 3 (June, 1933).

160. "Neue Quellen," P. 158.

161. *Reason and Revolution*, p. 78.

162. Haberma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 1968).

163. *Reason and Revolution*, p. 75.

164. See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1955), Pp. 170 - 179, for his discussion of the "play drive."

165. See, for example, Marcuse "The Struggle against Liberalism in the Totalitarian State," *Negations* (originally *ZfS* III, 1 [1934]).

166. "The Concept of Essence," p. 44.

167. *Ibid.*, p. 69.

168. *Ibid.*, p. 78.

169. Marcuse, "Philosophy and Critical Theory," *Negations*, p. 147.

170. *Ibid.*, pp. 149 - 150.

171. *Ibid.*, p. 156.

172. *Ibid.*, p. 155. Marcuse was to develop the importance of fantasy in his later works, especially *Eros and Civilization*.

173. New York, 1941. Part of the book appeared in the *SPSS* as Marcuse, "An Introduction to Hegel's Philosophy," VIII, 3 (1939).

174. Ironically in the light of his later stance, Marcuse flattered his American audience in his introduction by quoting Hegel's belief that America's rational spirit made it the "land of the futur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 xv.)

175. *Ibid.*, p. 60

176. *Ibid.*, pp. 313 - 314.

177. *Ibid.*, p. 256.

178. *Ibid.*, p. 322.

179. See, for example,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and

de man is thinly disguised as Adriaan de Barenne, one of the main characters. Pollock, when I spoke with him in March, 1969, denied the idea that de Man was deliberately brought to Frankfurt for the purpose Professor Meyer claims.

7. Theodor Wiesengrund, "Der Begriff des Unbewussten in der Transzendentalen Seelenlehre" (unpub. diss., Frankfurt University, 1927)

8. *Ibid.*, p. 318.

9. Interview with Horkheimer, Montagnola, Switzerland, March, 1969.

10. It emerged out of a factional split within the German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See Carl M. Grossman and Sylvia Grossman, *The Wild Analyst* (New York, 1965), p. 178.

11. Horkheimer interview, March, 1969.

12. Meng taught a course entitled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 Landauer, "Psychoanalytische Klinik," Frieda Fromm-Reichmann, "Psychoanalytische Trieblehre." and Fromm, "Die Anwendung der Psychoanalyse auf Soziologie und Religionswissenschaft." See the May-June, 1929, issue of *Die psychoanalytische Bewegung* (1, 1) for a description of the Institute's opening. See also Adolf Friedmann, "Heinrich Meng, Psychoanalysis and Mental Hygiene," *Psychoanalytic pioneers*, ed. "Franz Alexander, Samuel Eisenstein, and Martin Grotjahn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13. Erich Fromm,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New York, 1962), 317 P. 5.

14. See, for example, Fromm,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1961).

15. In *Fear of Freedom* (the English version of *Escape from Freedom* whose pagination will be used in these notes [London, 1942]), Fromm acknowledged the importance of Hegel and Marx for their notion of alienation (p. 103).

16. Fromm,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p. 28.

17. John Schaar, *Escape from Authority: The Perspectives of Erich Fromm* (New York, 1961), has argued that Fromm fails to answer the criticisms of G. E. Moore and David Hume against the naturalistic fallacy, that he doesn't understand that society is more than nature, that one must have full knowledge of nature before judging what is natural or not, and that if evil exists, it must be part of nature too. (pp. 20-24)

18. Letter from Fromm to me, May 14, 1971.

19. See Fromm's *Marx's Concept of Man* for evidence of his respect for Marx's ability as a psychologist. A more extensive statement appears in "Marx's Contribution to the Knowledge of Man," *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1970)

20.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p. 12. In his letter to me of May 14, 1971, Dr. Fromm said that he regretted the comparison, because it was foolish to rank one great man next to another, but his judgment about their respective merits was unchanged.

21.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P. 10: "There is not a single theoretical conclusion about man's psyche, either in this or in my other writings, which is not based on a critical observation of human behavior carried out in the course of this psychoanalytic work." For a rebuttal of this assertion, see J. A. C. Brown, *Freud and the Post Freudians* (London, 1961), p. 205.

22. Fromm, "Der Sabbath," *Imago*, XIII, Nos. 2, 3, 4, (1927).

23. Published originally in Vienna in 1931, it appeared in English as *The Dogma of Christ, and Other Essays on Religion, Psychology, and Culture*, trans. James Luther Adams (New York, 1963).

24. *Ibid.*, p. 91.

25. *Ibid.*, p. 94.

26. Fromm, "Über Methode und Aufgabe einer analytischen Sozialpsychologie," *ZfSI*, 1/2 (1932) Translated in *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

27. *Ibid.*, p. 32. Reich's more recent work he approved. See his review of Reich's *Der Einbruch der Sexualmoral* in *ZfSII*, 1 (1933).

28. Fromm, "Über Methode," p. 48. See also Fromm, *The Dogma of Christ*, p. 47.

29. "Über Methode," p. 45.

30. *Ibid.*, p. 28.

31. *Ibid.*, p. 30.

32. Letter from Fromm to me, May 14, 1971.

33. "Über Methode," p. 38.

34. Fromm, "Die psychoanalytische Charakterologie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Sozialpsychologie," *ZfSI*, 3 (1932). Translated in *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

35. *Ibid.*, p. 265.

36. In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1955), Marcuse was to write: "Reactivation of polymorphous and narcissistic sexuality ceases to be a threat to culture and can itself lead to culture - building if the organism exists not as an instrument of alienated labor but as a subject of self - realization" (pp. 191 - 192). "Polymorphous perversity" was a term Norman O. Brown popularized in his *Life against Death* (New York, 1959).

37. Reich differed from Fromm in arguing that all character "armoring" 318 was pernicious and repressive. See Robinson, *The Freudian Left*, p. 23.

38. Interview with Fromm, New York, N. Y., December, 1968.

39. Fromm, "Die psychoanalytische Charakterologie," p. 268.

40. *Ibid.*, p. 273.

41. E. M. Butler. *The Tyranny of Greece over Germany* (Cambridge, 1935), p. 327. For a bibliography of articles written on Bachofen in the 1920's, see Adrien Turel, *Bachofen - Freud, Zur Emanzipation des Mannes vom Reich der Mutter* (Bern, 1939), pp. 209 - 210.

42. Quoted in Robinson, *The Freudian Left*, p. 50.

43. "Family Sentiments," *ZfS* III, 1 (1934).

44. Fromm, "Die sozialpsychologische Bedeutung der Mutterrechtstheorie," *ZfS* III, 2 (1934). Translated in *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

45. The notion of nature as a dominant force to which man must passively submit played a large part in the Institut's analysis of fascism. See, for example, Marcuse's "Der Kampf gegen den Liberalismus in der totalitären Staatsauffassung," *ZfS* III, 2 (1934); and Leo Lowenthal's "Knut Hamsun. Zur Vorgeschichte der autoritären Ideologie," *ZfS* VI, 2 (1937).

46. Fromm, "Die sozialpsychologische Bedeutung der Mutterrechtstheorie," p. 221.

47. In the light of Fromm's early religiosity, his discussion of Judaism in this context is worth noting. Although acknowledging the patriarchal God at its core, he also pointed to such elements in Jewish thought as the vision of the land of milk and honey, which were clearly matriarchal. The Hasidim, he argued (once again as Buber would have done), were especially matriarchal in character (*Ibid.*, p. 223).

48. Fromm, "Die gesellschaftliche Bedingtheit der psychoanalytischen Therapie," *ZfS* IV, 3 (1935)

49. *Ibid.*, pp. 371-375.

50. Marcuse, "Repressive Tolerance," *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 with Robert Paul Wolff and Barrington Moore, Jr. (Boston, 1965). Similarly, Adorno wrote: "The bourgeois is tolerant. His love for men as they are arises out of hate for the correct man" (*Minima Moralia* [Frankfurt, 1951], p. 27). Horkheimer made a similar point in *The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1947), p. 19.

51. "Die gesellschaftliche Bedingtheit," p. 393.

52. "Repressive Tolerance," P. 109.

53. For Fromm's own attitude towards radicals, see "The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included in *The Dogma of Christ and Other Essays on Religion, Psychology, and Culture* (New York, 1966). Horkheimer expressed similar doubts about Freud's view of revolutionaries as early as 1934 (Heinrich Regius [pseud.] *Dammerung* [Zurich, 1934], p. 256.)

54. "Die gesellschaftliche Bedingtheit," pp. 384 - 385.

55. Ernest Jones, *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New York, 1963), p. 400. Jones also accused Otto Rank of insanity. Fromm tried to set the record straight in *Sigmund Freud's Mission* (New York, 1959).

56. Grossman and Grossman, *The Wild Analyst*, p. 195. Frieda Fromm - Reichman was especially close to Groddeck and was one of the last people to see him before his death in 1934. She included him in the dedication of her first book, *Principles of Intensive Psychotherapy* (Chicago, 1950).

57. Fromm, "Zum Gefühl der Ohnmacht," *ZfSVI*, 1 (1937). This and Fromm's contribution to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aris, 1936) will be treated in the next chapter.

58. See Schaar, *Escape from Authority*, and Guyton Hammond, *Man 319 in Estrangement* (Nashville, 1965), for two discussions of the book.

59. Fromm, *Fear of Freedom*, p. 9.

60. *Ibid.*; p. 157.

61. *Ibid.*, p. 251.

62. *Ibid.*, p. 249.

63. Fromm, *Man for Himself* (New York, 1947). Fromm divided character types into "productive" and "nonproductive" orientations. The latter was subdivided into receptive, exploitative, hoarding, and marketing subtypes (p. 120).

64. *Fear of Freedom*, p. 7. In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1955), however, Fromm attacked Sullivan's notion of love as alienated (pp. 193 - 199).

cific Palisades, California (Lowenthal collection).

82. Horkheimer, "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 *ZfSVI*, 2 (1937), p. 276.

83. In *Sociologica: Aufsätze, Max Horkheimer zum sechzigsten Geburtstag gewidmet* (Frankfurt, 1955) and *New Left Review*, 46 (November - December, 1967), 47 (January - February, 1968).

84. I am indebted to Professor Lowenthal for making this paper available to me. There is a German version of it in *Sociologia II: Reden und Vorträge*, ed.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Frankfurt, 1962).

85. Adorno "Social Science and Sociological Tendencies in Psychoanalysis," April 27, 1946 (unpub. hd), p. 4; in Lowenthal's collection.

86. Benjamin had written extensively on the importance of shocks in modern life in "Über einige Motive bei Flaubert," *ZfSVIII*, 1/2 (1939), which has been translated in *Illuminations*. He explicitly used Freudian ideas to support his interpretation. 320

87. "Social Science and Sociological Tendencies in psychoanalysis," p. 6.

88. *Ibid.*, pp. 6-7.

89. *Ibid.*, p. 14.

90. *Ibid.*, p. 15.

91. *Ibid.*, p. 22.

92. Walter Benjamin, *Schriften*, ed. Gershom Scholem and Theodor W. Adorno (Frankfurt, 1955), vol. I, p. 140.

93. "Social Science and Sociological Tendencies in Psychoanalysis," pp. 22-23.

94. *Minima Moralia*, p. 78

95. For an imaginative use of Freud by a second generation Critical Theorist, see Jürgen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trans.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1971) Earliest in the Institut's postmigration his-

tory, psychoanalytic categories were used in empirical studies, such as the *Gruppenexperiment*, ed. Friedrich Pollock, *Frankfurter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vol. II (Frankfurt, 1955).

96. *Freud in der Gegenwart*, *Frankfurter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vol. VI (Frankfurt, 1957). The book consisted of addresses and papers given at Frankfurt by a number of distinguished psychologists, including Erik Erikson, Franz Alexander, René Spitz, and Ludwig Binswanger.

97. Marcuse, "Autorität und Familie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bis 1933," in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Marcuse also contributed a long introductory essay o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idea of authority.

98. Robinson, *The Freudian Left*, pp. 188 - 191.

99. Marcuse, "The Affirmative Character of Culture,"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trans.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1968), pp. 122 - 123 (originally *ZfS* VI, 1 [1937]).

100. *Ibid.*, p. 116. Here Marcuse expressed an attitude towards the carrying through of reification to its extreme which he later was to admire in Sartre's *Being and Nothingness* ("Existentialism: Remarks on Jean - Paul Sartre's *Être et le néant*,"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III, 3 [March, 1948], p. 327).

101. Marcuse, "On Hedonism," *Negations*, p. 190.

102. Robinson, *The Freudian Left*, p. 179.

103. *Eros and Civilization*, p. 218.

104. *Ibid.*, p. 41.

105. *Ibid.*, p. 223.

106. *Ibid.*, pp. 54 - 55.

107. *Ibid.*, p. 231.

108. *Ibid.*, p. 235.

109. "The Oedipus complex, although primary source and model of neu-

Dissent 11, 4 (Autumn, 1955), and "A Counter - Rebuttal," *Dissent* 11, 1 (Winter, 1956).

120. "The Human Implications of Instinctive 'Radicalism,'" p. 346.

121. Marcuse, "A Reply to Erich Fromm," *Dissent* 11, 1 (Winter, 1956). In *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 Fromm picked up the debate where he had put it down fifteen years earlier (pp. 14 - 20).

122. *Ibid.*, 81. This was a term Marcuse was to use extensively in *One Dimensional Man* and his subsequent works. *Nicht Mitmachen* had been a favorite "password" of the Institut from the earliest Frankfurt days, so Lowenthal told me (letter, August 15, 1970).

123. *Fear of Freedom*, p. 158 (italics in original).

124. Fromm, *The Heart of Man* (New York, 1964), pp. 53 - 54.

125. Horkheimer, "Gedanke zur Religion," *Kritische die Theorie*, vol. 1 (Frankfurt, 1968), p. 375.

4. THE INSTITUT'S FIRST STUDIES OF AUTHORITY

1. Max Horkheimer, "Autoritärer Staat," in "Walter Benjamin zum Gedächtnis" (unpub., 1942; Collection Friedrich Pollock in Montagnola, Switzerland), p. 152.

2. Margaret Mead, "On the Institutionalized Role of Women and Character Formation," *ZfSV*, 1 (1936); Charles Bear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ZfSIV*, 1 (1935); Harold Lasswell, "Collective Autism as a Consequence of Culture Contact," *ZfSIV*, 2 (1935).

3. In 1935 Tönnies' rather unexceptional article on the right to work was published out of deference to his position and reputation; Ferdinand Tönnies, "Das Recht auf Arbeit," *ZfS IV*, 1 (1935)

4. 1938 unpublished mimeographed history of the Institut in Friedrich Pollock's collection in Montagnola, p. 13.

5. "Ten Years on Morningside Heights: A Report on the Institute's History 1934 to 1944" (unpub., 1944), in Lowenthal's collection. Paying honoraria for published or unpublished articles and reviews in the *Zeitschrift* was a frequently used device to make the support "more respectable" (letter from Lowenthal to me, August 15, 1970).

6. Interview with Friedrich Pollock, Montagnola, Switzerland, March, 1969.

7. Ludwig Marcuse, *Mein zwanzigstes Jahrhundert* (Munich, 1960), pp. 239 - 240.

8. Conversation with Professor Pachter, New York, N. Y., October 13, 1971. 322

9. These appeared in two special issues of a Berlin journal called *Alternative*, 56 - 57 (October - December, 1967) and 59/60 (April - June, 1968).

10.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period at Columbia, see Robert Maciver's autobiography, *As a Tale That is Told* (Chicago, 1968). According to his account, Maciver wanted a broader, more theoretically oriented department than Lynd, who stressed a utilitarian, professional approach. The final break came over a hostile review Maciver wrote of Lynd's *Knowledge for What* (pp. 137 - 141).

11. Letter from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November 8, 1942, in Lowenthal's collection.

12. Henry Pachter, "A Memoir," in *The Legacy of the German Refugee Intellectuals* (*Salmagundi*, 10/11 [Fall, 1969 - Winter, 1970]), p. 18.

13. Horkheimer,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r Sozialphilosophie und die Aufgabenein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Frankfurt Universitätsreden* (Frankfurt, 1931), pp. 14 - 15.

14. Adolf Levenstein, *Die Arbeiterfrage* (Munich, 1912). Paul Lazarsfeld first brought the importance of this predecessor to my attention. His

student, Anthony Oberschall, has written on Levenstein's work in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 in Germany, 1846 - 1914* (Paris, The Hague, 1965), pp. 94ff. Fromm denies the importance of Levenstein's model (letter from Fromm to me, May 14, 1971).

15. Fromm, "Die psychoanalytische Charakterologie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Sozialpsychologie," *Z/SI*, 3 (1932).

16. Fromm, *Social Character in a Mexican Village*, with Michael Mac-coby (Englewood Cliffs, N. J., 1970).

17. So it was called i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A Report on Its History and Activities, 1933 - 1938* (New York, , 1938), pp. 14 - 15.

18. Letter from Pollock to me, March 24, 1970. Paul Massing, who was a student at the Institut in its Frankfurt days, suggested to me that the study was really not that conclusive because revolutions might well be made by authoritarian types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interview with Massing, New York, N. Y., November 25, 1970).

19. Letter from Fromm to me, May 14, 1971.

20. Fromm, *Fear of Freedom* (British title of *Escape from Freedom*) (London, , 1942), p. 183.

21. Horkheimer, "Allgemeiner Teil," in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aris, 1936), pp. 23 - 24.

22. See, for example, Franz Neumann'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Democratic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ed. Herbert Marcuse (New York, 1957), written originally in 1951. Here he wrote: "Marxist theory suffers from a misunderstanding: the confusion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 with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action" (p. 273). In a posthumously published paper entitled "Confining Conditions and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s," in *Politics, Law, and Social Change: Selected Essays of Otto Kirchheimer*,

ed. Frederic S. Burin and Kurt L. Shell (New York and London, 1969), Kirchheimer made a similar point.

23. For a recent discussion of this issue, see Sheldon Wolin, *Politics and Vision* (Boston, 1960).

24. Marcuse,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trans.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1968), pp. xi xii.

25. For a recent restatement of the Institut's stress on society, see Adorno's "Society," in *The Legacy of the German Refugee Intellectuals* (*Salmagundi*, 10/11 [Fall, 1969 - Winter, 1970]).

26. Marcuse, *Negations*, pp. 31ff.

323

27.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change, see Robert V. Daniels, "Fate and Will in the Marxian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Since Darwin and Marx*, ed. W. Warren Wager (New York, 1966).

28. Horkheimer, "Vernunft und Selbsterhaltung," in "Walter Benjamin zum Gedächtnis," p. 25.

29. Fromm, *Fear of Freedom*, pp. 26, 232.

30. Marcuse, *Negations*, p. 39 (italics in the original).

31. Horkheimer, "Autoritärer Staat," p. 153.

32. Horkheimer, "Allgemeiner Teil," pp. 48 - 48.

33. Fromm, "Sozialpsychologischer Teil," in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p. 132 - 133.

34. Horkheimer, "Vernunft und Selbsterhaltung," p. 29.

35. The relevant section of this work first appeared in English in 1947, in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rans. A. M. Henderson and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1947).

36. *Ibid.*, p. 185.

37. Horkheimer, "Allgemeiner Teil," pp. 48 - 49.

38. Horkheimer, "Vernunft und Selbsterhaltung," p. 56.

39. Marcuse, *Negations*, p. 19.
40. Horkheimer, "Die Juden und Europa," *ZfS* VIII, 1/2 (1939), p. 115.
41. Horkheimer, "Zum Rationalismusstreit in der gegenwärtigen Philosophie," *ZfS* III, 1 (1934), p. 36.
42. Marcuse, *Negations*, p. 18.
43. *Ibid.*, p. 13.
44. *Ibid.*, p. 23.
45. *Ibid.*, pp. 30 - 31
46. *Ibid.*, p. 32.
47. *Ibid.*, p. 36.
48. *Ibid.*, p. 38.
49. *Ibid.*, p. 39.
50. Horkheimer, "Die Juden und Europa," p. 125.
51. *Ibid.*, p. 121.
52. For an analysis of fascism as middle - class extremism by a theorist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see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New York, 1960).
53. Horkheimer, "Vorwort,"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 xii.
54. J. N. Findlay, in his *Hegel: A Reexamination* (New York, 1958), writes: "Alone among modern philosophers Hegel has an almost Freudian realization of the simple sexual and family foundations of organized group - life" (p. 116).
55. For a recent discussion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family in the last century see Rene König, "Soziologie der Familie," in *Handbuch der empirischen Sozialforschung*, vol. II (Stuttgart, 1969).
56. Horkheimer, "Allgemeiner Teil," P. 19.

57. Ibid., p. 49.

58. In a subsequent article in *ZfS* VI, 1 (1937), entitled "Zum Gefühl der Ohnmacht," Fromm explored the consequences and causes of the growing feeling of impotence.

59. Horkheimer, "Allgemeiner Teil," p. 66.

60. Ibid., pp. 75 - 76.

61. Mitscherlich, a psychoanalyst connected with the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and director of the Sigmund Freud Institute, was very much influenced by the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after the war. His *Society without the Father*, trans. Eric Mosbacher (New York, 1970), shows how indebted he was to the Frankfurt School's earlier stud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324

62. Fromm, "Sozialpsychologischer Teil," p. 84.

63. Ibid., p. 101.

64. Ibid., p. 110.

65. See Chapter 3, p. 99.

66. He elaborated on these symptoms of masochistic passivity in "Zum Gefühl der Ohnmacht," p. 117.

67. Marcuse, "Autorität und Familie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bis 1933," in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68. See, for example, Alasdair MacIntyre's very harsh treatment of his work, *Herbert Marcuse: An Exposition and a Polemic* (New York, 1970).

69. Marcuse, "Ideengeschichtlicher Teil," in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 140.

70. The Institut was generally at one with German academic philosophy in concentrating on the Greeks, Descartes, Kant and Hegel, the various philosophers of life, and modern phenomenologists. Most medieval philosophy was ignored, and the empiricist tradition was usually discussed as a whole in order to be dismissed. Marcuse, however, did discuss Hobbes, Locke, and Rousseau in

lectures at Columbia (letter from Lowenthal to me, August 15, 1970).

71. This quotation is taken from the English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 901.

72. Letter from Fromm to me, May 14, 1971.

73. Interview with Ernst Schachtel, New York, N. Y., June, 1970.

74. Fromm, "Geschichte und Methoden der Erhebungen," in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p. 235 - 238.

75. *Ibid.*, p. 235.

76. Ernst Schachtel, "Zum Begriff und zur Diagnose der Persönlichkeit in den 'Personality Tests,'" *ZfS* VI, 3 (1937).

77. These included the following:

Karl A. Wittfogel, "Wirtschaftsgeschichtliche Grundlagen der Entwicklung der Familien Autorität."

Ernst Manheim, "Beiträge zu einer Geschichte der autoritären Familie."

Andries Sternheim, "Materialien zur Wirksamkeit ökonomischer Faktoren in der gegenwärtigen Familie."

Hilde Weiss, "Materialien zum Verhältnis von Konjunktur und Familie."

Gottfried Salomon, "Bemerk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französischen Familie."

Willi Strelewicz, "Aus den familienpolitischen Debatten der deutschen Nationalversammlung 1919."

Ernst Schachtel, "Das Recht der Gegenwart und die Autorität in der Familie."

Harald Mankiewics, "Die Entwicklung des französischen Scheidungsrechts."

—, "Die Rechtslage der in nichtlegalisierten Ehen lebenden Personen in Frankreich."

Zoltán Ronai, "Die Familie in der französischen und belgischen Sozialpolitik."

Hubert Abrahamsohn, "Die Familie in der deutschen Sozialpolitik."

Paul Honigsheim, "Materialien zur Beziehung zwischen Familie und Asozialität von Jugendlichen."

Kurt Goldstein, "Bemerkungen über die Bedeutung der Biologie für die Soziologie anlässlich des Autoritätsproblems." 325

Fritz Jungmann, "Autorität und Sexualmoral in der freien bürgerlichen Jugendbewegung." (Jungmann was a pseudonym for Franz Borkenau, who was living in London at the time. This was his last contribution to the Institut.)

Marie Jahoda - Lazarsfeld, "Autorität und Erziehung in der Familie, Schule und Jugendbewegung."

Curt Wormann, "Autorität und Familie in der deutschen Belletristik nach dem Weltkrieg."

78. Interview with Pollock, March, 1969.

79. Horkheimer, "Die Juden und Europa."

80. Hans Speier, review of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Social Research* III, 4 (November 1936), pp. 501 - 504.

81. Among Wittfogel's articles in the thirties, which were all part of his more ambitious project to write a series of books on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were the following: "The Foundations and Stages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ZfS* IV, 1 (1935), and "Die Theorie der orientalischen Gesellschaft," *ZfS* VII, 1 (1938). In much of his work he was helped by his second wife, Olga Lang, whose book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New Haven, 1946) appear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Like his work, it did not really employ the methodology of Critical Theory, as Professor Lang admitted to me in conversation (New York, N. Y., June, 1970).

82. Felix Weil, *The Argentine Riddle* (New York, 1944).

83. Mirra Komarovsky, *The Unemployed Man and His Family* (New

York, 1940). Originally, this was to be part of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nemployment and the family in European cities as well, but the Institut's European branches were all closed by 1938.

84. For a discussion of Lazarsfeld's Research Center, see his article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Research; A Memoir." i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 - 1960*, ed.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Cambridge, Mass., 1969), pp. 285f.

85. Paul Lazarsfeld, "Some Remarks on the Typological Procedures in Social Research," *ZfS* VI, 1 (1937).

86. Komarovsky, *The Unemployed Man and His Family*, p. 122.

87. *Ibid.*, p. 3.

88. Adorno, "Fragmente über Wagner," *ZfS* VIII, 1/2 (1939). This was a condensation of several chapters of the book he later published entitled *Versuch über Wagner* (Frankfurt, 1952).

89. Leo Lowenthal, *Erzählkunst und Gesellschaft; Die Gesellschaftsproblematik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19. Jahrhunderts* with an intro. by Frederic C. Tubach (Neuwied and Berlin, 1971).

90. *Ibid.*, p. 83.

91. *Ibid.*, p. 132.

92. In addition to the opening essay and the piece on Meyer, which were printed in the *Zeitschrift*, a shortened version of the Goethe essay appeared in Lowenthal's *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 (Boston, 1957), and similarly abbreviated version of the chapter on Freytag was included in a Festschrift for Georg Lukács, *George Lukács zum achtzigsten Geburtstag*, ed. Frank Benseler (Neuwied, 1965).

93. Lowenthal, "Zur gesellschaftlichen Lage der Literatur," *ZfS* I, 1 (1932).

94. *Ibid.*, p. 90.

95. Lowenthal, "Conrad Ferdinand Meyers hero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326 *ZfS* II, 1 (1933).

96. *Ibid.*, p. 61.

97. Lowenthal, "Die Auffassung Dostojewskis im Vorkriegsdeutschland," *ZfS* III, 3 (1934). A version of the paper in English is contained in *The Arts in Society*, ed. Robert N. Wilson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4).

98. Benjamin wrote him a very appreciative letter from Paris on July 1, 1934, calling it a breakthrough in studies of this type (Lowenthal collection).

99. Lowenthal in *The Arts in Society*, p. 125.

100. *Ibid.*, p. 368.

101. Lowenthal, "Das Individuum in der individu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Berner - Kungen über Ibsen," *ZfS* V, 3 (1936). The article appeared with minor changes in translation in Lowenthal's *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 All quotations refer to the English version.

102. *Ibid.*, p. 170.

103. *Ibid.*, p. 175.

104. *Ibid.*, p. 179.

105. *Ibid.*, p. 184.

106. Lowenthal, "Knut Hamsun. Zur Vorgeschichte der autoritären Ideologie," *ZfS* VI, 3 (1937). This also was republished with a few changes in *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 from which the following quotations are taken.

107. So Lowenthal told me in conversation, Berkeley, Calif., August, 1968.

108. *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 p. 198.

109. *Ibid.*, p. 202.

110. They were also to be found, Adorno added in a footnote (written pseudonymously as Hektor Rottweiler), in the music of Jan Sibelius. (page 338

in the original article in *ZfS*, omitted in the English version in *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

111. III. *Ibid.*, p. 218.

5. THE INSTITUT'S ANALYSIS OF NAZISM

1. Interview with Alice Maier, New York, N. Y., May, 1969.

2. 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 - 1944* (rev. ed.; New York, 1944).

3. Neumann et al., *The Cultural Migration: The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Philadelphia, 1953), p. 18.

4. Herbert Marcuse, Preface to *The Democratic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Legal Theory*, by Franz Neumann (New York, 1957), p. vii. See also H. Stuart Hughes, "Franz Neumann between Marxism and Liberal Democracy," i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 - 1960*, ed.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Cambridge, Mass., 1969).

5. Most frequently he appeared in *Die Arbeit und Die Gesellschaft*.

6. Franz Neumann, "Der Funktionswandel des Gesetzes im Recht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ZfS* VI, 3 (1937), reprinted in English as "The Change in the Function of Law in Modern Society," in *The Democratic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from which the following quotations are taken

7. *Ibid.*, p. 39.

8. *Ibid.*, p. 42.

9. *Ibid.*, p. 52.

10. *Ibid.*, p. 65.

11. Neumann made the same point in *Behemoth*, P. 451.

12. *The Democratic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p. 66.

30. *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p. 179.

31. A. R. L. Gurland, *Produktionsweise - Staat - Klassendiktatur* (Leipzig, 1929). The director of the thesis was Hans Freyer of the philosophy faculty.

32. Gurland, "Die Dialektik der Geschichte und die Geschichtsauffassung Karl Kautskys," *Klassenkampf* (Berlin, Sept. 1, 1929).

33. Gurland, "Die K. P. D. und die rechte Gefahr," *Klassenkampf* (Berlin, Dec. 1, 1928). Gurland also wrote a discussion of the SPD's situation, stressing the need for *praxis*, entitled *Das Heute der proletarischen Aktion* (Berlin, 1931).

34. For a discussion of Grossmann's career, see Walter Braeuer, "Henryk Grossmann als Nationalökonom," *Arbeit und Wissenschaft*, vol. VIII (1954).

35. Henryk Grossmann, "Marx, die klassische Nationalökonomie und das Problem der Dynamik." (mimeographed, 1940). Braeuer refers to a manuscript entitled "Marx Ricardiensis?," which Pollock feels may be another title for the same work, although according to Braeuer, it was over three hundred pages long, rather than 113 pages like the one in Pollock's possession (letter to me from Friedrich Pollock, April 16, 1970). The work was finally published with an afterword by Paul Mattick in Frankfurt in 1969.

36. Henryk Grossmann, "The Evolutionist Revolt against Classical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LI, 5 (1943); "W. Playfair, the Earliest Theorist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VIII, 1 (1948).

37. In our interviews, Lowenthal, Pollock, and Marcuse all mentioned Grossmann's growing distrust of the Institut's members during the forties. The Lowenthal-Horkheimer correspondence confirms their assertions in a number of letters.

38. The same might be said of another old Institut acquaintance, Ernst Bloch, who was refused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Institut because of his politics (interview with Leo Lowenthal, Berkeley, Calif., August, 1968).

39. Interview, New York, May, 1969.

40. Gerhard Meyer, "Krisenpolitik und Planwirtschaft," *ZfS* IV, 3 (1935); Meyer also contributed several bibliographical essays, "Neuere Literatur über Planwirtschaft," *ZfS* I 3 (1932), and "Neue englische Literatur zur Planwirtschaft," *ZfS* II, 2 (1933). With Kurt Mandelbaum, he wrote "Zur Theorie der Planwirtschaft," *ZfS* III, 2 (1934).

41. Under the pseudonym Kurt Baumann, Mandelbaum wrote "Autarkie und Planwirtschaft," *ZfS* II, 1 (1933). Under his own name, he wrote "Neuere Literatur zur Planwirtschaft," *ZfS* IV, 3 (1935), and "Neuere Literatur über technologische Arbeitslosigkeit," *ZfS* V, 1 (1936).

42. Erich Baumann was also a pseudonym for Mandelbaum. The article appearing under this name was "Keynes' Revision der liberalis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ZfS* V, 3 (1936). "Spring's" piece was entitled "Zu Marshalls neuklassischer Ökonomie," *ZfS* VI, 3 (1937).

43. Felix Weil, "Neuere Literatur zum 'New Deal,'" *ZfS* V, 3 (1936); "Neuere Literatur zur deutschen Wehrwirtschaft," *ZfS* VII, 1/2 (1938).

44. Marcuse, "Som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Modern Technology," *SPSS* IX, 3 (1941); in this piece Marcuse first expressed some of the ideas he was to develop in *One - Dimensional Man*. Gurland, "Technological Trends and Economic Structure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SPSS* IX, 2 (1941).

45. Conversation with Karl August Wittfogel, New York, N. Y. June 21, 1971.

46. Conversation with Gerhard Meyer, Meredith, N. H. July 19, 1971.

47. Friedrich Pollock. *Die planwirtschaftlichen Versuche in der Sowjetu-*

nion (1917 - 1927), (Leipzig, 1929).

48. Pollock, "Die gegenwertige Lage des Kapitalismus und die Aussichten einer planwirtschaftlichen Neuordnung," *ZfS* I, 1/2 (1932) In the following year, he continued his discussion of the Depression in "Bemerkungen zur Wirtschaftskrise," *ZfS* II, 3 (1933).

49. Pollock, "State Capitalism: It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SPSS* IX, 2 (1941).

50. *Ibid.*, p. 207.

51. James Burnham,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41), Burnham had originally been a Trotskyist. Although Trotsky himself rejected the notion of state capitalism, at least as it applied to the Soviet Union, a number of his followers did not. There is no evidence, however, of Pollock's having gotten the idea from this source.

52. Pollock, "Is National Socialism a New Order?," *SPSS* IX, 3(1941), p. 447.

53. *Ibid.*, p. 449

54. *Ibid.*, p. 450. Neumann was to use the same term in *Behemoth*; Willi Neuling had coined it in "Wettbewerb, Monopol und Befehl in der heutigen Wirtschaft,"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LXXXXIX (1939).

55. For a recent discussion of the same issue, see T. W. Mason, "The Primacy of Politics: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in *The Nature of Fascism*, ed. S. J. Woolf (New York, 1968).

56. Max Horkheimer, "Philosophie und Kritische Theorie" *ZfS* VI, 3 (1937), p. 629.

57. Pollock, "State Capitalism," p. 207.

58.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point, see Robert C. Tucker, "Marx As a Political Theorist," in *Marx and the Western World*, ed. Nicholas Lobkowitz

(Notre Dame, Ind., 1967).

59.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rev. ed. (Boston, 1960), p. 410. Earlier, in his article on "Der Kampf gegen den Liberalismus in der totalitären Staatsauffassung," *ZfS* III, 1 (1934), Marcuse also talked solely of "monopoly capitalism." At this early date, however,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Institut agreed.

60. Horkheimer, "Autoritärer Staat," in "Walter Benjamin zum Gedächtnis" (unpub., 1942), pp. 124 - 125, in Pollock's collection.

61. Horkheimer, Preface to *SPSS* IX, 2 (1941), p. 195.

62. Horkheimer, "Vernunft und Selbsterhaltung," in "Walter Benjamin zum Gedächtnis," p. 66.

63. Kirchheimer, "In Quest of Sovereignty," pp. 178 - 180. Here Kirchheimer related rackets to the technological ethos of modern society: "Rackets seem to correspond to a stage of society where success depends on organization and on access to appropriate technical equipment rather than on special skills" (p. 179).

64. Horkheimer, Preface to *SPSS* IX, 2 (1941), p. 198.

65. Horkheimer, "Die Juden und Europa," *ZfS* VIII, 1/2 (1939), p. 115. This essay was one of the last predominantly Marxist pieces Horkheimer wrote. Not insignificantly, it was excluded from the collection of his work published as *Kritische Theorie*, 2 vols., ed. Alfred Schmidt (Frankfurt, 1968).

66. "Autoritärer Staat," p. 151.

67.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1968), p. 263.

68. "Autoritärer Staat," p. 143.

69. *Ibid.*, pp. 148 - 149.

70. For a more serious discussion of the function of terror and coercion by an Institut member, see Leo Lowenthal, "Terror's Atomization of Man," *Com-*

mentaryI, 3 (January, 1946). In a later article on "The Lessons of Fascism," in *Tensions That Cause Wars*, ed. Hadley Cantril (Urbana, Ill., 1950) Horkheimer argued that the authoritarian character was not so widespread until the Nazis began using terror and massive propaganda to atomize the population (p. 223).

71. "Die Juden und Europa," p. 125.

72. "Autoritärer Staat," p. 138

73. "Vernunft und Selbsterhaltung," p. 59.

74. "Autoritärer Staat," p. 160.

75. So Lowenthal told me during one of our interviews, in Berkeley, August, 1968.

76. Kirchheimer, "Criminal Law in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SPSS* VIII, 3 (1939). Kirchheimer also published another article on German criminal practice, entitled "Recent Trends in German Treatment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XXIX (1938).

77. Compare Kirchheimer's critique of phenomenological law with Marcuse's article "The Concept of Essence," *Negations*, and Adorno's more extensive attack on Husserl in his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Stuttgart, 1956). The source of the Kiel School's phenomenology was Scheler's materialist eidetics rather than Husserl's idealistic variety.

78. Kirchheimer, "The Legal Order of National Socialism," *SPSS* IX, 3 (1941), reprinted in *Politics, Law, and Social Change*, from which the following quotations are taken (p. 93).

79. *Ibid.*, p. 99.

80. *Ibid.*, p. 108.

81. Kirchheimer,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Compromise," *SPSS* IX, 2 (1941), also reprinted in *Politics, Law, and Social Change*, from which the following quotations are taken.

100. Quoted by John M. Cammett, "Communist Theories of Fascism, 1920-1935," *Science and Society* XXXI, 2 (Spring, 1967).

101. *Behemoth*, p. 261.

102. *Ibid.*, p. 298.

103. *Ibid.*, p. 305.

104. *Ibid.*, p. 185.

105. *Ibid.*, p. 354.

106. *Ibid.*, p. 366.

107. *Ibid.*, pp. 449. David Schoenbaum's "revision" of Neumann in *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Garden City, N. Y., 1966), which is ba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Nazistatus revolution, was thus in part anticipated by Neumann himself.

108. *Behemoth*, p. 278.

109. *Ibid.*, p. 472.

110. *Ibid.*, p. xii.

111. *Ibid.*, p. 471.

112. Horkheimer, Foreword to *SPSS* VIII, 3 (1939), p. 321. This was actually dated July, 1940.

113. On the board directors of the Social Studies Association were Charles Beard, Robert MacIver, Robert Lynd, Morris Cohen, and Paul Tillich, all old friends of the Institut. ("Supplementary Memorandum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Institute from 1939 to 1941," mimeographed; Friedrich Pollock's collection in Montagnola).

114. Of the new research associates, Karsen had contributed the most to the *Zeitschrift*, with two bibliographical pieces, "Neue Literatur über Gesellschaft und Erziehung," *ZfS* III, 1 (1934), and "Neue amerikanische Literatur über Gesellschaft und Erziehung," *ZfS* VIII, 1 (1939).

115. Interviews with Marcuse (May, 1968) in Cambridge, Mass. and

Lowenthal (August, 1968). One ought not to make too much out of Neumann's friction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Institut. Pollock, with whom he was most clearly at odds on theoretical matters, delivered a eulogy at his funeral in Switzerland in December, 1954.

116. Gurland, Neumann, and Kirchheimer, *The Fate of Small Business in Germany* (Washington, D. C., 1943). This was partially financed by a grant from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Pepper's subcommittee was designed to study problems of American small business. The book's conclusion that small business in Weimar and Nazi Germany had been caught in the squeeze between big business and labor fitted well with the goals of the subcommittee.

117. "Cultural Aspects of National Socialism," in Lowenthal's collection in Berkeley. Another abortive project which the Institut tried to get sponsored was a study of the postwar reconstruction of German society.

118. *Ibid.*, p. 51.

119. The dissertation was a study of the agrarian situation in France after World War I. Massing did much of the research at the Sorbonne and spent eighteen months in Moscow at the Agrarian Institute after its completion in 1929. 332
(This and the subsequent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comes from an interview with Dr. Massing in New York, November 25, 1970).

120. Massing [pseud Karl Billinger], *Schutzhäftling 880* (Paris, 1955); Wittfogel [pseud: Klaus Hinrichs], *Staatliches Konzentrationslager VII* (London, 1936).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seudonym comes from my interview with Massing in New York.

121. See Wittfogel's testimony on August 7, 1951,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of the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 82nd Congress, 1951 - 1952, vol. III, p. 276.

122. For a description of the trip, see Hede Massing, *This Deception* (New York, 1951), pp. 244f.

123. Conversation with Wittfogel, New York, June 21, 1971.
124. This was the reason Marcuse mentioned during our interview.
125. "Ten Years on Morningside Heights," (unpub., 1944), in Lowenthal's collection.
126. Horkheimer, "Egoismus und Freiheitsbewegung," *ZfS* V, 1 (1936), p. 219. Marcuse wrote an article "Über den affirmativen Charakter der Kultur," *ZfS* VI, 1 (1937), which we shall examine in the following chapter.

6. AESTHETIC THEORY AND THE CRITIQUE OF MASS CULTURE

1. Goerge Steiner, "Marxism and the Literary Critic," *Language and Silence* (New York, 1967).
2. Georg Lukács, *The Historical Novel*, trans. Hannah and Stanley Mitchell (Boston, 1963), pp. 30 - 63.
3. With his *Wider den missverstandenen Realismus* (Hamburg, 1958), after Stalin's death, Lukács lessened his hostility somewhat. See Roy Pascal's essay in *Georg Lukács: The Man, His Work, and His Ideas*, ed. G. H. R. Parkinson (New York, 1970).
4. See his lengthy polemic against "irrationalism" in Lukács, *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 (Berlin, 1954).
5. Herbert Marcuse's critique of socialist realism in his *Soviet Marxism: A Critical Analysis* (New York, 1958) stresses this fallacy.
6. Walter Benjamin, *Briefe*, ed. Gershom Scholem and Theodor W. Adorno (Frankfurt, 1966), vol. I, pp. 350, 355.
7. Theodor Adorno, "Erpresste Versöhnung," *Noten zur Literatur II* (Frankfurt, 1961), p. 152.
8. See Adorno, "The George Hofmannsthal Correspondence, 1891 -

1906," *Prisms*, trans.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London, 1967), p. 217.

9. For a description of Cornelius's artistic background, see his essay "Leben und Lehre," in *Di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in Selbstdarstellungen*, ed. Raymund Schmidt (Leipzig, 1923) vol. II. Among his works on aesthetics were *Elementargesetze der bildenden Kunst; Grundlagen einer praktischen Ästhetik* (Leipzig and Berlin, 1911), and *Kunstpädagogik* (Erlenbach - Zurich, 1920).

10. In a letter to Horkheimer on October 27, 1942, Lowenthal refers to a novel that Horkheimer had begun to write (Lowenthal collection).

11.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have an interesting essay on the difficulties of translating Adorno at the beginning of *Prisms*.

12. Adorno, *Prisms*, p. 225.

13. *Ibid.*, p. 150

14. *Ibid.*, p. 246

15. *Ibid.*, p. 229

16. This was similar to the task Norman O. Brown seems to have set himself in *Love's Body* (New York, 1966), where much of the text consists of quotations.

17. See his letter to Max Rychner, in Benjamin, *Briefe*, vol. II, p. 524.

18. Quoted in Adorno, *Prisms*, p. 232.

19. Benjamin, *Briefe*, vol. II, pp. 726, 727.

20. "Ten Years on Morningside Heights: A Report on the Institute's History, 1934 - 1944" (unpub., 1944) (Lowenthal collection).

21. *Prisms*, p. 71.

22. Benjamin, *Illuminations*, ed. with an intro. by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1968), p. 258.

23. Max Horkheimer, "Art and Mass Culture," *SPSS IX*, 2 (1941), p. 291.

24. This was a transition the young Lukács had made as well. See Lucien Goldmann, "The Early Writings of Georg Lukács," *Tri - Quarterly IX* (Spring, 1967).

25. *Prisms*, p. 184. "Force - field" (*Kraftfeld*), it will be recalled, was the term Adorno also used in his critique of Husserl.

26. *Ibid.*, p. 262

27. *Ibid.*, p. 262.

28. This point is made by Ilse Müller - Stromsdorfer in "Die ' helfende Kraft bestimmter Negation, '"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VIII*, 2/3 (Jan. 1961), p. 98.

29. Adorno, "Über dne Fetischcharakter in der Musik und die Regression des Hörens," *ZfS VII*, 3 (1938), p. 321; Leo Lowenthal, *Literature,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1), p. 12.

30. *Prisms*, p. 30.

31. Benjamin, *Briefe*, vol. II, p. 785; Adorno, *Prisms*, p. 236.

32. Horkheimer, "Art and Mass Culture," p. 292. For an expansion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art, see Adorno's "These upon Art and Religion Today," *Kenyon Review VII*, 4 (Autumn, 1945).

33. Nietzsche was the first to pick up this phrase and use it against Kant's definition of beauty as the object of *disinterested* desire. Marcuse first used it in "The Affirmative Character of Culture,"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trans.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1968), p. 115.

34. So Horkheimer argued (under the pseudonym Heinrich Regius) in *Dammerung* (Zurich, 1934), p. 60, and Adorno in *Prisms*, p. 32.

35. *Prisms*, p. 32.

36. *Ibid.*, p. 171.

37. *Ibid.*, p. 32.

38. Adorno, "Theses on Art and Religion Today," p. 678.

39. Marcuse, "The Affirmative Character of Culture," p. 117. This was to be a major theme of his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1955).

40. *Prisms*, p. 87.

41. *Ibid.*, p. 230.

42. Marcuse "On Hedonism," *Negations*, p. 198.

43. In one of the last articles he wrote, Adorno returned to the centrality of mediation for a genuine aesthetic theory. In criticizing the notion of communications in the work of the sociologist of music Alphons Silbermann, Adorno wrote: "Mediation is.....in the object itself, not something between the object and that to which it is brought. What is contained in communications, however, is sole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er and consumer" ("Thesen zur Kunstsoziologie,"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XIX, 1 [March, 1967], p. 92).

44. *Prisms*, p. 33.

334

45. Benjamin, *Briefe*, vol. II, pp. 672, 676. Several of Adorno's letters to Benjamin are included in the volume.

46. *Prisms*, p. 85.

47. *Ibid.*, p. 84.

48. "Music did not 'represent' anything outside of itself; it was on the order of prayer and play, not painting and writing. The decay of this reality of music by its becoming an image of itself tends to break the spell" (Adorno, "Currents of Music: Elements of a Radio Theory" [unpub. prospectus for the Princeton Radio Research Project, 1939], p. 72). I am indebted to Professor Lazarsfeld for making this available to me.

49. Many of his early articles appeared in the journal he edited, *Anbruch*, and in others such as *Musik*, *Pult und Taktstock*, *Scheinwerfer*, and *23*.

68. Hans Mayer, *Der Repräsentant und der Märtyrer* (Frankfurt, 1971), pp. 156 - 157.

69. A review of Wilder Hobson's *American Jazz Music* and Winthrop Sargeant's *Jazz Hot and Hybrid*, writte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Eunice Cooper, in the *SPSS* IX, 1 (1941), p. 169. Adorno was enthusiastic about Sargeant's interpretation of jazz, which he took as a native confirmation of his own ideas. Hobson, on the other hand, he criticized for trying to abstract the music from its commodity character.

70. *Ibid.*, p. 177.

71. "Oxford Nachtrage," p. 119.

72. *Ibid.*, p. 123

73. *Ibid.*, p. 123.

74. *Prisms*, pp. 199f.

335

75. Adorno, "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i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 - 1960*, ed.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Cambridge, Mass., 1969), p. 341. Curiously, Adorno writes, "I actually still considered jazz to be a spontaneous form of expression," which seems scarcely to have been the case.

76. Marcuse's mid - 1960's enthusiasm for the "counterculture," however, has begun to wane in the 1970's; see, for example, his review of Charles Reich's *The Greening of America* (*The New York Times*, Nov. 6, 1970, p. 41), and his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Boston, 1972).

77. Adorno, "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p. 340.

78. *Ibid.*, p. 341, and Paul Lazarsfeld,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Research: A Memoir," i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pp. 322f.

79. Lazarsfeld,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Research," p. 301.

80. "Über den Fetischcharakter in der Musik und die Regression des

Hörens," *ZfS* VII, 3 (1938).

81. Benjamin, "L'Oeuvre de l'art a l'époque de sa reproduction mécanisée," *ZfS* V, 1 (1936).

82. Adorno, "Über den Fetischcharakter," p. 327.

83. *Ibid.*, p. 330.

84. More orthodox Marxist critics were always quick to point to this as an inadequacy of Adorno's work. See, for example, Konrad Boehmer, "Adorno, Musik, Gesellschaft" in *Die neue Linke nach Adorno*, ed. Wilfried F. Schoeller (Munich, 1969), p. 123.

85. "Über den Fetischcharakter," p. 355.

86. Adorno acknowledged the importance of Simpson's help in his essay "Scientific Experiences," i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pp. 350 - 351. Simpson had been a student of Robert Maciver. His major work was as translator and critic of Durkheim's sociology.

87. Adorno, "A Social Critique of Radio Music," *Kenyon Review* VII, 2 (Spring, 1945).

88. Ernst Krënek, "Bemerkungen zur Rundfunkmusik," *ZfS* VII, 1/2 (1938). Adorno later wrote a tribute to Krënek in *Moments Musicaux*, entitled "Zur Physiognomik Krëneks."

89. Adorno "A Social Critique of Radio Music," pp. 210 - 211.

90. See his discussion of their genesis i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p. 351.

91. Adorno, "On Popular Music," *SPSS* IX, 1 (1941).

92. *Ibid.*, p. 48.

93. Professor Lazarsfeld has graciously made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available to me. It was entitled "Currents of Music: Elements of a Radio Theory." A shortened version appears as "The Radio Symphony," in *Radio Research 1941*, ed. Paul Lazarsfeld and Frank Stanton (New York, 1941).

his involvement in Communist activities, and Adorno wanted no part of the association the book might have suggested.

111. Adorno, "Gegangelte Musik," in *Dissonanzen*.

112. Adorno, *Minima Moralia* (Frankfurt, 1951); and Adorno and Horkheimer,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1947).

113. Adorno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1950). Adorno's paper on Martin Luther Thomas was never published.

114. Adorno and Bernice T. Eiduson, "How to Look at Television" (paper read at the Hacker Foundation in Los Angeles, April 13, 1953) (Lowenthal collection).

115. Adorno, "The Stars Down to Earth; *The Los Angeles Times* Astrology Column; A Study in Secondary Superstition," *Jahrbuch für Amerikastudien*, vol. II (Heidelberg, 1957).

116. Adorno, "Thesen gegen den Okkultismus," *Minima Moralia*, pp. 462f.

117. Adorno used this work as the basis of his discussion in an article he wrote at approximately the same time, "Freudian Theory and the Pattern of Fascist Propaganda," in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d. Geza Roheim (New York, 1951).

118. Adorno, "The Stars Down to Earth," p. 82.

119. *Prisms*, p. 98.

120. See, for example, his letter to Horkheimer in the fall of 1934 (Benjamin, *Briefe*, vol. II, p. 625f.). Benjamin also resisted invitations to move to Denmark, Palestine, and the Soviet Union.

121. Adorno, "Interimbescheid," *Über Walter Benjamin* (Frankfurt, 1970), p. 95.

122. Benjamin, *Briefe*, vol. II, p. 834. The rest of the history of Benjamin's life comes from the Introduction to *Illuminations* by Hannah Arendt

and the biographical sketch by Friedrich Pollock in Benjamin's *Schriften*, ed. Theodor W. Adorno and Gershom Scholem, vol. II (Frankfurt, 1955).

123. Arthur Koestler, *The Invisible Writing* (London, 1954), p. 512.

124. *Ibid*, p. 513

125. Horkheimer, "Autoritärer Staat" and "Vernunft und Selbsterhaltung"; Adorno, "George und Hofmannsthal"; and Benjamin, "Thesen zur Geschichtsphilosophie," in "Walter Benjamin zum Gedächtnis" (unpub., 1942) (Friedrich Pollock's collection in Montagnola).

126. Rolf Tiedemann, *Studien zur Philosophie Walter Benjamins* 337 (Frankfurt, 1965).

127. See, especially, *Alternative*, 56/7 (Oct. - Dec., 1967) and 59/60 (April - June, 1968), and Hannah Arendt, intro. to *Illuminations*. Other contributions to the debate include Siegfried Unseld, "Zur Kritik an den Editionen Walter Benjamins," *Frankfurter Rundschau* (January 24, 1968); Rolf Tiedemann, "Zur 'Beschlagnahme' Walter Benjamins, oder Wie Man mit der Philologie Schlitten fährt," *Das Argument* X, 1/2 (March, 1968); Friedrich Pollock, "Zu dem Aufsatz von Hannah Arendt über Walter Benjamin," *Merkur*, XXII, 6 (1968); Hannah Arendt, "Walter Benjamin und das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 noch einmal," *Merkur*, XXII, 10 (1968); and Hildegard Brenner, "Theodor W. Adorno als Sachwalter des Benjaminschen Werkes," in *Die neue Linke nach Adorno*. Adorno's own reply, "Interimbescheid," is reprinted in his *Über Walter Benjamin*. For a summary of the debate, see "Marxistisch Rabbi," *Der Spiegel*, XXII, 16 (April 15, 1968).

128. See Benjamin's article, "Unpacking My Library," *Illuminations*.

129. Benjamin, *Berliner Kindheit um Neunzehnhundert* (Frankfurt, 1950) *passim*. In 1940 Benjamin wrote to Adorno: "Why should I hide from you that I find the root of my 'Theory of Experience' in a childhood memory?"

(*Briefe*, vol. II, p. 848).

130. So Gershom Scholem has suggested in "Walter Benjamin,"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New York, 1965).

131. Adorno, *Über Walter Benjamin*, p. 97.

132. Benjamin, *Briefe*, vol. II, p. 655.

133. Gretel Adorno has denied the effect of his marriage's failure on his turning away from Zionism (letter to me, November 4, 1970), but Hannah Arendt has suggested otherwise in her Introduction to *Illuminations*, p. 36.

134. Max Rychner, "Erinnerungen an Walter Benjamin," *Der Monat*, XVIII, 216 (September, 1966), p. 42. *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 was published in Berlin in 1928.

135. *Briefe*, vol. II, p. 524.

136. Adorno, "A Portrait of Walter Benjamin," *Prisms*, p. 234.

137. See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lluminations*; Hans Heinz Holz, "Philosophie als Interpretation," *Alternative*, 56/57 (October - December, 1967); and "Walter Benjamin: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London, August 22, 1968). Although anonymous, this last article is almost certainly by George Steiner.

138. *Illuminations*, p. 263. Miss Arendt adds a footnote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n which she argues that Benjamin meant a mystical *nunc stans* rather than the more prosaic *Gegenwart* (the normal German word for the present). Ernst Bloch in his "Erinnerungen an Walter Benjamin," *Der Monat*, XVIII, 216 (September, 1966), suggested that *Jetztzeit* meant a break in the continuity of the temporal flow, in which the past suddenly became present (p. 40).

139. "These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lluminations*, p. 255.

140. Letter from Lowenthal to Horkheimer, June 18, 1942.

141. Benjamin, *Briefe*, vol. II, p. 786. This would seem to contradict Hildegard Brenner's assertion that Adorno sought to encourage the theological

Denken) is Brecht's own description of his style of thought. Benjamin picked it up in his discussion of Brecht's *Dreigroschenroman* (Benjamin, *Versuche über Brecht*, ed. Rolf Tiedemann [Frankfurt, 1966], p. 90).

150. Introduction to *Illuminations*, p. 15.

151. See, for example, Hildegaard Brenner's essay in *Die neue Linke nach Adorno*, *passim*.

152. Benjamin, *Versuche über Brecht*.

153. *Briefe*, vol. II, p. 657. Benjamin cited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as the reason why he could not leave Paris for Svendborg permanently.

154. Bertolt Brecht, "An Walter Benjamin, der sich auf der Flucht vor Hitler Entleibte" and "Zum Freitod der Flüchtlings W. B.," *Gedichte VI* (Frankfurt, 1964).

155. Benjamin, *Der Begriff der Kunstkritik in der deutschen Romantik* (Bern, 1920).

156. *Briefe*, vol. II, P. 857.

157. Benjamin, "Über das Programm der kommenden Philosophie," *Zur Kritik der Gewalt und andere Aufsätze* (Frankfurt, 1965), pp. 15–16.

158. Quoted in Adorno, *Prisms*, p. 232

159. *Briefe*, vol. II. pp. 726, 727.

160. Adorno, *Alban Berg: Der Meister des kleinsten Übergangs* (Vienna, 1968), p. 32.

161. Benjamin, "The Author as Producer," *New Left Review*, 62 (July – August, 1970).

162. *Illuminations*, p. 265. In a letter to me, Gretel Adorno emphatically denied an analogical moment in her late husband's thinking (January 27, 1970).

163. Quoted in Adorno, *Prisms*, p. 234.

164. *Ibid.*, p. 240.

165. It was published in Hofmannsthal's *Neue Deutsche Beiträge*, II, 1 (April, 1924).

166. See Hannah Arendt's discussion in her introduction to *Illuminations*, pp. 8 - 9.

167. *Briefe*, vol. I, p. 379.

339

168. With Franz Hessel, Benjamin translated *A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 and two volumes of *Le Côté de Guermantes* during the twenties.

169. Letter to me from Gretel Adorno (November 4, 1970).

170. Benjamin, *Berliner Kindheit um Neunzehnhundert* (Frankfurt, 1950).

171. What Benjamin once wrote of Kafka might have been applied to himself: "Kafka's work is an ellipse with foci that are far apart and are determined, on the one hand, by mystical experience (in particular, the experience of tradition) and, on the other, by the experience of the modern big-city dweller" (*Illuminations*, pp. 144 - 145).

172. Benjamin [Detlef Holz], *Deutsche Menschen: Eine Folge von Briefen* (Lucerne, 1936).

173. As Adorno remembers it, they met either through Siegfried Kracauer or in a sociological seminar run by Gottfried Salomon - Delatour in Frankfurt. See "Erinnerungen an Walter Benjamin," *Der Monat*, XVIII, 216 (September, 1966). Benjamin was also close friends with Marguerite (Gretel) Karplus, later Adorno's wife, whom he met in 1928. Many of his letters in the *Briefe* are addressed to "Felizitas," as he called her. In 1928, so Adorno wrote (*Über Walter Benjamin*, p. 98), Benjamin became part of the Institut's circle. If so, he certainly was not a very close member. In fact, he did not actually meet Horkheimer in person until 1938.

174. Benjamin, "Zum gegenwärtigen gesellschaftlichen Standort des französischen Schriftstellers," *ZfS* III, 1 (1934). In his discussion of French

writers from Barrès to Gide, Benjamin showed his distance from the Leninist strain in Marxist aesthetics. For example, he contended that surrealism, although beginning apolitically with Apollinaire, was moving towards reconciliation with political *praxis*, in the work of Breton and Aragon (p. 73).

175. *Briefe*, vol. II, p. 652.

176. *Ibid.*, p. 689.

177. These changes and others are pointed out by Helga Gallas, "Wie es zu den Eingriffen in Benjamins Texte kam oder über die Herstellbarkeit von Einverständnis," *Alternative*, 59/60, p. 80.

178. Horkheimer [Regius], *Dämmerung*, p. 178.

179. Benjamin, "Eduard Fuchs, der Sammler und der Historiker," *ZfS* VI, 2 (1937), and "L'Oeuvre de l'art à l'époque de sa reproduction mécanisée," *ZfS* V, 1 (1936).

180. Hildegard Brenner has argued that the changes were substantial,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copy in the *Potsdam Zentralarchiv* in East Germany; see her piece in *Die neue Linke nach Adorno*, p. 162.

181. *Briefe*, vol. II, p. 742.

182. This was at least one possible plan for the work; see the *Briefe*, vol. II, p. 774.

183. *Briefe*, vol. II, pp. 671–683.

184. *Ibid.*, p. 678.

185. *Ibid.*, pp. 681–682. Benjamin's lack of interest in the subjective individual has often been noted. He once confided to Adorno that "I am interested not in men, but only in things" (Adorno, Introduction to Benjamin's *Schriften*, vol. I, p. 17).

186. *Briefe* vol. II, pp. 782–790.

187. *Ibid.*, p. 786.

188. *Ibid.*, p. 788.

189. *Ibid.*, pp. 790 – 799.
190. *Ibid.*, pp. 794 – 795.
191. A translation has appeared as “Paris: 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Dissent*, XVII, 5 (September – October, 1970). A more complete version finally appeared in 1969 in German as *Charles Baudelaire: Ein Lyriker im Zeitalter des Hochkapitalismus* (Frankfurt, 1969). 340
192. “Über einige Motive bei Baudelaire,” *ZfS* VIII, 1/2 (1939), trans. in *Illuminations*, p. 159.
193. To Baudelaire, so Benjamin argued, the creative process was like a duel with the traumas of shocks, in which the artist tried to parry with all his powers (*Illuminations*, p. 165).
194. *Ibid.*, p. 174.
195. Miss Arendt’s introduction to *Illuminations*, for example, is rooted in this view of Benjamin.
196. *Illuminations*, p. 184.
197. See Benjamin, *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 Tiedemann comments extensively on Benjamin’s *Umfunktionierung* (changing the function) of Goethe’s *Urphanomene* in his *Studien zur Philosophie Walter Benjamins*, p. 59f.
198. Horkheimer, “Zu Bergsons Metaphysik der Zeit,” *ZfS* III, 3(1934).
199. *Illuminations*, p. 187.
200. *Studien zur Philosophie Walter Benjamins*, p. 69.
201. *Illuminations*, p. 263.
202. On Kraus’s concern for origins, see Hans Mayer, *Der Repräsentant und der Märtyrer*, pp. 51 – 52.
203. Fredric Jameson entitled his article in *The Legacy of the German Refugee Intellectuals* (*Salmagundi*, 10/11 [Fall, 1969 – Winter, 1970]), “Walter Benjamin, or Nostalgia,” and Peter Szondi wrote an article called

“Hoffnung im Vergangenen,” in *Zeugnisse: Theodor W. Adorno zum Sechzigsten Geburtstag* (Frankfurt, 1963), in which he suggests that Benjamin sought his utopia in the past.

204 “On Certain Motifs in Beudelaire,” *Illuminations*, p. 189.

205. *Ibid.*, p. 224.

206. *Ibid.*, p. 223.

207. *Ibid.*, p. 225.

208. *Ibid.*, p. 226.

209. Brecht had been disappointed in 1931 with the film version of the *Dreigroschenoper*. From this experience, he argued that intellectuals has themselves been proletarianized, a theme that Benjamin picked up in “Der Autor als Produzent,” written in 1934 and published in his *Versuche über Brecht*. Here Benjamin attacked as reactionary the notion of an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Logokratie*, of the type proposed by Kurt Hiller and the Activists. By implication, Benjamin also questioned the tendency in Adorno’s aesthetics to oppose avant-garde art to the popular culture of the working class.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he wrote at the end of the essay, “occurs not between capitalism and Geist [which was the key word of the Activists], but between capitalism and the proletariat” (*Versuche über Brecht*, p. 116).

210. *Illuminations*, p. 236.

211. *Ibid.*, p. 236.

212. *Ibid.*, p. 244.

213. *Briefe*, vol II, p. 798. Adorno remained skeptical about the validity of Benjamin’s position, calling it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ggressor” in his Introduction to the *Briefe*, vol. I, p. 16.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ggressor” was one of the classic psychoanalytic defense mechanisms. See Anna Freud, 341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 rev. ed. (New York, 1966), pp. 109f.

214. The remark was made in Benjamin's study of Goethe's *Wahlverwandtschaften* in *Neue Deutsche Beiträge*, II, 1 (April, 1924), and is quoted in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1964), p. 257.

215. Herta Herzog, "On Borrowed Experience: An Analysis of Listening to Daytime Sketches", Harold Lasswell, "Radio as an Instrument of Reducing Personal Insecurity"; Charles A. Siepmann, "Radio and Education"; and Adorno, with the assistance of George Simpson, "On Popular Music," all in *SPSS*, IX, 1 (1941).

216. Horkheimer, "Art and Mass Culture," *SPSS*, IX, 1 (1941).

217. Leo Lowenthal, "German Popular Biographies: Culture's Bargain Counter," in *The Critical Spirit: Essays in Honor of Herbert Marcuse*, ed. Kurt H. Wolff and Barrington Moore, Jr. (Boston, 1967).

218. Lowenthal, "Biographies in Popular Magazines," in *Radio Research: 1942 - 1943*, ed. Paul F. Lazarsfeld and Frank Stanton (New York 1944); later republished in Lowenthal's *Literature,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 as "The Triumph of Mass Idols."

219. Adorno, *Prisms*, pp. 103 - 104. This serves to contradict the analysis of such critics as Edward Shils ("Daydreams and Nightmares: Reflections on the Criticism of Mass Culture," *Sewanee Review* LXV, 4 [Autumn, 1957]), who call the Institut puritanical because of its attack on escapism.

220. Quoted in *Prisms*, p. 109.

221. See Chapter 3, p. 102.

222.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 ix.

223. Adorno, "Resumé über Kulturindustrie," *Ohne Leitbild* (Frankfurt, 1967), p. 60.

224. The term was originally Nietzsche's. It is quoted in Adorno and Horkheimer,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1947), p. 153.

225. *Ibid.*, p. 187.

(Lowenthal collection) .

2. For a discussion of its creation , see Paul F . Lazarsfeld ,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Research: A Memoir,” i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 Europe and America , 1930 - 1960* , ed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Cambridge, Mass, 1969).

3. In the issue of the SPSS devoted to mass communications (IX, 1, 1941), Lazarsfeld contributed a very optimistic appraisal of the future cross-fertilization of the two research styles .

4. The results of the content analysis, which included all the Institut's publications, were reported in an accompanying memorandum and are worth repeating here:

Books	16
Articles and monographs	91
Manuscripts used as basis for lectures and seminars	38
Research reports	<u>2</u>
TOTAL	147

PUBLICATIONS BY FIELD OF INTEREST	NUMBER OF PUBLICATIONS	PERCENTAGE OF TOTAL
Studies in authority	76	40
Philosophy	43	22
Studies in literature, music and art	38	18
Social prejudices	17	9
Miscellaneous	<u>22</u>	<u>11</u>
TOTAL	196	100

5. Letter from Horkheimer to Lazarsfeld, June 10, 1946 (Lowenthal collection).

6. Letter from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October 31, 1942 (Lowenthal collection).

7. SPSS IX , 1 (1941) the prospectus was dated two years earlier.

25. Herbert H. Hyman and Paul B. Sheatsley,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in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ed. Richard Christie and Marie Jahoda (Glencoe, III, 1954), P. 109.

26. The spread of ego psychology, Adorno suggested in a later essay, was a reflex of sociology in which individuals mirror objective trends like automatons; Adorno,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pt. 2, *New Left Review*, 47 (January - February, 1968), p. 95.

27. For this critique, see above, Chapter 3, pp. 103ff.

28.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vol. II, p. 747.

29. Horkheimer, "Soci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Psychoanalytic Approach." *Anti - Semitism: A Social Disease*, ed. E. Simmel (New York, 1946), p. 3.

30. Letter from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October 2, 1946.

31.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vol. II, p. 671.

32. Memorandum from Adorno on the Labor Project, November 3, 1944, pp. 43 - 44 (Lázarsfeld collection).

33. Marx, "On the Jewish Question,"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trans. and ed. T. B. Bottomore, foreword by Erich Fromm (New York, 1964).

34. Horkheimer and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1947), p. 204.

35. *Ibid*, p. 228.

36. *Ibid*, p. 230.

37. *Ibid*, p. 233..

38. Adorno, "Note on Anti - Semitism," September 30, 1940 (Lowenthal collection).

39. *Ibid*, p. I. Here it sounds as if Adorno had projected the condition of the Jews after the Diaspora back to a far earlier period. He offered no concrete evidence of this as a historical reality.

40. *Ibid*, p. I.

41.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July 24, 1944 (Lowenthal collection).

42. Horkheimer and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 234.

43. *Ibid.*, P. '1.

44.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July 5, 1946 (Lowenthal collection).

45. In English, the word "atonement" captures some of this in the sense that it can be understood as "at - one - ment." Yom Kippur, of course, is known as the "Day of Atonement."

46. In a letter to Lowenthal on November 17, 1945, Horkheimer supported alternatives to the creation of Israel "to prevent Judaism, as a whole, being held mor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fallacies of Zionism."

47.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 236.

48. Adorno, "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p. 356.

49. Bruno Bettelheim and Morris Janowitz, *Dynamics of Prejudice: A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Study of Veterans* (New York, 1950).

50. Nathan W. Ackerman and Marie Jahoda, *Anti - Semitism and Emotional Disorder: A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1950).

51. Leo Lowenthal and Norbert Guterman, *Prophets of Deceit* (New York, 1949).

52. Paul Massing, *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 (New York, 1949).

53. *Die Arbeitslosen von Marienthal* (Leipzig, 1932).

54. Among the better known of these are *Love Is Not Enough* (Glencoe, Ill., 1950), *Symbolic Wounds* (Glencoe, Ill., 1954), *The Empty Fortress* (New York, 1967), *The Informed Heart* (Glencoe, Ill., 1968), and *The Children of the Dream* (New York, 1969).

55. Bettelheim and Janowitz, *Dynamics of Prejudice*, p. 171.

56. Bruno Bettelheim and Morris Janowitz, *Social Change and Prejudice* (New York, 1964), pp. 74f. This was a reedition of *Dynamics of Prejudice*, with considerable new material added.

57. Nathan Glazer,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in Profile; Report on

a Major Study of Race Hatred," *Commentary*, IV, 6 (June, 1950).

58. Lowenthal and Guterman, *Prophets of Deceit*, P. xvi. Horkheimer, "Egoismus und Freiheitsbewegung," *ZfS*, V, 2 (1936).

59. *Ibid.*, p. xii.

60. *Ibid.*, p. 140.

61. Adorno "Freudian Theory and the Pattern of Fascist Propaganda," in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d. Geza Roheim (New York, 1951). The Freudian text on which Adorno primarily based his argument was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He also referred to Erikson's work on fascism (see the following note).

62. Erik Erikson, "Hitler's Imagery and German Youth," *Psychiatry* V, 4 (November 1942); reprinted in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1950), from which the following quotation comes.

63. *Ibid.*, pp. 332 - 333.

64. Leon Branso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Sociology* (Princeton, 1961).

65. So Adorno reports in "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p. 358

66. Mrs. Frenkel - Brunswik was herself a refugee from Vienna and the wife of the distinguished psychologist Egon Brunswik.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ir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psychology, see Jean Matter Mandler and George Mandler, "The Disapora of Experimentalist Psychology: The Gestaltists and Others," i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pp. 411 - 413. Levinson later became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at Yale Medical School and Sanford went on to Stanford as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67. R. Nevitt Sanford and H. S. Conrad, "Some Personality Correlates of Moral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XXXVIII, 1 (January, 1943).

68.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 xii.

69. *Ibid.*, p. ix.

70. Roger Brown points out the similarity in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and London, 1965).

71. Part of *Anti - Semite and Jew* appeared in *The Partisan Review* in 1946, but it was not fully translated until 1948, by G. J. Becker.

72. Wilhelm Reich, *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 (New York, 1946), 345 and Abraham H. Maslow, "The Authoritarian Character Structur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8 (1943).

73. Horkheimer, "The Lessons of Fascism," *Tensions That Cause War* (Urbana, Ill., 1950), p. 230.

74. Adorno, "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p. 363.

75. Horkheimer, "Notes on Institute Activities," *SPSS IX*, 1 (1941), p. 123.

76. Ernst Schachtel, it will be recalled, had criticized personality tests in the *Zeitschrift* for similar reasons ("Zum Begriff und zur Diagnose der Persönlichkeit in den 'Personality Tests,'" *ZfS VI*, 3, 1937).

77.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 15.

78. *Ibid.*, p. 18.

79.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two scales, see Marie Jahoda, Morton Deutsch, and Stuart W. Cook,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Relations*, vol. 1 (New York, 1951), pp. 190 - 197.

80. *Ibid.*, p. 196.

81.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vol. I, chap. 7.

82. *Ibid.*, p. 228.

83. Herbert H. Hyman and Paul B. Sheatsley,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84. Lazarsfeld, "Problems in Methodology," in *Sociology Today*, ed. Robert K. Merton, Leonard Broom, Leonard S. Cottrell, Jr. (New York, 1959), p. 50.

85. Brown, *Social Psychology*, p. 523.

86. *Ibid.*, p. 515.

87. *Ibid.*, p. 506.

88. Hyman and Sheatsley,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 65.

89. Paul Kecskemeti, "The Study of Man: Prejudice in the Catastrophic Perspective," *Commentary* II, 3 (March, 1951).

90. Part of it was published as Else Frenkel - Brunswik, "A Study of Prejudice in Children," *Human Relations* I, 3 (1948). One of the conclusions of the project modified the findings of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as Adorno was to admit in "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p. 364. The results of Mrs. Frenkel - Brunswik's work, he wrote, "refined the conception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nventionality and the authoritarian temperament. It emerged that precisely the 'good,' i. e., conventional, children are freer from aggression and therefore from one of the fundamental aspects of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and vice versa." This would seem to indicate empirical confirmation of Bettelheim and Janowitz's argument more than that of the Berkeley group, at least if adult behavioral patterns are understood in the same way as children's.

91.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 359.

92. Bramso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Sociology*, p. 137.

93.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p. 759f.

94. Fromm himself had abandoned the sexu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ado-masochistic character, which he had used in the *Studien* for a more "existential" approach. See above, Chapter 3, p. 99.

95.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 759.

96. *Ibid.*, p. 760.

97. Horkheimer,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Family Today," *The Family: Its Function and Destiny*, ed. Ruth Nanda Anshen (New York, 1949).

98. *Ibid.*, p. 376.

99.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 371.

346

100. Ralf Dahrendorf,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London, 1968), p. 371; and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Cleveland,

1963), p. 97.

101. Edward Shils, "Authoritarianism: 'Right' and 'Left,'" in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Bramson repeats this criticism i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Sociology*, pp. 122f.

102. Kecskemeti, "The Study of Man: Prejudice in the Catastrophic Perspective," p. 290.

103. Bettelheim and Janowitz, *Social Change and Prejudice*, p. 75.

104.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 676.

105. *Ibid.*, p. 976

106. *Ibid.*, p. 182. The notion of "pseudo - conservatism" was picked up by other scholars in the 1950' s . See, for example, Richard Hofstadter, "The Pseudo - Conservative Revolt," in *the Radical Right*, ed. Daniel Bell (New York, 1963).

107.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 176.

108. *Ibid.*, p. 771.

109. Interview with Adorno, Frankfurt, March 7, 1969.

110. M. Rokeach, *The Open and Closed Mind* (New York, 1960). Rokeach tried to develop a "Dogmatism (D) Scale" to measure leftist authoritarianism. On the basis of this and other studies, Seymour Martin Lipset argued that authoritarianism and neurosis might well be inversely related in the working class; Lipset, *Political Man* (New York, 1960), p. 96.

111. Adorno, "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p. 361.

112. J. F. Brown' s review of the *Studies in Prejudice* i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CCVXX (July, 1950), p. 178.

113. For a summary of the earlier efforts see Richard Christie, "Authoritarianism Reexamined," in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For later additions see Roger Brown's bibliography in *Social Psychology*.

114. Friedrich Pollock, ed., *Gruppenexperiment: Ein Studienbericht* (Frankfurt, 1955). This was published as vol. II in the Institut's *Frankfurter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ed. T. W. Adorno and Walter Dirks.

115. Adorno, "Zur gegenwärtigen Stellung der empirischen Sozial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Empirische Sozialforschung* (Frankfurt, 1952), p. 31.

116. See, for example, Adorno's article, "Contemporary German Sociology," *Transactions of the Four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vol. I (London, 1959).

117. For a cross-section of the views expressed by participants in the debate, see Ernst Topitsch, ed.,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Cologne and Berlin, 1965). Adorno's contributions have been posthumously collected in *Aufsätze zur Gesellschaftstheorie und Methodologie* (Frankfurt, 1970). A summary of the recent literature in English appeared in "Dialectical Methodology: Marx or Weber,"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London, March 12, 1970) published anonymously but actually written by George Lichtheim.

8. TOWARD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E CRITIQUE OF THE ENLIGHTENMENT

1. So Adorno reported to Benjamin by letter on November 10, 1939; Theodor W. Adorno, *Über Walter Benjamin* (Frankfurt, 1970), p. 143.

2.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Amsterdam, 1947). The house was Querido.

3. I have been able to locate two reviews in professional journals: J. D. Mabbott in *Philosophy*, XXIII, 87 (October, 1948), which was generally favorable, and John R. Everett in *Journal of Philosophy*, XLV, 22 (October 21, 1948), which was less enthusiastic. Lowenthal told me during one of our interviews that the sales of the book were disappointing.

4. Horkheimer, *Kritik d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trans. Alfred Schmidt (Frankfurt, 1967).

5. Göran Therborn's assertion to the contrary seems to me clearly erroneous. See his "Frankfurt Marxism: A Critique," *New Left Review*, 63 (September - October, 1970), p. 76, where he writes that the nonmastery of nature "was not present in Frankfurt thinking from the start. Moreover, it is shared by their archenemy, Heidegger."

6. Adorno, *Kierkegaard: Konstruktion des Aesthetischen*, rev. ed. (Frankfurt, 1964), p. 46.

7. In an early essay on *der Freischütz*, Adorno said that salvation (*Rettung*) could be found only in reconciled nature; see his *Moments Musicaux* (Frankfurt, 1964), p. 46.

8. Horkheimer [Heinrich Regius], *Dämmerung* (Zürich, 1934), pp. 185f. on animals, and p. 181 on the work ethic. In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Horkheimer and Adorno included a long aphorism on "Mensch und Tier," pp. 295f.

9. Leo Lowenthal, *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 (Boston, 1957), p. 197.

10. Erich Fromm, "Die sozialpsychologische Bedeutung der Mutterrechtstheorie," *ZfS* III, 2 (1934), p. 206. Here Fromm cited Bachofen as saying that the victory of patriarchal society corresponded to the break between spirit and nature, the triumph of Rome over the Orient.

11. Horkheimer, *Die Anfänge der bürgerlichen Geschichtsphilosophie* (Stuttgart, 1930).

12. Horkheimer, "Vernunft und Selbsterhaltung," in "Walter Benjamin zum Gedächtnis" (unpub., 1942), p. 43 (Friedrich Pollock collection, Montagnola).

13. Only on rare occasions did the Institut attempt to relate a thinker's work to his life. One example was Adorno's discussion of Kierkegaard's role as a *rentier* in *Kierkegaard: Konstruktion des Aesthetischen*, p. 88.

14. Letter from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May 23, 1942 (Lowenthal collection).

15.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1947), p. 104.

16. Therborn has made the astute observation that whereas Lukács stressed reification as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capitalism, and others such as the early Marcuse emphasized alienation (Fromm could also be included here), Horkheimer and Adorno regarded the exchange principle as its essence. See his "Frankfurt Marxism: A Critique," p. 79.

17. Friedrich Nietzsche, *Genealogy of Morals*, trans. Francis Golffing (New York, 1956), p. 202.

18. Much later, one of the younger member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extended this argument considerably; see Albrecht Wellmer,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New York, 1971).

19. This phrase is used by Hannah Arendt in her critique of Marx in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1958). She draws a distinction between man as *animal laborans* and as *homo faber* (man the maker), which the Frankfurt School did not make.

20. This was the phrase that Adorno used during our interview on March 15, 1969, in Frankfurt.

21. In 1913 - 1914, Lukács had been part of Weber's circle in Heidelberg. For a discussion of his relationship with Weber, see George Lichtheim, *George Lukács* (New York, 1970), *passim*. 348

22. Horkheimer, "Vernunft und Selbsterhaltung," p. 33.

23. *Ibid.*, p. 34.

24.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p. 174.

25. Horkheimer and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 41.

26. *Ibid.*, p. 35.

27. Marcuse, *Negations*, trans.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1968).

28. See his article "Über Sprache überhaupt und über die Sprache des Menschen," in Walter Benjamin, *Schriften*, ed. Theodor W. Adorno and Gershom Scholem, vol. II (Frankfurt, 1955). Discussions of his theory of language can be found in Hans Heinz Holz, "Philosophie als Interpretation," *Alternative*,

56/57 (October - December, 1967), and Anon., "Walter Benjamin: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London, August 23, 1968).

29. Benjam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lluminations*, 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annah Arendt,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1968), p. 80.

30. *Ibid.*, p. 77.

31. Jürgen Habermas made this point to me in an interview in Frankfurt, March 7, 1969.

32. Anon., "Walter Benjamin: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Language," uses this phrase to describe Benjamin. In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Benjamin wrote that the transparency of pure language might be approached. "above all, by a literal rendering of the syntax which proves words rather than sentences to be the primary element of the translator" (p. 79).

33. See the letter from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quoted on page 233, Chapter 7, above.

34. *Eclipse of Reason*, p. 179.

35. *Ibid.*, p. 180.

36. *Ibid.*, p. 183.

37. Walter Benjamin, *Briefe*, ed. Theodor W. Adorno and Gershom Scholem (Frankfurt, 1966), vol. II, p. 786.

38.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 195.

39. Herbert Marcuse has an extensive discussion of the "closing of the Universe of Discourse" in *One - Dimensional Man* (Boston, 1964), pp. 85f.

40.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 71. In *Eros and Civilization*, Marcuse wrote that "the predominant culture - hero is the trickster and (suffering) rebel against the gods, who creates culture at the price of perpetual pain" (p. 146). He used Prometheus rather than Odysseus as its prototype.

41.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p. 76f.

42. *Ibid.*, p. 117 - 118.

43. This point was developed in the aphorism on "Mensch und Tier" *ibid.*, pp. 297f.

44.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 218. Horkheimer discussed this point at greater length in *Eclipse of Reason*, pp. 121f.

45. Alfred Schmidt has tri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Adorno as a "real humanist" and other conventional humanists. The term "real humanist" first appeared in Marx's *The Holy Family* in 1845 in opposition to the abstract, ahistorical humanism of Feuerbach. Adorno himself liked to be called an "antihumanist," not only for the reason Schmidt cites - his dislike of the positive connotations of any static definition of human nature - but also because of his fear that anthropocentricity would mean the concomitant denigration of nature. For Schmidt's argument, see his "Adorno - ein Philosoph des realen Humanismus," *Neue Rundschau*, LXXX, 4 (1969). See also my article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que of Marxist Humanism," *Social Research* XXXIX, 2 (Summer, 1972). 349

46.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p. 267.

47. *Eclipse of Reason*, p. 184.

48.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critical literature on Bloch which stresses this point. For one example, see Jurgen Habermas, "Ernst Bloch - A Marxist Romantic," in *The Legacy of the German Refugee Intellectuals*, *Salmagundi*, 10/11 (Fall, 1969 - Winter, 1970).

49.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p. 223.

50. *Ibid.*, p. 305.

51. In *Eros and Civilization* Marcuse wrote that "the restoration of remembrance to its rights, as a vehicle of liberation, is one of the noblest tasks of thought. In this function, remembrance (*Erinnerung*) appears at the conclusion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the Spirit*; in this function, it appears in Freud's theory" (p. 212). In Marcuse's work, the importance of "re-membering" what has been split asunder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dentity theory he never fully abandoned. Habermas has also stressed the liberating function of memory in his

l'imitation (Paris, 1890).

62. Sigmund Freud,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trans.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1960), p. 27.

63. "Research Project on Anti - Semitism," *SPSS IX*, 1 (1941), p. 350-139.

64.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p. 115.

65. *Ibid.*, p. 116.

66. Leo Lowenthal and Norbert Guterman, in *Prophets of Deceit* (New York, 1949), mentioned the frequency with which anti - Semitic agitators mimic Jews (p. 79).

67. April 24, 1945 (Lowenthal collection).

68. *Eclipse of Reason*, p. 179.

69. *Ibid.*, pp. 105 - 107.

70. *Ibid.*, p. 122.

71. See, for example, Marcuse,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trans.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1968), pp. 32, 47.

72. Interview with Habermas, Frankfurt, March, 1969.

73. Fritz Ringer,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Cambridge, Mass., 1969).

74. Max Scheler, *Die Wissensformen und die Gesellschaft* (Leipzig, 1926), pp. 234 - 235.

75. The most extensive recent defenses of this position can be found in Rolf Ahlers, "Is Technology Intrinsically Repressive?," *Continuum VIII*, 1/2 (Spring - Summer, 1970), and Paul Piccone and Alexander Delfini, "Marcuse's Heideggerian Marxism," *Telos 6* (Fall, 1970).

76. The essay is reprinted in Michael Oakeshott,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1962). Oakeshott equated rationalism with its instrumental variant, and was thus able to write: "This assimilation of politics to engineering is, indeed, what may be called the myth of rationalist politics" (p. 4).

77. *Eclipse of Reason*, p. 122 - 123.
78. *Ibid.*, p. 125.
79. *Ibid.*, p. 123. The book contained an extensive critique of the work of Sidney Hook and John Dewey.
80. Benjamin, "Eduard Fuchs, der Sammler und der Historiker," *ZfS* VI, 2 (1937), p. 364.
81. *Eclipse of Reason*, p. 127.
82. *Ibid.*, p. 87.
83. *Ibid.*, p. 90.
84. Horkheimer, "Bemerkungen zu Jaspers 'Nietzsche,'" *ZfS* VI, 2 (1937). In a letter to Lowenthal on May 2, 1946, he made other disparaging remarks about Jaspers (Lowenthal collection).
85. Marcuse, *Negations*, p. 41.
86. *Ibid.*, pp. 31 - 42.
87. Letter from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August 19, 1946 (Lowenthal collection).
88. Marcuse, "Existentialism: Remarks on Jean - Paul Sartre's *L'Être et le néant*,"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III, 3 (March, 1948).
89. Sartre was to repudiate much of *Being and Nothingness* in his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Paris, 1960). Marcuse's appraisal of this work was far more favorable; see his added paragraph to the German version of his essay on *Being and Nothingness* in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vol. II (Frankfurt, 1965), pp. 83 - 84.
90. Marcuse, "Existentialism," p. 322.
91. *Ibid.*, pp. 323.
92. For a later discussion of the existentialists' alienation from nature, see Albert William Levi,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Consciousness*, ed. John Weiss (Detroit, 1965), pp. 57f.
93. Paul Robinson, *The Freudian Left* (New York, 1969), pp. 192f. 351
94. Marcuse, "The Affirmative Character of Culture," *Negations*, p. 116.

95. *Ibid.*

96. This occurred not in *Being and Nothingness*, but in a separate article entitled "Materialisme et révolution," *Les Temps modernes* I, 1 and 1, 2 (1946). In the article, Sartre tried to reject the materialist premises of Marxism, but still be a revolutionary.

97.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pp. 40f.

98.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p. 280 - 281.

99. Benjamin, *Briefe*, vol. II, pp. 681 - 682.

100. More orthodox Marxist critic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lways pointed to the continuation of contradictions under capitalism. See for example, Paul Mattick, "The Limits of Integration," in *The Critical Spirit: Essays in Honor of Herbert Marcuse*, ed. Kurt H. Wolff and Barrington Moore, Jr. (Boston, 1967).

101. *Eclipse of Reason*, p. 186.

102. Adorno, *Minima Moralia*, p. 10.

103. *Ibid.*, p. 13.

104. *Ibid.*, p. 80. In the same spirit, he wrote, "the task of art today is to bring chaos into order" (p. 428).

105. Adorno, "Reflexionen," *Aufklärung* IV, 1 (June, 1951), p. 86.

106. *Minima Moralia*, p. 7.

107. *Ibid.*, p. 80.

108. *Ibid.*, p. 480.

109. *Ibid.*, p. 481.

110. Benjamin, *Illuminations*, p. 256.

111.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 1966).

112. Horkheimer, "Schopenhauer Today," in *The Critical Spirit*, p. 70.

113. Letter from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December 2, 1943 (Lowenthal collection).

114. A recent student of utopias and of Rousseau, Judith N. Shklar, has made this point in *Men and Citizens: A Study of Rousseau's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1969), p. 2.

115. Quoted in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April 26–27, 1969), p. 10.

116.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p. 13.

117. Adorno's recent critics have discussed this theme at length. See, for example, Manfred Clemenz, "Theorie als Praxis?," *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 XIII, 2 (1968).

EPILOGUE

1. Letter from Leo Lowenthal to Max Horkheimer, May 12, 1946 (Lowenthal collection).

2. The first contact was made in letters to Felix Weil and Friedrich Pollock, so Lowenthal reported in a letter to Horkheimer on October 19, 1946 (Lowenthal collection).

3. Letter from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April 12, 1947 (Lowenthal collection).

4. In a letter to Paul Lazarsfeld written on August 4, 1947, Horkheimer mentioned possibilit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and Occidental College. (Lowenthal collection.)

5. Interview with Horkheimer, Montagnola, Switzerland, March 12, 1969.

6. Letter from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February 18, 1950 (Lowenthal collection) 352

7. Letter from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April 8, 1950 (Lowenthal collection).

8. Conversation with Everett Hughes, Cambridge, Mass., July 21, 1971.

9. In his first letter to me on November 22, 1968, Horkheimer wrote of Butler's "great kindness and understanding," adding, "I met him the first time a few weeks after my arrival in New York and I shall never forget what we owe to him."

10. This was a phrase Pollock used during a conversation in Lugano, March,

ume V,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Frankfurt, 1971).

25. For one treatment of this question, see Paul Breines, "Marcuse and the New Left in America," *Antworten auf Herbert Marcuse*, ed. Jürgen Habermas (Frankfurt, 1968). I have attempted a more extensive analysis of the post-1950 influence of the Institut in America in "The Frankfurt School in Exile,"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VI (Cambridge, 1972).

26. The Horkheimer scrapbooks contain many articles about his appearances in the mass media.

27. Letter from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February 2, 1943 (Lowenthal collection).

28. Adorno, *Prisms*, trans.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London, 1967), p. 166.

29. See, for example, Claus Grossner, "Frankfurter Schule am Ende," *Die Zeit* (Hamburg, May 12, 1970), p. 5.

30. In 1966 Horkheimer expressed alarm ab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threat by saying that Kaiser Wilhelm II's warning about "the menace of the yellow race should be taken very seriously today"; "On the Concept of Freedom," *Diogenes*, 53 (Paris, 1966). In the following year, he appeared at a celebration of German - American Friendship Week on the Römerplatz in Frankfurt, which prompted anti-Vietnam War students to shout "*Horkheimer Raus*" in an effort to persuade him to dissociate himself from American policy. They failed.

31. Edward Shils, "Tradition, Ecology, and Institution in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 *Daedalus* LXXXIX, 4 (Fall, 1970).

32. Interview with Marcuse, Cambridge, Mass., June 18, 1968.

33. The term is used by Lazarsfeld. See his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Research: A Memoir," i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 - 1960*, ed.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Cambridge, Mass., 1969), p. 286.

34. Conversation with Lazarsfeld, New York, N. Y., January 3, 1971.

35. Interview with Pollock, Montagnola, Switzerland, March 14, 1969.

36. Interview with Paul Massing, New York, N. Y., November 25, 1970.

37. On November 12, 1943, Lowenthal wrote to Horkheimer that "if you look up in the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you will find that this [George Herbert] Mead apparently was a philosopher and sociologist with genuine problems." This, however, is the only mention of Mead in the Institut's writings I've been able to find. Location: Lowenthal collection.

38. Letter from Horkheimer to Lowenthal, July 17, 1946 (Lowenthal collection). Part of this quotation reappears in Horkheimer,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1970), p. 160.

39. Hans Mommsen,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n Transition: The Situation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Daedalus*, C, 2 (Spring, 1971), p. 498.

40. Adorno, *Prisms*, p. 48.

41. Horkheimer, "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 *ZfSVI*, 2 (1937), p. 269.

42. Walter Benjam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Mass und Wert* I, 5 (May - June, 1938), p. 820.

43. Adorno noted this in one of his essays on Benjamin: "The predominance of spirit extremely alienated his psychical and even psychological existence. . . . He considered animal warmth taboo; a friend could scarcely dare to lay a hand on his shoulder."; *Über Walter Benjamin* (Frankfurt, 1970), p. 50.

44. Fritz Ringer,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Cambridge, Mass., 1969).

45. Carl Grünberg, "Festrede gehalten zur Einweihung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and der Universität Frankfurt a. M. am 22 Juni 1924," *Frankfurter Universitätsreden*, XX (Frankfurt, 1924), p. 4.

46. Ringer,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p. 5.

47. *Ibid.*, p. 106.

48. *Ibid.*, p. 90.

49. "I have encountered only one favorable comment upon Freud's work in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of this period, and that was written by the radical critic Ernst von Aster," Ringer wrote (*ibid.*, p. 383).

50. Adorno, *Prisms*, p. 22.

51.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the Frankfurt School denied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class struggle entirely. "Society remains class struggle, today just as in the period when that concept originated," Adorno later wrote; "Society," *The Legacy of the German Refugee Intellectuals*, *Salmagundi* 10/11 (Fall, 1969 – Winter, 1970), p. 149. It was, however, no longer the focal point of their analysis.

52. See, for example, Hans Heinz Holz, *Utopie und Anarchismus: Zur Kritik der kritischen Theorie Herbert Marcuses* (Cologne, 1968), pp. *oof.*

53. This comment is mentioned in one of the clippings in Horkheimer's 354
scrapbooks.

54. Quoted in a letter from Weil to me, January 31, 1971.

55. Harold Poot, *Kurt Tucholsky and the Ordeal of Germany, 1914 – 1935* (New York, 1968), p. 137.

56. This was the figure Pollock mentioned during one of our conversations in Montagnola in March, 1969.

57. Adorno, *Minima Moralia* (Frankfurt, 1951), p. 98.

58. Göran Therborn has written that "understandably, fascism became a Medusa's head for the Frankfurt School.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initial attitude of revulsion was *frozen*, instead of developing into a scientific analysis and participation in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practice"; "Frankfurt Marxism: A Critique," *New Left Review*, 63 (September – October, 1970), p. 94. His criticism was made from the left, but liberals also have pointed to the Institut's obsession with fascism. See for example, Leon Bramso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Sociology* (Princeton, 1961), p. 129, and David Riesman,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and Other Essays (Glencoe, Ill., 1954), p. 477.

59. Martin Jay, review of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d.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and *The Bauhaus*, by Hans Wingler, in *Commentary*, XXXIX, 3 (March, 1970).

60. Horkheimer [Heinrich Regius], *Dämmerung* (Zurich, 1934), p. 216.

61. Marcuse indicated this during our interview in Cambridge, Mass. on June 18m, 1968.

62. Adorno, *Prisms*, p. 34.

文 献

The following abbreviations are used:

*Grünbergs Archiv: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SPSS: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ZfS: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PUBLICATIONS OF THE INSTITUT

The Institut was associated with or published the following journals: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vols. I - XV (1910 - 1930).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vols. I - VIII, 2 (1932 - 1939).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vol. VIII, 3 - IX, 3 (1939 -
1941).

Individual Beihefte of Grünbergs Archiv are listed below next to their au-
thors' names.

The collective works of the Institut included the following:

Stü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aris, 1936).

"Anti - Semitism within American Labor: A Report to the Jewish Labor
Committee." 4 vols. Unpublished, 1945; in Pollock's collection.

Anti - Semitism and Emotional Disorder : A 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1950).

THEODOR W. ADORNO

At this writing, Adorno's *Gesammelte Schriften* are being collected by the Suhrkamp Verlag. Volume VII, *Ästhetische Theorie*, (Frankfurt, 1970), and Volume V, *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Frankfurt, 1971), have already appeared. (The earlier version of *Zur Metakritik* [Stuttgart, 1956], has been quoted in the text). Specific works consulted:

Alban Berg: Der Meister des kleinsten Übergangs (Vienna, 1968).

"*Auf die Frage: Was ist deutsch,*" *Stichworte: Kritische Modelle 2* (Frankfurt, 1969).

Aufsätze zur Gesellschaftstheorie und Methodologie (Frankfurt, 1970).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with Else Frenkel - Brunswik, Daniel J. Levinson, and R. Nevitt Sanford (New York, 1950).

"Der Begriff der Unbewussten in der Transzendentalen Seelenlehre." Unpublished, 1927; in University of Frankfurt library.

"Contemporary German Sociology," *Transactions of the Four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Vol. I (London, 1959).

"Currents of Music: Elements of a Radio Theory." Unpublished, 1939; in Lazars - feld's collection.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with Max Horkheimer (Amsterdam, 1947).

Dissonanzen: Musik in der verwalteten Welt (Frankfurt, 1956).

"Erpresste Versöhnung," *Noten zur Literatur II* (Frankfurt, 1961).

"Fragmente über Wagner," *ZfS VIII*, 1/2 (1939).

"Freudian Theory and the Pattern of Fascist Propaganda," in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d. Geza Roheim (New York, 1951).

Der getreue Korrepetitor (Frankfurt, 1963).

"How to Look at Television," with Bernice T. Eiduson. Paper read at Hacker Foundation, Los Angeles, April 13, 1953; in Lowenthal's collection.

"Husserl and the Problem of Idealism," *Journal of Philosophy* XXVII, 1 (January 4, 1940).

Kierkegaard: Konstruktion des Aesthetischen (Tübingen, 1933), rev. 357 ed. (Frankfurt, 1966).

Minima Moralia; Reflexionen aus dem beschädigten Leben (Frankfurt, 1951).

Moments Musicaux (Frankfurt, 1964).

Negative Dialektik (Frankfurt, 1966).

Ohne Leitbild (Frankfurt, 1967).

"On Kierkegaard's Doctrine of Love," *SPSS* VIII, 3 (1939).

"On Popular Music," with the assistance of George Simpson, *SPSS* IX, 1 (1941).

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 (Frankfurt, 1949).

Prismen (Frankfurt, 1955); in English as *Prisms*, trans. Samuel and Shier-ry Weber (London, 1967).

"Reflexionen," *Aufklärung* IV, 1 (June, 1951).

"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i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ed.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Cambridge, Mass., 1969).

"A Social Critique of Radio Music," *Kenyon Review* VII, 2 (Spring, 1945).

"Social Science and Sociological Tendencies in Psychoanalysis." Unpublished, Los Angeles, April 27, 1946; in Lowenthal's collection.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New Left Review*, 46 (November-December, 1967) and 47 (January-February, 1968).

"The Stars Down to Earth: *The Los Angeles Times Astrology Column: A Study in Secondary Superstition*," *Jahrbuch für Amerikastudien*, vol. II (Heidelberg, 1957).

"Thesen zur Kunstsoziologie,"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XIX, 1 (March, 1967).

"Theses upon Art and Religion Today," *Kenyon Review* VII, 4 (Autum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Mass und Wert* I, 5 (May/June, 1938).

"Zum gegenwärtigen gesellschaftlichen Standort des französischen Schriftstellers," *ZfS* III, 1 (1934).

Zur Kritik der Gewalt und andere Aufsätze (Frankfurt, 1965).

BRUNO BETTELHEIM AND MORRIS JANOWITZ

Dynamics of Prejudice: A Psychological and Sociological Study of Veterans \ (New York, 1950).

Social Change and Prejudice (New York, 1964).

FRANZ BORKENAU

Der Übergang vom feudalen zum bürgerlichen Weltbild (Paris, 1934).

"Zur Soziologie des mechanistischen Weltbildes," *ZfS* 1, 3 (1932).

ERICH FROMM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My Encounter with Marx and Freud (New York, 1932).

"A Counter-Reply," *Dissent* III, 1 (Winter, 1956).

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1970).

The Dogma of Christ, and Other Essays on Religion, Psychology, and Culture (New York, 1963).

Fear of Freedom (London, 1942). (English version of *Escape from Freedom*.)

"Die gesellschaftliche Bedingtheit der psychoanalytischen Therapie," *ZfS* IV, 3 (1935).

The Heart of Man (New York, 1964).

"The Human Implications of Instinctive 'Radicalism'," *Dissent* II, 4 (Autumn, 1955).

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New York, 1936).

Man for Himself (New York, 1947).

"Die psychoanalytische Charakterologie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Sozialpsychologie," ZfS 1, 3 (1932).

"Der Sabbath," *Imago* XIII, 2, 3, 4 (1927).

The Sane Society (New York, 1955).

Social Character in a Mexican Village, with Michael Maccoby (Englewood Cliffs, N. J., 1970).

"Die sozialpsychologische Bedeutung der Mutterrechtstheorie," ZfS III, 2 (1934).

"Sozialpsychologischer Teil," in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aris, 1936).

"Über Methode und Aufgabe einer analytischen Sozialpsychologie," ZfS I, 1/2 (1932).

Sigmund Freud's Mission (New York, 1963).

Zen Buddhism and Psychoanalysis with D. T. Suzuki and R. de Martino (New York, 1960.)

"Zum Gefühl der Ohnmacht," ZfS VI, 1 (1937).

HENRYK GROSSMANN

Da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Leipzig, 1929).

"Die gesellschaftlichen Grundlagen der mechanistischen Philosophie und die Manufaktur," ZfS IV, 2 (1935). 359

Marx, die klassische Nationalökonomie und das Problem der Dynamik, afterword by Paul Mattick (Frankfurt, 1969)

"Die Wert-Preis-Transformation bei Marx und das Krisisproblem," ZfS I, 1/2 (1932).

CARL GRÜNBERG

"Festrede gehalten zur Einweihung d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an der Universität Frankfurt a. M. am 22 Juni 1924," *Frankfurter Universitätsreden*, vol.

XX (Frankfurt, 1924).

JULIAN GUMPERZ

"Zur Soziologie des amerikanischen Parteiensystems," *ZfS* I, 3 (1932).

"Recent Social Trends," *ZfS* II, 1 (1933).

ARCADIUS R. L. GURLAND

"Die Dialektik der Geschichte und die Geschichtsauffassung Karl Kautskys," *Klassenkampf* (Berlin, September 1, 1929).

The Fate of Small Business in Nazi Germany, with Franz Neumann and Otto Kirchheimer (Washington, D. C., 1943).

"Die K. P. D. und die rechte Gefahr," *Klassenkampf* (Berlin, December 1, 1928).

"Technological Trends and Economic Structure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SPPS* IX, 2 (1941).

MAX HORKHEIMER

Most of Horkheimer's essays in the *ZfS* are collected in *Kiritische Theorie*, 2 Vol., ed. Alfred Schmidt (Frankfurt, 1968). Other works and individual *Zeitschrift* essays:

"Allgemeiner Teil,"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aris, 1936).

Anfänge der bürgerlichen Geschichtsphilosophie (Stuttgart, 1930).

"Art and Mass Culture," *SPPS* IX, 2 (1941).

"Auf das Andere Hoffen," Interview in *Der Spiegel* (January 5, 1970).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Family Today," in *The Family: Its Function and Destiny*, ed. Ruth Nanda Anshen (New York, 1949).

"Autoritärer Staat," in "Walter Benjamin zum Gedächtnis." Unpublished 1942; in Pollock's collection.

"Bemerkungen über Wissenschaft und Krise," *ZfS* I, 1/2 (1932).

- "Bemerkungen zu Jaspers 'Nietzsche,'" ZfS VI, 2 (1937).
- "Bemerkungen zur philosophischen Anthropologie," ZfS IV, 1 (1935).
- Dämmerung*, written under the pseudonym "Heinrich Regius," (Zurich, 1934).
-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with Theodor W. Adorno (Amsterdam, 1947).
- Eclipse of Reason* (New York, 1947.)
- Egoismus und Freiheitsbewegung," ZfS V, 2 (1936).
-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r Sozialphilosophie und die Aufgaben eines Instituts für Sozialforschung," *Frankfurter Universitätsreden*, vol. XXVII (Frankfurt, 1931).
- "Geschichte und Psychologie," ZfS I, 1/2 (1932).
- "Hegel und die Metaphysik," *Festschrift für Carl Grünberg: zum 70. Geburtstag* (Leipzig, 1932).
- "Die Juden und Europa," ZfS VIII, 1/2 (1939).
- Kants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als Bindeglied zwischen theoretischer und praktischer Philosophie* (Stuttgart, 1925).
- "The Lessons of Fascism," in *Tensions That Cause Wars*, ed. Hadley Cantril (Urbana, Ill., 1950).
- "Materialismus und Metaphysik," ZfS II, 1 (1933).
- "Materialismus und Moral," ZfS II, 2 (1933).
- "Montaigne und die Funktion der Skepsis," ZfS VII, 1 (1938).
- "Ein neuer Ideologiebegriff?," *Grünbergs Archiv* XV, 1 (1930).
- "Der neueste Angriff auf die Metaphysik," ZfS VI, 1 (1937).
- "Notes on Institute Activities," SPSS IX, 1 (1941).
- "On the Concept of Freedom," *Diogenes* 53 (Paris, 1966).
- "Die Philosophie der absoluten Konzentration," ZfS VII, 3 (1938).
- "Philosophie und kritische Theorie," ZfS VI, 3 (1937).
- Preface, SPSS IX, 2 (1941).
- "The Relation between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in the Work of Wilhelm Dilthey," SPSS IX, 3 (1939).
- "Schopenhauer Today," *The Critical Spirit: Essays in Honor of Herbert Marcuse*, ed. Kurt H. Wolff and Barrington Moore, Jr. (Boston, 1967).

ERNST KRENEK

"Bemerkungen zur Rundfunkmusik," *ZfS* VII, 1/2 (1938).

OLGA LANG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New Haven, 1946).

PAUL LAZARSFELD

"An Episode in the History of Social Research: A Memoir," i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ed.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Cambridge, Mass., 1969).

"Problems in Methodology," in *Sociology Today*, ed. Robert K. Merton, Leonard Broom, and Leonard S. Cottrell, Jr. (New York, 1959).

"Remarks on Administrative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SPSS* IX, 1 (1941).

"Some Remarks on the Typological Procedures in Social Research," *ZfS* VI, 1 (1937).

LEO LOWENTHAL

"Die Auffassung Dostojewskis in Vorkriegsdeutschland," *ZfS* III, 3 (1934); an English version can be found in *The Arts in Society*, ed., Robert N. Wilson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4).

"Conrad Ferdinand Meyers hero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ZfS* II, 1 (1933).

"Dad Dämonische," in *Gabe Herrn Rabbiner Dr. Nobel zum 50. Geburtstag* (Frankfurt, 1921).

Erzählkunst und Gesellschaft: Die Gesellschaftsproblematik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19. Jahrhunderts, with an intro. by Frederic C. Tubach (Neuwied and Berlin, 1971).

"German Popular Biographies: Cultuer's Bargain Counter," in *The Critical*

Spirit: Essays in Honor of Herbert Marcuse, ed. Kurt H. Wolff and Barrington Moore, Jr. (Boston, 1967).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f Popular Culture," in *Mass Culture: The Popular Arts in America*, ed. Bernard Rosenberg and David Manning White (Glencoe, Ill. and London, 1957).

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 (Boston, 1957).

Literature,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1).

Prophets of Deceit, with Norbert Guterman (New York, 1949).

"Terror's Atomization of Man," *Commentary*, I, 3 (January, 1946).

"Zugtier und Sklaverei," *ZfS* II, 1 (1933).

"Zur gesellschaftlichen Lage der Literatur," *ZfS* I, 1/2 (1932).

RICHARD LOWENTHAL [PAUL SERING]

"Zu Marshals neuklassischer Ökonomie," *ZfS* VI, 3 (1937).

KURT MANDELBAUM

(Under the pseudonym Kurt Baumann), "Autarkie und Planwirtschaft," *ZfS* II, 1 (1933).

(Under the pseudonym Erich Baumann), "Keynes Revision der liberalis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ZfS* V3 (1936).

"Neuere Literatur über technologische Arbeitslosigkeit," *ZfS* V, 1 (1936). 362

"Zur Theorie der Planwirtschaft," with Gerhard Meyer, *ZfS* III, 2 (1934).

HERBERT MARCUSE

For a complete bibliography of Marcuse's works until 1967, see *The Critical Spirit: Essays in Honor of Herbert Marcuse*, ed. Kurt H. Wolff and Barrington Moore, Jr. (Boston, 1967) P. 427-433 Works consulted in this study:

- "Beiträge zu einer Phänomenolog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Philosophische Hefte I*, 1 (1928).
- "Der Einfluss der deutschen Emigranten auf das amerikanische Geistesleben: Philosophie und Soziologie," *Jahrbuch für Amerikastudien*, vol. X (Heidelberg, 1965).
- Eros and Civilization* (Boston, 1955).
- An Essay on Liberation* (Boston, 1969).
- "Existentialism: Remarks on Jean-Paul Sartre's L'Être et le néant,"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VIII, 3 (March, 1949).
- Five Lectures*, trans. Jeremy J. Shapiro and Shierry M. Weber (Boston, 1970).
- Hegels Ontologie und die Grundlegung einer Theorie der Geschichtlichkeit* (Frankfurt, 1932).
- "Ideengeschichtlicher Teil," in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aris, 1936).
- "An Introduction to Hegel's Philosophy," *SPSS* VIII, 3 (1939).
- "Der Kampf gegen den Liberalismus in der totalitären Staatsauffassung," *ZfS* III, 1 (1934).
- Kultur und Gesellschaft*, 2 vols. (Frankfurt, 1965).
-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trans.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1968).
- "Neue Quellen zur Grundlegung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Die Gesellschaft* IX 8 (August, 1932).
- "The Obsolescence of Marxism," in *Marx and the Western World*, ed. Nicholas Lobkowitz (Notre Dame, Indiana, 1967).
-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1964).
- "Philosophie und kritische Theorie," *ZfS* VI, 3 (1937).
- "Das Problem der geschichtlichen Wirklichkeit," *Die Gesellschaft* VII, 4 (April, 1931).

Psychoanalyse und Politik (Frankfurt, 1968)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rev. ed. (Boston, 1960).

"A Reply to Erich Fromm," *Dissent* III, 1 (Winter, 1956).

"*Repressive Tolerance*," *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 with Robert Paul Wolff and Barrington Moore, Jr. (Boston, 1965).

"Som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Modern Technology," *SPSS* IX, 3 (1941).

Soviet Marxism: A Critical Analysis (New York, 1958).

"Über den affirmativen Charakter der Kultur," *ZfS* VI, 1 (1937).

"Über die philosophischen Grundlagen des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sbegriff,"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LXIX, 3 (June, 1933).

"Zum Begriff des Wesens," *ZfS* V, 1 (1936).

"Zum Problem der Dialektik," *Die Gesellschaft* VLI, 1 (January, 1930).

"Zue Kritik des Hedonismus," *ZfS* VII, 1 (1938).

"Zur Wahrheitsproblematik der soziologischen Methode," *Die Gesellschaft* VI, 10 (October, 1929).

PAUL MASSING

363

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 (New York, 1949).

(Under the pseudonym Karl Billinger), *Schutzhaftling 880: Aus einem deutschen Konzentrationslager* (Paris, 1935); trans. as *Fatherland*, intro. by Lincoln Steffens (New York, 1935).

GERHARD MEYES

"Krisenpolitik und Planwirtschaft," *ZfS* IV, 3 (1935).

"Neue englische Literatur zur Planwirtschaft," *ZfS* II, 2 (1933).

"Neuere Literatur über Planwirtschaft," *ZfS* I, 3 (1932).

"Zur Theorie der Planwirtschaft" (with Kurt Mandelbaum), *ZfS*, III, 2 (1934).

FRANZ NEUMANN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 rev. ed. (New York, 1944).

The Democratic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Legal Theory, ed. with a preface by Herbert Marcuse (New York, 1957). Contains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The Fate of Small Business in Nazi Germany, with Arcadius R. L. Gurland and Otto Kirchheimer. (Washington, 1943).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Cultural Migration: The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 with Henri Peyre, Erwin Panofsky, Wolfgang Kohler, and Paul Tillich, intro. by W. Rexford Crawford (Philadelphia, 1953).

FRIEDRICH POLLOCK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Automation, trans. W. O. Henderson and W. H. Chalmer (Oxford, 1957).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s Kapitalismus und die Aussichten einer planwirtschaftlichen Neuordnung," *ZfS* I, 1/2 (1933).

Ed., *Gruppenexperiment; Ein Studienbericht; Frankfurter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vol. II (Frankfurt, 1955).

"Is National Socialism a New Order," *SPSS* IX, 3 (1941).

Die planwirtschaftlichen Versuche in der Sowjetunion, 1917-1927 (Leipzig, 1929).

Somebarts "Widerlegung" des Marxismus (Leipzig, 1926).

"Sozialismus und Landwirtschaft," in *Festschrift für Carl Grünberg: zum 70. Geburtstag* (Leipzig, 1932).

"State Capitalism: It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SPSS* IX, 2 (1941).

"Zu dem Aufsatz von Hannah Arendt über Walter Benjamin," *Merkur* XXII, 6 (1968).

ERNST SCHACHTEL

"Zum Begriff und zur Diagnose der Persönlichkeit in den 'Personality Tests',"
ZfS VI, 3 (1937).

ANDRIES STERNHEIM

"Zum Problem der dreizeitgestaltung," ZfS I, 3 (1932).

FELIX J. WEIL

364

The Argentine Riddle (New York, 1944).

"Neuere Literatur zum 'New Deal,'" ZfS V, 3 (1936).

"Neuere Literatur zur deutschen Wehrwirtschaft," ZfS VII, 1/2 (1938).

Sozialisierung: Versuch einer begrifflichen Grundlegung (Nebst einer Kritik der Sozialisierungspläne) (Berlin-Fichtenau, 1921).

KARL AUGUST WITTFOGEL

Das Erwachende China (Vienna, 1926).

"The Foundations and Stages of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ZfS IV, 1 (1935).

Geschicht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Vienna, 1924).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London, and New York, 1957).

Testimony in front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the Senate Judiciary Committee (August 7, 1951), 82nd Congress, 1951-1952, vol, III.

"Die Theorie der orientalischen Gesellschaft," ZfS VII, 1 (1938).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Leipzig, 1931).

Die Wissenschaft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Berlin, 1922).

WORKS DIRECTLY RELATING
TO THE INSTITUT OR ONE OF ITS MEMBERS

Arendt, Hannah, *Introduciton to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New York, 1968); reprinted in Hannah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as "Walter Benjamin: 1892 - 1940"* (New York, 1968).

Axelos, Kostas, "Adorno et l'école de Francfort," *Arguments*, III, 14 (1959).

Bernsdorf, Wilhelm, *Internationalen Soziologen Lexikon* (Stuttgart, 1956).

Bloch, Ernst, "Erinnerungen an Walter Benjamin," *Der Monat* XVIII, 216 (September, 1966).

Boehmer, Konrad, "Adorno, Musik, Gesellschaft," in *Die neue Linke nach Adorno*, ed. Wilfried F. Schoeller (Munich, 1969).

Braeuer, Walter, "Henryk Grossman als Nationalökonom," *Arbeit und Wissenschaft*, VIII (1954).

Bramson, Leo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Sociology* (Princeton, 1961)

Braunthal, Alfred, "Der Zusammenbruch der Zusammenbruchstheorie," *Die Gesellschaft* VI, 10 (October, 1929).

Brecht, Bertolt, *Gedichte* VI (Frankfurt, 1964).

Breines, Paul, ed., *Critical Interruptions; New Left Perspectives on Herbert Marcuse* (New York, 1970).

Brenner, Hildegaard, "Die Lesbarkeit der Bilder: Skizzen zum Passagenentwurf," *Alternative* 59/60 (April-June, 1968).

—, "Theodor W. Adorno als Sachwalter des Benjaminschen Werkes," in *Die neue Linke nach Adorno*, ed. Wilfried F. Schoeller (Munich, 1969).

Brown, Roger,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1965).

Christie, Richard, and Marie Jahoda,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Glencoe, Ill, 1954).

(October-December, 1967).

——, *Utopie und Anarchismus: Zur Kritik der Kritischen Theorie Herbert Marcuses* (Cologne, 1968).

Howard, Dick, and Karl Klare, ed. *The Unknown Dimension: European Marxism since Lenin* (New York and London, 1972). 366

Hughes, H. Stuart, "Franz Neumann between Marxism and Liberal Democracy," i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ed.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Cambridge, Mass., 1969).

Jameson, Fredric, "T. W. Adorno, or Historical Tropes," *Salmagundi* II, 1 (Spring, 1967).

——, "Walter Benjamin, or Nostalgia," *The Legacy of the German Refugee Intellectuals*, *Salmagundi*, 10/11 (Fall, 1969 - Winter, 1970).

Jay, Martin, "The Frankfurt School in Exile,"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VI (Cambridge, 1972).

——,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que of Marxist Humanism," *Social Research* XXXIX, 2 (Summer, 1972).

——, "The Metapolitics of Utopianism," *Dissent* XVII, 4 (July-August, 1970) reprinted in *The Revival of American Socialism*, ed. George Fischer et al. (New York, 1971).

——, "The Permanent Exile of Theodor W. Adorno," *Midstream* XV, 10 (December, 1969).

Kecskemeti, Paul, "The Study of Man: Prejudice in the Catastrophic Perspective," *Commentary* XI, 3 (March, 1951).

Kettler, David, "Dilemmas of Radicalism," *Dissent* IV, 4 (Autumn, 1957).

Kittsteiner, Heinz-Dieter, "Die 'geschichtsphilosophischen' Thesen," *Alternative* 56/57 (October-December, 1967).

Koestler, Arthur, *Arrow in the Blue* (New York, 1952).

——, *The Invisible Writing* (London, 1954).

König, René, "Soziologie der Familie," in *Handbuch der empirischen*

Sozialforschung, vol. II (Stuttgart, 1969).

——, "On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Research," in Transactions of the 4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vol. II (London, 1959).

Laplanche, Jean, "Notes sur Marcuse et la Psychoanalyse," La Nef 36 (January-March, 1969).

Lefebvre, Henri, "Eros et Logos," La Nef 36 (January-March, 1969).

Leibowitz, René, "Der Komponist Theodor W. Adorno," Zeugnisse: Theodor W. Adorno zum sechzigsten Geburtstag (Frankfurt, 1963).

Lethen, Helmut, "Zur materialistischen Kunsttheorie Benjamins," Alternative 56/57 (October-December, 1967).

Liberu, Alain de, "Le Critique de Hegel," La Nef 36 (January-March, 1969).

Lichtheim, George, "From Marx to Hegel: Reflections on Georg Lukács, T. W. Adorno, and Herbert Marcuse," Tri-Quarterly, 12 (Spring, 1968).

Lipshires, Sidney S., "Herbert Marcuse: From Marx to Freud and Beyond,"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1971.

Lück Helmut, "Anmerkungen zu Theodor W. Adornos Zusammenarbeit mit Hanns Eisler," Die neue Linke nach Adorno, ed. Wilfride F. Schoeller (Munich, 1969).

MacIntyre, Alasdair, Herbert Marcuse: An Exposition and a Polemic (New York, 1970).

——, "Herbert Marcuse," Survey 62 (January, 1967).

——, "Modern Society: An End to Revolt?" Dissent XII, 2 (Spring, 1965).

Mann, Thomas, The Story of a Novel: The Genesis of Doctor Faustus,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 1961).

——, Letters of Thomas Mann, 1889-1955, selected and trans.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intro. by Richard Winston (New York, 1971).

Marks, Robert W., The Meaning of Marcuse (New York, 1970).

Massing, Hede, *This Deception* (New York, 1951).

Mayer, Gustav, *Erinnerungen* (Zurich and Vienna, 1949).

Mayer, Hans, *Der Repräsentant und der Martyrer: Konstellationen der Literatur* (Frankfurt, 1971).

Müller-Stromsdorfer, Ilse, "Die ' helfende Kraft bestimmter Negation,'"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VIII, 2/3 (January, 1961).

Oppens, Kurt, et al., *Über Theodor W. Adorno* (Frankfurt, 1968).

Piccone, Paul, and Alexander Delfini, "Marcuse's Heideggerian Marxism," *Telos* VI (Fall, 1970).

Picht, Georg, "Atonale Philosophie, Theodor W. Adorno zum Gedächtnis," *Merkur* X, 13 (October, 1969).

Pross, Helge,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 - 1941*. (Berlin, 1955).

Radkau, Joachim, *Die deutsche Emigration in den USA: Ihr Einfluss auf die amerikanische Europapolitik, 1933-1945* (Düsseldorf, 1971).

Riesman, David, and Nathan Glazer, *Faces in the Crowd* (New Haven, 1952).

——,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and Other Essays* (Glencoe, Ill, 1954).

——, and Reuel Denney and Nathan Glazer, *The Lonely Crowd* (New Haven, 1950).

Robinson, Paul, *The Freudian Left* (New York, 1969).

Rosenberg, Bernard, and David Manning White, eds., *Mass Culture: The Popular Arts in America* (London, 1957).

Rusconi, Gian Enrico, *La Teoria Critica della Società* (Bologna, 1968)

Rychner, Max, "Erinnerungen an Walter Benjamin," *Der Monat* XVIII, 216 (September, 1966).

Schaar, John H., *Escape from Authority: The Perspectives of Erich Fromm* (New York, 1961).

Schmidt, Alfred, "Adorno - ein Philosoph des realen Humanismus," *Neue*

Rundschau LXXX, 4 (1969)

—, "Nachwort des Herausgebers: Zur Idee der kritischen Theorie," in *Kritische Theorie*, vol. II (Frankfurt, 1968).

—, Di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Geschichte und gegenwärtige Bedeutung (Munich, 1970).

Scholem, Gershom, "Erinnerungen an Walter Benjamin," *Der Monat* XVIII 216 (September 1966).

—, "Walter Benjamin,"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New York, 1965).

Sedgwick, Peter, "Natural Science and Human Theory," *The Socialist Register* (London, 1966).

Shils, Edward, "Daydreams and Nightmares: Reflections on the Criticism of Mass Culture," *Sewanee Review*, LXV, 4 (Autumn, 1957).

—, "Tradition, Ecology, and Institution in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 *Daedalus* LXXXIX, 4 (Fall, 1970).

Silbermann, Alphons, "Anmerkungen zur Musiksoziologie,"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XIX, 3 (September, 1967).

Stourzh, Gerald, "Die deutschsprachige Emigration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und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Jahrbuch für Amerikastudien* X (Heidelberg, 1965). 368

Sweezy, Paul, "Paul Alexander Beran: A Personal Memoir," *Monthly Review* XVI, II (March, 1965).

Szondi, Peter, "Hoffnung im Vergangenen," in *Zeugnisse: Theodor W. Adorno zum sechzigsten Geburtstag* (Frankfurt, 1963).

—, "Nachwort," *Städtebilder*, by Walter Benjamin (Frankfurt, 1963).

Therborn, Göran, "Frankfurt Marxism: A Critique," *New Left Review*, 63 (September-October, 1970).

"Theodor Adorno,"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London, September 28, 1967).

—, "Zur 'Beschlagnahme' Walter Benjamins, oder Wie Man mit der

Philologie Schlitten fährt," *Das Argument* X, 1/2 (March, 1968).

Trottman, Martin, *Zur Interpretation und Kritik der Zusammenbruchstheorie von Henryk Grossmann* (Zurich, 1956).

Usseld, Siegfried, "Zur Kritik an den Editionen Walter Benjamins," *Frankfurter Rundschau* (January, 1968).

"Walter Benjamin: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London, January 8, 1971).

Wellmer, Albrecht, *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 (New York, 1971).

Werckmeister, O. K., "Das Kunstwerk als Negation; Zur Kunsttheorie Theodor W. Adornos," *Die Neue Rundschau* LXXIII, 1 (1962).

"When Dogma Bites Dogma or The Difficult Marriage of Marx and Freud,"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London, January 8, 1971).

Wilden, Anthony, "Marcuse and the Freudian Model: Energy, Information, and Phantasie," *The Legacy of the German Refugee Intellectuals, Salmagundi*, 10/11 (Fall, 1969 Winter, 1970).

Wolff, Kurt H., and Barrington Moore, Jr., eds., *The Critical Spirit: Essays in Honor of Herbert Marcuse* (Boston, 1967).

OTHER WORKS

Althusser, Louis,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New York, 1969).

Arendt, Hannah,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Cleveland and New York, 1961).

—,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1958).

—,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Cleveland, 1958).

Aron, Raymond, *German Sociology* (Glencoe, Iii, 1964).

Avineri, Shlomo,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1968).

Berlin, Isaiah,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1969).

Bottomore, T. B., trans. and ed.,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New York, 1963).

Brown, Norman O., *Life Against Death* (New York, 1959).

Butler, E. M., *The Tyranny of Greece over Germany* (Cambridge, 1935).

Cornelius, Hans, "Leben und Lehre," in *Di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in Selbstdarstellungen*, ed. Raymund Schmidt, vol. II (Leipzig, 1923).

Deak, Istvan, *Wemar Germany's Left-Wing Intellectuals: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Weltbühne and Its Circl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8).

Dodge, Peter, *Beyond Marxism: The Faith and Works of Hendrik de Man* (The Hague, 1966).

Duggan, Stephen, and Betty Drury, *The Rescue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369
(New York, 1948).

Erikson, Erik,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1950).

Findlay, J. N., *Hegel: A Reexamination* (New York, 1958).

Friedemann, Adolf, "Heinrich Meng, Psychoanalysis and Mental Hygiene," *Psychoanalytic Pioneers*, ed. Franz Alexander, Samuel Eisenstein, and Martin Grotjahn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Goldmann, Lucien, "The Early Writings of George Lukács" *Tri-Quarterly*, 9 (Spring, 1967).

Grossman, Carl M., and Sylvia Grossman, *The Wild Analyst: The Life and Work of Georg Groddeck* (New York, 1965).

Hoggart, Richard, *The Uses of Literacy* (London, 1957).

Jahoda, Marie, Paul F. Lazarfeld, and Hans Zeisel, *Die Arbeitslosen von Marienthal* (Leipzig, 1932).

Jahoda, Marie, Morton Deutsch, and Stuart W. Cook,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Relations*, vol. 1 (New York, 1951).

Habermas, Jürgen,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trans.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1971).

——,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 1968).

——, *Theorie und Praxis* (Neuwied, 1963).

——,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trans.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 *The Historical Novel*, trans. Hannah and Stanley Mitchell (Boston, 1963).

——, *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 in Werke*, vol. IX (Neuwied, 1961).

Macdonald, Dwight, *Against the American Grain* (New York, 1962).

MacIver, Robert M. *As a Tale That Is Told* (Chicago, 1968).

Marcuse, Ludwig, *Mein zwanzigstes Jahrhundert* (Munich, 1960).

Maslow, Abraham H., "The Authoritarian Character Structure,"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XVIII, 2 (November, 1943). 371.

Mason, T. W., "The Primacy of Politics: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y," *The Nature of Fascism*, ed. S. J. Woolf (New York, 1968).

Maus, Heinz, "Bericht über die 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 1933 bis 1945,"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II, 1 (1959).

Merton, Robert,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rev. ed. (Glencoe, Ill., 1957).

Meyer, Gladys, *The Magic Circle* (New York, 1944).

Mitscherlich, Alexander, *Society without the Father*, trans. Eric Mosbacher (New York, 1970).

Negt, Oskar, ed. *Aktualität und Folgen der Philosophie Hegels* (Frankfurt, 1970).

Oakeshott, Michael,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1962).

Oberschall, Anthony,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 in Germany* (Paris and The Hague, 1965).

Parkinson, G. H. R., ed., *Georg Lukács: The Man, His Work, and His Ideas* (New York, 1970).

Popper, Karl,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1957).

Reich, Wilhelm, *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 (New York, 1946).

Rieff, Philip, *Freud: The Mind of the Moralizer* (New York, 1959).

——, ed., *On Intellectuals* (New York, 1970.)

Riemer, Svend, "Die Emigration der deutschen Soziologe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II, 1 (1959).

Ringer, Fritz,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Cambridge, Mass, 1969).

Rokeach, M., *The Open and Closed Mind* (New York, 1960).

Sanford, Nevitt, and H. S. Conrad, "Some Personality Correlates of Moral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XXXVIII, 1 (January, 1943).

Scheler, Max, *Die Wissensformen und die Gesellschaft* (Leipzig, 1926).

Schmidt, Alfred, *Der Begriff der Natur in der Lehre von Marx* (Frankfurt, 1962).

Schoenbaum, David, *Hitler's Social Revolution* (Garden City, N. Y., 1966).

Shklar, Judith N., *Men and Citizens: A Study of Rousseau's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1969).

Speier, Hans, "The Social Condi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Exile." *Social Order and the Risks of War: Paper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1952).

Steiner, George, *Language and Silence: Essays o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he Inhuman* (New York, 1967).

Werk und Wirken Paul Tillichs: Ein Gedenkbuch (Stuttgart, 1967).

Topitsch, Ernst,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Cologne and Berlin, 1965).

Turel, Adrien, *Bachofen Freud: Zur Emanzipation des Mannes vom Reich der Mutter* (Bern, 1939).

Weber, Max,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rans. A. M. Henderson and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1947).

Wolin, Sheldon, *Politics and Vision* (Boston, 1960).

Wurgast, Lewis D., "The Activist Movement: Cultural Politics on the German Left, 1914 - 1913," Ph. 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0.

索引

- Abel, Theodore, 220
 Abraham, Karl, 93
 Ackerman, Nathan W., 235 - 236
 Adenauer, Konrad, 287
 Adler, Max, 22, 28
 Adler, Mortimer, 212
 Adorno, Gretel, 305_n, 334_n, 335_n
 Adorno, Theodor Wiesengrund, 16, 20 - 24, 27, 29, 31, 34, 40 - 41, 52, 54, 56 - 57, 61, 65 - 66, 71, 75, 78 - 79, 82, 86, 89, 101, 109, 113, 119, 124, 129, 135, 140, 143, 145, 152, 155, 169, 172 - 175, 197 - 198, 201, 204, 214, 227, 235, 238 - 239, 246, 249 - 250, 256, 276, 283, 285 - 287, 290, 298, 345_n, 350_n; personal background, 21 - 23, 188, 196 - 197; on art, 177 - 179, 187 - 188, 190, 196, 215, 295, 308_n, 330_n; critique of Benjamin, 71, 180 - 181, 199, 201 - 203, 207 - 208, 210 - 211, 262, 337_n; *Dialectic of the Enlightenment*, 105, 140, 156 - 157, 196, 212 - 213, 215 - 217, 221, 230 - 232, 234, 248, 253 - 266, 272, 275; early musical education, 22, 182; on empirical research, 222 - 225, 228 - 230, 234, 239, 251; "On the Fetish Character of Music and the Regression of Hearing," 189 - 190, 211; on Freud and psychology, 87, 103 - 108, 227, 229 - 230, 340_n; and Hacker Foundation, 196, 286; relationship with Horkheimer, 23, 65 - 66, 172, 188, 196; on Husserl, 24, 56, 68 - 69, 74, 327_n; on jazz, 185 - 188, 190, 192, 215, 270,

331 - 332n; on Kafka, 176 - 177, 196; *Kierkegaard: Construction of the Aesthetic*, 24, 66 - 68, 175, 177, 207, 257, 273, 344n; relationship to Kracauer, 21 - 22, 66; language and style, 175, 207, 263, 266, 277, 283; on logic, 68 - 70; on Marcuse's *Hegel's Ontology*, 28 - 29; on Marx, 57; association with Lazarsfeld, 168190 - 193, 220, 222 - 223, 251 - 252; and Thomas Mann, 194 - 195; *Minima Moralia*, 52, 105, 196, 221, 254 - 256, 276 - 279, 291, 315n; critique of ontology, 70, 181, 278; analyses of music, 56, 182 - 188, 190 - 195, 210, 331n; *Philosophy of Modern Music*, 182, 183, 195 - 196; *Prisms*, 196, 308n, 310n, 329n; critique of radio, 191 - 193, 210; on Schonberg and Stravinsky, 175, 182 - 185, 187, 195 - 196, 208, 215; "The Stars Down to Earth," 196 - 197; on Veblen, 180 - 181; on Wagner, 135, 188, 193 - 195, 308n

alienation, 75, 89, 120, 124, 128, 186, 189, 209, 229, 266, 268, 314n

Allport, Gordon, 285

Althusser, Louis, 269, 346n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170, 221, 224, 234 - 236, 239, 248, 289

anarchism, 125, 147

Anderson, Eugene N., 169

Antigone, 126

Apollinaire, Guillaume, 336n

Aragon, Louis, 336n

Arendt, Hannah, 35, 65, 116, 157, 202, 334n, 344n

Aristotle, 4, 146

Aron, Betty, 239

Aron, Raymond, 37, 167, 285

Aster, Ernst von, 351n

Aufbau, 194, 224

Avenarius, Richard, 45

- Berg, Alban, 22 - 23, 183
- Bergson, Henri, 12, 30, 43, 48, 50 - 51, 53, 67, 208 - 209
- Berkeley Public Opinion Study Group, 239, 245, 248, 251, 296
- Bernfeld, Siegfried, 86, 88
- Bernstein, Eduard, 18, 79, 92, 273
- Bettelheim, Bruno, 235, 237, 248, 342n
- Beveridge, Sir William, 37
- Blanqui, Auguste, 206
- Bloch, Ernst, 44, 114, 185, 201, 268, 325n
- Blumer, Herbert, 217
- Borkenau, Franz, 13, 16, 17, 19 - 20, 38, 91, 290, 302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Feudal to the Bourgeois World View*, 16, 151
- Bouglé, Célestin, 30, 38, 115, 167
- Bouglé, Jeanne, 132
- Bourgeois culture, See Adorno, Benjamin, Critical Theory, Horkheimer, Marcuse
- Bramson, Leon, 245, 247
- Brandes, Georg, 136
- Brecht, Bertolt, 157, 194, 201 - 203, 211, 227, 337n; critique of 'Tui - intellectuals', 201 - 202, 335n
- Breton, André, 336n
- Briffault, Robert, 95
- Brill, Hans Klaus, 113
- Brinton, Crane, 169
- Brown, C. F., 239
- Brown, Norman O., 169, 314n, 318n
- Brown, Roger, 244
- Buber, Martin, 21, 33, 89, 200
- Burckhardt, Jacob, 137
- Burke, Edmund, 130, 279

- Burnham, James, 153, 326n
 Butler, E. M., 94
 Butler, Nicholas Murray, 39, 113, 282, 349n
 Calvin, 259
 Cantril, Hadley, 189
 Cassirer, Ernst, 116
 Chaplin, Charlie, 157, 211
 Cole, G. D. H., 285
 Cologne Quarterly of Sociology, 27
 Cologne Research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11
 Comintern, 163
 Communist Party of Germany (KPD), 4, 36, 296
 Communist Party and Psychoanalysis, 86
 Comte, Auguste, 78
 Cornelius, Hans, 6 - 8, 20, 23 - 24, 44 - 45, 87, 175, 204; influence on Horkheimer and Pollock, 6 - 7, 20, 23, 44 - 45, 83
 Creedon, Carol, 239
 Croce, Benedetto, 42
 Critical Theory. *See also* Adorno, Frankfurt, School, Horkheimer,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Lowenthal, Marcuse, 5 - 6, 10 - 12, 20 - 21, 34 - 36, 40 - 41, 43 - 44, 46, 49, 51, 56, 61, 63 - 66, 71, 76 - 77, 82, 84, 87, 103, 106, 108, 110, 112, 116, 118, 130, 132, 134, 143, 147, 150, 152, 158, 162, 175, 178 - 180, 182, 198, 200 - 203, 205, 212, 215, 218, 220, 226 - 227, 229, 234, 237, 240, 244, 251, 253 - 254, 268, 277 - 278, 291, 307n; origins of, 41, 43 - 44, 77; 'affirmative culture,' 172, 180, 186, 192, 215, 264, 294; consciousness and being, 54, 59, 84, 268, 271; culture and society, 57, 172, 175 - 179, 197, 213 - 216, 218, 229, 276, 295; understanding of dialectics; 54 - 55, 63, 67, 79, 82 - 83, 117, 128, 157, 181, 207, 218, 278, 294; on domination, 155 - 157, 165 - 166, 246, 248, 256, 260 - 261, 263, 266 - 267,

- Descartes, René, 17, 61, 122, 257 - 258, 269, 271, 321n
- Dewey, John, 89
- Dialectics. *See* Adorno, Critical Theory, Horkheimer, Marcuse
Die Gesellschaft, 28, 74, 148
- Dieterle, William, 194, 212
- Dilthey, Wilhelm, 42 - 43, 48 - 49, 50, 53, 73, 77, 101, 122, 136, 268, 346n
- Dimitrov, George, 163
- Döblin, Alfred, 194
- Dostoyevsky, Fyodor, 137 - 139, 174, 178
- Dünner, Josef, 31
- Duprat, Jeanne, 167
- Durkheim, Emile, 30, 269
- Eastman, Max, 12
- Eckert, Christian, 11
- Eiduson, Bernice T., 196
- Eisler, Gerhart, 5
- Eisler, Hanns, 184, 196, 203, 333n, 335n
- empirical studies. *Se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 Projects
- empiricism (critique of). *See* Adorno, Horkheimer,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 Engels, Friedrich, 9 - 10, 13, 17, 55, 73, 79, 84, 96, 156, 173 - 175, 267 - 268;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94
- Enlightenment, the, 58, 62, 66, 95, 155, 215, 232 - 233, 253 - 254, 257 - 267, 269, 273, 275 - 276, 279, 294
- Epicurus, 147
- Erikson, Erik, 238, 245
- Existentialism, 122, 128, 274, 275

Fabians, 9

Farquharson, Alexander, 30, 38

Fascism. *See* Horkheimer, Institute projects, Neumann, Franz

Favez, Juliette, 113

Federn, Paul, 86, 88

Ferichel, Ottó, 86

Ferenczi, Sándor, 97 - 98, 108, 128

Feuerbach, Ludwig, 53, 56, 345n

Fichtean Idealism, 53

Findlay, J. N., 320n

Finkelstein, Moses I., (M. I. Finley), 149, 284 - 285, 289, 306n

Finkelstein, Sidney, 173

Fischer, Ruth, 171

Fiske, Marjorie, 283

Flowerman, Samuel, 227, 234

Fogarasi, Bela, 5

Ford, Franklin, 169

Fourier, Charles, 57

Fraenkel, Ernst, 144

Frankfurt, University of, 6 - 8, 28, 204, 321n

Frankfurt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 88

Frankfurt School. *See also* Adorno, Critical Theory, Horkheimer,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Lowenthal, Marcuse, 5, 8, 11 - 12, 16, 22, 30 - 31, 33 - 34, 36, 42 - 44, 52 - 53, 60 - 61, 64, 70 - 71, 76, 79 - 80, 89, 101, 103, 118, 121, 123, 129, 135, 137, 144, 155, 158, 166, 171 - 181, 189, 201, 215 - 216, 221, 248, 252 - 260, 262, 266 - 267, 269, 271, 275 - 276, 278 - 279, 281, 287 - 289, 291 - 293, 297 - 298, 344n; Jewish background, 29, 31 - 35, 56, 61, 133, 200, 262, 290, 305n; upper - bourgeois life - style, 31, 36, 292, 293; effect of emigration to America, 39 - 40, 114, 131, 167, 172, 189, 205, 255, 282 - 283,

289 - 290; dominance of Horkheimer, 11, 239, 288 - 289; loss of critical edge, 227, 248, 288, 350n; analysis of culture, 176 - 179, 197, 209 - 218, 224, 264 - 265, 276, 295, 330n, relations with Brecht, 201 - 202, 335n; and the Soviet Union, 17, 19 - 20, 36, 38, 43 - 44, 107, 118 - 119, 153, 156, 196, 228 - 229, 248, 256, 295; and Weber's work, 120 - 121, 259 - 260

Frazer, Sir James, 94

Freies Jüdisches Lehrhaus, 21, 23, 89, 200

Freisler, Roland, 158

Frenkel - Brunswick, Else, 235, 239, 242, 244 - 245, 341 - 342n

Freud, Anna, 88

Freud Sigmund, 35, 78, 85 - 111, 127 - 129, 133, 197, 208, 215, 227, 229, 235 - 236, 238, 267, 269 - 270, 275, 295, 315n, 317n, 346n, 351n

Freytag, Gustav, 136

Friedeburg, Ludwig von, 287

Fried, Hans, 168

Friedmann, Georges, 37

Fromm, Erich, 21, 27, 31, 33, 39, 88, 102 - 103, 106 - 108, 110, 116 - 117, 119, 145, 168 - 169, 190, 200, 217, 222, 229 - 230, 245, 289 - 290, 293, 298, 315n, 319n, 342n; personal background 33, 88; and Judaism, 33, 88 - 89, 315n; relations with the Institute, 89, 98, 100 - 101, 104 - 105;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89, 92; critique of Freud, 89 - 90, 92, 95 - 99, 105, 111, 127 - 128; synthesis of Marx and Freud, 90 - 92; *Man for Himself*, 89, 99, 100; analysis of character types, 93 - 94, 99 - 100, 104, 117, 128 - 129, 132, 162, 193, 227, 240, 316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gma of Christ*, 91, 99; *Psychoanalysis and Politics*, 91; *Escape From Freedom*, 93 - 94, 98 - 99, 101, 104, 112, 117, 119, 128, 314n; matriarchy and patriarchy, 93 - 97, 129, 139, 247, 344n, on tolerance, 97, 227; *The Art of Loving*, 100; study on authority and family, 98,

125, 127 - 129, 131 - 132, 141, 238, 245; critique of Marcuse, 111 - 112; *The Heart of Man*, 112; "The Feeling of Impotency," 190; *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 314n

Fromm-Reichmann, Frieda, 87 - 88, 315n

Geifer, Alois, 286

Gelb, Adhemar, 6, 23

George, Stefan, 9, 23, 94, 178, 204

Gerlach, Kurt, Albert, 9 - 10, 13, 15, 27, 168

German idealism, 25, 34, 43, 47, 53, 56, 262

Gerth, Hans, 31, 296

Gesellschaft für Sozialforschung, 9, 285

Gide, Andre, 336n

Ginsberg, Morris, 30, 115, 167, 285

Glazer, Nathan, 237

Godard, Jean-Luc, 175

Goethe, 41, 105, 136, 174, 179, 201, 203, 209

Goldfrank, Esther, 134, 171

Goldmann, Lucien, 16, 173

Gooch, G. P., 285

Graebner, I., 168

Gramsci, Antonio, 36, 44

Greenberg, Clement, 217

Groddeck, Georg, 88, 97 - 98, 108, 315n

Groethuysen, Bernard, 167

Grossmann, Henryk, 16 - 21, 27 - 29, 37, 44, 55, 84, 87, 113, 124, 145, 151, 152 - 155, 169, 284; personal background, 16, 151; differences with the Institute, 18 - 19, 55, 151, 325n; critique of Borkenau, 17, 151; understanding of Marx, 17 - 18, 55, 151;

Grunberg, Carl, 9, 11 - 12, 14, 16 - 17, 20, 22, 24 - 28, 30, 36, 87, 151, 170, 175; conception of Marxism, 10 - 12

- Hilferding, Rudolf, 18, 22, 28, 74, 163
- Hiller, Kurt, 36, 337n
- Hindemith, Paul, 184
- Hirschfeld, C. L., 30
- Miss, Alger, 301n
- Historicity, 72, 91, 269
- Hobbes, Thomas, 25, 53, 105, 130, 147, 165, 257-258, 321n
- Hofmannsthal, Hugo von, 178, 204
- Hoggart, Richard, 217
- Hoiborn, Hajo, 169
- Homer, 263-264
- Honingsheim, Paul, 38, 113, 167, 294
- Hook, Sidney, 83
- Hooker, Richard, 147
- Horkheimer - Lowenthal correspondence, 83, 103, 116, 188, 206, 212 - 214, 219, 221, 232 - 234, 255, 258, 273, 278, 281 - 283, 287, 290, 340n
- Horkheimer, Maudon, 35, 305n
- Horkheimer, Max, 6-7, 11-12, 16-17, 19-24, 26, 28-32, 37, 39-41, 44-45, 61, 65, 67-68, 75-80, 89, 91, 93, 100, 106, 109, 112-113, 115, 117-120, 122-123, 125, 129-130, 135, 141, 143, 145, 150-152, 155, 158, 164, 169, 173, 175-176, 179, 193, 198, 201, 203, 205, 212, 218-219, 223-224, 253, 280-281, 285-287, 294-295, 298; personal background, 6-7, 35, 172, 220, 234, 255, 281-282, 286; critique of absolutes and eternal essences, 46-47, 52, 55-56, 63, 101, 260-261, 278; artistic inclinations, 22, 175; as "Heinrich Regius," 35, 40, 302n; relationship with Adorno, 23, 65-66, 188, 254; assumes Institute directorship, 24-25; critique of ascetism, 57-58, 276; on authority and the family, 124-127, 156, 240, 246-247, 270; "Authoritarian State," 156, 158, 215, 256, 259; on Bergson, 50-51,

Husserl, Edmund, 24, 28, 43, 51, 56, 68 - 71, 74, 77, 80, 122, 188, 255, 271, 327n

Huxley, Aldous, 111, 178, 196 - 197, 215, 346n

Hyman, Herbert H., 227, 244

Ibsen, Henrik, 126, 139

Imago, 90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See also* Adorno, Critical Theory, Frankfurt School Horkheimer Institute Projects, Institute Publications, Lowenthal, Marcuse; origin of, 5 - 6, 8 - 10; move to Geneva, 29 - 30, 37, 113; European Branches, 26, 30, 113, 115, 131 - 132, 167; relationship to Columbia University, 39 - 40, 44, 114 - 115, 134, 151, 169, 172, 219 - 220, 289; inner circle. *See* Frankfurt School; financial resources, 8, 31, 37 - 39, 114, 167 - 170, 188, 198, 220, 285, 289; methodology of empirical studies, 130 - 132, 134 - 135, 221 - 222, 225 - 227, 234, 239 - 242, 250 - 251, 276; studies of fascism, 141, 143, 145, 150, 152, 158, 160 - 166; support of émigrés, 39, 114 - 115, 168, 296, 318n; return to Germany, 105, 250 - 251, 255, 281, 283, 285 - 286, 291, 298

Institute Projects *The German Workers under the Weimar Republic*, 117; *Cultural Aspects of National Socialism*, 169;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38, 98, 115, 117, 124 - 127, 129 - 135, 139, 141, 143, 147, 167, 172, 194, 222, 227, 237, 240 - 241, 243, 246, 321 - 322n; *Studies in Prejudice*, 133, 170, 172, 218, 221, 225 - 226, 228 - 229, 234 - 238, 248, 250 - 251, 253, 270, 281; *Anti - Semitism in American Labor*, 206, 224 - 226, 229;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86, 105, 117, 131, 196 - 197, 224, 226 - 227, 234 - 235, 342n

Institute publications, 339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21, 26 - 27, 30 - 31, 37, 40, 44, 91, 113 - 114, 134, 136, 151 - 152, 167, 172, 182, 206, 220, 281, 286;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150, 154, 156 - 158, 160, 167, 169, 180, 191, 212, 220, 224, 240;

- Frankfurter Beiträge zur Soziologie*, 106, 286, 317n
-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26
- Jaekch, Ernst, 144
- Jaensch, E. R., 240
- Jahn, Father, 115
- Jahoda, Marie, 235 - 236
- Janowitz, Morris, 235 - 237, 248, 342n
- Jaspers, Karl, 50, 237
- Jewish Labor Committee, 224 - 225
- Johnson, Alvin, 39
- Jones, Ernest, 93, 98
- Joyce, James, 174
- Jung, Carl, 107, 207
- Kafka, Franz, 174, 176 - 177, 196, 336n
- Kant, Immanuel, 6, 21, 43 - 46, 51 - 52, 57, 60 - 61, 66, 97, 129 - 130, 140, 177, 179, 187, 202, 216, 258, 265, 294, 301n, 307n, 321n
- Kapp, Karl Wilhelm, 168
- Karsen, Fritz, 114, 168
- Kautsky, Karl, 10, 17, 79, 92, 150, 268
- Kecskemeti, Paul, 244, 248
- Kehr, Eckhart, 162
- Keller, Gottfried, 136
- Kellner, Dora, 201
- Kellner, Leon, 199
- Kiel School, 157, 327n
- Kierkegaard, Soren, 24, 66 - 68, 115, 139, 174, 177, 207, 257, 273, 344n
- Kirchheimer, Otto, 37, 113, 118, 143, 148, 150, 156, 158, 165 - 166, 169, 172, 290; personal background, 148 - 149, 284; *Punish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149, 158, 172; *Political Justice*, 284; on Nazism 156, 158 - 160, 324n, 236n, 237n

Klages, Ludwig, 94 - 95

kline, George, 82

Koestler, Arthur, 23, 98

Kogon, Eugen 285

Komarovsky, Mirra, 132, 134 - 135, 222, 322n

Konig, Rene, 286

Korsch, Hedda, 5

Korsch Karl, 5, 10, 13, 27, 42, 302n, 306n

Koyre, Alexander, 27, 167

Kracauer, Siegfried, 21, 66; relationship with Adorno, 21 - 22, 66

Kraus, Karl, 23, 183, 209

Krenek, Ernst, 191 - 192, 208, 210

Krieger, Leonard, 169

Kris, Ernst, 102, 116, 227

Lacis, Asja, 201

Lamprecht, Karl, 15

Landauer, Karl, 27, 87 - 88, 131, 168, 290

Landsberg, Paul ludwig, 37, 290

Lang, Olga, 29, 168, 322n

Lasalle, Ferdinand, 156

Laski, Harold, 30, 115, 144

Lasswell, Harold, 114, 212

Lazarsfeld, Paul, 114, 116, 132, 134, 168, 189 - 193, 212, 220, 222, 225, 235, 244, 252, 285, 288, 297; Radio Research Project, 168, 188, 191 - 193, 212, 220, 222 - 223; 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116, 220, 225; criticism of Adorno, 222 - 223

- Le Bon, Gustav, 269
- Lebensphilosophie*, 48-53, 64, 71, 122, 123, 141
- Lederer, Emil, 164, 327n
- Left Hegelians, 41-43, 64, 115, 294
- Leibnitz, 82, 268
- Leichter, Käthe, 131
- Leninism, 53, 79, 130, 148, 158, 174, 179, 193, 336n
- Leonardo da Vinci, 17
- Le Play, Frederic, 124
- Leroy, Maxime, 167
- Levenstein, Adolf, 116, 319n
- Levinson, Daniel J., 235, 239, 341n
- Levinson, Maria Hertz, 239
- Lewin, Kurt, 27
- Librairie Félix Alcan 30, 40, 113, 167
- Lichtheim, George, 302n
- Likert, Rensis, 242
- Lindemann, Hugo, 11
- Lipset, S. M., 346n
- Locke, John, 62, 130, 147, 321n
- Logical Positivists, 62, 297
- Lowe, Adolf, 24-25, 305n
- Lowenthal Leo, 16, 20-21, 24, 26-27, 29-31, 33, 39, 44, 65-66, 83, 87-88, 101-103, 125, 132, 135, 155, 162, 168-169, 172-173, 175, 178, 188, 194, 206, 208, 215, 219-221, 225-226, 228, 232-234, 239, 255-258, 273, 278, 281-283, 287, 290, 293, 322n, 327n, 350n; personal background, 20-21, 33, 283; editor of Institute publications, 21, 132, 136; and Fromm, 27, 33, 88; approach to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135-137; early works, 136-137; on reception of Dostoyevsky in Germany, 137-139, 141, 178, 212; on Conrad Ferdinand Meyer, 137-138, 212; on

Ibsen, 139-140, 212; on Hamsun, 140-141, 265, 267; *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 141; and Neumann, 144; *Prophets of Deceit*, 105, 235, 237, 238; *Literature,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 212; on popular culture, 212-214

Löwenthal, Richard, 152

Lukács, Georg, 4-5, 10, 15, 36, 43-44, 47, 49, 54, 84, 173-175, 179, 181, 201, 268, 296, 306n, 344n;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4, 42, 47, 54, 73-74, 174, 201, 259; *The Historical Novel*, 174; *The Theory of the Novel*, 136, 201

Luxemburg, Rosa, 4, 14, 18, 158

Lynd, Robert, 39, 116, 125, 219, 285, 319n

Maccoby, Michael, 117

MacDonald, Dwight, 217

Mach, Ernst, 45

Machiavelli, Nicolo, 25, 257

MacIver, Robert, 39, 116, 219, 285, 319n

Mackauer, Wilhelm, 168

Maier, Alice, 143, 151, 168, 286

Maier, Joseph, 168, 281, 284

Maine, Sir Henry, 164

Malik Verlag, 24

Malinowski, Bronislaw, 94, 96

Mallarme, Stefan, 262

Man, Henrik de, 31

Mandarins, 11, 36, 293-295

Mandelbaum, Kurt, 26, 37, 152, 284, 290, 325n

Mandeville, Bernard de, 57

Mann, Heinrich, 194

Mann, Thomas, 116, 194, 224; relations with the Institute, 194; re-

lations with the Institute, 194; relations with Schonberg, 195; *Buddenbrooks*, 292; *Doctor Faustus*, 194-195

Mannheim, Karl, 12, 24, 29, 63-64, 81, 288, 291-292, 310n

Marburg School, 25

Marcuse, Herbert, 5, 7, 28-29, 31, 39-41, 56, 58-59, 65, 68, 71, 89, 93, 118, 122, 125, 144-145, 152, 155, 166, 169, 172, 175, 179-180, 188, 194, 203, 212, 215, 219-220, 268, 287, 296, 298, 309n, 321n; personal background, 28, 71, 80, 284; on affirmative culture, 180, 215, 338n; on authority and the family, 125, 129-130, 317n; on Dilthey, 73-74, 77, 122; attitude to empirical work, 76, 129; concept of essence, 77; *Eros and Civilization*, 86, 103, 106-107, 109-111, 245, 256, 271, 284, 314-315n, 346n; interpretation of Freud, 106-112, 271, 275, 312n, 317n, 318n; attack on neo-Freudians, 98, 103, 107-109, 111-112, 129; on Hegel, 28, 73-80, 123, 312n, 318; *Hegel's Ontology and the Foundation of a Theory of Historicity*, 28, 73-74; relationship to Heidegger, 28, 71-74, 76-79, 91, 122-123, 272-273, 311n; relationship with Horkheimer, 76, 78-79, differences with Adorno and Horkheimer, 60-61, 71, 76, 79-80, 109, 111, 119, 288; "On Hedonism," 58-59, 106-107, 181, 263, 276; on labor, 75-76, 78-79, 311n; on Marx, 71, 75, 78-79; on nature, 73, 75, 122, 276, 315n; *Negations*, 180; *One-Dimensional Man*, 59, 166, 180, 212, 216-217, 256, 263, 276, 284, 318n; "Philosophy and Critical Theory," 77-78; critique of political existentialism, 122-123, 146, 273; on reason, 60, 71, 74; *Reason and Revolution*, 64, 73-75, 78, 80, 108, 123, 155, 169, 312n; repressive desublimation, 216; on Sartre, 274-275, 317n; critique of sociology of knowledge, 63-64, 310n; "The Struggle Against Liberalism in the Totalitarian View of the State," 121-123, 137, 261, 326n; *Soviet Marxism*, 284; on theory and practice, 64, 77-80, 84, 310n; on technology, 157; on tolerance, 97, 227

Marcuse, Ludwig, 7, 115

Marx, Karl, 3-4, 6, 13, 15, 18, 32, 42, 44-45, 53-57, 64-65,

72, 74-75, 77-79, 84, 86-92, 99-100, 106-107, 109, 118-119, 124, 126, 130, 133, 148, 152-153, 155, 166, 181, 189, 201, 230-231, 258-259, 261-262, 268, 278, 295-296, 314n, 315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13, 42, 57, 74-75, 89

Marxism, 3, 5, 8, 9, 11, 12, 15, 17-18, 20, 25, 27-29, 36, 40, 42-44, 54, 71, 83, 85, 92, 107, 116, 118, 124, 144-145, 150, 171, 174, 193, 200, 209, 215, 227-228, 248, 258, 269, 273; Orthodox Marxism, 10, 12, 17, 20-21, 42, 44, 46, 49, 53-55, 57, 59, 65, 73, 81, 84, 87, 134, 136, 150-152, 155-156, 163-164, 166, 175, 178-181, 202, 227, 253, 256, 292, 295-296, 306n, 348n; Austro-Marxism, 10, 26

Marx-Engels Institute, 12, 19

Maslow, Abraham, 240

Massing, Hede, 12, 285, 301n

Massing, Paul, 5, 34, 143, 170-172, 220, 224-226, 235, 238, 284, 289-290, 301n, 319n, 328n, 329n; personal background, 170-171, *Fatherland*, 179; *Hitler Is No Fool*, 171; *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 235

Materialism. See Horkheimer, Orthodox

Marxism, Critical Theory

Mattick, Paul, 17, 37

Mayakovsky, Vladimir, 201

Mayer, Gustav, 9

Mayer, Hans, 113-114, 187

McCarren, Pat, 284-285

McCloy, John J., 282-283, 285

McLuhan, Marshall, 81

McDougall, W., 128

McWilliams, Joseph E., 238

Mead, George Herbert, 289, 350n

Mead, Margaret, 114

- Mehring Franz, 136
- Meng, Heinrich, 17, 88
- Mennicke, Karl, 24
- Merleau-Ponty, Maurice, 44, 71
- Merton, Robert, 220
- Meyer, Conrad Ferdinand, 136-138
- Meyer, Gerhard, 37, 113-114, 152, 284
- Meyer, Gladys, 31, 316n
- Mill, John Stuart, 59, 80
- Mitchell, Wesley, 39
- Mitscherlich, Alexander, 127, 321n
- Moeller van den Bruck, Arthur, 138
- Moore, G. E., 314n
- Morgan, Lewis, 94
- Mörgenthau, Hans, 144
- Moricke, Eduard, 136
- Morrow, William R., 239
-
- Nazism, *See* Horkheimer, Institute Projects, Kirchheimer, Marcuse, Neumann, Pollock
- Negt, Oskar, 298
- Nelson, Benjamin, 289
- Neo-Freudians. *See* Adorno, Fromm, Horkheimer, Marcuse
- Neo-Kantians, 15, 120, 202, 260
- Neuling, Willi, 154
- Neumann, Franz, 32, 87, 118, 121, 143, 144, 148-150, 154-155, 158, 160, 161, 164, 166, 168-169, 220, 284, 289, 298, 324n; personal background, 144-145; *Behemoth*, 32, 121, 144, 147-148, 150, 152, 157, 161-162, 165, 169, 327n; theoretical differences with the Frankfurt School, 145, 147, 161-163, 165, 168, 328n; *The Fate of Small Business*

in *Nazi Germany*, 169, 328n; legal studies, 145-147; on Pollock's theory of state capitalism, 163-165; on psychoanalysis, 87, 145, 162

Neumann, Sigmund, 144

New Left, 5, 284, 296

New Objectivity (*Neue Sachlichkeit*), 10, 184, 286, 297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39, 133, 164, 306n

Niebuhr, Reinhold, 39

Nietzsche, Friedrich, 41, 43, 48-51, 53, 58, 69, 104, 115, 122, 174, 192, 215, 259, 265, 277, 308n

Nobel, Nehemiah A., 21, 33, 88

Novalis, 264

Oakeshott, Michael, 272, 279, 347n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168-169

Ortegay Gasset, Jose, 148, 215

Ossietszky, Carl von, 36

Pachter, Henry, 115-116

Pareto, Vilfredo, 130

Park, Robert, 217

Parsons, Talcott, 285

Patti, Adelina, 22

381

Pavlovian Behaviorism, 86

Pepper, Claude, 169

Phelps, George Allison, 238

Phenomenology, 24, 45, 56, 68, 70-71, 77, 87, 203

Philosophische Hefte, 28

Picasso, Pablo, 211

Pinthus, Kurt, 168

Piscator Theater, 15, 24

- Rickert, Heinrich, 202
Rieff, Philip, 86
Rienzi, Cola di, 58, 237
Riesman, David, 217
Riquadies-Weiss, Hilde, 305n
Riezler, Kurt, 24, 28
Ringer, Fritz, 272, 293-294
Robespierre, '58, 237
Robinson, Paul, 106, 275, 317n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34, 223
Röckle, Franz, 10, 286
Rokeach, Milton, 343n
Romantics, 115, 136, 183
Rosenberg, Alfred, 141
Rosenzweig, Franz, 21, 89
Rousseau, 65, 120, 130, 140, 147, 321n
Rumney, Jay, 113, 131-132
Rusche, George, 37, 149
Russell, Bertrand, 92
Ryazanov, David, 13, 19
Rychner, Max, 200
- Sachs, Hanns, 88, 90
Saint-Simonians, 94
Salomon-Delatour, Gottfried, 336n
Salzberger, Georg, 89
Sanford, R. Nevitt, 235, 239, 241, - 341n
Sartre, Jean-Paul, 44, 71, 173; *Antisemite and Jew*, 240; *Being and Nothingness*, 273-275, 338n, 348n
Savonarola, 58, 237

- Scelle, Georges, 30, 197
 Schaar, John, 119, 314n
 Schachtel, Ernst, 116, 131-132, 342n
 Schardt, Alois, 168
 Scheler, Max, 11, 24-25, 51, 55-56, 77, 148, 272, 327n
 Schiller, 179, 289
 Schlesinger, Rose (Mrs. K. A. Wittfogel), 5, 25
 Schlesinger, Rudolf, 15, 20
 Schmidt, Alfred, 287, 298, 311n, 345n
 Schmitt, Carl, 118, 122-123, 148, 273
 Schmückle, Karl, 5
 Schoen, Ernst, 204
 Scholem, Gershom, 198-202
 Schonberg, Arnold, 23, 71, 176, 182-184, 187, 191, 195-196, 215
 Schopenhauer, Arthur, 43-44, 48, 105, 115, 194
 Schopenhauer Gesellschaft, 44
 Schorske, Carl, 4, 169
 Schücking, Levin, 136
 Schultz, Franz, 204
 Scott, Walter, 174
 Second International, 42, 73, 79, 268
 Seiber, Matyas, 186
 Skles, Bernhard, 22
 Sheatsley, Paul B., 227, 244
 Shils, Edward, 247-250, 288
 Shotwell, James T., 285
 Siepmann, Charles A., 212
 Simon, Ernst, 21
 Simon, Hans, 144
 Simpson, George, 191

- Stravinsky, Igor, 182-185
Strinberg, August, 126
Sullivan, Harry Stack, 99
Swabian Pietism, 262
Swede, Oscar H., 12
Sweezy, Paul, 304n
Szabo, Ervin, 306n
- Tarde, Gabriel, 269
Tawney, R. H., 29, 30
Theory and Practice. *See praxis*
Therborn, Göran, 344n, 351n
Thomas, Albert, 26, 37
Thomas, Martin Luther, 238
Thomism, 147, 273
Thurstone, L. L., 242
Tiedemann, Rolf, 199, 201, 209
Tillich, Paul, 24, 25, 29, 31, 66, 285, 304n, 310n
Tocqueville, Alexis de, 217
Töller, Ernst, 293
Tonnies, Ferdinand, 114, 318n
Toscanani, Arturo, 190
Treves, Paolo, 141
Trotsky, Leon, 86, 326n
Tucholsky, Kurt, 293
Tugan-Baranovski, M. J., 18
- Utilitarianism, 57, 59
- Valéry, Paul, 177, 178, 295

- Veblen, Thorstein, 180, 181
Vico, Giambattista, 25, 49, 81, 257, 258, 269
Vienna Circle. See Logical Positivism
Vierkandt, Alfred, 128
Vogt, Karl, 53
Von Stein, Lorenz, 78
- Wagner, Richard, 188, 193-195, 308n
Webb, Sidney, 30
Weber, Alfred, 81
Weber, Max, 43, 54, 81, 120, 121, 241, 259, 260, 293, 344n, 345n
Webern, Anton von, 183
Weil, Anne, 132
Weil, Felix J., 5, 6, 8-10, 15, 20, 24, 25, 31, 32, 124, 134, 152, 172, 225, 285, 286, 296, 301n
Weil, Hermann, 5, 8, 24, 31, 35, 133, 168, 301n
Weil, Kate, 5
Weill, Kurt, 184
Weimar Germany, 3, 4, 10, 31, 33, 34, 34, 116, 144, 145, 148, 162, 163, 194, 287, 293, 297, 298
Wellmer, Albrecht, 298
Weltbühne, Die, 33
Wertheimer, Max, 133
Wiese, Leopold von, 11, 27, 286
Wilson, Edmund, 173
Wittfogel, Karl August, 5, 13, 15-17, 19, 20, 26, 28, 29, 32, 38, 134, 145, 150, 168, 169-171, 290, 298, 301n; personal background, 15; and Communism, 13, 19, 170, 171, 284, 285; on aesthetics, 15, 16, 175; Chinese studies, 15, 16, 134, 322n

译后记

注意到阿多诺在发达国家的声望日隆，本世纪中叶以来，英语世界的学者开始翻译他的著作。可几乎所有怀有善意的译者都未能令阿多诺满意，也没有一个译者愿意再译第二本。语言的隔阂是存在的，阿多诺就认为哲学是说德语的，英语怎么能表达他的“无调哲学”呢？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阿多诺在拒绝现代社会的同时也拒绝其语言，他的写作表述较之康德、黑格尔似更其晦涩难解，甚至他的同事马尔库塞也坦陈“阿多诺的许多段落连我都读不懂。”

8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现代转进日益明朗，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一些问题在中国也初露端倪。于是在写了两本关于中国古典的书后，我便开始留意批判理论，秉“入门须正，立志须高”的古训，第一步便是着手翻译这本在西方学界已有定评的著作。译事之难，古今同慨；而理解批判理论之难，批判理论家自己也多次确认：它需要另一种思维—语言方式。因而尽管这是一本研究、解释批判理论的英语著作，翻译之中也颇费踟蹰。前几年国内的一本译文集也选译了本书第6章的片段，其错漏之多令人吃惊。我不敢说这个译本有多完善，但我确实以超乎自己写作的严肃态度下了一番功夫，尽量做到准确完整，中译本边码为英文原版页码，读者可以据此查对、批评。考虑到中国的接受背景，书名由《辩证的想象》改为《法兰克福学派史》。

本书是根据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3 年第 1 版翻译的，交付出版时，Jay 先生又寄来他为即将问世的本书第 2 版所写的序言和所作的改正，因而这个译本与加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第2版是一致的。

原书的注释、书目、索引一律不译，俾益于读者进一步研究参考；涉及的人物在第一次出现时写明原文（少数常见的除外）；一些专门术语也引出原文；偶尔几处我加了译注。

第5章初稿是王瑞雪女士翻译的，我们曾在长江边的一所中学工作了一年，为纪念那段“患难之交”，89年我们计划合作翻译，只是因为她太忙，只翻译了一章。我永远记着她在83年初凛冽的寒风中所做的勇敢抗争，也祝福她找到自己最佳的生存方式。

1991年底译完初稿后，1992年和1993年的酷暑我曾两度校阅，在耽搁4年后，袁伟时教授慨允收入他主编的《现代与传统丛书》，我又在1995年盛夏作了最后修改。此书问世，首先得感谢袁老师。

Martin Jay先生极为关心本书翻译，多次写信指导，并帮助解决版权问题；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立胜先生仔细校改，避免了若干错误；中山大学英语培训中心杨翔老师耐心解答了不少疑难；宋晶哲小姐在1992年夏代为抄写部分译稿；陈小雨小姐帮助校对英文部分；广东人民出版社余小华女士及其他朋友一直关心本书出版，高情盛谊，在此统致谢忱。

单世联

1995年12月12日于中山大学
荣光堂202室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法兰克福学派史 (1 9 2 3 - 1 9 5 0)

作者 =

页数 = 4 9 5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